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成果系列之一

王家葵 著

陶弘景丛考

滄冬題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弘景丛考/王家葵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3

ISBN 7-5333-1139-6

I. 陶... II. 王... III. 陶弘景(456~536) — 人物研究 IV. B95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803 号

陶弘景丛考

王家葵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2 插页 366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139-6

K·328 定价: 28.00 元

总 序

25年前,著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教授在其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人类行为的四个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8, p. 97)。这一理论有力地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内部结构。就此,去年我曾与威尔逊教授在哈佛的一次学术约谈中表达并一起探讨这样一种思考,即科学不仅是人类特有的用以有效认识和把握自然的知识系统,而且是延伸和增强人类对自然之控制与攻击力的攫能系统;不仅对社会、而且还应对文化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研究,探讨我所说的“文化生物学”。如今,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使人类的攻击性获得了越来越有效的扩张;现代人所受科学之惠可谓不胜枚举,科学文明几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形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赖于科学和它的不断“升级”。在人们眼里,科学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就是我们人格的外化。事实上,过去两百年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福祉,胜过此前的总和。但令人深思的是,宗教与现代科学比肩而立,古老而不衰竭,科学甚至还会受到来自宗教的批判和挑战。科学文明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同宗教引起的社会问题和对生存的关注一起,缠结难分,处身其中的现代人为之困惑。

质言之,宗教千载不已,乃源于人类的一种深切关怀:人类有没有此岸之外存在的可能? 这似乎是一个超出乃至远离现实

逻辑的问题,但却是千古依然的问题,它源于人类自我意识进而人性的升起,以及由此不断膨胀的对外部世界的攻击和攫取的能力及欲望。在已知的世界,只有人类产生了自我意识,与自然母体出现了对象化,提出“认识自我”的命题,认定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于是,人类便不断谋求在日益升级的层面上使自我得以实现。由此而生疑问:难道这么珍贵的生命存在真的会随其物理形态的结束而终结么?在这种张力作用下,天堂、净土、仙境、极乐世界等等,作为人性向着“来世”的不同延展方式,在各种宗教中被描画出来。

同宗教一样,科学源自人性,是人性的外化。随着科学理性在文明中之升起,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用科学来表达和伸张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在现实维度上标示人性的向度。换句话说,科学是人类特有的攫能系统,它是社会共同人格在现实维度的膨胀形式。因此,任何试图对科学采取的否定,都将被视为是对人性与人类意志的威胁和否定,因而是危险的和不可接受的。崇尚科学,以科学为万物之尺度,以科学为文化之正,这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因为,科学这种理性文化使人类从整体到个体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攫能性,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对外部世界的强大攻击力和控制力。科学使人类获得了过去许多宗教承诺的只有进入神界才有的能力(比如战胜许多疾病,延长人的寿命),许多人因此有一种似乎不再需要也不再畏惧上帝鬼神的感觉。这是人性的自然扩张,人类因此不会也不可能放弃对科学的崇尚和追求。

然而,遍阅千万年人类宗教和信仰的沧桑历史,我们却不得不说,人类的内在世界并没有他自己常常表白的那样完美无缺;“荒诞”,以及对更高形式的“荒诞”的需要,似乎也是人性的重要一面。自古以来,社会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人要走向宗教信仰;而且,科学从未回答甚而加以否定的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而这恰恰是人性另一维度长期存在的、有“思想”的人类所难

以避免的问题。这意味着,至少是相对于特定人群而言,科学理性在精神层面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它并不一定能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获得满足,使人获得“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新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说:“宗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事实上,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宗教同科学一样是膨胀着的人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每个人都是从特定的传统中走来;特定的传统造就了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社会就存在于特定传统的外化和更新、流变过程之中。宋代以后,以自省内求为特征的文化思潮渐成其势,中国文化逐步内向化,对外部世界的激情消失,而越来越深地耽溺于内部世界不能自拔。昔日尚具外向性的“格物致知”探索,到明代王阳明那里已被改造为“致良知”的内在学问:“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为“彻上彻下功夫”(《传习录》下)。可悲的是,以这种思想为代表的心性之学长期泛滥,又随封建社会及其道德和价值体系之江河日下,对中国文化之攫能性构成自我阉割,从而注定了近代中国之孱弱。与此同时,传统宗教也经历了由“聚形”到“散形”的过程,昔日传统宗教多已衰弱,其宗教思想和证神体系散入民间,大量新兴民间宗教倡行于世,社会伦理、审美、价值观念多元化,对传统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政治张力陡增,官民冲突不断。而按照历史规律和社会的自组织性逻辑,应有的宗教改革、重整各大宗教(“聚形”)并使新的外来宗教“汉化”的过程,却始终未能出现。而自19世纪,经受侵略蹂躏之苦的中国人似乎看出自己落后挨打的根源在文化,于是民族自强的努力被诉诸于文化变革,这种努力的失败又一再地被归因于自身文化问题。于是,中国人多次强烈地排斥和否定传统,导致传统文化残裂,道德价值观念混乱。这是必须慎思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加深的信仰和道德问题,与过去的年代里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自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确实,传统在不断的被超越中获得生命力,时代在继承和突破中前进;我

们不怕丢掉了破旧的传统、苍白的鬼神,我们怕的是把民族的内在整合性、民族的灵魂也一并丢掉了。

学人当以时代之甘苦为甘苦,以审思既往思虑未来为己任。我们需要斟酌中外,检阅古今,重建我们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应纳入吾人之思,“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解蔽》)。如此,则庶几可臻大道哉。

学问是荒原野草,自本自根,求之不得。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的专兼职科研人员,依各自之学术志趣,就某些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所思所得,皆寒烛心血之凝聚;又选国外部分学术名著加以翻译,一同汇成系列,陆续出版。谨此为序。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姜生

2002年岁末识于泉城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解读陶弘景	(1)
一、死王与生鼠的选择	(2)
二、依违于出尘与入世之间	(6)
三、得作才鬼胜于顽仙	(11)
四、蓬莱都水监与胜力菩萨	(14)
五、解读陶弘景	(20)
第一章 陶弘景交游丛考	(23)
第一节 陶弘景与梁武帝	(23)
一、齐梁更替之际的陶弘景	(24)
二、梁武帝舍道入佛	(25)
三、炼丹与远游	(28)
四、礼塔受戒	(30)
五、进《周氏冥通记》	(33)
六、晚年的陶弘景	(36)
七、余论	(38)
第二节 陶弘景与沈约	(41)
一、竟陵八友与陶弘景	(41)
二、沈约与陶弘景的诗文酬唱	(44)
三、沈约的宗教信仰	(47)
第三节 陶弘景的道教师承及门生法嗣	(50)
一、从陆修静到陶弘景	(51)

二、陶弘景的门生与法嗣	(57)
第四节 陶弘景交游琐考	(64)
一、刘侯、萧铿	(64)
二、萧齐三帝	(67)
三、道友	(70)
四、慧约、昙鸾	(72)
第二章 陶弘景著作丛考	(74)
第一节 历代著录陶弘景著作表释	(74)
第二节 陶弘景著作解题	(82)
第三节 《华阳陶隐居集》研究	(112)
一、现存陶集版本情况	(112)
二、两种陶集内容比勘	(116)
三、新辑陶集的原则及拟目	(118)
第三章 《真诰》丛考	(126)
第一节 诸真降授考	(126)
一、杨、许关系	(129)
二、降灵的目的	(136)
三、余论	(152)
第二节 降真人物考	(153)
一、魏华存考	(156)
二、王褒考	(164)
三、三茅君考	(171)
四、关于周、苏、裴传的讨论	(180)
第三节 论《真诰》的主体思想	(184)
一、张陵之道与杨许之道	(185)
二、黄庭之道	(192)
三、葛洪与许谧	(194)
四、《真诰》与《四十二章经》	(198)
第四节 《真诰》的文献学研究	(204)

一、真迹流传考	(204)
二、陶弘景与《真诰》	(208)
三、《真诰》的文献学价值	(219)
第五节 《真诰》与《登真隐诀》	(223)
一、《登真隐诀》的撰著、流传与亡佚	(223)
二、《登真隐诀》的内容与辑佚	(225)
第四章 陶弘景书法丛考	(240)
第一节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研究	(240)
一、论书启校理	(241)
二、论书启缀合	(246)
三、论书启的时间及相关问题	(256)
第二节 再论陶弘景尊钟卑王之论	(264)
一、陶弘景的书法渊源	(265)
二、梁武帝尊钟卑王之论的背景	(269)
三、再论陶弘景对钟、王的评价	(271)
第三节 《瘞鹤铭》作者平议	(276)
一、《瘞鹤铭》文本的考察	(277)
二、陶弘景与《瘞鹤铭》	(288)
三、皮日休与《瘞鹤铭》	(294)
四、疑问与推测	(300)
第五章 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	(313)
附录一 陶弘景传记资料汇编	(377)
附录二 陶弘景事迹类编	(418)
本书征引(古典)文献一览	(439)
后记	(444)

绪论 解读陶弘景

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研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条下有一段关于方法论的阐述: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

赵瓯北此论虽不乏灼见,^①但毕竟历史人物决不仅是考察家眼中镂刻在木板史书上的平面化的姓名,实质上应该是曾经活动于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真实生动的人物。无论正史或野史,所记录的事件都经过作史者的加工修饰,我们今天能够阅读到的文本,与其说是传主的生平,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史家心目中人物形象的写照,换言之,带有作史者的倾向性。因此,考察历史人物,更应该结合其所立身的历史环境,去分析、考评见诸正史或野乘中有关传主其人的一切举动;只有这样或许能

① 赵说亦有片面之处,王树民作《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25页)于此条下加按语云:“赵氏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易于导致盲目信从官修正史,不可不指出其限度。从另一方面观之,则可有不同之结论。如刘知几曾就唐初所修各史书指出:‘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观其朱墨所图,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史通·杂说中》)即其一例。赵氏书中亦多次引用野史之文以补正史之缺失,尤以《明史》部分为甚,可知其说自有一定限度,惟未明言之耳。”确是持平之论。

够真正深入所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本书研究陶弘景的基本立场。

在六朝道教人物中,陶弘景的传记资料最为详赡,《梁书》卷五十一《处士》、《南史》卷七十六《隐逸》皆为其立有专传,在陶弘景生前有齐永明十年(492)谢朓所作之《陶先生小传》、从子陶翊于齐末作之《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卒后有梁邵陵王萧纶作《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简文帝作《华阳陶先生墓志铭》,唐李渤作《梁茅山贞白先生传》,宋贾嵩撰《华阳陶隐居内传》,此外,元刘大彬《茅山志》、张雨《玄品录》等,亦为研究陶弘景生平的重要文献。通过这些史料,我们能够了解作为宗教家、医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陶弘景的基本情况。^①

陶弘景拥有的头衔虽多,但归根结蒂,真正使其名垂青史的是他道教上清派大宗师的身份,故欲深入了解陶弘景,必须结合六朝的宗教环境加以考查。

一、死王与生鼠的选择

从道家到道教,一以贯之的是“重生”、“贵生”思想,《吕氏春秋·贵生》云: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

^① 关于陶弘景的评价,我们基本同意王明先生在《论陶弘景》一文中的观点:“他(指陶弘景)对于天文历算、地理学、药理学、医学、经学、兵学等都有显著的成就。尤其对于药理学和医学的贡献为最大。同时,他在技术上还铸刀剑,注意工艺制造,对炼丹也抱严格的实验态度。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地方。而且他的文学和艺术的造诣也是相当深的。……综合来观察,陶弘景不失为南朝一个多才多艺的杰出的道教学者。”见王明《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0-98页。

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见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在后来的道教经典中，这一“贵生”命题不断地得到强化，《太平经·乐生得天心法》有云：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

发展到六朝，乃有更为极端的“死王”、“生鼠”之论，题“三天弟子徐氏撰”之《三天内解经》卷上^①云：

经言：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序》亦云：

夫禀气含灵，惟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于生。

在陶弘景的生命历程中，确实面临过“死王”与“生鼠”的抉择。刘宋末年，后来成为齐高帝的萧道成气焰日炽，泰豫元年（472）宋明帝崩，后废帝刘昱即位，道成不臣之心已萌，至元徽五年（477），乃谋废立事，七月，弑废帝于仁寿殿，拥立顺帝刘準，时司徒袁粲以身受顾托，尚书令刘秉为宋朝宗室，皆不欲事二姓，

^① 《三天内解经》有云：“宋帝刘氏是汉之苗裔，恒使与道结缘，宋国有道多矣”。故陈国符、杨联陞、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小林正美、长部和雄、尾崎正治诸氏皆谓此经出于刘宋。说见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題》，华夏出版社，1996年，47页。

乃于升明元年(477)十二月起兵攻萧道成,陶弘景时年22岁,亦积极参与其事,《本起录》云:

先生年二十二,随刘丹阳(秉)入石头城,就袁粲建事,先生与韩贵、糜淡同掌文檄。

未几事败,袁粲、刘秉并死,刘秉二子刘侯、刘陔亦见诛杀,独陶弘景侥幸得脱。《南史·刘秉传》云:

事败,侯与弟陔剃发被法服向京口,于客舍为人识,执于建康狱,尽杀之。

陶弘景素与刘侯交好,《本起录》云:

十七乃冠。常随刘秉尹之丹阳郡,得给帐下食,出入乘厩马。(刘)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时为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与先生日夜搜寻,未尝不共味而食,同车而游。侯与江敳、褚炫等俱为顺帝四友,故最以才学得名。侯作《宋德颂》,连珠七警,当世称绝。

至此陶弘景乃不避危险,亲为殓殮,《本起录》云:

侯及弟陔^①为沙门以逃,为人所获,建康狱死,人莫敢视。先生躬自收殓瘞葬,查硎旧墓,营理都毕,自此弃世,寻山而止。

对于陶弘景此举,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的评价是:

先生终始久要,不遗旧故,虽危疑患难,不求自退也。

^① 《本起录》作“陔”,与《南史》作“陔”不同,然乃兄既名刘侯,则应从《本起录》作刘陔。

但事隔未久,陶弘景却并未如《本起录》所说“自此弃世,寻山而止”,反而做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举动,即投靠萧道成,并得任用。《本起录》云:

值宋齐之际,物情未安,既结刘宗,常怀忧惕。(陶弘景)父乃因纪僧真求事高帝(萧道成)于新亭,即蒙帐内驱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从还东府,公仍遣使侍弟五息暉、六息暉侍读,兼助公间管记事。先生时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

尽管陶弘景父子屈节于萧道成确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毕竟有悖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旨。或者是因为陶弘景在当时位卑名微,故此举未遭物议,但同一事件中的另一位大人物褚渊,却因此而大损令誉。据《南齐书·高帝纪》,褚渊与袁粲、刘秉、萧道成并为宋明帝托孤顾命之臣,时号“四贵”,比道成谋篡,袁、刘皆反,而褚渊独默然,“归心高帝”,故《南史·褚彦回传》有云:

世颇以名节讥之,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褚渊)生。^①

在“死王”与“生鼠”之间,陶弘景选择了生,而仔细分析其思想根源,在其十五岁时所作《寻山志》中已见端倪:

轻死重气,名贵于身,迷真晦道,余所弗承。

另据《本起录》记载,“俟既亡后,文章皆落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上云:“先生乃喟然而叹

① 褚渊之谄附萧道成成为清议所不耻,除上引《南史》本传,《南齐书·刘祥传》亦载一事:“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粲)、刘(秉),安得免寒士。”

曰：人无愚智，同尽百年，所贵身名遗芳寄世，惜乎刘生，名迹俱丧。”则的确是陶弘景生死名利观的真实写照。

当然，陶弘景绝非苟且偷生之辈，当环境压力让他感觉到“义无再辱”的时候，他宁可选择死亡。据《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记载，约在天监七年(508)左右，陶弘景上梁武帝有云：

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为，是独济小道。(原注：委形枕杖，此尸解下法，盖不得旋及故乡，无由更议营合。)若脱尔便逝，不可以为教迹。乃以意启梁武，梁武难之。

究其本事，天监三年(504)梁武帝舍道入佛，尽管武帝对陶礼遇未衰，而作为道教宗师的陶弘景毕竟陷于尴尬境地，更兼梁武帝令其合丹，数次开鼎皆无所成，遂生弃世之念。

由此来看，前引《吕氏春秋》之语“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的确是贯穿陶弘景八十一年生命历程的人生哲学。

二、依违于出尘与入世之间

陶弘景早有离世出尘之心，《梁书》本传云：

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

在《寻山志》中，十五岁的陶弘景更是畅言其对世俗浮名的轻视，和仙道生涯的仰慕：

裘衣缝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庙，趋翔庭宇，传氏百王，流芳世绪，负德叨荣，吾未敢许。

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涓兮弗远，必长年兮可期。

现实生活中的陶弘景远没有那么洒脱，入齐以后，虽一方面从孙游岳“咨稟道家符图经法”，东行浙越，访宿旧道士，寻求杨、许手书真迹，而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仕进。或许是由于萧齐王朝对其曾经参与袁、刘集团的“前科”始终心存芥蒂的缘故，陶弘景的仕途十分坎坷，先后为诸王侍读，拜左卫殿中将军，授振武将军，至三十六岁，始除奉朝请。按六朝故事，奉朝请乃释褐起家之官，品秩甚低。《宋书·百官志上》云：“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故陶弘景意颇快快，其失望之情在所作与从兄书中表露无遗：

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高迈。宿昔之志，谓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①

年三十六始为无品秩的奉朝请，距其四十左右作尚书郎的目标实在太遥远，仕途蹭蹬，转而坚定了陶弘景的退隐之志，永明十年（492）五月，三十七岁的陶弘景拜表解职求去，入茅山筑华阳馆，自号华阳隐居，正式开始了长达44年的隐逸生涯。

有关陶弘景弃官的原因，说法甚多，《南史》笼统地以“家贫，求宰县不遂”为理由，恐不够全面。陶弘景的仙道信仰，仕进的坎坷，固然是重要原因，而陶弘景之所以选择在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其对时机的把握，令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远见，《南史》记有陶弘景晚年对门人说的一段话：

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

① 陶弘景《与从兄书》见《本起录》。

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桓欲就之。且永明间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惟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

分析永明年间的政治局面,武帝次子萧子良鸡笼山开西邸,广纳文学之士,一时俊彦,如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云集门下,形成了以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竟陵八友为中坚的文人集团。竟陵八友之集,绝非单纯的文人声气相投,实有深远的政治动机,^①其目的乃在与早怀异志的西昌侯萧鸾抗衡。至永明末年,萧长懋、子良兄弟与萧鸾的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之势。^②

在陶弘景归隐茅山的第二年,即永明十一年(493)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薨,七月武帝疾笃,萧子良乃积极谋取帝位,八友之一的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杖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其事未遂,萧鸾奉皇太孙萧昭业登殿,即皇帝位,王融下狱死。《《南史·王融传》》次年正月,改元隆昌,四月竟陵王萧子良薨,七月废帝为郁林王,另立恭王萧昭文,改元延兴,十月又废,明帝萧鸾即位,乃尽诛高帝、武帝、文惠太子的后代,至此,竟陵八友乃作鸟兽散。陶弘景在朝时虽未与竟陵之会,但与西邸人物交往甚密,若非永明十年及时抽簪,恐亦不免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由此来看,陶弘景所说:“永明间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惟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的确是肺腑

① 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35页。)中将竟陵八友的性质定义为“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分”,所见甚是。

② 萧鸾本齐高帝(萧道成)兄萧道生子,早孤,为高帝抚育,爱逾亲子,历高、武两帝,恩宠有加,后夺位为明帝。萧长懋素与萧鸾有隙,《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初,太子内怀恶明帝(萧鸾),密谓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当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教解。后明帝立,果大相诛害。”按《南齐书》作于梁代,齐、梁同宗,且梁武帝曾参与萧鸾政变阴谋,《南史·梁武帝纪》云:“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故《南齐书》于齐明帝之事多有隐讳,纪传中涉及萧长懋、子良兄弟与萧鸾的矛盾仅此一处,然检《南齐书·萧子良传》谓子良以郁林王隆昌元年(494)薨,“帝(萧鸾)常虑子良有异志,及薨,甚悦”。则其中秘辛宜多有不为外人所知者。

之言。

出尘弃世的陶弘景，在入山以后其实也没有真正摆脱世俗的干扰。先是齐明帝“敕迎先生出居蒋山，……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饷赐重叠，随意所求”（《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引《本起录》），继以梁武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屡加礼聘”（《南史·陶弘景传》），陶弘景皆婉言谢绝，对齐明帝的请求，陶弘景以诗歌代答辞：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①

而对梁武帝的诏令，则绘二牛以明志，事见《南史》：

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曳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

曳尾之龟典出《庄子·秋水》，庄子辞楚王之聘有云：“往矣，吾将曳尾于塗中。”成玄英疏云：“庄子保高尚之遐志，贵山海之逸心，类泽雉之养性，同泥龟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无为也。”梁武帝以曳尾之龟比拟陶弘景，可谓妥当之极。无独有偶，陶弘景的朋友杜京产，辞齐武帝之徵，亦用《庄子》此典，有云：“庄生持钓，岂为白璧所回。”（《南史·隐逸·杜京产传》）因此，陶弘景之拒绝齐、梁二帝，应非故作姿态，其高隐之名甚至远播北朝，乃有引以为楷模者，唐赵璘《因话录》卷四云：

昔北齐封阳休之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

^① 此诗《华阳陶隐居集》标题作“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未言答何帝之问。考此诗最早见于北齐阳玢松《谈薮》，云为答齐高祖问，而齐无高祖，故《古诗源》引作齐高帝，然高帝时弘景尚未入山，亦不应有此问。颇疑高祖为高宗（明帝）之说，正此年邀弘景出山时之问也。诗谓“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云云，确为明志之辞。

为王。使林远及陶隐居之徒,当必为休之耻矣。

隐沦茅岭并没有钝化陶弘景的政治敏感性,这种政治才干虽未能经时济世,但用于自保远祸也足够了。永泰元年(498),齐明帝崩,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宝卷荒淫无道,陶弘景料知齐祚不久,乃造三层楼,移居其中,不与物接。《梁书》本传云:“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懂得侍其旁。”《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亦云:“永元元年移住,便与物顿隔,外间简牍亦削去。”

深藏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与萧齐王朝划清界限,即《本起录》所说:“先生自永元以来,深托向晦”,而当萧衍兵至新林,时人尚皆心怀犹豫之际,陶弘景已“指毫赞赏”,并遣弟子传送音书,开始了与新王朝的沟通。

直到晚年,陶弘景依然对时局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尝作预制诗,准确地预言了侯景之乱,《南史》云:

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篋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①

应该看到,对于出尘与入世,陶弘景可能一直处于矛盾之中。《梁书》、《南史》皆提到陶弘景“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莫比”,这是反映陶弘景隐逸心态十分关键的一句话,据《史记·留侯世家》,张良虽有“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之愿,而终为吕后所阻,未能果退,真正为陶弘景所仰慕的应该是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的治世功夫——这也正是陶弘景自度拥

^① 《南史》所记固然有夸大之嫌,但以陶弘景的才智,由当时朝野人士空谈玄理,不务实事,梁武帝佞佛舍身,以国家为儿戏等现象,预言梁祚覆没是完全可能的。

有,而从来没有被齐、梁最高统治者,如齐明帝、梁武帝所认可的政治才能。^① 故我们十分同意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中对陶弘景的评价:“陶弘景在齐初和梁初特别热衷政治。其永明末归隐,实以官位卑微故也,未尝忘却现实也。”^②

三、得作才鬼胜于顽仙

《梁书》谓陶弘景“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南史》称其“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其才艺之广博,成就之多端,堪称古今一人,梁邵陵王萧纶作《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有云:

恡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厉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乙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女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诣。爰及卞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钧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

这的确非泛泛谀墓之辞,实乃写实之论。王明作“论陶弘景”,依次以“好学习习惯和在医学、药理学上的贡献”;“天文历算和地理学方面的贡献”;“铸刀剑和炼丹的实验”;“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对于兵学的研究”;“经学著作的特点”为标题,述其学术成就,^③ 所论已详,不劳费辞。

尽管道家学术向来被认为“杂而多端”,^④ 陶弘景以上成就

① 《南史》谓陶弘景在梁代有“山中宰相”之称,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已详加辨正。

②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282页。

③ 王明:《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论陶弘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0-98页。

④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

之多数确实也可以纳入道家文化的范畴,如《本起录》谓其尝作浑天象,以机转之,悉与天相会,自云“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但细绎其思想,确有游移于道家学术之外的地方。在上梁武帝论书启中,陶弘景有一段著名的才鬼顽仙之论:

常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惟充恣五欲,实可耻愧。每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至今犹然。

这一段话的出处,实本于扬雄《法言·君子篇》:

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虚羲、神农殁,黄帝、尧、舜殁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或曰: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实死也。

由此来看,陶弘景所慕的乃是“耻一物之不知”的圣人(才鬼),而非“耻一日之不生”的仙人(顽仙)。无论这段话是否出于陶弘景的本心,^①但站在神仙道教大宗师的立场,的确很不应该,故此论在道教内部曾经受到批评,《桓真人升仙记》有云:

陶隐居聪明过人,雕琢文词,劳神典籍,穷究经旨,好述异事,酷爱山水,栽种松药,心念太高,望登云天。上帝虽

① 陶弘景才鬼顽仙之论的字面意思,确应如正文所论解者。但也要看到,此段与梁武帝论书的时间,乃是在梁武帝废止道教,陶弘景皈依佛门之后(考证见第一章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及第四章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研究”),因此也未必完全出于陶弘景的真实思想。此段才鬼顽仙之论的目的,恐更多地是向梁武帝表明,“我不羡慕道家的仙,我所羡慕者是儒家的圣”,有所谓与道教“划清界限”之意。因此,陶弘景“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及“一事不知,以为深耻”两语,每每成为后世儒士所常引用的典故,而较少为道教人士语及。如明陈继儒有云:“神仙不读书,亦是一俗汉,所谓顽仙不如才鬼耳”。清代大儒阎若璩更以此语为座右铭,集陶弘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见《清史稿·阎若璩传》)。

念，实少真功，徒劳阴力。

但换一个角度看待陶弘景“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一事不知，以为深耻”两语，则的确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作为道教上清派的大师，陶弘景固然不应该怀疑“金丹黄白”的神奇妙用，^①甚至在上茅山之初他还有开炉转炼的打算。^②但入梁以后，梁武帝赐给药具，令其合丹时，陶弘景却很突兀地反问：“吾宁学少君邪？”欲以李少君事为推托。而一旦接受炼丹使命，陶弘景还是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进行操作，其细节皆见《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不赘引。当经历十数年失败，至天监十八年(519)终于有成之际，《华阳陶隐居内传》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描述：

累年所得，一皆埋藏，而十八年飞华虽无杂色，光彩特异，欲试作黄白，以验成否。是夕摄心乞感，忽见有人来，朦胧如烟云中，语云：不须试，试亦不得。今人多贪，忽闻金玉可作，便求，竟毁天禁。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复作叹声云：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渐服自可知。言訖，飒然东去。于是乃不试。

梦中云云，自然是借口，不服、不试才是关键。看来陶弘景本人对“服丹长生”之说也持怀疑态度。陶弘景能有此清醒头脑，自属难得，而且相对于同时代的另一位炼丹家邓郁而言，陶弘景此举更显得明智。据《华阳陶隐居内传》引《登真隐诀》，天监四年(505)不仅有陶弘景为梁武帝炼丹，同时应邀的还有南岳

① 上清派对金丹之道虽不及丹鼎派热衷，但《真诰》卷五亦说：“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沟神丹，不须其他术也，立便仙矣。”

② 《真诰》卷十一陶弘景注有云：“惟启乞垂赐，所不论耳。意欲营转炼之事，亦指此山前临长涧东流水，至幽隐，有形势，若基构有期，当更宣述耳。”因知陶弘景在注释《真诰》之时(齐末)确有在积金岭开炉的打算。

道士邓郁：

(邓郁)宜都夷陵人。天监四年湘州刺史杨公则携邓郁，启闾，进见。权住蒋山，后敕给九转药具，令还山营合。

邓郁传亦见《南史·隐逸》，其卒于天监十四年(515)，《南史》云：

至天监十四年，忽见二青鸟悉如鹤大，鼓翼鸣舞，移晷方去。谓弟子等曰：求之甚劳，得之甚逸。近轻鸟既来，期会至矣。少日无病而终。

邓郁死亡真相则见于《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

时有邓郁之居南岳，敕给九转丹具，令营合。限尽开鼎，上有钟乳霜雪，光明照耀，永无杂色。邓不以献奉，自饵之。(原注：《丹经》说云：乙未^①正月开鼎，云上有钟乳霜雪，下滓作丸，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飞华都不与人，亦无献奉，独将往南岳间，一皆藏之也。)乃云病病，八日去。是夕衡岳本风雪，忽暂明朗。(原注：《登真隐诀》云：邓先生初去，颜色如故，后三日安舆中，停置积日，尸不毁坏。)

看来如果陶弘景也以神丹自试的话，恐怕等不到大同二年，就会提前与南岳邓先生结伴化鹤而去了。

四、蓬萊都水監与胜力菩薩

蓬萊都水監与胜力菩薩两尊号皆是陶弘景自己所加者。“蓬萊都水監”见陶弘景天监十六年(517)所作《周氏冥通记》卷三：

^① 即天监十四年。

昨与思和至太元府，仍诣南夫人论陶某事，乃得由。少时，子良问：申几时？又曰：未测几时，或五年、十年，事虽关我，亦由上府继东华隶司命，未敢为定。赵丞仍曰：且已被东宫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问：召为何职，仙官、鬼官？丞答：蓬莱都水监高光坐治水事被责，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当更选耳。此是仙官，隶司阴府，掌水事，以陶有劳，故得补之。如陶意似不大欲为，此位既仙，陶当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

“胜力菩萨”则见《梁书》：

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两尊号的由来皆与陶弘景被迫事佛有关，欲弄清此事的来龙去脉，不妨先分析陶弘景的宗教信仰。丹阳陶姓为道教世家，陈寅恪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语涉丹阳陶氏，然仅引《本起录》叙陶氏世系，而未能举出切实证据。^①今据陶弘景所作《真诰·真胄世谱》，则知上清派创始人之一许谧的祖父许尚娶陶弘景七世祖陶濬之女，而许谧之妻则为陶濬从子陶威之女陶科斗，由此可以概见陶弘景家庭道教背景之深厚。《真胄世谱》在谈到陶科斗升仙，“入易迁宫受学”一事时，陶弘景还不无得意地加注解说：

长史妇陶威女，虽入易迁，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关许氏五人之数也。

^① 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35—36页。检陈氏所引《本起录》，述十三世祖超至父贞宝事迹皆极简略，无一语涉及道教。

或许是受家庭的熏陶,陶弘景幼年即倾慕道术,而有神仙养生之志,十岁读《神仙传》,十五作《寻山志》,引文皆已见前,此外,年十二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手书《太清诸丹法》;年十八受上道,学《上清太极法》;年二十九从兴世馆主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年三十三到茅山寻求杨、许手书真迹;年三十五往浙越各处访宿旧道士等。以上诸事《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上记之已详,不烦列举,总之,当三十七岁的陶弘景决意弃世时,选择茅山修道,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毋庸讳言,虽陶氏为道教世家,而陶母郝氏却佞佛。《本起录》云:

母东海郝夫人,讳智湛,精心佛法,及终,有异焉。……其年九月,母觉有娠,仍梦见一小青龙,忽从身中出,直东向而升天,遂视之,不见尾。既觉,密语比丘尼,云:弟子必当生男儿,应出非凡人,而恐无后。尼问其故,以所梦答。尼云:将出家。又答:审尔亦是所愿。

这或许与陶弘景后来改事佛法有一定关系,至少在入梁以前陶弘景对佛教无明显排斥之语,^①甚至在此期的著作中还引用佛经典故,如齐永元二年(500)作《肘后百一方·序》有云:

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达众庶,莫不各加缮写,而究括之。

同时期所作《真诰》,^②更将杨、许手书真迹与道书《庄子》、佛书《妙法莲华经》并尊:

① 这一点陶弘景与另一位年辈稍长的道士顾欢不同,顾作《夷夏论》“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南齐书·顾欢传》)

② 《真诰》的撰著年代约在齐建武三年至永元元年(496-499)之间,考证见第三章第四节“《真诰》的文献学研究”。

仰寻道经，上清上品，事极高真之业，佛经《妙法莲花》，理会一乘之致，仙书《庄子内篇》，义穷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万象，体具幽明。

此外，撰著时间不详的“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对佛教也无恶意攻击之词。^①而当梁天监三年梁武帝宣布道教为邪为伪，并令“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法苑珠林》卷五十五《舍邪归正》）之际，作为当时道教的代表人物陶弘景奋起反抗，作《难沈镇军均圣论》，连作八项设问，质疑沈约均圣之论：

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济者，夫为罪莫过于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力，甫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踰乎？若粳粮未播，杀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有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为内惕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硕乖。不审于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否？

其语气之激烈，令沈约几乎难以招架，只好说：“请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②但崇

①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读〈道藏〉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412-416页）对陶弘景此作有所解说，认为所论者两事：佛道两教于形神、生死问题上看法有异；两教所求解脱方法不同。尽管文中略存道高于佛之意，但确无攻击之语。关于此作的时间，我们推测在入梁以前，如后文将要讨论者，天监三年梁武帝舍道人佛之初，陶弘景异常愤怒，乃有“以释理乖方”之论，而天监十一年陶弘景自己礼塔受戒后，则被迫承认佛高于道，而此作论佛道差别，语气尚属平和，故疑为入梁以前之作也。

② 有关沈约与陶弘景《均圣论》之争的背景，详见第一章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

佛之意毕竟来自尚方，非区区陶弘景所能抗衡者，陶弘景所能做的，惟有逃避，即天监七年(508)化名王外兵远走永嘉，而逃避无门，则只能屈服，即天监十一年(512)诣鄞县礼阿育塔，自誓受五大摄戒。

受戒后的陶弘景变得十分谨慎，至少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处处注意与梁武帝一致，如梁武帝自号“皇帝菩萨”，《谈薺》云：

梁高祖崇信佛道，于建业起同泰寺，又于故宅立光宅寺，皆穷极工巧，殫竭财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为奴，朝庭共敛珍宝赎之。有事佛精苦者，辄加菩萨之号，其下书皆云皇帝菩萨。^①

陶弘景梦佛授记曰“胜力菩萨”，胜力二字典出不详，^② 但在茅山事佛之精苦，的确不愧菩萨之号。唐释玄奘《甄正论》卷下云：

其时丹阳陶弘景，性多博识，聪颖过人。身为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阳，静退无为，不交时事。时号贞白先生。又号陶隐居。多所著述，并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于所居地起塔，因佛容像，亲自供养，号曰胜力菩萨。其塔见在茅山朱阳观中，于今不为鸟雀所污。

法琳《辩正论》卷八《历代相承篇第十一》引《陶隐居内传》云：

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

① 《魏书·萧衍传》亦云：“(萧衍)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戒(菩萨戒)，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

② 按，“胜力”在佛经中为佛名，如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所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云：“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其第六佛名曰胜力，彼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亦为佛世界之名，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有“胜力佛刹”。

所以然者，道本无形，但是元气。

佞佛的梁武帝以伤残生命为第一大戒，不仅有《断酒肉文》之作，并于天监十六年（517）十月慎重下诏，宗庙荐羞改用蔬果，事见《梁书·武帝记》。《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亦云：

（天监）十六年，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郊庙牺牲皆代以面，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陶弘景奉此诏旨，在同年所进的《周氏冥通记》中亦慎重申论食肉之害：

（食肉）既吞噬众生，理乖慈育之气，涉乎仁心者，必宜断之以成性，是以仙圣为体，一向绝之。（卷二）

这一段话正是梁武帝《断酒肉文》所说“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意义的发挥，自然能够得到梁武帝的欢心。而此前的道士包括陶弘景在内，似并无禁绝荤腥之举，故《桓真人升仙记》针对陶弘景此举，专门说桓真人（法闾）在茅山：

不烧香、不礼拜，不诵经、不忌荤。

又因其所撰《本草经集注》多以牲类入药，为符梁武帝“不得以生类为药”之旨，乃“以草木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过”。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大同二年（536）陶弘景卒，其遗令载于《南史》，有云：

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褐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复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

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①

陶弘景佞佛之举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并未得到同时或后世道教人士的谅解,《桓真人升仙记》^②托言弘景弟子桓凯升天,陶则因有三是四非,暂不得飞升,其中一条罪过便是:“求真不一,潜神二门,好禅悦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记,作往生文,道释并修。”而宋贾嵩作《华阳陶隐居内传》则将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中有关佛教的一大段话“大造佛像,爰及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梦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启闻,蒙敕许可。葛玄之梦见开土,朱鸾之远望尊仪,何以拟兹通感,正此阖应”。完全芟落,以为尊者所讳。

至于“蓬莱都水监”一号,乃有向梁武帝示弱之意,按《周氏冥通记》的说法,此职虽隶仙班,但品秩甚低,仅为“下仙之上”,且陶弘景也未履任。《周氏冥通记》接着说:“如陶意似不大欲为”,若与论书启中不作“顽仙”之论连在一起,其实是在借机探问梁武帝对仙道的态度。^③后人未能了解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的背景,乃以“蓬莱都水监”为陶弘景的尊号,如宋宣和年间加封陶弘景为“宗元翊教真人”之诰,元刘大彬《茅山志》等,皆作如此称呼。

五、解读陶弘景

如前面四题所论,陶弘景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而给他带来最大痛苦的应该是佛道之争。若按照首引《吕氏春秋·贵生》的标准,陶弘景的人生始终徘徊在“亏生”的层次,而从没有达到过“全生”的境界,这是时代的悲剧。

① 遗令中“道人”指佛教僧侣,以道人居左,道士处右,乃暗含佛胜于道之意。陶弘景生前在茅山所建道坛佛塔亦作如此安排,《茅山志》卷八云:“东位青坛,西表素塔。”

② 《桓真人升仙记》作于梁代以后,但传主桓法阇(传称桓凯)确有其人,为陶弘景弟子之一,此传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桓法阇在当时可能对陶弘景的佞佛持反对态度。

③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

研究陶弘景,真正困难之处并不在文献的缺乏,而是因其一生迭经动荡,个人性格上又复“禁忌太甚”^①,尤其在入梁以后,面临举国崇佛的大环境,陶弘景不仅对许多敏感问题言不尽意,乃至处理一些细节也刻意周密,若非认真分析,极易为表象所迷惑。简举数例:

关于制造浑天象,《本起录》、《梁书》、《南史》都提到陶弘景自谓:“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此语的重心其实在次句,天学历来为朝廷专学,禁止私相授受,于造作仪器,禁令尤严,如《唐律疏议》卷九云:“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徙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②因知陶弘景此说实为杜绝口实,由此来看待其制造浑仪,则能更加理解其好学之笃,“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确是诚心之言。

关于回答梁武帝“宁学少君”一语,除前文已提到婉拒梁武帝的目的外,对照《史记·封禅书》有关李少君的记载,乃知此语是为炼丹可能出现的麻烦预留后路。

在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这类言论尤多,第四章有详细说明。处理细节问题,陶弘景亦一丝不苟,如《周氏冥通记》本是陶模拟《真诰》之作,但为了使梁武帝相信,于记中多处加注释说周子良从未读过《真诰》,在提到周子良的死亡经过,陶弘景还十分小心地描述当时场景,先说周死时“仍见铛中温半升酒”,接着赶快补充道:“又检温铛中,犹如常酒气,瓦盆中已被水盪无气,都不见药,踪迹竟不测,何所因托”,以排除饮药自尽的嫌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非有关陶弘景生平、著作、思想的通论性文字,著者试图通过史料的考据,勾勒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宗教家的、学问家的、书法家的陶弘景形象。全书分五

① 此《桓真人升仙记》对陶弘景的评价。

② 关于历代对私授天文、造作仪器的禁令,参见江晓原《天学真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62-68页。

个专题,分别为:陶弘景交游丛考、陶弘景著作丛考、《真诰》丛考、陶弘景书法丛考、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至于陶弘景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著者已有《神农本草经研究》详论在先,不劳本书喋喋。^①此外,本书对陶弘景的文学成就亦未作深入讨论,此则非著者之长,若仓促立论,终不免为博雅君子所笑,故尔藏拙,敬俟贤能。

考据学问,所忌者约有三端:为符己见,刻意杜撰篡改文献;断章摘句,曲为解说;隐藏证据之不利于己者。此皆著者所深恶痛绝。著者所知见文献尽在本书附录中,供览者检核。

^① 参看王家葵《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年。

第一章 陶弘景交游丛考

陶弘景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宋齐更替时，陶弘景曾从刘秉、袁粲起兵攻萧道成，事败，乃转投萧齐，后因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492）上表辞禄，隐茅山修道。比至萧梁革命，早已退隐山中的陶弘景又积极援引图讖，以示拥戴。入梁34年，梁武帝对陶弘景虽恩遇有加，但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被迫出走远游，作为妥协，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本章拟以陶弘景交游人物为线索，对与六朝宗教史密切相关的几个重大问题，如梁武帝对三教的态度，陶弘景礼塔受戒的动机，上清派的传授次第等，略作探索。

第一节 陶弘景与梁武帝

谈到陶弘景与梁武帝的关系，最为论者乐道的自然是“山中宰相”的典故，语出《南史·陶弘景传》：

（梁武）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惟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救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但深考陶、萧关系，则远非“山中宰相”四字所能概括，综论

如次。

一、齐梁更替之际的陶弘景

陶弘景生于宋孝建三年(456),长萧衍9岁,宋齐之间二人是否已有往还,虽然《梁书·陶弘景传》提到:“高祖(萧衍)既早与之游”,但其他记载皆付阙如,不能确考。^① 陶萧的正式接触应开始于齐梁更替之际。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知帝使人刺己,遂与吕僧珍等以“昏主暴虐,恶逾于纣”,于襄阳起兵叛齐,次年(和帝中兴元年)九月,萧衍督军围建康,十二月入城。当萧衍兵围建康未克之际,时人多存犹豫观望之心,而弘景乃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称颂。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

先生自永元以来,深托向晦,闻义师西下,日夕以覬,及届于新林,便指毫赞赏,遣弟子戴猛之假道传送,行达皂荚桥,不能得造至登石头,复使李嗣公仰奏,即获闻答,时十一月朔日也。时台堞犹自严固,时人惩崔氏复匱,多怀犹豫,先生不疑,庶事必决也。

应该承认,陶弘景尽管僻处深山,但对时局洞若观火,早在永元初,即料知齐祚不久,乃于茅山华阳上馆侧筑三层楼,移居其中,不与物接。《梁书》云:“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僮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亦云:“永元元年移住,便与

^① 检陶弘景与萧衍二人入梁以前经历,陶、萧若有接触,应在永明之初,但当时萧衍为竟陵八友,受萧子良影响,亲近佛法,而陶弘景则从兴世馆主孙游岳受符图,仰慕道术。永明十年陶弘景入山,其后未久,竟陵王薨,萧衍出镇寿春,二人接触的机会更少。故萧齐之时,陶弘景与梁武帝纵有往还,恐亦不深。

物顿隔，外间简牍亦削去。”

陶弘景对萧齐素无好感，当宋齐更替时，陶与其父贞宝曾从刘秉、袁粲起兵攻萧道成，挚友刘侯惨死，入齐之后又甚不得志，职授闲散，永明九年(491)始除奉朝请，乃于次年弃官入山，及齐明帝即位，虽对陶弘景多有恩遇^①，但建武元年(494)明帝诛高、武、文惠诸子，宜都王萧铿仰药死，年十八。陶弘景曾为宜都王侍读多年，与萧铿感情极深，据《南史》云：

初铿出阁时，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云：某日命过。身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著《梦记》云。

正是这些恩怨，陶弘景乐见萧齐覆亡。

陶弘景于萧梁建国并无实勋，史书及《华阳陶隐居内传》、《本起录》等所载诸事，如齐和帝既有禅代之议，而国号未决，弘景乃援引图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南史》)；奉旨尅定登极时日(《本起录》)；造新历，预言梁武帝享祚四十九年(《华阳陶隐居内传》)等，皆只是道士身份的陶弘景于新王朝应尽的“义务”，确很难与《南史》“山中宰相”的美溢相符。至于《南史》提到的“月中常有数信”，应是保存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中的数通“与梁武帝论书启”而已，并无关“吉凶征讨大事”，由此看来，“山中宰相”很可能只是后人附会溢美之辞。而且，天监三年(504)以后，陶萧关系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二、梁武帝舍道入佛

梁武帝素奉道教，即位之初尚独自上章，《隋书·经籍志》云：

^① 齐明帝“潜信道术”(《南齐书·明帝纪》)，即位后对陶弘景多有恩遇，据《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宋明帝三年二月，敕迎先生出居蒋山，先生固辞，并因江祐陈启，乃停。从此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餽赐重疊，随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

“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并于天监二年(503)“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辅，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太平御览》引《道学传》)。至天监三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梁武帝乃舍道入佛，并于佛前自誓忏悔，诏云：

弟子比经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翳，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十一日诏更明确以老教为邪，佛教为正，云：“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事见《法苑珠林》卷五十五《舍邪归正》，又见《广弘明集》卷四。

萧衍立佛教为国教，这样的国家吉凶大事是否预先咨询陶弘景，殆未可知，但梁武帝舍道入佛之先，必有一番舆论声势，陶弘景确实参与了论战。

《广弘明集》卷五有沈约《均圣论》，论后附陶弘景《难镇军均圣论》及沈约答辩。《广弘明集》未载此论的著作年代，据《梁书·武帝纪》天监三年正月，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故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① 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沈约诗文事迹系年》^② 均将《均圣论》系于天监三年，今据文章内容分析，此论恐正是为梁武帝崇佛做舆论准备。

《均圣论》云：

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后佛，其道不异。法身湛然，各由感应，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缘苟未应，虽践迹而弗睹。娑婆南界，是曰阎浮，葱岭以西，经途密迹，缘运未开，

^① 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见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383页。

^② 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578页。

自与理隔。……西国密涂，厥路非远，虽叶书横字，华梵不同，而深义妙理，于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独西限，道未东流，岂非区区中国，缘应未启。求其会归，寻其旨要，宁与四夷之乐，同日而语乎。非为姬公所遣，盖由斯法宜隐故也。

此论的宗旨在于解释佛法晚近始传入中土的原因，为说明佛法思想与孔儒不殊，沈约历数燧人用火、神农播谷、周孔戒杀，悉归结为“佛教之萌兆也”，并结论说：“内圣外圣，义均理一。”

陶弘景明显地不以佛法为然，他针对《均圣论》佛法晚传的原因“盖由斯法宜隐故也”，驳难说：

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事？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济者，夫为罪莫过于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力，甫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踰乎？若粳粮未播，杀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有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为内惕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硕乖。不审于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否？

平心而论，《均圣论》在当时众多的三教论辩文章中，语气尚属平和，而陶弘景的驳难则严厉得多，因此，作为陶弘景老朋友的沈约在《答陶隐居难均圣论》文章的最后，用了极有深意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请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

我们固然不能确定《均圣论》是否沈约奉命之作,但毫无疑问,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作为道士的陶弘景只能噤若寒蝉。当然,天监三年以后,陶与萧的关系也并未疏远,陶弘景有了一项新任务,为梁武帝炼丹。

三、炼丹与远游

《南史·陶弘景传》云: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从《南史》的记载来看,似乎是陶弘景主动以神丹讨好萧衍,^①但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天监三年,夜梦有人云,丹亦可得作。是夕,帝亦梦人云,有志无具,于何轻举,式歌汉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黄陆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阙。宜及真人,真心无难言也。先生初难之,吾宁学少君邪?帝复以梦旨告焉。乃命弟子陆逸冲、潘渊文开积金岭东以为转炼之所。凿石通洞,水东流矣。

这段文字除了揭示梁武帝请陶弘景炼丹的事实外,更可注意的是陶弘景答梁武帝语:“吾宁学少君邪?”这是十分沉痛的一句话。陶弘景是极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于齐永明十年弃官入山,除宗教情结外,求官不遂,抱负未能施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所说:“陶弘景在齐初和梁初特别热衷政治。其永明末归隐,实以官位卑微故也,未尝忘却现

^① 《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与《南史》明显不同:“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

实也。”^①确是的论。梁武帝欲其合丹，说明他在萧衍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由“山中宰相”沦为如李少君般的方士者流，这绝非陶弘景所愿。

据《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载，陶弘景于天监四、五年多次开炉，丹皆未成。而且，天监四年，武帝又诏南岳道士邓郁合丹，《华阳陶隐居内传》引《登真隐诀》云：“（邓）宜都夷陵人。天监四年湘州刺史杨公则携下都，启闻，进见。权住蒋山，后敕给九转药具，令还山营合。”《南史·邓郁传》云：“梁武帝敬信殊笃，为帝合丹，帝不敢服。”

面对这些压力，陶弘景心怀忧虑，乃以地近朝市，岩林浅近为托词，并有移徙远游之心，武帝阻之。《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明年（天监五年）元日，开鼎无成，重九复燧，亟多不偶，限竟开鼎，复无成。先生平居，凜然如斋戒，自摄心转炼，弥能谨笃。至于燃鼎用阳燧，日中取火，盖其精如此。性少睡，未尝昼寝，夜坐往往及晓。常于月明读书，及是为积烟所熏，火下欲不见字，帝知之，送波律烛。先生以为营非常事，宜声迹旷绝，而此山密迩朝市，岩林浅近，人人皆云有望，事丹家酷忌。姑改服易氏，遐遁东迈，当去建晋中。以其山海深旷，民不知道，见所营为无关视听。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为，是独济小道。若脱尔便逝，不可以为教迹。乃以意启梁武，梁武难之。（原注：《集卷》有帝答书：知欲徙卜，想谕请幽胜，谋及蓍龟。但迁徙之日，为当使人，为当使鬼，犹蹶躄因地，其不灭也。）先生撰意直往，不复疑异，惟是心计旁无知觉。

此段可注意者有三，陶弘景几乎打算以死相殉，只是虑及茅山道众的生存，未能实现而已；梁武帝的答书，使人使鬼之问已

①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282页。

属刻薄，“蹶蹶因地”云云，更有天网恢恢之意，这是警告陶弘景，逃避是没有用的；尽管如此，陶弘景出走之志十分坚定，“惟是心计旁无知觉”，尤见其决心。

天监七年四月，陶弘景托言静斋，乃于夜半携从者二人，化名王整官，号外兵，从茅山出走。转道东阳，暂居楠溪青嶂山，僦田自作。

陶弘景在青嶂山住了三年，在此期间，恐梁武帝亦不知其行踪，直到天监十年，按《华阳陶隐居内传》的说法是因为“会荒伦连岁不谐，兼寇掠充斥”，不得已转道往霍山。《茅山志》卷二十《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云：“七年往永嘉楠江青嶂山，十年涉海诣霍山。”另据陶弘景所撰《周氏冥通记》卷一记当时情况：“忽值永嘉人谈述彼山水甚美，复相随渡峤，至郡，投永宁令陆襄，陆仍自送憩天师治堂。”这应是陶弘景出走之后首次与政府接触，若与《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对看，陶弘景当初的出走，确实冒着风险。

在霍山仍患田少乏糠，他乃于次年(天监十一年)六月复还永嘉，八月住木溜屿。会梁武帝遣司徒慧明召弘景，十月，慧明至木溜屿宣敕，固辞不允，乃与之还。至此结束了为期五年的流离生涯。《华阳陶隐居内传》引《登真隐诀》云：

壬辰年(天监十一年)六月，便乘海还永嘉。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墟孤立海中，都无人居，甚可营合。八月，至木溜，见其可居，始上岸起屋。十月，司徒慧明至。于时，愿得且停木溜，与慧明商榷，往复积日，永不敢许，于是相随而还也。

四、礼塔受戒

陶弘景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一事，《南史》、《梁书》无异辞，但两书皆未记受戒时间，《南史》与“弘景末年一眼有时而方”，

《梁书》与“年逾八十而有壮容”句连书，故后人往往误以为系其晚年之事，如宋王质《绍陶录·陶华阳谱》即系于大同二年条，云：“君年八十一。只眼或方，梦胜力菩萨受菩萨记。乃诣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①则付阙如。

今据《茅山志》卷十云：“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武帝有敕迎还旧山，因诣鄮县礼阿育塔，自誓受五大摄戒。既归，入住东涧。”故知礼塔受戒事在天监十一年(512)由木溜屿返茅山途中。

陶弘景以茅山道派领袖的身份皈依佛法，返茅山后又造佛像、起佛塔，如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云：“大造佛像，爰及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梦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启闻，蒙敕许可。”更有甚者，“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辨正论》卷六）。乃至临终遗命：“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南史》）这一切究竟是出于本心，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②我们推测似属后者，否则便无法理解陶弘景在天监三年尚坚决排佛，以“释教乖方”，未及十年，却顶礼膜拜。至少有一件事能反映陶弘景受戒后的心境。

天监十二年闰三月，沈约卒。沈约于梁武帝有劝进之功，但晚年因天监初诛齐和帝事为萧衍所忌，郁郁而终。沈约与陶弘景交往甚密，除前述《均圣论》之争外，《沈隐侯集》中存赠陶诗四首，书启一通，沈约卒，陶弘景有诗哭之，诗云：

① 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见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91-328页。

② 陶弘景礼塔受戒的动机应是研究六朝佛道关系的重要问题，但从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以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此事视为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而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此诗见于《陶隐居集》，题作《和约法师临友人》，未言所哭临友人之姓字。约法师即释慧约，驻锡钟山草堂寺，称草堂法师，弘景曾作《草堂法师传》。考沈约与慧约交谊尤深，《沈隐侯集》中有《与约法师书》、《憩郊园和约法师采药诗》等，又检《续高僧传》卷六记沈约与法师交往事，其略云：

（沈）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满。以沈词藻之盛，秀出当时，临朝莅职，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未）尝以朱门蓬户为隔。……（天监十一年，法师）曰：檀越福报已尽，贫道未得天度。词旨凄然，俄而沈殒。

则此必慧约以诗悼沈约，弘景和之也。诗虽寥寥廿字，而备极沉痛：“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看来，不仅是在哭沈约，也是哭自己。诗称有泪不落十余年，并非虚指，沈约卒时，正梁武帝践祚十二年。这十余年间，陶弘景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的山中宰相，退化为祀灶祭物的李少君，对佛教的态度也由坚决地“以释教乖方”，转变为至心皈命，其胸中的苦闷正借此二十字得到抒发。

尽管陶弘景佞佛一事，在其生前身后颇招物议，如《桓真人升仙记》托言弘景弟子桓凯升天，陶则因有三是四非，暂不得飞升，其中一条罪过便是：“求真不一，潜神二门，好禅悦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记，作往生文，道释并修。”但据《佛祖统记》所载，梁武帝既誓永弃道教，遂于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反俗。茅山道观之所以能在梁武帝灭道浪潮中得以幸存，且不断有敕建朱阳馆、筑太清玄坛、造昭真台、疏浚旧井之举，正与前此陶弘景的礼塔受戒有极大的关系。

五、进《周氏冥通记》^①

受戒后的陶弘景并未放弃道教信仰，就在梁武帝敕废天下道观，令道士皆反俗的当年，即天监十六年（517）十二月十六日，陶弘景忽然遣弟子潘渊文向梁武帝进呈了自己亲手厘定的《周氏冥通记》四卷。

《周氏冥通记》称弟子周子良于去岁十月迁化，生前颇得诸高真降授，或宣诰命，或传真经，陶弘景将残存的诸真语录用《真诰》体例编次为四卷。《冥通记》实陶弘景一手炮制，其内容中最值得注意者有二。

首先，陶弘景透过《冥通记》对杀生问题表明了态度。当时的上清道派似乎并不完全禁绝杀生血食，如陶弘景在入梁以前所作的《本草经集注》中大量使用虫鱼禽兽类药物，其在鹿茸条下有按语说：

野肉之中，惟獐、鹿可食，生则不膻腥，又非辰属，八卦无主，而兼能温补于人，即死生无尤，故道家许听为脯。过其余肉，虽牛、羊、鸡、犬，补益充肌肤，于亡魂皆为愆责，并不足啖。

而佞佛的梁武帝则以伤生为第一大戒，不仅有《断酒肉文》之作，并于天监十六年十月慎重下诏，宗庙荐羞改用蔬果，事见《梁书·武帝记》。^②《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亦云：

（天监）十六年，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① 在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的前一年，即天监十五年，陶弘景与梁武帝有关于钟繇、王羲之书法的通信交流，即保存于《法书要录》卷二中的“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这也是反映陶、萧关系的重要事件，本书第四章陶弘景书法丛考之第一节、第二节有专题讨论，此不赘述。

^② 《梁书·武帝记》云：“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去宗庙荐脍，始用蔬果。”

这些措施固然非针对陶弘景，而检《桓真人升仙记》有云：

（陶弘景）注药餌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之心，实负杀禽之罪。

由此看来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在当时已遭物议，因此，在十六年年底所进的《周氏冥通记》卷二中，陶弘景很明智地借范帅之口告诫周子良：

卿不宜复食肉，食肉，恐先源建卿，幸可慎之，仙药草自足，何急啖此。

并在注释中申论食肉之害：

（食肉）既吞噬众生，理乖慈育之气，涉乎仁心者，必宜断之以成性，是以仙圣为体，一向绝之。

这一注释正是梁武帝《断酒肉文》所说“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意义的发挥，自然能够得到梁武帝的欢心。

此外，在《冥通记》中又有多处借高真之口称赞陶弘景的文字：

陶有美志，为人所投归。（卷一）

问曰：陶氏才识何如？答曰：德操渊深，世无其比。（卷二）

昨所与陶隐居共有辞，欲须雨事，国主忧民乃至，但时运应尔。比诸处屡有章辞，皆不与报。陶既有功行，周方来此，当为验二人之德，不烦谦谦，恐悒望。（卷二）

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问：家师陶公何如？答曰：假令尔如其者，则期真不难也。

陶入下仙之上，乃范幼冲等也。（小字：一本作中仙之中。）
（卷三）

昨与思和至太元府，仍诣南夫人论陶某事，乃得由。少时，子良问：申几时？又曰：未测几时，或五年、十年，事虽关我，亦由上府继东华隶司命，未敢为定。赵丞仍曰：且已被东宫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问：召为何职，仙官、鬼官？丞答：蓬莱都水监高光坐治水事被责，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当更选耳。此是仙官，隶司阴府，掌水事，以陶有劳，故得补之。如陶意似不大欲为，此位既仙，陶当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卷三）

《冥通记》还不失时机地向梁武帝暗示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提到天监十四年陶弘景又有弃世的打算，经弟子劝解始罢，当然，《冥通记》的说法是上仙将召陶弘景，经潘渊文、周子良等上章奏请而免，卷三云：

隐居此年（天监十四年）四月自得梦，应被召，云官府已整，惟印未成。意甚惻惻，径向周说，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营跪信，告潘渊文，为条疏作辞牒，令周共奏请。

另一件事则是梁武帝颇为关心的炼丹，陶弘景有意卖了一个关子，卷三云：“复言合丹事云云。”其后小字：“不知此所道，弗闻，可恨也。”

从《冥通记》的时间来看，周子良入冥与高真沟通，其事开始于天监十四年，次年子良卒，陶弘景托言斋禁，故当时“无由得启闻”，因循至一年以后的天监十六年岁末始进呈，这确实包含有试探萧衍对道教态度的意图在其中。梁武帝的批答很简单：

省疏，并见周氏遗迹真言，显然符验，前诘二三明白，益为奇特，四卷今留之，见渊文并具一一，惟增赞叹。十二月

二十日。

由《冥通记》的内容分析,此文俨然是杨许所受《真诰》的续篇,作为累世奉道的萧衍,自然能够体会陶弘景上此记的用意,故其答辞虽然只有寥寥数十字,且不乏敷衍之语,但毕竟认可了《冥通记》的真实性,这一点已足令陶弘景安心了。

六、晚年的陶弘景

改元普通以后,梁武帝对佛教更加热衷,先后多次幸同泰寺舍身,设无遮大会,升座说经,并自称“皇帝菩萨”。晚年的陶弘景则尽可能地保持低调,现存文献涉及陶弘景晚年与梁武帝交往,仅见以下数事:

普通元年,萧纲(简文帝)授南徐州刺史,召陶弘景,与谈数日,颇为敬重。据《南史》云:“简文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敬异之。”

约在大通初(527-528),陶弘景精心冶制了宝刀两枚,名威胜、善胜,上呈武帝,此二刀颇为萧衍珍爱,故当昭明太子薨后,梁武帝以此二刀赐简文帝,用作传位信物。据《艺文类聚》卷六十引《梁简文帝谢赐善胜威胜刀启》有云:“五宝初成,曹丕先得其一。二胜今造,愚臣总被其恩。”正以魏武帝授魏文帝龙刀为譬。

大通二年,有北魏僧昙鸾闻江南陶隐居广博弘贍,海内宗重,乃入梁访弘景,求本草仙术。昙鸾入梁,先谒武帝,说佛性义大为武帝赞叹,因问及来意,昙鸾说:“欲学佛法,恨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武帝说:“此傲世遁隐者,比屡征不就,任往造之。”(《续高僧传》卷六)需注意这里梁武帝对陶弘景所下的考语,竟然与廿余年前天监初对陶的评价“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全无二致。联系到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中的话:“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

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则陶弘景在萧梁王朝心目中的地位始终只是隐居有道之士，而非“山中宰相”。

陶弘景卒于大同二年，身后哀荣史志载之甚详，不赘引。惟一需要说明的是梁武帝给予的谥号“贞白先生”。据《本起录》陶父名贞宝，字国重，谥用“贞白”，正犯其家讳。考六朝人于家讳避忌极严，陈登原《国史旧闻》“严家讳”条列举《南史》谢超宗、王亮、王珣、殷钧、殷仲堪、王慈诸事，有谓：

六朝之时，自家之讳，已至禁人勿言。……同音之字，甚至亦付之讳。^①

想梁武帝极重孝道，尝有《孝思赋》之作，此或恐无意间犯陶氏家讳，^②但无论如何也反映出梁武帝对陶弘景不够重视。

陶弘景临终作《告逝篇》示门人云：

性灵昔既肇，缘业久相因。即化非冥灭，在理澹悲欣。
冠剑空衣影，镰辔乃仙身。去此昭轩侣，结彼瀛台宾。倘或踵留轍，为子道玄津。

《告逝篇》颇可以看出陶弘景对死亡的从容态度，这倒未必全是修炼所臻的境界，晚年的陶弘景确实生活在痛苦之中。《华阳陶隐居内传》曾记载陶弘景晚年感慨之语：“昔闻幽说，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登晨者，盖三朝有浮名乎。”若取与前引“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为，是独济小道。若脱尔便逝，不可以为教迹”对观，则应知其死志早明，其所以偷生，只是为了顾全大局，由此而论陶弘景礼塔受戒的因缘，昭然若揭。

弘景卒前有《预制诗》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悟昭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583页。

② 梁武帝于谥号亦有刻意为之者，如沈约之谥，《南史·沈约传》云：“（沈约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此处以“贞白”为谥，究竟系有意还是无意犯讳，殆未可知。

阳殿，遂作单于宫。”预言侯景之乱，则再次证明了他不为梁武帝所用的政治远见。

七、余 论

欲准确把握陶弘景入梁以后的遭遇，必须对梁武帝的宗教观有所认识。梁武帝兴塔建寺，乃至披大袈裟升座说经，屡幸同泰寺舍身，其佛教信仰史载甚明，诸家亦无异辞。但梁武帝登极后对道教的态度究竟如何，因天监三年舍道人佛之诏仅见释典，故少为论者采信。另一方面，梁武帝有《述三教》诗之作，又复礼遇茅山宗师陶弘景，研究者往往据此得出梁武帝调和三教的结论。^① 我们不完全同意此观点，首先看梁武帝的《述三教》诗：

少时学周孔，弱冠勤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
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
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遣阴德，显证表长龄。晚年开释
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示教惟平等，
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著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
非三英。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明。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
荣。心想起异解，报应有殊形。差别岂作意，深浅因物情。

《述三教》诗作于何时，不能确考，诗中虽推重佛教，确无排斥道教之意。但不容回避的是《佛祖统纪》卷五十四中的记载：

梁武帝天监三年，率群臣士庶发菩提心，永弃道教。十

① 其实，对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和以梁武帝为代表的梁朝“国家信仰”，应加以区别，就梁武帝个人而言，他绝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如后文所论，他绝对不会容忍外道——譬如道教——的存在。而出于国家政治利益和全局安定考虑，梁朝的“国家信仰”固然是佛教，但对道教确也有宽容的一面，在此意义上言梁武帝所代表的“国家信仰”有三教调和的趋势，亦无可厚非。即如下文所引《佛祖统纪》“十六年，敕度天下道观，道士皆反俗”一事，即使真有此诏，恐也未必严格执行，如《茅山志》卷二十载普通三年领道士正吴郡张绎所立《九锡真人三茅君碑》，“领道士正”一职，必出朝廷敕封，可见道士并未完全禁绝。至于茅山道观，天监以后更见兴盛。

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反俗。

由此确可看出，梁武帝绝不是三教并尊，而是抑道扬佛。关于梁武帝的佛教观，汤用彤先生的观点颇值得重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梁武帝有云：

武帝原在竟陵王门下，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当由家世之熏染。而中年之改奉佛，当由其在竟陵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游，而渐有改变也。武帝一热烈之佛教信徒也。即皇帝位三年乃舍道归佛。……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①

汤先生将梁武帝信仰的转变与其竟陵八友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确有见地，事实上，武帝即位之初，其崇佛心态已露端倪，《华阳陶隐居内传》记天监元年将行禅让之礼，诏令陶弘景择日，引《本起录》佚文云：

春末夏初，当就昭告，沈约宣旨，又请剋日。先生虽疏数日，而正拣四月八日丙寅也。

“正拣四月八日丙寅”云云，语意不甚分明，《华阳陶隐居内传》续引《本起录》云：

乙丑（四月初七）夜，凝云洒雨，朝廷深虑致疑，诘朝迟明，登坛焚燎，受终礼毕，鸾驾还宫，百司陪庆，冥夕之间，雨复滂沛，朝廷扼腕，莫不谓天命矣。

由此知梁武帝未用陶弘景所择日期，而自决为四月初八，究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1年，341页。

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此日系佛祖圣诞。

分析梁武帝的宗教倾向,自不能脱离其帝王身份。帝王的宗教信仰不外两种原因,一者属于发自内心的虔诚敬信,一者则是怀有政治目的的权宜之计。梁武帝之于佛教,自然是出于前者,这由其即位四十八年间的一切举动可为证明。^①那么,从宗教的排他性出发,即使是号称具有“包容性”的佛教,也未必能够容忍外道——譬如道教——的存在,这亦有梁武帝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令道士返俗为证明。

反观梁武帝与陶弘景的交往,请陶弘景、邓郁等炼丹合药,这是个人长生的需要,且并无悖佛家戒律,如前引北魏高僧昙鸾访陶弘景,索求本草仙术。而梁武帝之礼遇陶弘景,更多地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试观齐梁之际的佛道关系,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皆奉佛护法,至延兴元年(494)十月萧鸾废恭王萧昭文称帝,即齐明帝,明帝一反高、武及文惠太子的崇佛政策,转奉道教,《南齐书·明帝纪》称其“潜信道术”,于陶弘景礼遇有加,据《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云:

及齐明帝践祚,恐幽祇未协,固请隐居诣诸名岳,望快展敬。遂周旋五郡,经历三年,事迄,迎还。令憩钟岭。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餉赐重叠,随意所求。

不仅如此,明帝又有敕为薛彪之立洞天馆于大茅山东岭,事见《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引《道学传》。检《真诰》卷十一中有一段陶弘景注文,或即当日茅山香火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

今腊月、二月多寒雪,远近略无来者。惟三月十八日,

^① 梁武帝之佞佛,兹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14—315页所列,略举数事:天监五年征扶南僧人于寿光殿译经,初翻经日,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建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脱、开善诸寺,备极宏大;常设大会,数次舍身;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欲自为白衣僧正,经智藏斥阻而止;断食血味,日惟一食等。

辄公私云集，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

因此当萧衍兵至新林，陶弘景指毫赞奖，并遣弟子戴猛之奉表称颂之举，其实代表着道教势力对“义兵”的拥护，此举也为梁武帝即位后对陶弘景的礼遇种下了前因，更何况陶弘景作为有影响的道教领袖人物，梁武帝出于大局考虑，也不得不加以笼络。

再看陶弘景方面，为了茅山道众的生存，陶弘景能做的只有两事，一是逢迎，如在上梁武帝论书启中对萧衍书法的夸赞，几乎到了肉麻的程度^①；如果这还不够的话，那就只有屈从，即本篇反复讨论的礼塔受戒。

第二节 陶弘景与沈约

陶弘景一生交游甚广，早年有刘侯、萧铿，中岁有沈约、谢朓，晚年有庾肩吾等。其中陶沈交谊最可注意，沈陶二人，一位是永明文学的主将，一位是齐梁道教的宗师，透过二人的交往，颇能反映齐梁政治、宗教、学术的交互影响。

一、竟陵八友与陶弘景

沈约生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长陶弘景十六岁。迄刘宋末，陶弘景先后为司徒左长史王钊子王昊博士，随父贞宝从吏部尚书刘秉至淮南、丹阳，起兵攻萧道成，与沈约似无往还。

见于记载的陶沈首次接触，始于齐武帝即位之初的建武四年(482)。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桂阳王登双霞台，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从宜

^① 详见本书第四章。

都预焉。桂阳采名颂号,各令为赋,寔十题器中,先生探获水仙,大惬意。沈约、任昉读之叹曰:如清秋观海,第见澶漫,宁测其深。其心服如此。

《水仙赋》今存《陶隐居集》中,其中警句云:

循有生之造物,固莫灵于在人。宁不踵武于象帝,入妙门而自宾,苟沦形而无晓,与蝼蚁而为尘。亦有先觉之秀,独往之英,窥若士于蒙榼,求吕梁于石城,从务光于砥柱,索龙威于洞庭,迎九玄于金阙,谒三素于玉清,更天地之弥固,终逍遥以长生。

此赋颇申其慕仙出尘之志,^①宜其为沈约、任昉赞叹。

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梁书·武帝纪》云:

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据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所论,八友的形成时间当在永明五年前后,^②分析陶弘景当时的情况,既有《水仙赋》沈任称誉在先,复作《清溪宫颂》武帝褒赏于后,^③永明初诏拜左卫殿中将军,据《本起录》云:“太元以来,此官皆用名家,裴

① 陶弘景少有出尘之志,《梁书·陶弘景传》云:“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覩白日,不觉为远矣。”

②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29页。

③ 陶靖《本起录》云:“(永明二年)年二十九,清溪宫新成,(齐武)帝宴乐之,先生拜表献颂,又有伏曼容亦上赋。于是勅遣中书省舍人刘系宜旨褒赞,并敕豫旧宫金石会,于时上意欲刻此颂于石碑,王俭沮议而止。时献赋者五人,惟以先生为最。”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亦云:“齐代好治宫室,方修苑囿青溪旧馆,更就起筑,仍奏表上颂,辞事兼美,迈彼乐职之篇,逾乎景福之制,帝省览久之,益以为善。”

松之从此转员外郎”。皆能概见陶弘景在当时的名望，何以不与竟陵之会，揆其原因，恐有三端。

宗教信仰分歧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萧子良素以佞佛著称，《南齐书·萧子良传》谓：“（子良）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又云：“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受其影响，八友亦倾向佛法，当范缜作《神灭论》时，八友中沈约、萧衍、王融、萧琛、范云、陆倕等皆积极参与论辩。而陶弘景少慕仙道，《华阳陶隐居内传》云：“自云年十二时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欣然有志。”永明年间更忙于从兴世馆主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往浙越各处访寻隐逸，搜求杨羲、许谧、许翊真人手书真迹，其不参与竟陵集团，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陶弘景与萧齐素有嫌隙，早在刘宋末季，袁粲与刘秉等谋诛萧道成，弘景亦参与其事，“与韩贲、糜淡同掌文檄”（《本起录》），事败，陶弘景侥幸得脱。尽管事后萧道成用弘景为第五子暉、第六子暕侍读，除巴陵王侍郎，但不被信任也是必然之事。再分析永明时期的政治局面，萧子良为武帝次子，声誉甚隆，而后来成为齐明帝的萧鸾则素怀异志，竟陵八友之集，绝非仅只文人的声气相投，更有深远的政治动机。故当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齐武帝先后薨崩，八友积极拥立子良。事败，萧子良死，王融被杀，沈约、谢朓等尽被排挤外任，及萧鸾登皇帝位，乃诛高、武、文惠诸子，这的确印证了陶弘景对时局的看法：“永明中求禄，得辄差舛。”^① 其远离永明时期的政治纠葛，实属明智之举。

门第亦是因素之一。竟陵八友多出大姓甲族，谢朓、王融出

① 此陶弘景告门人语，见《南史·陶弘景传》。全句为：“永明间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惟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亦可看出陶弘景在永明年间韬光养晦是有意为之，意谓倘无当日之退隐，则无今日茅山宗师之荣耀。

身王谢世家,陆倕、沈约属吴姓望族,萧衍、萧琛并为皇室姻娅,任昉、范云门第稍逊,乃祖乃父亦有勋业可供矜夸。而陶弘景虽非寒素,但与前八人相较,的确相形见绌。宋齐故事:“甲族二十登仕,后门过而立试吏。”(《梁书·武帝纪》)陶弘景年三十六始除奉朝请,其非“甲族”也必。^①

尽管陶弘景不与竟陵之会,但他与西邸人物颇有交往,如《华阳陶隐居内传》所云:

齐梁间侯王公卿从先生受业者数百人,一皆拒绝,惟徐勉、江祐、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谢朓、谢览、谢举等,在世日早申拥簪之礼,绝迹之后,提引不已。

六朝人文集散佚太半,竟陵八友与陶弘景有文字酬答者,今仅能检得沈约、任昉、萧衍、范云、谢朓五人^②,以下重点讨论陶弘景与沈约的关系。

二、沈约与陶弘景的诗文酬唱

陶弘景以永明十年(492)拜表解职求去,隐于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自号华阳隐居。又明年,沈约除东阳(今浙江金华一带)郡守,据《梁书·陶弘景传》云:“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今《沈隐侯集》中《与陶弘景书》应即当时所作,书云:

① 丹阳陶姓固非寒门,《本起录》罗列了从汉初陶舍以来的一系列陶姓人物,但陶氏在南朝绝非大姓,另一件事亦可间接证明。当陶贞宝、弘景父子从刘劭反萧道成失败后,贞宝“因纪僧真事求高帝(萧道成)于新亭”(《本起录》)。检《南史·江革传》,纪僧真乞作士大夫,乃奉武帝旨诣敕,敕“移床让客”。此可以概见当时士族对寒门的态度,而陶贞宝之屈交纪僧真,亦可推知当日陶家与高门往还不多。

② 范云有《答句曲陶先生诗》,见《文苑英华》卷二二七。《陶隐居集》中有《与谢中书(谢朓)书》。另据《本起录》陶弘景曾为《述异记》作序,按,祖冲之、任昉皆有《述异记》之作,从陶弘景与任昉的关系来看,此序极有可能是为任昉《述异记》而作。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独远，列霓羽带，总辔云霞。方当名书绛简，身游玄阙，凭星夕卧，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暖焉难睹。虽欲下风问道，未知厥路。若夫栖迟间远，咀嚼琼芝，出入清都，师友灵圣，循崖反迹，无缺惟心。

尽管陶弘景未能如约到郡，但与沈约唱不绝，今本沈约集中尚存沈赠陶诗四首，其中《华阳先生登楼不复下赠呈》、《奉华阳王外兵》、《还园宅奉酬华阳先生》三首^①最可窥见陶沈交谊。

齐明帝崩后，国事堪忧，陶弘景已预见齐祚不久，乃于茅山华阳上馆侧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懂得侍其旁”（《梁书·陶弘景传》）。据《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亦云：“永元元年移住，便与物顿隔，外间简牍亦削去。”沈约乃作《华阳先生登楼不复下赠呈》云：

侧闻上士说，尺木乃腾霄。云骈不展地，仙居多丽谯。卧待三芝秀，坐对百神朝。衔书必青鸟，佳客信龙轺。非止灵桃实，方见大椿凋。

梁天监七年，陶弘景因为梁武帝炼丹未成，乃化名王整官，号外兵，从茅山出走。沈约作《奉华阳王外兵》云：

餐玉驻年龄，吞霞反容质。眇识青丘树，回见扶桑日。烂熳蜃云舒，嵒崑山海出。

考以上两诗之作，一成于陶弘景“与物遂绝”，“外间简牍亦削去”之际，一作于带有避难性质化名出游的非常时期，^②因此，二诗文辞虽然平易，但绝非泛泛的文字应酬，确蕴涵有老朋友

① 另一首为《酬华阳陶先生》，诗云：“三清未可窥，一气且空存。所愿回光景，拯难拔危魂。若蒙九丹赠，岂惧六龙奔。”

② 陶弘景化名出游的原因详前节“陶弘景与梁武帝”。

友的关心、理解在其中。

陶之于沈，也如沈之于陶，尽管陶集中仅存一首沈约挽诗，但相关记载仍可看出陶弘景对沈约的感情，《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沈约尝因疾遂有挂冠志，疾愈，复流连簪绂，先生封前书以激其志。约启云：上不许陈乞。先生叹曰：此公乃尔寒薄。

按，沈约因老病乞骸骨事在天监九年，《南史·沈约传》云：

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以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欲谢事，求归老之秩。勉为言于帝，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

陶弘景劝慰沈约的书信已不可见，但由《南史》、《梁书》的记载来揆度沈约当时的景况，其晚年已渐失宠，若听从陶弘景的劝告，及早抽簪，也就不至于有其后一连串的尴尬事发生了。《南史·沈约传》云：

初，帝有憾于张稷，及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洲刺史，已往之事，何复足论。帝以为约昏家相为，怒约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帝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约尝侍宴，会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约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疾，上遣主书黄穆之专知省视，穆之夕还，增

损不即启闻，惧罪，窃以赤章事因上省医徐奘以闻，又积前失。帝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

沈约既卒，陶弘景有《和约法师临友人》诗哭之：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诗称“友人”而不名，其亲密程度可知。寥寥二十字，全用白话写成，平易流畅，若比较为人盛称的沈约《伤王融》等怀旧九首，陶的挽诗恐更符古人“至哀无文”之旨。

三、沈约的宗教信仰

真正将沈约与陶弘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道教信仰。沈约出身道教世家，据沈约《宋书·自序》云：

（高祖）警字世明……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旺族，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

毋庸讳言，在沈约集中，佛教题材的文字多于道教内容，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他与驻锡钟山草堂寺的慧约法师的交谊，似也深于隐居茅山的陶弘景。但或许是受家庭的影响，沈约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道教，以下一些事实可为证明。

沈约早年从茅山兴世馆主孙游岳受道，《茅山志》卷十云：“一时名士沈约、陆景真、陈宝识等咸学焉。”^①永明七年（489）孙游岳卒，沈约复从陶弘景游，《太平御览》卷六七九引《三洞珠囊》

① 《云笈七籤》卷五齐兴世馆孙先生条的说法不同：“孔德彰、刘孝标等争结尘外之好。”语不及沈约，或二书互有脱讹。

云：“梁高祖太子从(陶弘景)而受道，梁简文、邵陵诸王、谢览、沈约、阮忻、虞权并服膺师事之。”引文中宜注意的是“师事之”一语，沈约虽年长于陶，但陶既承上清法嗣，故沈虽为孙游岳弟子，游岳卒，仍得以师事弘景，这一情形与乃祖沈警师事杜子恭、孙泰、孙恩三代正同。

永明年间沈约为西邸上宾，入梁后为武帝肱股，因萧子良与萧衍皆佞佛，故在这两个时期，沈约或受命、或奉敕撰写了大量有关佛教的诗文疏论，如《均圣论》、《究竟慈悲论》、《佛记序》、《内典序》、《千佛颂》、《弥勒赞》、《竟陵王发讲疏》等。同时也积极参与佛会，忏悔皈依，《广弘明集》中的《忏悔文》、《千僧会愿文》、《舍身愿疏》等皆当时礼佛舍身之作。从以上文章内容分析，我们决不怀疑沈约的佛教信仰，但与梁武帝舍道入佛后斥老子之教为邪说异端明显不同的是，沈约无一语贬斥道教，乃至在自作《忏悔文》、《舍身愿疏》中，以优婆塞的身份迭数自己过去身、现在身种种罪愆，一皆忏悔，但于事道之事居然只字未提。

齐明帝践祚以后，“潜信道术”(《南齐书·明帝记》)，对陶弘景恩遇有加，无独有偶，沈约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也以道教题材居多，如被何义门(焯)评为沈诗压卷之作的《游沈道士馆》即作于永泰元年(498)。^①张松辉在《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中专门谈到沈约作于永泰元年的《桐柏山金庭馆碑》，据碑文称：

自惟凡劣，识鉴鲜方，徒抱出俗之愿，而无致远之力。早沿幽栖，屏弃情累，留爱岩壑，托分鱼鸟。涂愈远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圣之德，结崇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末自夏汭，固乞还山。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圣主缵历，复蒙縈维。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憩之山，实惟桐柏，灵圣之下都，五

① 据陈庆元《沈约集校笺》认为此诗与《金庭馆碑》皆沈约永泰元年在剡时所作。

县之余地。……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约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甯景穷麓，结愿志于玄都，望霄客于云路。

张松辉据此认为“沈约早年即入山修道，中间因编修历法出山一段时间，于永泰元年(498)又退居桐柏山，成为金庭馆中的十道士之一”^①。尽管张说不被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采信，^②此碑的本事亦存在争议，^③但对照沈约晚年所作的《与徐勉书》有云：

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事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于徐令，想记未忘。^④

其“建武肇运，人事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句，似隐指《金庭馆碑》所称齐明帝建武时权憩汝南，旋被召回。“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句，则能与碑称永泰元年明帝崩后隐居桐柏符契。姑不论沈约是否曾经退隐桐柏，他的道教信仰通过此碑确也暴露无遗了。

沈约晚年因天监初诛齐和帝事内心不安，梦和帝“剑断其舌”，沈约采取的禳解措施居然也是道教的“奏赤章于天”，而不用佛教的超度忏悔。故我们十分同意陈庆元在《沈约集校笺·前言》中所下的结论：“沈约依违于道释之间，佞佛乃逢时之意，骨

① 张松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3页。

② 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沈约诗文史迹系年》据《金庭馆碑》认为沈约永泰元年曾短暂暂憩止于桐柏山金庭馆，其观点与张松辉接近。而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皆未记此事。

③ 按，对此碑文义的理解，历来有分歧，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三云：“《金庭馆碑》，南齐征虏将军南齐太守司徒左长史扬州行事沈约造，扬州刺史驍骑记室倪珪之书。据记称，永泰中定居桐柏岭，因地名建馆曰金庭宫，命置道士十人而已，为之首，盖道士自叙之言，非约所撰。其谓造之者，疑如后世所立碑之类耳。永元三年立。”

④ 见《梁书·沈约传》。

子里所遵奉的却仍然是道。”^①

分析了沈约的宗教信仰，回头再看沈约的《还园宅奉酬华阳先生》诗，由诗中“徒叨令尹秩”句，知为沈约天监三年拜丹阳尹时所作，诗云：

早欲寻名山，须待婚嫁毕。二事虽云已，此外复非一。
忽闻龙图至，仍睹荣光溢。副朝首八元，开壤赋千室。冠纓
曾拂露，风雨未尝栉。鸣玉响洞门，金蝉映朝日。惭无小人
报，徒叨令尹秩。岂忘平生怀，靡盬不遑恤。

在前节中，我们提到天监三年初沈约与陶弘景关于《均圣论》的辩论，怀疑《均圣论》是沈约奉命之作，因此沈在《答陶隐居难均圣论》文中用了大有深意的一句话：“请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劝戒陶弘景停止争论。如果所论不误，此诗当作于沈陶《均圣论》论辩结束以后，诗的结句“岂忘平生怀，靡盬不遑恤”，“靡盬”，不止息也，用《诗·唐风·鸛羽》“王事靡盬”之典，正暗示《均圣论》出自上方，系不得已而为之者。这的确是诉说衷肠之语。^②

第三节 陶弘景的道教师承及门生法嗣

陶弘景是道教上清经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按《真诰·叙

① 关于沈约的宗教信仰，陈寅恪亦有类似看法，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陈云：“吴兴为滨海地域，沈约为林子之孙，穆夫之曾孙，警之玄孙。警、穆夫皆孙恩妖党。恩败，几举族殉之。据此，则休文受其家传统信仰之熏习，不言可知。……按，沈隐侯虽归命释迦，平生著述如《均圣论》、《答陶隐居难均圣论》、《内典序》、《佛记序》、《六道相续作佛义》、《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究竟慈悲论》、《千僧会愿文》、《舍身愿疏》，及《忏悔文》等，皆阐明佛教之说。迨其临终之际，仍用道家上章首过之法。然则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消除，有如是者。”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37-38页。

② 严格说来，此诗从字面理解，以“早欲寻名山”起，述久存退隐之志，用“靡盬不遑恤”结，谓王命不已，退隐之志不得申，丝毫不涉及《均圣论》之争。但如果此诗确与《均圣论》为先后之作，则“岂忘平生怀，靡盬不遑恤”十字完全可能别有所指。

录》的说法,上清经为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南岳夫人降授杨羲、许謐者。而上清经派的发扬光大,并最终在南朝一枝独秀,陶弘景厥功甚伟。故分析陶弘景的师承受授,应是澄清上清经系发展嬗变中若干谜团的关键。

一、从陆修静到陶弘景

茅山谱系最早见于唐李渤所撰《真系》,其略云:

自晋兴宁乙丑岁,众真降授于杨君,杨君授许君,许君授子玄文,玄文付经于马朗。景和乙巳岁,敕取经入华林园。明帝登极,爰季真启还私廨。简寂陆君南下,立崇虚馆,真经尽归于馆。按《黄素方》,因缘值经,准法奉修,亦同师授。其陆君之教,杨、许之胄也。陆授孙君,孙君授陶君。陶君搜摭许令之遗经略尽矣。陶君授王君,王君又从宗道先生得诸胜诀云。经法秘典,大备于王矣。^①

其后《茅山志》即据此分别以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王远知为茅山第七、八、九、十代宗师。^②但综考齐梁间的文献,陶弘景所得上清真经,并不主要来源于陆、孙传授,而且陆修静、孙游岳对上清经的态度,也远不及陶弘景热衷。

据陶弘景《真诰·序录》称:“京师及江东数郡,略无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尔。”这尚只是说王灵期所造作的真伪参半之经“江外尚未多”,至于手书真迹,更为得者所秘,乃至有“洋铜灌厨簏,约敕家人不得复开”之举。考陆修静早年虽“潜衡熊湘,暨九嶷、罗浮,西至巫峡、峨眉”(《云笈七籤》卷五),访道求经,但所经行之地,似未及“京师及江东数郡”,故其初见真经,应是宋明帝

① 见《云笈七籤》卷五。

② 以陆、孙、陶、王为茅山宗师实始于李渤《真系》,今《云笈七籤》卷五中的《真系》依次列四人小传,虽未注明代数,但明确说杨羲至李含光计十三代,比照《茅山志》正合。

泰始三年(467)应诏至都以后,《真诰·序录》云:

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兴旻季真启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楼(惠明)谓上经不可出世,乃料简取真经、真传及杂受十余篇,乃留置钟(义山)间。惟以《豁落符》及真受二十许小篇,并何公所摹二录等将至都。旻即以呈景和,于华林暂开,仍以付后堂道士。泰始初,旻乃启,将出私廨。陆修静南下,立崇虚馆,又取在馆。

与上引李渤《真系》对勘,知李所说“真经尽归于崇虚馆”,实夸大其词,陆所得应只是“《豁落符》及真受二十许小篇,并何公所摹二录”等,这与《真诰·序录》小字注称陆修静处的经书“有三君所书真受,后人糊连,分为二十四篇”正合。由此可见,陆修静所得并非真经的全部。

不仅如此,陆修静所得真经并非出于师授,而系宋明帝所赐,《玄品录》云:“(宋明帝)遂以旻季真取到杨许真人上清经法敕付先生,总括三洞,为世宗师。”此实上清派传法之大忌,如陶弘景在《真诰·序录》中针对王兴先因盗写真经而遭报应时说:

此当是(王)兴先不师受,妄窃写用,所致如此也。

或许正因为此,《真系》不得不引《黄素方》为陆修静曲为解说:“因缘值经,准法奉修,亦同师授。”^①

若以陆修静泰始三年(467)得见真经计,其年陆已62岁,越10年(元徽五年,477)陆卒。陆修静以所得真经作为编修《三洞

① 据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引《云笈七籤》卷四十六之《修真要旨·黄素内法第一》注解此句云:“凡精诚密向,耽味玄真,清斋苦志,感慕神仙,忽遇此三品之经,而不师授者,其人皆玄会宿感,列籍帝乡,真人密授,应得此经。其人异挺,以擢世功,依《太上黄素四十四方》,听得隐盟玄誓神科也。”

经书目录》的参考殆无疑义,但是否研修奉持,殊难论断。由《本起录》的记载可以看出陶弘景对陆修静所得真经评价不高:“虽相承皆是真本,而历经模写,意所未惬。”^①

再分析孙游岳向陶弘景传授的经过,最早、最原始的文献记载应是陶弘景在世时从子陶翊所作的《本起录》,《本起录》涉及孙游岳仅有一句: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

按,甲子、乙丑、丙寅即永明二、三、四年(484、485、486),陶弘景尚为左殿中将军,其所以得闲从孙游岳问道,据《本起录》知陶母以永明二年卒,因此前陶父贞宝已卒,故甲子、乙丑、丙寅三年正其为母丁忧守制之期。而对照唐人记载,如《梁书》、《南史》及李渤《真系》等,多有差讹。《梁书》、《南史》均先述弃官,继言:“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而考孙游岳以永明七年五月十五日卒,其时陶弘景尚在官,故绝无可能永明十年以后再从孙游岳游。李渤《真系·齐兴世馆主孙先生》则云:“门徒弟子数百人,惟陶弘景入室焉。自恭侍六载,义贯千祀,惟贵知真,故特蒙赏识,经法诰诀,悉相传授。”至于《茅山志》卷十《孙游岳传》更附会出一段传奇:

先生尝梦茅君曰:青华小童复降句曲汝弟子中,善护持之。永明间陶弘景入山,先生异其丰神超迈,且闻身有斗文,引省所梦曰:青华小童岂非斗中真人耶。即尽授其法。

^① 《本起录》云:“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历经模写,意所未惬。”

我们不否认陶弘景曾向孙游岳“咨稟”^①道家符图经法,但必须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孙游岳是否有可能把衣钵托付给一个在家之众?

相对于陆、孙,陶弘景与上清经的渊源甚深,据《真诰·真胄世谱》所载,许谧祖父许尚娶陶弘景七世祖陶濬之女,而许谧妻则为陶濬从子陶威之女陶科斗,科斗后得道仙去,“入易迁宫受学”。陶弘景在《真胄世谱》中形容陶科斗升仙时,乃用不无自豪的语气说:

长史妇陶威女,虽入易迁,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关许氏五人之数也。

故当陶弘景感于孙游岳所授道家符图经法“意所未愜”时,乃辗转寻访,《本起录》云:

戊辰年(488)始往茅山,便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490)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姜慧明(即楼惠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崑山谒法师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即朱僧标)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爰及东阳长山、吴兴天目山、于潜、临海、安固诸名山无不毕践。

陶弘景永明十年(492)隐居茅山后,仍不废访求之事,《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云:

齐建武二年(495),陶受敕东祈名山,因寻经典也。

① 《本起录》仅称“咨稟”,而史书及《真系》悉称“授受”,词义实有不同。

其后,陶弘景在茅山筑昭真台,将历次所得杨、许手书真迹保存其中。由此可见,陶弘景几乎是竭毕生之力搜集整理诸真降授之迹,其对经文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①这一切与陆、孙相较确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决无意否认由陆修静而孙游岳而陶弘景的传授事实,这由《周氏冥通记》中提到陶弘景授周子良经书的情形可为证明,《冥通记》云:

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伏节为弟子。始受《仙灵箓》、《老子五千文》、《西岳公禁虎豹符》……此后进受《五岳图》、《三皇内文》。

其中《五岳图》与《三皇内文》皆属洞神部,据《云笈七籤》卷六云:“陆修静先生得之,传孙游岳,游岳传陶隐居。”

但必须看到,陶弘景与陆修静的道教主张未必全同,陆修静虽然“总括三洞,”但更偏重于灵宝一系,如唐·闾丘方远《太上洞玄灵宝大纲抄》所说:“(陆修静)更加增修,立成仪轨,于是灵宝之教大行于世。”陆不仅制定斋仪,并且身体力行,先后主持涂炭、金箓之斋。而核检《华阳陶隐居内传》所记陶弘景事迹,主要为三事:访求杨许真书、炼丹、闭关修静,^②几乎没有提到斋醮,惟一次由陶弘景亲自主持的祈雨活动,^③还因陶弘景对科仪不熟悉,险些失败,事见《周氏冥通记》:

① 陶弘景不仅能辨杨、许手书真伪,在《真诰》中对多数经文的传授、保存经过均有详细说明,由此见其对诸真降授之迹的熟悉程度。

② 上清派最倡存神内视及诵经功德。《华阳陶隐居内传》记陶弘景两次闭关,一为天监七年出走时“(诮)称静斋五旬”,一为天监十六年上《周氏冥通记》时称“(天监十五年)斋禁”。《茅山志》卷二十亦云:“十五年移郗冈斋室静斋。”

③ 祈雨事在天监十四年,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尚存有《请雨词》。在《周氏冥通记》卷四中提到天监十四年八月初九茅山曾举行塗炭斋,但主持者似为弟子主法明,而非陶弘景本人。《冥通记》原文云:“王法明为皇家塗炭斋。”

(天监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周子良夜梦神降曰:)昨所与陶隐居共有辞,欲须雨事,国主忧民乃至,但时运应尔。比诸处屡有章辞,皆不与报。陶既有功行,周方来此,当为验二人之德,不烦谦谦,恐悞望,故遣报。子良曰:比风日赫烈,塘湖涸竭,五谷焦枯,草木凋落,方虑饥乏,故冒共投辞,希垂沾润。此人曰:当不虑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辞(指陶弘景日间所作《请雨词》)言语乃好,但请雨应墨书,请晴应朱书,并青纸上。人惟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会处。诸如此者,世间非一。但无人报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无灵。愿更作墨书辞,勿同前语。

陶弘景对灵宝斋法的态度在《真诰》中亦有所反映,《真诰·卷十一》陶小字注云:“学上道者甚寡,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从行文的语气来看,陶弘景颇不以当时人修灵宝斋而轻“上道”(指上清道法)为然,故唐玄奘在《甄正论》中谓其“恶灵宝法伪鄙而不行,手著论以非之”,绝非空穴来风。除此之外,陶弘景虽然炼丹,但对葛洪等最为推重的金丹大药,信心也不够坚定,《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载:

(天监十八年开炉所得之丹光采特异,陶弘景)欲试作黄白,以验成否。是夕摄心乞感,忽见有人来,朦胧如烟云中,语云:不须试,试亦不得。今人多贪,忽闻金玉可作,便求,竟毁天禁。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复作叹声云: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渐服自可知。言讫,飒然东去。于是乃不试。

陶弘景对其他流派的经典也不甚措意,如《三洞珠囊·教导品》引《道学传》天监初弟子桓闾得古本《太平经》呈陶,后桓闾病疟,陶弘景乃命其送还本处。

综上所述,陆修静所得上清经既不全面,又不出师授,就陆

而言,上清经可能只是其“总括三洞”的诸经之一。至于陶弘景从孙游岳处所受,除上清经外,固然包括其他三洞经文,但陶弘景真正关心的只是杨、许所传上清真经。故我们认为,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的上清传授谱系,极有可能是后人(如李渤等)附会依托,茅山上清派的真正开山祖师应该是陶弘景。

二、陶弘景的门生与法嗣

陶弘景在茅山门生弟子甚众,李渤《梁茅山贞白先生传》(《云笈七籤》卷一百七)谓“弟子数十人”^①。核检相关记载,弟子中姓名可考者有陆逸冲、潘渊文、桓法閤、周子良、许灵真、戴坦、杨超远、孙文韬、王法明、王远知及女弟子钱妙真等。资料所限,不能一一具论,择重要者简述如下。

陆逸冲字敬游,吴郡海盐阳渎人,他应是入门最早的弟子,^②据《茅山志》卷八引天监三年八月十五日所造“陶真人丹井铭文”云:

先生丹阳陶,仕齐奉朝请,壬申岁来山。栖身高静,自号隐居。同来弟子,吴郡陆敬游,其次,杨、王、吴、戴、陈、许。

陶弘景入山之初,凡有营建,陆逸冲独任其劳,为表彰其勋劳,陶弘景于入山的第七年,即齐永元元年(499),为陆逸冲筑连石之邑于积金山,并遣总事弟子戴坦授陆十赉文,赐其为“栖静处士”。文见《华阳陶隐居集》。

从《十赉文》的内容来看,陶弘景称赞陆敬游“以诚慤为性,以恬澹为情,质直居本,沉重树志。不邀世才,高谢时俗,权谋诡

① 《茅山志》卷十称“弟子受经法者三千余人”,不免夸大其词。

② 陆逸冲是陶弘景弃官之前所收弟子,并随师入山,据《授陆敬游十赉文》云:“昔我纡绂帝闱……尔之来也。爰移两春,于是僦带青墀,挂冠朱阙,携手东驱,创居兹岭。”

谲,非意所欲”。“奉上唯勤,接下以惠”。“崇教为善,法无偏执”。“敬事经诰,遵尚楷模”。“真心内固,清形外彰。涤荡纷秽,表里雪霜”。的确是隐有以上清大道相托付之意。

陆逸冲初居陶弘景为他所建的连石之邑,陶居华阳馆。天监三年(504)陆逸冲、潘渊文于积金岭东为陶弘景营造转炼之所,次年筑成,“先生出居岭东,使王法明守(华阳)上馆,陆逸冲居(华阳)下馆,潘渊文、许灵真、杨超远从焉”(《华阳陶隐居内传》)。是知陆逸冲于天监四年继任华阳馆主。

陆逸冲应卒于陶弘景生前,^①时间可能在天监十年前。如前所述,陆司茅山营造事,天监三年《华阳陶隐居内传》犹云“命弟子陆逸冲、潘渊文开积金岭东以为转炼之所”。至天监十三年建朱阳馆时,《华阳陶隐居内传》引《登真隐诀》云“仍使潘渊文与材官师匠营起朱阳馆”。则仅潘渊文一人用事。又据《茅山志》卷二十梁普通三年(522)陶弘景所立《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的碑阴题有“过去现在受经法者”的姓名,第一人即为陆逸冲,称“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吴郡海盐陆逸冲”。这里称“华阳前馆主”,亦证实陆逸冲已卒。^②

陆卒后,茅山大弟子可能是潘渊文。从《旧馆坛碑·碑阴记》的排名来看,华阳前馆主陆逸冲、宗元前馆主杨超远之后便是“上清弟子朱阳馆主丹阳湖孰潘渊文”。潘渊文天监三年即协助陆逸冲司营造事,引文已见前,陶弘景所述《周氏冥通记》卷三亦提到潘的情况:

隐居此年(天监十四年)四月自得梦,应被召,云官府已整,惟印未成。意甚惻惻,径向周说,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营脱信,告潘渊文,为条疏作辞牒,令周共奏请。

① 门人先陶弘景而卒并不奇怪,《华阳陶隐居内传》云:“先生曰:吾门人先吾去者数矣。”

② 碑阴记中称“前馆主”的还有宗元前馆主杨超远,华阳前馆主丁景达、华阳前馆主冯法明(疑即王法明之讹)。

此条记载可见潘渊文在茅山道众中的地位，而《周氏冥通记》撰成后，陶弘景亦委潘转呈武帝，事见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启》及武帝批答。此外，潘渊文还曾续作陶翊的《本起录》，据贾嵩《内传·序》称：“其后潘泉（渊）文复踵其作（指陶翊的《本起录》）。”

潘渊文可能也先陶弘景而卒，继潘渊文的则应是桓法闾，这由陶弘景卒后邵陵王萧纶撰《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径称“门人桓法闾等”云云，证明桓在当时已成为茅山众门人的领袖人物。

据《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云：

桓闾字彦舒，东海丹徒人也。梁初昆仑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内有黄素写干君所出《太平经》三部。村人惊异，广于经所起静供养。闾因就村人分求一部，还都供养。先呈陶君。陶君云：此真干君古本。闾将经至都，便苦劳瘵，诸治不愈。陶贞白闻云：此病非余，恐取经为咎。何不送经还本处。即依旨送，病乃得差耳。

则知桓入陶门至迟也在天监初年，《茅山志》卷十五载其小传：

桓法闾字彦舒，东海丹徒人，陶隐居高第弟子也。为梁南平王清远馆主，任事缘多绪，有废研修，乃郁冈山右别筑玄洲精舍。周处士弘让题精舍壁云：李基遗故鼎，赵嘏绝风云，悠悠千载下，更复属夫君。王僧辩使陆晃图闾及己形与周处士像于障面，又飞白写闾与僧辩书于障背，仍以遗闾。

谈到桓法闾，最有必要讨论的是《桓真人升仙记》。《升仙记》成于陶弘景身后，系不满陶弘景者所为，故记中恣意褒桓贬陶，谓桓本系西蜀华盖山李桓仙君弟子，因借仙君之口数陶弘景若干罪过，其中尤以佞佛为最：“（陶弘景）求真不一，潜神二门，

好禅悦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记，作往生文，道释并修，则上帝未见用也。”复谓陶有三是四非，其四非云：

一曰，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心，实负杀禽之罪；二曰，好算星度，穷究天机，潜厌鬼神，言人休咎；三曰，种植花木，耕锄山林，好卜幽奇，伐木匠屋。自持声势，亲近朝廷；四曰，望想太重，便望升仙，创待仙楼，造降真馆，虽有门人弟子之广，实未有上天之缘。

按仙君的说法，陶有得道弟子七人，桓居其一，而陶本人“实少真功，徒劳阴力，皆不及七弟子之学道耳”。

很难揣度《升仙记》作者的真实动机，除了不满于陶弘景的佞佛行为以外，^① 是否也有为桓法阉未能成为茅山宗师鸣不平的意图在其中，证据不足，姑且存疑。

至于陶弘景的其他弟子，周子良卒于天监十三年，其生平有陶弘景所述《周氏冥通记》可参；许灵真为许长史裔孙，见陶撰《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孙文韬工书法，普通三年《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即其手书。兹据文献简述周、许、孙及女弟子钱妙真的情况：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隐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县人，寓居丹阳建康西乡清化里，祖文郎，宋江夏王国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继父耀旭，扬州议曹从事。母永嘉净光，怀娠五月，梦室中仙圣皆起行，四面来绕己身。以建武四年丁丑岁，正月二日人定时生。十

① 按，《桓真人升仙记》中批评陶弘景的文字确在后世成为攻击陶的口实，如《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云：“桓阉为陶隐居执役十余年，一旦有青童白鹤自天而下，曰：太上召桓先生。隐居问：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矣。即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隐居之室，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虺虫、水蛭辈为药，害于物命，一纪之后但解形去世，为蓬莱都水监耳。隐居乃以草木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贖过。”其内容基本源自《升仙记》。

岁随母还永嘉。天监七年隐居东游海岳，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师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内住，时年十二，因求入山，服节为弟子。始受《仙灵箓》、《老子五千文》、《西岳公禁虎豹符》，便专心于香灯之务。凡好书画，人间杂伎，经心则能。后随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从还茅岭，进受《五岳图》、《三皇内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亲族来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别解住。子良密受灵旨，降真接仙，而隐居未尝有疑。盖自十四年乙未岁五月二十三夏至日，忽尔寝卧弥纶，良久乃起，是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①日昃后，平卧尸解，时年二十。隐居料理篋蕴，而永无遗记。十一月甲子旦，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书，遂登崎岳钩取，拜请将还，即是从来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纸杂牒，乃依日月次第，类为《周氏冥通记》四卷。隐居又撰周玄人传于记前，进之武皇帝。子良盖三生学道，初生周达家，次生刘伟家，其学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经三过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复落去，故经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虚灵，为保籍丞，后更奏东华，为保晨司，而刻名紫玉之简者矣。^②

许玉斧玄孙灵真，梁代在茅山，敕立嗣真馆，以褒远祖之德也。陶隐居所住朱阳馆，即是许长史旧宅也。^③

孙韬字文藏，会稽剡人也。入山师潘四明，参受真法，学摹写，遂大巧妙，后学王书，殊有深意，当时称之。南洞大碑及许长史坛碑并是韬迹也，陶隐居手为经题。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惟传孙韬与桓闳二人而已。^④

① 按，据《周氏冥通记》周子良卒于通灵后的次年，即天监十五年，《玄品录》称当年卒，误。

② 元张雨《玄品录》卷四。

③ 《上清道类事相》卷一引《道学传》，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501页。

④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真诰》。按，此非《真诰》语，疑《太平御览》误注。

钱妙真，晋陵人也，幼而好道，便欲离俗，亲族逼以适人，泣涕固免，遂居大小二茅山，后往燕口洞，手裁书并诗七章与陶隐居。^①

最需要重点讨论的是王远知。

尽管李渤《真系》称王远知“年十五入华阳事贞白先生，授三洞法”，《唐书·王远知传》也说：“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②《茅山志》以王远知续陶弘景为茅山第十代宗师，但远知生梁大通二年(528)，弘景大同二年(536)卒时，远知方九龄，绝非陶弘景亲授弟子，有关此问题，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道经传授表·王远知传”有考辨，可参看。^③惟于陶弘景与王远知之关系，陈论尚有未详，爰为补述。

检茅山诸碑，《茅山志》卷二十二有唐贞观十六年江旻所撰《唐国师升玄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此碑仅述王远知师国师宗道先生(臧矜)，并谓臧“识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风黄道，作训紫宸，九重致礼，百工兴敬，摄斋撰履，妙简英奇”。语不及陶弘景。只是在王远知弟子王洪范碑^④中提到，约在唐贞观时，王远知“遣法师(指王洪范)先以还(茅山)，修葺许、陶故址。此观梁武皇帝于许真人旧宅为陶隐居建立，号曰朱阳，皇明启运，更以华阳为目”。但语句中确看不出有尊陶弘景为本师之意。同样，武周圣历二年(699)，由王适撰序，司马承祯书丹的《唐默仙中岳体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潘师正)碣》^⑤也未提到陶弘景传授王远知事。

值得注意的是王远知再传弟子司马承祯开元十二年(724)于梁萧纶所撰《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之碑阴题记，在碑阴记中，

①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老氏圣记》。

② 《新唐书·王远知传》亦云：“事陶弘景，传其术，为道士。”

③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48页。

④ 此碑全名《桐柏真人茅山华阳观王先生碑》，文见《茅山志》卷二十二，另有拓本传世。

⑤ 此碣见《金石萃编》卷六十二。

司马承祯一方面赞叹说“睹先生写貌之象，则道存目击。览先生著述之义，则情见乎辞。纵逾千载，亦可得之一朝矣”。却接着又云：

至于思神密感之妙，炼形化度之术，非我不知，理难详据。敬以修身，德业受书道备。按夫科格，固超真阶，命分殊途，显然异轨，应从解景，不事登晨，冥升上清，弗可得而测已。

大有“此事难知”之意，这的确不是后辈对“祖师”宜下的考语。

司马承祯的弟子是李含光，李含光碑有两通，一为大历七年（772）柳识撰，张从申书丹者，一为大历十二年（777）颜真卿撰书者，两碑均有拓本存世。柳碑较简略，颜碑则首次提出了由陶而王的上清传法谱系：

初隐居先生（陶弘景）以三洞真经传升玄先生（王远知），升玄付体玄先生（潘师正），体玄付正一先生（司马承祯），正一付先生（李含光）。自先生距于隐居，凡五叶矣。

而真正将茅山谱系编排完善的应是唐贞元年间李渤所著《真系》，^①在谈到陶弘景以后的上清传授经过时，李渤云：

陶授王君，王君又从宗道先生（臧矜）得诸胜诀，云经法秘典，大备于王矣。王授潘君（潘师正），潘君授司马君（司

① 李渤《真系》所编排的上清传法谱系，陶弘景以前诸人，多依据《真诰·翼真检》，但往往歪曲陶弘景的原意，如前所论，陶弘景与陆修静、孙游岳的关系，决不如李所描述的那样密切。而陆修静以前，李渤提到马（朗）、叟（季真），《茅山志》则以马朗、马罕兄弟为第五、第六代宗师，又引《灵验记》云：“二马有保经之功，没世之日，上帝命灵官持玉版召入金庭洞天，俱授仙卿之任。”而考陶弘景在《真诰·翼真检》对马的评价是：“论马朗虽不修学，而宝奉精至，梦（指马朗欲造经，因梦见玉碗自天而降，坠地破碎，遂辍一事。）既不凡，解之又善，亦应是得道人。”于马固无贬语，但推为宗师，应非陶公本意。

马承祯),司马君授李君(李含光)。

但如前所论,陶弘景卒后,真正有希望继承茅山大法的应该是桓法闾,桓和陶一样,交游名士,沟通朝廷,^①何以桓未能成为茅山宗师呢?我们推测有以下因素:(1)王远知梁陈之际入山,享寿甚长,历陈、隋、唐三代,皆受国主恩遇,声誉远在陶弘景嫡传弟子之上;(2)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皆属嫡系亲传,故诸弟子追本溯源,咸推远知为茅山宗师,而讳言陶弘景及其弟子;(3)或许是因为王远知的本师臧矜声名不及陶弘景,故中唐以后,颜真卿、李勃等始将王系于陶名下,而凌驾陶弘景嫡传弟子之上,乃云“(陶弘景)弟子数十人,惟王远知、陆逸冲称上足焉”^②。

第四节 陶弘景交游琐考

陶弘景生宋孝建三年(456),卒梁大同二年(536),一生经历宋、齐、梁三代十三帝,与其平生重大事件相关的人事交往,除前已论及的梁武帝、沈约及茅山教派的师承、授受外,可叙人物尚多,但皆记载寥寥,敷陈不易,兹述其梗概,总题为陶弘景交游琐考。

一、刘侯、萧铿

研究宗教家,尤需注意其平生所经历的悲情事件,此与其宗教人格的形成密切相关。刘侯、萧铿一位是陶弘景的生死之交,一位与之有师徒之谊,二人皆英年早逝,其不幸遭遇必对陶弘景

① 桓法闾与周弘正、王僧辩的交往已见前引《茅山志》,其清远道馆亦南平王萧伟所建。

② 李渤《真系》云:“(陶弘景)弟子数十人,惟王远知、陆逸冲称上足焉。”其先王而后陆,已见倾向性,至于不得不提到陆逸冲之名,可能是因为陶弘景《十赅文》尚存《陶隐居集》中,无法讳言的缘故,至于桓、潘等人则不与焉。

有所触动。

陶弘景与刘侯订交在宋泰豫元年(472),陶弘景十七岁,刘侯年龄应与弘景相若,^①《本起录》云:

十七乃冠。常随刘秉尹之丹阳郡,得给帐下食,出入乘厩马。(刘)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时为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与先生日夜搜寻,未尝不共味而食,同车而游。侯与江敫、褚炫等俱为顺帝四友,^②故最以才学得名。侯作《宋德颂》,连珠七警,当世称绝。

刘秉、刘侯父子为宋宗室,宋末齐王萧道成弑后废帝刘昱,升明元年(477)秉父子乃与司徒袁粲等谋诛萧道成,陶贞宝、弘景父子亦参与其事。事败,弘景侥幸得脱,而秉及子侯、侯死,弘景不避祸患,为刘侯料理身后。《本起录》云:

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随刘丹阳入石头城就袁粲建事,先生与韩贵、康淡同掌文檄。及事败城溃,即得奔出。侯及弟佺为沙门以逃,为人所获,建康狱死,人莫敢视,先生躬自收殓瘞葬,查砌旧墓,营理都毕,自此弃世,寻山而止。

刘侯死之次年,即升明二年(478),萧道成镇东府,气焰日炽。陶贞宝、弘景父子因曾参与袁粲、刘秉反萧道成事,心怀忧惕,乃以纪僧真之介与道成结交,道成使弘景为第五子羣、第六子嵩侍读,旋除巴陵王侍郎。《本起录》云:

值宋齐之际,物情未安,既结刘宗,常怀忧惕。父乃因

① 刘侯生年不能确考,据《宋书·刘秉传》秉升明元年(477)遇害时四十五岁,侯为其次子,故刘侯泰豫元年应不逾冠龄。

② 李渤《真系·梁茅山贞白陶先生》云:“(陶弘景)年十七与江敫炫、刘侯为宋升明四友。”疑误。按《南齐书·褚炫传》:“升明初,炫以清尚,与刘侯、谢朓、江敫入殿侍文义,号为四友。”且《本起录》亦仅云侯与江、褚等俱为顺帝四友,弘景不与焉。

纪僧真求事高帝(萧道成)于新亭,即蒙帐内驱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从还东府,公仍遣使侍第五息晷、第六息嵩侍读,兼助公间管记事,先生时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

需说明的是,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①以弘景结交萧道成事系于升明元年,考袁粲、刘秉死石头,事在升明元年十二月,弘景尚参文檄,不当有此举也。故弘景父子之与萧道成沟通,必在袁、刘败后,应系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尽管如此,陶氏父子之投靠萧道成,的确有悖儒家舍生取义之旨,^②但若对照陶弘景在十五岁时所作《寻山志》中的话:“轻死重气,名贵于身,迷真晦道,余所弗承。”或能理解弘景父子的举动。另据《本起录》“侯既亡后,文章皆落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华阳陶隐居内传》云:“先生乃喟然而叹曰:人无愚智,同尽百年,所贵身名遗芳寄世,惜乎刘生,名迹俱丧。”则正是陶弘景生死名利观的真实写照。

入齐以后,陶弘景先后为诸王侍读,建武四年(482)除宜都王侍读,据《南齐书》宜都王萧铿为高帝萧道成第十六子,延兴元年(494)遇害,年仅十八岁,故建武四年陶弘景为侍读时萧铿方六龄。^③《本起录》云:

世祖即位,以振武将军起宜都王侍读。齐世侍读任皆总知记室手笔事,选须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诸侍读多有惭惮,颇致谗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

① 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见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91页。

② 当时百姓语云:“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彥回(褚渊)生。”(《南史·褚彥回传》)颇见人心向背。

③ 《南史·齐高帝诸子传》云:“初铿出阁时,年七岁。”恐误。

陶弘景与萧铿的师生情谊如《南史·齐高帝诸子传》所记：“八九年中，甚相遇。”至永明十年，陶弘景将入山，与萧铿依依惜别，《华阳陶隐居内传》述当时情况：

将行，与宜都王别，彼此呜咽，各不能发一言，左右莫能仰规。或谓宜都王云，相爱重如此，那听其去。王云，今为天下胜事，天子许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镜赠，别给在山吏役数人。

陶弘景入山后与萧铿仍有音书往来，尝题桐叶作诗寄铿，其末句云：“愿为双白羽，长拂舆前尘。”事见《华阳陶隐居内传》。

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崩后，朝政大乱，萧鸾大权独揽，先后废郁林王、恭王称帝，乃诛高、武、文惠诸子，宜都王萧铿亦在劫难逃，仰药而死。《南史·齐高帝诸子传》云：

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云：某日命过。身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著《梦记》云。

按，陶弘景所撰《梦记》必是沉痛之作，有干时忌，故《本起录》谓“《梦记》一卷，先生自记所梦征想事，不以示人”。

二、萧齐三帝

或许是曾经参与过刘秉之谋的缘故，陶弘景在齐高帝建元年间甚不得志，辗转为诸王侍读。武帝登极，情况有所变化，永明元年(483)拜左卫殿中将军。《本起录》云：

年二十八，服闋，诏拜左卫殿中将军，颇郁时望。先生惊，亦不解所以，即告庾道敏，论诸屈滞。庾为面启武帝，武帝云：先帝昔亲命此官，卿不知耶，何其辞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叹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翻为此职？驛马

非驥驎。犹欲固辞。庾切言之云：太元以来，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从此转员外郎，但问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为尔误我事。庾于时正被委托总知诸王府事。先生不获已而拜矣。

虽然据《隋书·百官志》左卫殿中将军属第九品无秩小官，但齐武帝、庾道敏的话并没有错，《南史·裴松之传》云：“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轺，皆南北之望。”看来朝廷对陶弘景确有继续升转之意。但不幸的是，次年帝筑清溪宫成，弘景拜表献颂，虽大受武帝赏识，“将欲迁擢，会母忧去职”。（《本起录》）

因母丧耽误，陶弘景永明九年（491）始除奉朝请，^① 奉朝请亦是闲职，《宋书·百官志》云：“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会朝请召而已。”故陶弘景意颇快快，乃有退隐之意。因作与从兄书云：“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宿昔之志，谓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又作与亲友书云：“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次年五月，拜表解职求去，武帝诏可，乃隐于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据《本起录》云：

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职，求托岩林，青云之志于斯始矣。是年永明十一年（按，当作十年）壬申岁也。先生初隐不欲辞省，出仍脱朝服挂神武门，鹿巾径出东亭。已约语左右曰：勿令人知尔。乃往与王晏语别，晏云：主上性至严治，不许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贻罪咎，便恐违卿此志，诿可

^① 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以除奉朝请事系于永明三年，恐误。按，永明三年弘景尚在服中，且年三十六为奉朝请见陶弘景与从兄、与亲友书。

作？先生嘿思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为名，若有此虑，奚为所宜。于是即不诣省，直上表陈诚。诏赐帛十疋，烛二十铤，又别敕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先生既遂命，理舳东下。众宾并饯于征虏亭，举酒挥袂，皆云江东比来未有此事，乃见今日尔。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

谈到陶弘景入山的原因，若单纯以求官不遂为理由恐怕不够全面，奉朝请尽管不入流，但毕竟是“释褐起家之官”，以陶弘景的声望，由此升转亦非难事，其所以弃而不为，宗教方面的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陶弘景素慕仙道，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谓：“有乡人得葛洪《神仙传》，见淮南八公诸仙事，乃叹曰：读此书便使人有凌云之气。于是寝兴讽诵，晨夜不辍。”《华阳陶隐居内传》云：“年二九，授上道，见上清太极法。”及长，乃从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又遍游浙越各地搜求经典。另一方面，如本节第一部分谈到的“悲情事件”也是诱因之一。除了刘侯惨死的刺激以外，还应提到建元三年（481）父亲陶贞宝之死，《南史·陶弘景传》云：“父为妾所害”，这正堪与《华阳陶隐居内传》称“先生既冠而不肯婚。先生澡洁去嗜欲，盖一生全不迹于声色也，且曰，吾欲萧条其魂也”，相呼应。此外，永明二年母丧中大病七日，^①对他的情绪也应有所影响。总而言之，正如陶弘景后来自承：“永明间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惟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南史·陶弘景传》）

陶弘景入山同时也避开了永明末的政治风波，^②确属明智之举。明帝即位后，对陶弘景更是笼络有加，有敕令其东祈名山。据《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云：“齐建武二年

① 《本起录》云：“年二十九时，于石头城忽得病不知人事，而不服药不饮食，经七日乃豁然自差，说多有所覩见。从此容色瘦瘠，言音亦跌宕阉缓，遂至今不得复常。”

② 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武帝崩，郁林王萧昭业即皇帝位，次年正月，改元隆昌，七月废郁林王，恭王萧昭文即位，改元延兴，十月废，明帝萧鸾即位，乃尽诛高帝、武帝、文惠太子的后代。

(495),陶受敕东祈名山,因寻经典也。”次年二月,明帝又遣使迎弘景出居蒋山,固辞,乃止。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宋明帝三年二月,敕迎先生出居蒋山,先生固辞,并因江祐陈启,乃停。从此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饷赐重叠,随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①

明帝又有问“山中何所有”,弘景以诗代答辞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按,此诗在《陶隐居集》中标题作“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未言答何帝之问。考此诗最早见于北齐阳玠松《谈薮》,云为答齐高祖问,而齐无高祖,故《古诗源》引作齐高帝,然高帝时弘景尚未入山,亦不应有此问。颇疑高祖为高宗(明帝)之讹,正此年邀陶弘景出山时之问也。诗谓“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云云,乃明志之辞。

三、道 侣

如前引《本起录》,陶弘景在永明十年入茅山之先,已游历浙越各地,寻访高人隐逸,有姓名可考者杜京产、钟义山、楼惠明、朱僧标。其中陶与隐居余姚太平山杜京产的交往似较密切。按,吴郡杜氏,乃是南朝著名的道教世家,《南齐书·杜京产传》云: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杜子恭玄孙也。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除奉朝请,不就。与同郡顾欢同契。……孔稚珪、周顒、谢朓并致书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棕、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表荐京

^① 明帝召弘景出山事亦见《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然说法有异,录此备考:“及齐明帝践祚,恐幽祗未协,固请隐居诣诸名岳,望帙展敬。遂周旋五郡,经历三年,事迄,迎还。令憩钟岭。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饷赐重叠,随意所求。”

产……不报。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辞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

本传未提到杜与陶弘景的交往，而《真诰》卷十二陶弘景注有云：

钱唐杜微士京产，先与隐居共有诗咏，以赞述斯德，别在集中。

二人不仅有诗歌唱和，从《真诰》的记载来看，杜道鞠、京产父子是杨、许真书的主要保存者，陶弘景所得真经之多数源于杜家。

陶弘景入茅山后，交往人物则有蒋负刍、薛彪之、潘洪等：

蒋负刍，义兴人也，与晋陵薛彪之为俗外之交，去来茅山，有志栖托，齐永明中，暂下都，陶隐居一遇便尽素契，陶后解绂，结宇中茅，仍请负刍度岭相就，经典、药术，常共论之。^①

薛彪之闻陶隐居委绂，架石室与蒋负刍邻居接宇。彪叹曰：彼二人者可为道友，何为久滞东川。于是命棹来归，便相就共住，日夕讲习。^②

潘洪字文盛，山阴人。幼辞家入山，修禀上法。陶贞白见而悦之，遂与投分共游诸处，寻求真书。^③

陶弘景对蒋、薛评价甚高，《周氏冥通记》卷三有云：“已说句曲有四人（入下仙之品）……今以耳眼所闻见者，在男人中有蒋、

① 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

② 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道学传》。

③ 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道学传》。

薛，女人中有蒋、宋，并久就修学。”

四、慧约、昙鸾

谈到六朝的佛道交融，陶弘景每被视作正面例证，其礼塔受戒的问题，我们已在“陶弘景与梁武帝”一题中作了辩证，此处简略讨论其与慧约、昙鸾的交往。

据《续高僧传》，慧约俗姓娄，东阳乌场人，生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长陶弘景四岁。十七岁出家，依止南林寺高僧慧静。慧约颇为权要所重，周顒为剡令时，于钟山雷次宗旧馆筑草堂寺居之，故号“草堂法师”。先后出入褚渊、王俭之门，而与沈约最相得，传云：“(沈约)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满。以沈词藻之盛，秀出当时，临朝莅职，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未)尝以朱门蓬户为隔。”入梁后，武帝从其受菩萨戒，^①因有“国师”之号，大同元年(535)卒，年八十四。

陶弘景与慧约的交往恐系沈约介绍，如前论《陶隐居集》中《和约法师临友人》即陶弘景和慧约挽沈约诗，此外，据《茅山志》陶弘景尝作《草堂法师传》一卷，此书唐志尚见著录，今佚。

值得一提的是，《续高僧传》两处提到慧约“却粒岩栖，饵以松术，羸疾延华，深有成益”。“饭饵松术三十余年”。其服饵之方是否陶弘景所授，传未明言，不能臆断，^②而陶弘景与另一位高僧昙鸾的交往确实与服饵有关。

据《续高僧传》，昙鸾为雁门人，发愿注解《大集经》，因病未果，乃作念“江南陶隐居者，方术所归，广博弘贍，海内宗重”，遂南渡访求本草仙术。《续高僧传》云：

鸾寻致书通问，陶乃答云：去月耳闻音声，兹辰眼受文

① 事在天监十八年(519)。

② 按“饭饵松术三十余年”的说法计算，慧约服食必始于五十岁左右，即随沈约外任东阳前后，在此期间沈约与陶弘景交往频繁，故很可能由陶传授服食方。

字,将由顶礼,岁积,故使真应来仪。正尔整拂藤蒲,具陈花水,端襟敛思,竚聆警锡也。及届山所,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远意。

与慧约服松饵术三十年不同的是,昙鸾得陶弘景仙方十卷以后,本欲往名山依方修治,在洛下逢菩提留支,《续高僧传》云:

鸾往启曰: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不死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也。鸾寻顶受,所贵仙方并火烧之。

我们不否认六朝后期佛道纷争有所缓和,从上面所谈陶弘景与慧约、昙鸾的交往也可看出这一点,但毕竟佛、道教义有别,佛家追求涅槃寂静,而道教推崇肉身成圣,不仅昙鸾最终放弃了陶弘景的食饵仙方,在道教方面,陶弘景的礼塔受戒,事实上也只是对梁武帝佛教政治的妥协,并不代表佛道融合。

第二章 陶弘景著作丛考

《梁书》谓陶弘景“性好著述”，其著作有目录可考者八十余种，内容遍及四部，涵盖面之广，堪称古今一人，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称：“恹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厉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一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安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诣。爰及羿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钧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洵非夸饰之辞。历千五百年浩劫，陶弘景著作存世者不足十一，检近代文献，刘汝霖氏《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梁大同二年条有“陶弘景著述表”，列陶著作四十四种，^① 罗国威氏《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载陶著五十种，^② 均非陶弘景著作之全部，因详为考订，并就所知，为著作提要。

第一节 历代著录陶弘景著作表释

关于陶弘景著作的记载，以从子陶翊于齐末，陶弘景在世之时所作《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为最早，《本起录》云：

（先生）在人间制述甚多，了不存录，谨条先生所撰记世

① 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卷五下，中华书局，1987年。

② 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见刘跃进主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291～328页。

道书，名目如左：

《学苑》十秩百卷。此一书，先生常云：群书舛杂，欲探一事，不可遍检。乃钞撰古今要用，以类相从，为一百五十条，名为《学苑》，比于《皇览》，十倍该备。近赐翊语：吾无复此暇，汝可踵成之。此书若毕，于学问手笔家，无复他寻之劳矣。

《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共一秩，十二卷。

《三礼序》共一卷，并自注。

注《尚书》、《毛诗序》共一卷。

《左传》已有刘实、贺道养注。《易略例》即是《易序》，不假复注。

《老子内外集注》四卷，并自立意。

《三国志赞述》一卷。

《抱朴子注》二十卷。

《世语阙字》二卷，依陆文更以意造《世语》所阙者。

《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

《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

《古今州郡记》三卷，并造《西域图》一张。

《帝王年历》五卷，起三皇至汲冢竹书为正，检五十家书历异同共撰之也。

《员仪集》三卷。

《玉匱记》三卷，说名山福地事。

《七曜新旧术》二卷。

《占筮略要》一卷，有十三法。

《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有十法。

《算数艺术杂事》一卷。

《举百事吉凶历》一卷。

《本草经注》七卷。

《肘后百一方》三卷，增补葛氏。

《效验施用药方》五卷。此二十四种并世用所撰目书。又作《相书序》、《述异记序》，如此等并在集中。

《登真隐诀》三秩二十四卷，此一诀皆是修行上真道经要妙秘事，不以出世。

《真诰》一秩七卷，此一诰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居士已撰，多有漏谬，更詮次叙注之尔，不出外闻。

《梦记》一卷，此一记先生自记所梦征想事，不以示人。

《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

《集金丹药白要方》一卷。

《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

《服草木杂药法》一卷。

《断谷秘方》一卷。

《灵方秘奥》一卷。

《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

撰集《服气导引法》一卷。

集《人间诸却灾患法》一卷。此九种，所撰集道书。自先生凡所撰集，皆卷多细书大卷，贪易提录，若大书皆得数四。^①又有图象杂记甚多，未得一二尽知尽见也。

从梁阮孝绪《七录》开始，历代书目皆簿录陶著，存亡多寡颇不一致，表2-1列出《本起录》、《七录》、^②《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唐书·经籍志》（简称《唐志》）、《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简称《郡斋》）、《直斋书录解題》（简称《直斋》）、《通志》、《宋史·艺文志》（简称《宋

① 此句疑有脱讹，大意为用长卷密行细书则卷帙相对较少，若以大字书写，则卷帙相应增加。次节第42《本草经集注》条，《本草经集注》三卷、七卷之分，正缘于此，说见该条。

② 梁阮孝绪《七录》虽亡，部分佚文尚存《隋书·经籍志》中，本表将《隋志》注称“梁有”之书视为《七录》内容。

志》、《道藏》、《四库全书》(包括存目提要及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等十二部书目或丛书所载陶弘景著作情况。需说明的是,宋王应麟《玉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元刘大彬《茅山志》著录陶著亦多,且王、马之著不乏考据之功,但因系文献撮录,不能反映当时陶著存佚的真实情况,故未列入。至于宋郑樵《通志》虽亦属类纂杂录之书,但所录陶著《三命抄略》、《三命立成算经》等数种不见前代文献,为反映陶弘景著作的全貌,亦予列入。^①

表 2-1 历代著录陶弘景著作

	本起录	梁七录	隋志	唐志	新唐志	崇文总目	郡斋	直斋	通志	宋志	道藏	四库
学苑	一百卷											
孝经集注并自立意	两书共十二卷	一卷	亡									
论语集注并自立意		十卷	亡									
三礼序并自注	一卷	一卷	亡									
尚书注	两书共一卷											
毛诗序		一卷	亡									
老子内外集注并自立意	四卷			四卷 ⁷	四卷				四卷			
三国志赞述	一卷											
抱朴子注	二十卷											
鬼谷子注							三卷	三卷	三卷			
世语阙字	二卷											
续临川康王世说	二卷											
太公孙吴书略注	二卷											
古今州郡记	三卷											
西域图	一张											
帝王年历	五卷			五卷	五卷				五卷			

^① 必须明确的是,尽管《通志》著录陶著达三十一种之多,但绝不意味着这些书在南宋都有保存。

续表一

[illegible]

续表二

	本起录	梁七录	隋志	唐志	新唐志	崇文总目	郡斋	直斋	通志	宋志	道藏	四库	
服云母诸石药 消化三十六水法	一卷								一卷 ¹⁹				
服草木杂药法	一卷								一卷 ²⁰				
断谷秘方	一卷												
灵方秘奥	一卷									一卷 ²⁸			
消除三尸诸要法	一卷												
服气导引法	一卷												
人间诸却灾患法	一卷												
炼化杂术			一卷										
服饵方			三卷										
太清诸丹集要			四卷										
太清玉石丹药要集				三卷 ¹²	三卷								
太清诸石变化 神仙方集要									一卷				
陶真人金丹诀						一卷 ¹⁵			三卷 ²¹				
陶真人内丹诀									一卷				
达灵经						一卷			一卷				
养生经						一卷			一卷 ²²				
养生延命录						一卷			二卷 ²³	二卷	二卷		
导引养生图							一卷		一卷 ²⁴	一卷			
神仙玉芝瑞草图										二卷			
上清握中诀									三卷	三卷			
太上赤文洞神三策											一卷		
洞玄灵宝真 灵位业图											一卷	一卷 ³⁰	
周氏冥通记				一卷		三卷 ¹⁶					四卷	四卷 ³¹	
草堂法师传				一卷	一卷				一卷 ²⁵				
陶弘景集			三十卷	三十卷	三十卷				三十卷				
陶弘景内集			十五卷						十五卷				
华阳陶隐居集											二卷	二卷 ³²	
合计	75	35	8	10	13	13	11	5	3	31	16	8	6

注:1、《隋志》名《本草经集注》。2、《隋志》名《补阙肘后百一方》。3、

《隋志》名《陶氏效验方》。4、《隋志》此条云：“《肘后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亡。”则陶弘景补阙内容恐已掺入六卷本之《肘后方》中。5、《隋志》题作“陶氏撰”。6、《隋志》名《合丹节度》。7、《唐志》作“《老子》四卷，陶弘景注”。8、《隋志》亦有此书，但不著撰人。9、《唐志》作《本草集经》。10、《唐志》名《补肘后救卒备急方》。11、《唐志》名《效验方》。12、不详与《隋志》之《太清诸丹集要》四卷，是否同书，然《唐志》别有《太清诸丹要录集》四卷，未著撰人，疑即是《隋志》之《太清诸丹集要》，则此《太清玉石丹药要集》或别是一书。13、《新唐志》名《集注神农本草》。14、《新唐志》名《太清诸草木方集要》。15、《崇文总目·道书类六》载《陶真人金丹诀》一卷，陶弘景撰，而“道书类七”又重出《陶真人金丹诀》三卷，不著撰人。16、《崇文总目》名《周子良冥通录》。17、《通志》题作《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18、《通志》别有《药总诀》一卷，不著撰人。19、《通志》名《炼服云母法》。20、《通志》名《经食草木法》。21、《通志》有《陶真人金丹诀》一卷，不著撰人，又重出《陶真人金丹诀》三卷，题陶弘景撰。22、《通志》名《养生诀》，题作陶真人撰。23、《通志》名《养性延命集》，别本亦二卷，则题孙思邈撰。24、《通志》题作《导引图》。25、《通志》名《梁故草堂法师传》。26、《宋志》名《握镜图》。27、《宋志》五行类有《陶隐居》一卷，居《人元秘枢经》后，《风后》前。28、《宋志》作《灵奇秘奥》。29、《道藏》题作《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八卷，葛洪撰，陶弘景、杨用道增补。30、《四库全书》存目类。31、《四库全书》存目类。32、见阮元《四库未收书目》。

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亦载陶弘景著作多种，全据《本起录》，故上表未予列入，但《华阳陶隐居内传》将陶著分为“先生在世所著书”及“先生在山所著书”两类，正可据以研究陶弘景著作的成书年代。在世所著书：

《学苑》一百卷；《孝经》、《论语》序注十二卷；《三礼序》一卷；注《尚书》、《毛诗序》一卷；《老子内外集》四卷；《玉璽记》三卷；《三国志赞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语阙字》二卷；《古今州郡记》三卷；《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撰《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员仪集要》三卷；《七曜新旧术数》

二卷;《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卜筮略要》一卷;《灵奇秘奥》一卷;《举百事吉凶历》一卷;《算数艺术杂事》一卷。

在山所著书:

《登真隐诀》二十四卷;《真诰》十卷;《本草经注》七卷;《肘后百一方》三卷;《梦书》一卷;《效验施用药方》五卷;《集金丹药白方》一卷;《服云母诸石方》一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

事实上,上表所列,亦非陶弘景著作之全部,《南史·陶弘景传》云:

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及《玉匱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惟弟子得之。

其中《图像集要》、《占候》两书不见记载。《南史》又云:

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

检诸史志,均未见有陶弘景所造历。

又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云:

又序三洞经洞(目)者,其卷数题目,具如陆先生《三洞经书目录》、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等所明,今不具辨。

陶弘景所作《经目》不见文献记载,今亦失传。

此外,据陶弘景《登真隐诀·序》,陶在人间尚撰《真经修事》

两卷;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五提到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作《礼佛文》一卷;唐李绰《尚书故实》提到陶著《剑经》;据《太平御览》引《老氏圣纪》,陶弘景还著有《法检论》。

据马继兴氏《敦煌古医籍考释》,^①近年新发现《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一种,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则从未见簿录。

另有一些著作,亦题陶弘景之名,前人已辨其伪,如《珞琰子三命消息赋注》有谓珞琰子即陶隐居者,《四库提要》已作辨正,^②《药性论》别本称陶弘景撰,宋掌禹锡已议其非,^③如此之类,概不列入。

第二节 陶弘景著作解题

表2-1列陶弘景著作75种,加上目录学文献著录以外的《图像集要》等12种,合计87种,本节将一一论其真赝及存佚情况。部分已佚著作尚能检得佚文者,选录一二条,以窥原著之一斑。^④

1、《学苑》一百卷。^⑤ 今佚。

《学苑》见于《本起录》。据陶翊云:“《学苑》十秩百卷。此一书,先生常云:群书舛杂,欲探一事,不可遍检。乃钞撰古今要用,以类相从,为一百五十条,名为《学苑》,比于《皇览》,十倍该备。近赐翊语:吾无复此暇,汝可踵成之。此书若毕,于学问手

①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115-137页。

② 详本章第二节第25-27条引《四库提要》。

③ 《证类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所引书传”云:“《药性论》一本题曰陶隐居撰。然所记药性功效与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隐居所为。”

④ 清人辑佚之功甚伟,然于陶弘景佚著则较少留意,据孙启治、陈建华二氏之《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前人所辑陶弘景著作仅《华阳陶隐居集》一种,此外,近年有尚志钧氏辑陶著《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肘后方》而已。本篇非专为辑佚而作,故仅指出佚文线索,选录有代表性佚文,而未全部辑录。

⑤ 所标卷帙有前后目录不一致者,以最先出现者为准,以下各书同。

笔家，无复他寻之劳矣。”则知迄陶弘景永明十年弃官入山之时，《学苑》尚未完成。按，《皇览》为魏文帝门下士所作，《隋志》谓缪袭等撰。南朝士人喜辞赋之体，故齐梁间多有类纂杂录之书问世，见于《七录》、《隋志》者有何承天《合皇览》一百二十三卷，徐爱《合皇览》五十卷，萧琛《皇览抄》二十卷，刘孝标《类苑》八十二卷，徐僧权《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等。

尽管《南史》、《华阳陶隐居内传》、《茅山志》均提到陶著《学苑》百卷，但皆系附和《本起录》之说，而《七录》以降均未簿录，亦未见各书引用，故其是否最终由陶翊续成，颇有疑问。

2、《孝经集注》。

3、《论语集注》共十二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两书均见载《七录》，《孝经集注》一卷，《论语集注》十卷，《隋志》已亡。

4、《三礼序》一卷。今佚。

《三礼序》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七录》一卷，《隋志》已亡。《南史·陶弘景传》云：“以历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飨地祇，以为神理宜然，硕学通儒，咸所不悟。”疑即陶弘景论礼佚文。

5、《尚书注》。

6、《毛诗序》共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七录》载《毛诗序》一卷，《隋志》已亡。

7、《老子内外集注》四卷。今佚。

见《本起录》，两唐志皆著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老子》自汉河上公注本以来，分上、下二经，以“道可道”起，为道经上，

“上德不德”起，为德经下，陶氏注本则称“老子内外”，不解所谓，而两唐志径称为“《老子》四卷，陶弘景注”而已。题“华阳陶隐居集”之《养性延命录·卷上》引《老子》“谷神不死”章、“出生入死”章，分别称“混元道经”、“混元德经”，^①均用河上公注。又引严君平《老子指归》“游心于虚静，结志于微妙”云云。

《老子》注本存世较多，陶注则不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载唐蜀郡岷山道士张君相集《三十家注老子》八卷，以陶弘景注为三十家之一。《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宋饶阳居士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卷七“大器晚成”句引陶弘景曰：“积德道成，谓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应是陶注佚文。^②

8、《三国志赞述》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

9、《抱朴子注》二十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序》云：“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此题《抱朴子注》二十卷，疑是专注内篇者。《抱朴子内外篇》成书以来，注家极少，陶注亦不传。按，陶弘景对葛洪著作十分熟悉，《真诰·甄命授》中侯夫人云：“众藻集而龙章成，群声会而云韶谐，辛酸备则嘉味和耳。”陶弘景注：“中侯夫人答此二辞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其作《本草经集注》屡引《仙经》云云，考其内容多与《抱朴子内篇》相合。

《道藏》洞神部众术有《抱朴子神仙金杓经》三卷，上卷述金杓还丹之法，中、下两卷则与《抱朴子内篇·金丹》同。孙诒让《札迻·卷十·抱朴子微旨》云：“《金杓经》，晋宋间人依傅《抱朴子》假

① 《云笈七籤》卷三十二引《养性延命录》作“老子道经”、“老子德经”。

② 复检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巴蜀书社，2001年，145-254页有《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于《老子》陶弘景注亦仅得此句。

托为之。”《金钤经》上卷有注，中、下卷无注，孟乃昌《中国炼丹术原著评介》认为此书卷上在东晋中末季所出，其注文则出于南齐至陈间，盖陶弘景所为。^①

10、《世语阙字》二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本起录》云：“《世语阙字》二卷，依陆文更以意造《世语》所阙者。”按，《世语》应指西晋郭颁所撰之《魏晋世语》，《三国志》裴注引此书皆省称《世语》。然检《隋志》及两《唐志》均著录此书十卷，^②完好无缺，若言陶弘景《世语阙字》是补郭颁《魏晋世语》之阙，于理不合，又《本起录》“依陆文”云云，而郭氏《世语》更与陆姓无涉，故颇疑《世语阙字》为《新语阙字》之讹，乃补陆贾《新语》所阙者。按《史记正义》引梁《七录》云：“《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两《唐志》并同，则卷帙亦与《本起录》所称之“二卷”相符。

11、《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此书虽然不传，却有一点值得《世说》研究者注意。刘义庆《世说》问世之初即邀盛誉，后世模仿其体例之书至夥，陶弘景此书成于齐永明十年以前，距《世说》成书尚不足五十年，应是最早之续书，其年代当更在刘孝标《世说》注及《续世说》^③之先。

12、《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属兵家类著作。按汉志有《太公兵》八十五篇，《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吴起》四十八

① 参见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1996年，232页。

② 《唐志》作“《魏晋代语》十卷，郭颁撰”。《新唐志》作“郭颁《魏晋代说》十卷”。皆避讳所改。

③ 《唐志》有《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撰。

篇,《太公孙吴书略注》应即汇注此三家兵书者。

13、《古今州郡记》三卷。今佚。

见《本起录》,亦见《南史》,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此当系地理类记古今州郡沿革之书,已佚。

14、《西域图》一张。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按,当时南北睽隔,南朝与西域交往远逊北魏,^①陶弘景此图若非因袭前人,则其参考资料恐系其父陶贞宝元徽四年出使北魏时携回。^②

15、《帝五年历》五卷。今佚。

见《本起录》,两《唐志》并入杂史类。《本起录》云:“《帝王年历》五卷,起三皇至汲冢竹书为正,检五十家书历异同共撰之也。”《南史》云:“著《帝代年历》,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隋姚恭曾参用陶弘景《帝王年历》作《年历帝纪》,说见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五。^③

① 《南史·西域传》云:“玉门以西达于西海,考之汉史,通为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则其所也。自晋宋以还,有时而至,论其风土,甚未能详。”

② 《本起录》云:“(陶贞宝)元徽四年冬,衞使虏庭,通邻国之好,甚得雅称,升平元年还都,具撰游历记……”

③ 《辩正论》卷五《佛道先后篇》云:“隋世有姚长谦者(名恭,齐为渡辽将军,在隋为修历博士),学该内外,善穷算数(今太史承傅仁均受业师)。以春秋所纪,不过七十余国,丘明为传,但叙二百余年。至如《世系》、《世本》,尤失根绪,《帝王世纪》又甚荒芜,后生学者弥以多惑。开皇五年乙巳之岁,与国子祭酒开国公何妥等,被召修历。其所推勘三十余人,并是当世纪梓,备诸经籍者。据《三统历》编其年号,上拒运开,下终魏静。首统甲子,傍陈诸国。爰引九纪三元(九头五龙括提合雄连通序命修飞因提善通等,谓之九纪),天皇人帝,五经十纬,六艺五行,开山图,括地象,古史考,元命苞,援神契,帝系谱,钩命决,始学篇,太史公律历志,典略之与世纪,志林之与长历,百王诏诰,六代官仪,地理书,权衡记,三五历十二章,方叔机、陶弘景等数十部书,以次编之,合四十卷,名为《年历帝纪》,颇有备悉,文义可依。”按,《年历帝纪》,《隋志》作三十卷,姚恭撰。

按,此书虽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失载,然法琳《辩正论》、《破邪论》多处引用,^①据《破邪论》卷下引陶隐居云:“自魏黄初元年,至萧齐之末,凡二百八十岁。”则《帝王年历》之最后成书,或在陶弘景入山以后。^②

兹据《破邪论》录此书佚文两条:“隐居年纪云:夏禹治五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皋十一年。夏癸五十二年。”“陶公并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运之限,纵年长远,终非帝王。”

16、《玉匱记》三卷。今佚。

见《本起录》,亦见《南史》,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本起录》云:“《玉匱记》三卷,说名山福地事。”《真诰·稽神枢》陶弘景注文述名山福地甚详,当本于此书。

《玉匱记》虽不见目录记载,但初唐文献尚有引录本书者,《初学记》卷五引《玉匱》云:“青城山名九室之天。”《太平御览》卷四十四^③引《玉匱经》云:“黄帝封为五岳丈人,乃岳渎之上司,真仙之崇秩。一月之内,群岳再朝,六时酒泉,以代晷漏。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谷山,亦为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对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群峰掩映,牙相连接,灵仙所宅,祥异则多。”卷四十五引《玉匱》云:“抱犊山东北去恒山之南数百里,云南有穴,行三百里,出美阳县西七十里,名洞口。”但《初学记》、《太平御览》引文或称《玉匱》,或称《玉匱经》,与《本起录》、《南史》作《玉匱记》小异。复检宋钱塘沙门释智圆所著《涅槃玄义发

① 《破邪论》引陶弘景此书,多称“陶隐居年纪”,或径称“陶公”云云,与《本起录》作《帝王年历》,《南史》作《帝代年历》小异,然从引文内容来看,应是一书。

② 然诸家所引陶隐居《帝王年历》云云,间亦有窜入他书文字者,如《广弘明集》卷一载法琳“对傅奕费佛僧事”引隐居云:“自魏皇(黄)初元年,至萧齐之末,凡二百八十二岁。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所谓“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已在陶弘景身后,径将此书定为陶弘景入山以后之作,证据实有未足。

③ 《太平御览》虽作于宋初,但文献多有因袭前代如《修文殿御览》者。

源机要》卷第四云：“陶弘景《玉匱》云，括苍山西南百余里，有伟美山，状如宫阙，多灵异，可伟美也。”则知诸书所称《玉匱》、《玉匱经》为陶弘景《玉匱记》无疑。

17、《员仪集(要)》三卷。今佚。

18、《天仪说要》一卷。今佚。

19、《图像集要》今佚。

以上三著疑同是一书。《员仪集》见《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作《员仪集要》，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天仪说要》见《隋志》天文类，^①《通志》同。《图像集要》见《南史》，未著卷帙，亦不见他书记载。据《晋书·天文志·仪像》云：“暨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至和帝时，贾逵系作，又加黄道。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莢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开落。”因知所谓“员仪”，与浑象仪一样是测天之仪，《华阳陶隐居内传》作《员仪集要》，是。由此，《隋志》之《天仪说要》一卷则有可能是三卷本《员仪集要》之残书。《图像集要》则疑是员仪浑象之图录。

《本起录》云：“又作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见伏早晚，以机转之，悉与天相会。云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故《员仪集要》或称《天仪说要》恐系陶弘景自作浑天象之说明书。

20、《天文星经》五卷。今佚。

《天文星经》见《崇文总目》天文占书类：“梁陶弘景校合三垣列宿，中外官三百十九名，各设图像，著巫咸、甘德、石申所记。”

① 《隋志》天文类“《天仪说要》一卷，陶弘景撰”，凡两见。

《通志》名《星经》。此书应是星占之类,《开元占经》引巫咸、甘氏、石氏星经文字甚多,但未见有引用此书者。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五云:“陶华阳云,此三皇(指天、地、人皇)治紫微宫,其精为天皇太帝。”疑是本书文字。

21、《七曜新旧术》二卷。今佚。

见《本起录》,《南史》作《七曜新旧术疏》,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按,七曜指日、月及水、金、火、木、土五星,其学发源于古印度,东汉时传入中土,《后汉书·律历志》云:“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六朝时期,七曜之术尤盛行,见诸《隋志》有七曜历术二十余种,今皆不传。

22、《举百事吉凶历》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此当为择日吉凶宜忌之术,即《论衡》所称之“日禁之书”,《论衡·讥日》云:“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

按,陶弘景择日之术见《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齐梁禅代之年)春末夏初,当就昭告,沈约宣旨,又请尅日(指梁武帝登基之日),先生虽疏数日,而正拣四月八日丙寅也。”

23、《象历》一卷。今佚。

见《宋志》天文类。

24、为梁武帝造年历。

《南史》云:“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此历未见记载。

按,造历事《华阳陶隐居内传》与《南史》不同,《华阳陶隐居内传》云:“(梁武帝)因问享国之期曰:吾历数奢促如何?先生启

云:再环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则直上七七,然后乘彼白云。帝在祚四十九年。”不言造历。又检《隋书·律历志》,梁初因齐,用宋《元嘉历》,天监三年下诏定历,祖暅阻之,乃罢,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亦未见有陶弘景所造历者,疑造历事系《南史》误记。^①

25、《三命抄略》二卷。今佚。

26、《三命立成算经》一卷。今佚。

27、《三命杀历》一卷。今佚。

三书皆见《通志》五行三命类。按,“三命”一词虽古,然迄两《唐志》五行类,均无以“三命”为名之星命著作,三命之说大盛于宋,《宋志》有题郭璞撰《三命通照神白经》等“三命”书十八种,《三命杀历》亦在其中,然不著撰人。检《四库提要·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云:“是书(指《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前有楚颐序,又谓珞碌子者,陶弘景自称。然禄命之说,至唐李虚中尚仅以年月日起算,未有所谓八字者,弘景之时又安有是说乎。考其书始见于《宋(史)·艺文志》,而晁公武《读书志》亦云,宣和、建炎之间是书始行。则当为北宋人所作,旧称某某,皆依托也。”四库馆臣之见甚是,则不惟《珞碌子三命消息赋》,并此三书亦必宋人所作,而托陶弘景之名也。

28、《占筮略要》一卷。今佚。

29、《占候》今佚。

《占筮略要》见《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作《卜筮略要》,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占候》见《南史》,未著卷帙,亦不见他书记载。《占筮略要》当是占卜通论之书,《占候》疑系同书异名。

① 或《南史》陶弘景造历云云,系据梁武帝天监三年下诏定历事附会。

30、《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按，风雨水旱皆有占应，其术尚见《开元占经》卷九十一、九十二，陶弘景此书则不传。

31、《算数艺术杂事》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按，算数即算术，指推算历象吉凶之术，艺术即杂艺术数，此应为五行类著作。

32、《真人水镜》十卷。今佚。

《真人水镜》十卷最早见《隋志》兵家类，不著撰人，至两《唐志》兵书类，始题作陶弘景撰，此后书目多因之。《崇文总目》兵家类作《真人水鉴》十二卷，《玉海》称为《真人水镜经》，《通志》兵阴阳类《真人水鉴》十卷。《宋志》兵书类有陶弘景《真人水照》十三卷，五行类又有《真人水鉴》十三卷，不著撰人。按，“水鉴”、“水照”皆是“水镜”，乃宋人避讳所改。此书是否陶著，不能确考。

33、《握镜》一卷。今佚。

34、《握鉴方》三卷。今佚。

以上两著疑同是一书。《握镜》，《唐志》兵书类一卷，题陶弘景撰，《新唐志》兵书类作三卷，不著撰人。《宋志》五行类有《握镜图》一卷，《握鉴方》三卷，并题陶弘景撰。《通志》兵阴阳类《握镜图》、《握镜方》两书均不著撰人。

按，“握”即“幄”，宋高似孙《子略》卷一引《风后握奇经·叙》云：“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机。”则《握镜》应与《风后握奇经》一样，为兵阴阳类著作。检《开元占

经》卷一百十一至一百二十，^①引《握镜》佚文十余条，考其内容均为物异杂占，但部分条文确与兵事有关，如云：“牛大疫，舂草动，主用兵，杂城郭，不出三年有大殃。”“鱼忽出屋上，死道中，皆有兵奔败。”“甲虫无故生宗庙中，不出三年，臣背叛，兵兴，国忧亡。天下虫无故自死，用刑暴，戕害过。”或即陶弘景《握镜》佚文。

35、《陶隐居》一卷。今佚。

此书惟见《宋志》五行类。

36、《陶隐居易髓》三卷。今佚。

两《唐志》五行类并有《易髓》一卷，不著撰人。《崇文总目》卜筮类、《通志》五行类、《宋志》五行类有《陶隐居易髓》三卷，《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易类又别有《易髓》八卷，称“晋人撰，不知姓名”。本书当系易占类，故各志皆入五行类，恐后人托名之作。

37、《五行运气》一卷。今佚。

此书惟见《宋志》五行类。按，“运气”之说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所补七篇大论中，^②即所谓“五运六气”，以五行干支相配，其术甚烦，医学家以此预测天时民病，五行星命家则用作推演流年运程。此术实始于唐代，故《五行运气》一书必唐宋间人伪托。

① 据《唐志》有《开元占经》一百一十卷，然此书明万历四十五年重现时为一百二十卷，其末十卷均为物异杂占，与前一百一十卷为天象占不同，故论者谓末十卷系唐以后人所附益。

② 唐宝应中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原书缺第七卷，冰乃以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足之，七篇大论首倡“五运六气”之说，故又称运气七篇。篇中术语及运气推算方法与唐代流行之术数甚合，故论者颇疑此七篇系王冰伪造。

38、《鬼谷子注》三卷。存。

《鬼谷子》，《隋志》纵横家类有皇甫谧、乐一两家注，皆为三卷，两《唐志》有乐台（壹）注、尹知章注，亦三卷。宋代书目始有称陶弘景注者，^①《玉海》引《中兴书目》云：“一本始末皆东晋陶弘景注，一本捭阖、反应、内捷、抵牾四篇，不详何人训释，中下二卷与弘景所注同。”他若《郡斋》、《直斋》、《通志》、《子略》皆著录陶弘景注本，独《宋志》纵横家类《鬼谷子》三卷，未题注家。

今存之《鬼谷子》有注本，^②或题陶弘景注，或不题注者姓名，然比勘文字，实出一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此书汉志亦无有，隋、唐志则直以为苏秦撰，不可考也。《隋志》有皇甫谧、乐一两家注，今本称陶弘景注。”是知宋代已仅存所谓“陶弘景注本”也。此书是否果出陶弘景之手，不能确考。

39、《古今刀剑录》一卷。存。

《古今刀剑录》最早见唐李肇《尚书故实》征引。《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称“陶弘景刀剑录”。《崇文总目》、《郡斋》、《宋志》并作《古今刀剑录》，题陶弘景撰。此书传本甚多，以宋本《百川学海》最早，题“梁华阳道士陶弘景撰”，前有小序云：“夫刀剑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后帝，莫不铸之。但以小事，记注者不甚详录，遂使精奇挺异，空成湮没，慨然有想，遂为记之。”

按，陶弘景精铸造事，《南史》云：“中大通初，又献二刀，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今本此书颇有后人附益者，如蜀

① 四库本《鬼谷子》卷首有题“监修国史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上”之“鬼谷子序”一篇，称“隋书经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乐壹注三卷”。若此序不伪，则唐代已有陶弘景注本。

② 四库本《鬼谷子》除每篇标题有注，正文悉白文无注训。

主刘备采金牛山铁铸剑条,引房子容云云,实为唐代之事。称梁武帝云云,非陶弘景口吻,又谓梁武帝天监二年即位,亦谬。《四库提要·古今刀剑录》于此书立论甚平,有云:“《古今刀剑录》一卷,梁陶弘景撰。……是书所记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诸国刀剑,自刘渊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吴将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将刀,钟会以下凡六事。……弘景生于宋代,齐高帝作相时已引为诸王侍读,而书中乃称顺帝准为杨玉所弑,不应以身历之事谬误至此。且弘景于武帝时卒,而帝王刀剑一条乃预著武帝谥号,并指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书已为后人所窜乱,非尽出弘景之本文。然考唐李绰《尚书故实》引《古今刀剑录》云:自古好刀剑多投伊水中,以禳人膝之妖。与此本所记汉章帝铸剑一条,虽文字小有异同,而大略相合,则其来已久,不尽出后人之臆造。或亦张华《博物志》之流,真伪参半也。”

40、《太清经》今佚。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五云:“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按,《道教义枢》卷二十七云:“(太清经)明金丹之术,服御之者远升太清。”则《太清经》所述应皆金丹服食之道。^①

日·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十六引《太清经》文甚多,如“《太清经》云:黄帝四扇散,仙人茅君语李伟曰,卿宜服黄帝四扇散,方:松脂、泽泻……此黄帝所授风后四扇神方,却老还少之道也。我昔受之于高丘先生,令以相传耳”。“西王母四童散,茅君语思和曰,卿宜服王母四童散,其方用:胡麻、天门冬……”由内容分析,确系言服食之道者,应即是此。此书当系陶弘景辑录东晋杨羲、许谧降灵接真时所出金丹、服食内容而成,其文多能与《真诰》、《登真隐诀》互参。

^① 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89页。

41、《剑经》佚。

唐李绰《尚书故实》云：“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李说《太清经》即《剑经》，恐误。由《尚书故实》所引其佚文来看，此书应与《古今刀剑录》一样，述刀剑事。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五“剑解”条引陶隐居曰：“晋永嘉中，刘懂多奇识，亦云是异人，作此剑，乃方佛符字殊细，设娄罗钁，曰大乘法，而铁甚快利，宋来便恒供御卫，名曰：刘懂钁尚千牛刀，同宝女已易去，钁磨刻处亦渐渐欲灭。又见有四五故钁，并相似如一，不知其剑身何在。东山顾居士亦造此剑，诸人有同时共制者，今犹存焉。大抵违谬，不可具说。乃有铜铸作钁，以钉铸着故刀，如此并可以类推。”^①疑是陶弘景《剑经》佚文。

42、《本草经（集）注》七卷。残，有辑本。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作《本草经注》，梁《七录》名《本草经集注》，《南史》作《本草集注》，《唐志》作《本草集经》、《新唐志》作《集注神农本草》均为七卷。据敦煌出土唐开元六年尉迟卢麟写本题：“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知此书正名应为《本草集注》，今则习惯称为《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在本书序录中叙及撰述宗旨：“余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内获家门，傍及亲族。其虚心告请者，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数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岭，犹不忘此，日夜玩味，恒觉欣欣。今撰此三卷，并《效验方》五卷，又《补阙葛氏肘后》三卷。盖欲永嗣善业，

① 《太平御览》“剑解”条先引《东乡序》，然后提行书“陶隐居曰”，其文极长，后又复有“又曰”两条，然详据上下文，陶隐居云云，实亦《东乡序》引陶，非尽是陶弘景《剑经》也。

令诸子侄，弗敢失坠，可以辅身济物者，孰复是先。”又论撰述体例：“以《神农本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附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三卷。”陶弘景自序未记本书著作年代，然由上引文知其必作于《补阙葛氏肘后》之后，检陶《肘后百一方·序》称“太岁庚辰”，即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又《本草经集注》人参条陶注“百济今臣属高丽”。按，《南史·百济传》云：“梁天监元年，进（牟）大号征东将军。寻为高句丽所破。”《梁书》同。由此可见《本草经集注》必成于入梁之天监初年，论者谓此书作于齐代，恐谬。^①

需加辨明者，陶弘景在序录中对此书卷帙即有三卷、七卷两种说法。陶云：“本草经卷上（序药性之本源，论病名之形诊，题记品录，详览施用），本草经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经卷下（虫鱼、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药合七百三十种，各别有目录，并朱墨杂书并子注，大书分为七卷。”其三卷、七卷之分，正《本起录》“先生凡所撰集，皆卷多细书大卷，贪易提录，若大书皆得数四”之意。

《本草经集注》对本草学术影响极大，唐显庆四年官修《新修本草》即以此书为蓝本，《新修》出而《集注》晦，比至宋代，《新修本草》经开宝、嘉祐两次重修，北宋末，更有蜀医唐慎微参用诸经，撰成《证类本草》，至此，不惟《本草经集注》，并《新修本草》亦渐失传。故《通志》称“《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实系耳食之言。然至为幸运者，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时所创“朱墨杂书”体例，为后世修本草者采纳，使《集注》文字之绝大部分得以保存。此外，20世纪初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长卷，1915

^① 如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64页，据陶弘景齐永元二年所作《肘后百一方·序》有云：“凡如上诸法，皆已具载余所撰本草上卷中”，遂认为《本草经集注》先于《肘后百一方》。然《本草经集注·序录》则云已作成《补阙葛氏肘后》三卷，则二书当为同时之作，由书中“百济今臣属高丽”云云，知《本草经集注》成书稍后也。

年上虞罗振玉氏影印收入吉石盦丛书,罗并有长跋。吐鲁番又出土残片一段,为燕矢等四药佚文,1933年黑田源次氏曾撰文考证,后载入万斯年《唐代文献丛考》及罗福颐《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此书有日人森立之、国人尚志钧氏辑本。^①

43、《陶隐居本草》十卷。今佚。

梁《七录》除著录《本草经集注》七卷外,复有《陶隐居本草》十卷,此书《隋志》已亡,亦不见其他目录记载。检《证类本草》卷十三槟榔条唐李珣《海药本草》引陶弘景云:“向阳曰槟榔,向阴曰大腹。”同卷龙脑香条《海药本草》引陶弘景云:“生西海律国,是波律树中脂也,如白胶香状。”因槟榔条引文不见《本草经集注》陶氏注文,而龙脑香更非《本草经集注》中药,故疑系《陶隐居本草》佚文。

44、《别行本草》三卷。今佚。

《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云:“桓闾为陶隐居执役十余年,一旦有青童白鹤自天而下,曰:太上召桓先生。隐居问: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矣。即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隐居之室,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害于物命,一纪之后但解形去世,为蓬莱都水监耳。隐居乃以草木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过。”按,《别行本草》未见著录,恐出附会,附记于此,待考。

45、《名医别录》三卷。有辑本。

《名医别录》,《隋志》作三卷,称陶氏撰,《通志》题陶弘景撰。《通志·校讎略》云:“《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按,因《隋志》将《名医别录》置《名医集验方》与《删繁方》两方技

^① 尚志钧辑本 1961年由芜湖医专油印,199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

书之间,故有论者疑此书为医方,非本草,更非陶弘景所作,^①对此,著者在《神农本草经研究》一书中已详作辩证,认为《名医别录》是否陶弘景所作,确不可知,但可肯定者,此书是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墨书大字部分为依托,增补而后成。^②此书有尚志钧氏辑复本。

46、《药总诀(集药诀)》一卷。今佚。

今本《华阳陶隐居集》有陶弘景撰《药总诀序》一篇,此书《崇文总目》、《通志》皆作一卷,《宋志》名《制药总诀》一卷,均不著撰人,《通志》别有《陶隐居集药诀》一卷。据《证类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所引书传”云:“《药总诀》,梁陶隐居撰,论次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凡二卷。一本题云《药像教诀》,不著撰人名氏,文字并相类。”则知此书宋代尚存。

《药总诀》除序文尚存外,《证类本草》镜鼻、石蚕、马蹄、水牛角、牡鼠等五条存《嘉祐补注本草》引《药诀》佚文,此外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一引《药像教》一条:“服槐实,忌猪肉。”^③

47、《肘后百一方》三卷。存。

《本起录》云:“三卷,增补葛氏”,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梁《七录》名《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隋志》仅存葛洪《肘后方》六卷,陶弘景补阙之九卷本亡。按,葛洪《肘后方》据《隋志》,梁为二卷,而至隋代衍为六卷,故疑陶弘景补阙内容已包含在《隋志》“葛洪《肘后方》六卷”之中。两《唐志》并作《补肘后救卒备急方》六卷。此书《道藏》题作《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八卷,葛洪撰,陶弘景、杨用道增补。《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医家类,名《肘后备急方》

① 廖育群:陶弘景本草著作中诸问题的考察,中华医史杂志,1992;(2):74。

② 王家葵:《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年,144-152页。

③ 《药总诀》佚文由马继兴氏最早揭出,见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年,268页。

八卷,《四库提要》述其原委:“《肘后备急方》八卷,晋葛洪原撰,初名《肘后卒救方》,梁陶弘景补其缺漏,得一百一首,为《肘后百一方》,金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诸方,附于《肘后》随证之下,为《附广肘后方》。”有关此书版本情况马继兴氏《中医文献学》论之甚详,^①不赘引。

陶弘景《肘后百一方·序》云:“太岁庚辰,隐居曰: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虽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时之设,可以传方远裔者,莫过于撰述,见葛氏《肘后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方术之书,卷轴徒烦,拯济殊寡,欲就披览,迷惑多端。抱朴此制,实为深益,然尚缺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旧方都有八十六首……今乃配合为七十九首,于本文究具都无付减,复添二十二首。……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按,序云一百一首者,治一百零一种疾病之一百零一类处方,治每类疾病有若干首处方,非此书仅载一百零一首处方也。由序知陶著成于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陶弘景于葛洪原书既有调整,又有增补,其增补文字以墨书,葛氏原文用朱书。共一百零一类处方,分三卷。然今存之《肘后备急方》,虽溢为八卷,而实载疾病仅69类,较陶弘景原著少32病,且陶氏增补内容无法甄别,可见今传本已非全帙。有鉴于此,尚志钧氏有《补辑肘后方》,^②增补疾病32种,辑得佚方1265条,虽未能尽复陶氏原书旧观,较今传本亦称完善。

48、《效验施用药方》五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七录》名《陶氏效验方》,五卷,《隋志》六卷,两《唐志》并为十卷。陶弘景《本草经集

①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年,158-161页。

② 尚志钧:《补辑肘后方》,安徽科技出版社,第二版,1996年。

注·序录》、《肘后百一方·序》皆提到此书,《肘后百一方·序》云:“余又别撰《效验方》五卷,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则《效验方》应完成于《肘后百一方》之先。

陶氏此书久佚,亦无辑本,唐王焘《外台秘要》尚存佚文数条。^①此外,宋苏颂《本草图经》蝎条引“陶隐居《集验方》”云云,^②据其内容,亦应是《效验方》之讹。

49、《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卷。存。

此书不见著录,马继兴氏《敦煌古医籍考释》始载之,卷首书名后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据马氏述其流传始末云:“此书历代未见著录。原为卷子本,藏于敦煌千佛洞,伯希和盗运敦煌文物时选中此卷,幸被一装车道士暗暗留下,民国初年售予河北省威县中医师张握南先生,握南先生传与嫡孙张大昌中医师,世袭珍藏,惜于1966年夏毁于横扫一切之浩劫。今存两种抄本。”^③

有关本书真伪,马云:“此书为陶弘景所撰之可能性确实较大。”王淑民氏所编《敦煌石窟秘藏医方》亦收此卷,并录有张政烺、李学勤两氏鉴定语,则谓此书确非近人伪造,然亦非梁代之作。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者,为尊崇本师,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④。今按此卷文辞近古,引据《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皆符经义,选方药物精审,因不见于《本起录》记载,故不能遽指为陶撰,而考其内容,确与陶弘景医药思想吻合,谓“后人辑录

① 《外台秘要》引陶弘景《效验方》有称“陶隐居效验方”者(卷十四),称“陶效验方”者(卷十八),称“陶效方”者(卷二十二),称“隐居效验”者(卷二十三)等,卷二十四又引“隐居必效方”,疑亦指陶弘景《效验方》。详见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外台秘要方丛考》,华夏出版社,1993年,906-955页。

② 见《证类本草》卷二十二引《本草图经》。

③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115-137页。

④ 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9年,1页。

陶说而为之者”，是矣。另据《本起录》云：“又有图象杂记甚多，未得一二尽知尽见也。”《南史》云：“（弘景著作）撰而未讫又十部，惟弟子得之。”则此书或当时撰而未讫，弟子足成之者，也未可知。

卷首有小序，文字尚不恶，录存备考：“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邪气虽平，精气被夺，致令五脏虚疲，当即据证服补汤数剂以补之。不然，时日久旷，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耳。谨将五脏虚实证候悉列如左，庶几识别焉。”序虽不足二百字，用道家典故信手拈来，“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句，出《抱朴子内篇·杂应》：“（修道之人）居人间者，志不得专，所修无恒，又苦懈怠不动，故不得不有疾疹耳。……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序中“进修内视之道”，“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乃《黄庭经》、《真诰》、《登真隐诀》中语言。由此而论，此序或果为陶弘景所遗。

50、《登真隐诀》二十四卷。残。

51、《真经修事》二卷。今佚。

《登真隐诀》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本起录》云：“《登真隐诀》三秩二十四卷，此一诀皆是修行上真道经要妙秘事，不以出世。”此书两《唐志》并作二十五卷，《郡斋读书后志·卷二》云：“《登真隐诀》二十五卷。右梁陶弘景撰。景以为学其诀者，当由阶而登，真文多隐，非诀莫登，故以名书。凡七篇，十七条。《隋志》云。”《崇文总目》、《通志》作六十卷，《宋志》三十五卷，恐系传写之讹。今正统《道藏》洞玄部玉诀类存《登真隐诀》三卷，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卷上有真符、宝章、九宫、明堂、洞房五篇；卷中记诸真受诀凡五十二事；卷下有诵黄庭经法、入静、章

符、请官四篇。则此书今传本远非完帙。

按,今《道藏》本无序文,而《华阳陶隐居集》则载之,陶集为南宋傅霄所编,因知此书宋代尚完整,至元明间亡佚,正统修藏乃收集残篇,厘为三卷也。唐宋以来道经、类书征引本书佚文甚多,刘师培氏《读道藏记》云:“此仅三卷,盖系残书。故唐宋诸道书所引,其为此三卷所无者,不下数百则。又本藏逊字号六列《上清明堂元真经诀》一卷,与此书体例悉同。(此诀前半为茅传诀,后半为王传诀。茅传诀夹注有云,此诀《真诰》别授,则书出隐居明甚。)逊字号四列《上清三真旨要玉诀》一卷,亦与此书体例近,惟无夹注。疑均缺卷之别标书名者。”^①后之好事者宜循刘氏之说而辑复之。

又据陶弘景《登真隐诀·序》云:“昔在人间,已抄撰《真经修事》两卷。于时粗谓委密,顷岩居务静,颇得恭洁,试就遵用,犹多阙略。今更反复研构,表里洞洽,预是真学之理,使(便)了然无滞,一字一句皆有事旨。”则《真经修事》应为《登真隐诀》之蓝本,此书不传,亦不见《本起录》等记载。

52、《真诰》七卷。存。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本起录》云:“《真诰》一秩七卷,此一诰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居士已撰,多有漏谬,更詮次叙注之尔,不出外闻。”此书两《唐志》、《崇文总目》、《直斋解题》、《四库书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志》并作十卷,恐即与前《本草经集注》一样,属《本起录》所谓“先生凡所撰集,皆卷多细书大卷,贪易提录,若大书皆得数四”者。^②《道藏》、《四库全书》作二十卷,盖后人因此书卷帙浩繁而

① 刘师培:《读道藏记》,见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选辑:《道藏要籍选刊》,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19页。

② 晁公武谓十卷本亦系后人所分,《郡斋读书志》卷三下云:“后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为上下。”

加析分者。关于《真诰》源流及文本，赵益有文论述，可参看。^①有关《真诰》著作年代等问题，可详本书第三章。

53、《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隋志》、《南史》名《合丹法式》，《隋志》作四卷。此书当说金丹事，《隋志》别载《合丹要略序》一卷，孙文韬撰，检《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云：“孙韬字文藏，会稽剡人也。入山师潘四明参，受真法，学摹写，遂大巧妙，后学王书，殊有深意，当时称之。南洞大碑及许长史坛碑并是韬迹也，陶隐居手为经题。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惟传孙韬与桓闳二人而已。”孙韬即孙文韬，^②《合丹要略序》疑系解说陶弘景《合丹法式》之作。

54、《集金丹药白要方》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

55、《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此书《华阳陶隐居内传》名《服云母诸石方》，《通志》名《炼服云母法》。按，《本草经集注》云母条陶弘景云：“炼之有法，惟宜精细，不尔，人腹大害人。”消石条云“化消石法，在三十六水方中”。疑皆是指此《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

《道藏》洞神部总术类别有《三十六水法》，陈国符氏《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谓此书系汉代之作，^③然详案其内容，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称之为“三十六水方”颇合，诸水

① 赵益：《真诰》的源流与文本，文献，2000；（3）：50—56页。

② 据《茅山志》，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九锡真人三茅君碑皆题孙文韬书，故知《太平御览》误作孙韬。

③ 陈说见《道藏源流续考》，此转引自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94页。

法中亦有“云母水法”，虽未必即是陶著，但与陶《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应有关系。

56、《灵方秘奥》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世所著书。此书《华阳陶隐居内传》、《宋志》皆名《灵奇秘奥》。检《医心方》卷二十六引有《灵奇方》数条，有芳香术：服之能“五日口香，十日舌香，廿日肉香，卅日衣香，五十日远闻香”；达知术：服之能“心思念所欲为事，卧觉心开而知，或梦中大来吉”；相爱方：能“令亲疏相爱”。又有求富方、避寒术、避雨湿方等，考其内容，确属“灵奇秘术”，或即是此书。^①

57、《服草木杂药法》一卷。今佚。

58、《断谷秘方》一卷。今佚。

59、《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今佚。

以上三书见《本起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服草木杂药法》，《华阳陶隐居内传》名《服食草木杂药法》，《通志》名《经食草木法》。

三书皆不传，然与《医心方》卷二十六引《太清经》内容颇相接近，如《太清经》之服五茄方、服苟杞方、服菊方、服槐子方、服莲实鸡头实方、服术方等延年方，或即《服草木杂药法》内容。服茯苓法、服黄精法、服松脂、松叶、松实、松根法等断谷方，或即《断谷秘方》中内容。又有去三尸诸法，或即《消除三尸诸要法》中内容。推测陶弘景先著成以上三书，晚年复加整理，总成《太清经》若干卷，即释道世《法苑珠林》所称，^② 丹波康赖《医心方》所征引者。

① 此类灵奇之术确为六朝道士习用，《抱朴子内篇·杂应》即有不寒之道、不热之道、辟五兵之道、隐沦之道等奇奥秘术。

② 《法苑珠林》引文已见第40《太清经》条。

60、《服气导引法》一卷。今佚。

61、《养生延命录》一卷。存。

62、《导引养生图》一卷。今佚。

《服气导引法》见《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称《服气导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养生延命录》见《崇文总目》，《通志》、《宋志》、《道藏》皆作二卷，名《养性延命录》。《云笈七籤》卷三十二有本书节本，称“旧题孙思邈撰”，《道藏》洞神部方法类虽题陶弘景撰，然序文后有按语云：“或云此书孙思邈所集。”《通志》亦著录此书别本，题孙思邈撰。任继愈氏《道藏提要》云：“按书中所集，上自神农，下迄魏晋，而不及南北朝，盖为陶集，孙氏所集或系另一书。”^①其说甚允。据今《道藏》本《养性延命录》内容分析，乃纂集前人服气导引之论，与《本起录》称“撰集《服气导引法》一卷”正合，二者应是同书异名。

《导引养生图》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晁公武云：“《道引养生图》一卷。右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势，如鸿鹤徘徊，鸳鸯戢羽之类，各绘像于其上。田伟家本少八势。”《宋志》同，《通志》名《导引图》。此图不传，疑即《服气导引法》（或称《养性延命录》）之图解。

63、《人间诸却灾患法》一卷。今佚。

见《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称《人间却灾患法》，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

64、《炼化杂术》一卷。今佚。

见《隋志》。

①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04页。

65、《太清草木集要》二卷。今佚。

见《隋志》。《新唐志》三卷，名《太清诸草木方集要》，《通志》亦三卷。按，《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楚泽先生编《太清石壁记》有云“近代有贞白先生陶隐居条撰草木方”，应即指此书。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引本书两条。卷十二槐实条称《太清草木方》：“槐者，虚星之精，以十月上巳日采子服之，去百病，长生通神。”卷二十三藕实茎条称《太清诸草木方》：“七月七日采莲花七分，八月八日采根八分，九月九日采实九分，阴干捣筛，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66、《太清诸丹集要》四卷。今佚。

见《隋志》。《唐志》有《太清诸丹要录集》四卷，不著撰人。

67、《太清玉石丹药要集》三卷。今佚。

两《唐志》并作三卷。

68、《太清诸石变化神仙方集要》一卷。今佚。

此书惟见《通志》。《本草图经》云母条苏颂云：“古之服五云之法甚多，陶隐居所撰《太清诸石药变化方》言之备矣。今道书中有之，然修炼节度，恐非文字可详，诚不可轻饵也。”^①

69、《服饵方》三卷。今佚。

见《隋志》。考《隋志》收载服食类方书甚多，因书名皆接近，故唐宋医方虽多有征引，实难确认孰为陶隐居所作。检《本草经集注》松脂条陶注云：“采炼松脂法，并在《服食方》中，以桑灰汁或酒煮软，擲内寒水中数十过，白滑则可用。其有自流出者，乃

^① 见《证类本草》卷三引《本草图经》。

胜于凿树及煮用膏也。”或即是《服饵方》中文字。

70、《陶真人金丹诀》一卷。今佚。

《崇文总目·道书类六》载《陶真人金丹诀》一卷，陶弘景撰，而《道书类七》又重出《陶真人金丹诀》三卷，不著撰人。《通志》则相反，《陶真人金丹诀》一卷，不著撰人，而《陶真人金丹诀》三卷，题陶弘景撰。

按，北宋时陶弘景始被加封为“宗元翊教真人”，见《茅山志》卷四，此前少有呼其为“陶真人”者。^① 检《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有《陶真人内丹赋》一卷，刘师培《读道藏记》考为唐末陶植作，所见甚是。此诀亦应是植所作，因题“陶真人”，后人乃误会为陶弘景之作也。《云笈七籤》卷七十三《大还心镜》引陶真人云：“若言非世间水银。又云：砂产于金也，汞生于铅也。”同篇又云：“陶埴真人云：若用世间水银化白烟。此真言也。”此疑即《陶真人金丹诀》佚文。引文称“陶埴（植）真人”，尤明陶真人为陶植，非隐居也。

71、《陶真人内丹诀》一卷。今佚。

见《通志》。亦陶植所撰，后人误题。说见上条。

72、《养生经》一卷。今佚。

见《崇文总目》。《通志》作《养生诀》，题陶真人撰。此书恐亦陶植所撰，后人误题。

73、《达灵经》一卷。今佚。

见《崇文总目》，《通志》同。

① 如梁萧纶作《梁解真中散大夫贞白先生陶隐居碑铭》、简文帝作《华阳陶先生墓志铭》皆呼“陶先生”，而不称“陶真人”，唐李渤《真系》、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亦如之。元刘大彬《茅山志》始称陶为“陶真人”，如卷八“陶真人井”条。

74、《神仙玉芝瑞草图》二卷。今佚。

见《宋志》。《本草经集注》六芝条陶注云：“此六芝，皆仙草之类，俗所稀见，族种甚多，形色环异，并载《芝草图》中。”未详《芝草图》是此《神仙玉芝瑞草图》否。

75、《上清握中诀》三卷。存。

见《通志》，《宋志》同。按，此书记载虽晚，然《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云：“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陶隐居）惟传孙韬与桓闾二人而已。”^①是陶弘景确有《握中诀》之作。今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有《上清握中诀》三卷，未著撰人，述服日月精气、拘三魂七魄、按摩、澡浴、服药、存想、祝咒诸法，应即是陶著遗篇。

76、《太上赤文洞神三策》一卷。存。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载此书一卷，题“梁贞白先生集，唐太史令李淳风注”。按，三策为八卦内吉凶应策、太上玄妙通神策、太上玄妙千金策，此书未见前志记载，或托名之作。

77、《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一卷。存。

此书亦晚出，《道藏》洞真部谱录类始载之，题“梁贞白先生陶弘景撰，唐天台妙有大师玄同先生赐紫闾丘方远校定”，前有陶弘景序。虽《四库提要》谓其“杜撰凿空，又出《真诰》之下”，然核书中神仙谱系确源自《真诰》等六朝道经，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相其文词，实出六朝人之笔，非出伪托。”的确是持平之论。

① 此条《太平御览》接“《真诰》曰刘翊”云云后，题作“又曰”，然实非《真诰》中语，疑《御览》漏引书标题。

78、《众醮仪》十卷。今佚。

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二《三教治道篇第二》云：“如茅山道士陶隐居，撰《众醮仪》，凡十卷。从天地山川星辰岳渎，及安宅谢墓，呼召魂神所营醮法，备列珍奇，广班绫彩，多用蒸鱼鹿脯，白黄蜜饭，清酒杂果，盐豉油米等。先奏章请唤将军吏兵，道士等皆执手版，向神称臣，叩头再拜，求恩乞福，与俗并同。既非出家，具造邪业。”此书不传。

79、《经目》今佚。

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云：“又序三洞经洞者，其卷数题目，具如陆先生《三洞经书目》、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等所明，今不具辨。”检《真诰·叙录》云：“自此前凡诸经书在处者，其篇数并别有目录。若止零牒一两篇者，今复显题卷目如后。”疑即是此《经目》，则此目乃陶弘景搜集整理杨、许手书真经所拟目录。陶隐居《经目》不传。

80、《梦记》一卷。今佚。

《本起录》云：“《梦记》一卷，此一记先生自记所梦征想事，不以示人。”《华阳陶隐居内传》名《梦书》，为陶弘景在山所著书。

按，陶弘景作《梦记》事见于正史，《梁书》云：“建武中，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梦铿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秘异，因著《梦记》焉。”《南史·萧铿传》亦云：“初（齐宜都王萧）铿出阁时，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日命过，身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著《梦记》云。”又《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

佚文云：“延兴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月十八日忽梦王云云。先生眠觉，悲怛惊怪，明日使人出都参访，云（王）以此月十日致薨矣。”则《梦记》必作于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又检《太平广记》卷二七七引《梦记》两条，一即陶弘景梦萧铿事，文字与《南史·萧铿传》略同，一记后魏卢元明事，称孝武永熙末（534），距陶弘景去世仅两年，其非陶之《梦记》也明。

81、《周氏冥通记》一卷。存。

《周氏冥通记》一卷，《隋志》先著录，不著撰人。《唐志》一卷，题陶弘景撰。《崇文总目》作三卷，《道藏》洞真部记传类作四卷。此书系陶弘景纂集弟子周子良所记众真降授之词，其体例一同《真诰》。首为陶弘景所撰周子良传及天监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启》、梁武帝批答。据《进周氏冥通记启》云：“今谨撰事迹，凡四卷。”及卷四末云：“大凡四卷，真本书杂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知今《道藏》四卷本确系原著。

82、《法检论》。佚。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老氏圣纪》云：“张绎字士和，吴郡人也。奖励学徒，整肃法事，屡讲众经，理致深密，词端华辩，当时所宗，梁武帝雅相钦赏。时陶隐居著《法检论》，明释、老二教，绎往复讨论，甚有条理，隐居嘉焉。专心道法，居贫守约，善八体书，别制云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按，陶弘景佛、道观前后颇有变化，天监三年与沈约辩《均圣论》时尚明确排佛，至十一年转又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法检论》若作于天监十一年前，应是尊道卑佛之作，若成于此后，则必为二教调和之论。

又检唐释玄嶷《甄正论》卷下云：“弘景重制冠服，改馆为观，行黄帝老子之教。恶灵宝法伪鄙而不行，手著论以非之。”此又与《法检论》不同，当别是一论，姑附记于此。

83、《草堂法师传》一卷。今佚。

《隋志》有《梁故草堂法师传》一卷，不著撰人。两《唐志》及《通志》并题作陶弘景撰。据《续高僧传》，慧约字德素，俗姓娄，东阳乌场人，住锡钟山草堂寺，称草堂法师，入梁封国师，大同元年卒，年八十四。今本《陶隐居集》中有《和约法师临友人》一首，约法师即慧约。

84、《礼佛文》一卷。今佚。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云：“陶隐居作《礼佛文》一卷。”《破邪论》卷下云：“道士陶隐居作《发菩提心礼佛文》。”按，《茅山志》卷十云：“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武帝有敕迎还旧山，因诣鄞县礼阿育塔，自誓受五大摄戒。既归，入住东涧。”《梁书》云“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鄞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此应当日礼塔受戒时所发愿文，今不传。

85、《陶弘景集》三十卷。今佚。

《隋志》及两《唐志》并作三十卷。据《道藏·陶隐居集》首篇《寻山志》文中所夹小注云：“先生去世后，久无人编录文集，至陈武帝贞明二年，敕令侍中尚书令江总始撰（纂）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驾，至是五十三载矣，文章颇多散落。”则知《陶弘景集》乃陈祯明二年（588）江总所纂。此集失传，惟今本《陶隐居集》尚存江总序文一篇。

86、《陶弘景内集》十五卷。今佚。

《隋志》尚有著录，两《唐志》则不载，因知《内集》亡佚时间更在三十卷文集之前。内容不详，或仿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之制，《内集》专为道家文字。

87、《华阳陶隐居集》二卷。存。

今《道藏》太玄部《华阳陶隐居集》作上下卷，以江总序冠首，题作：“昭台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陈楠校勘。”据《茅山志》卷十六，霄字子昂，宋晋陵人，由儒入道，住持茅山玉晨观，重编隐居集，修茅山旧记，以绍兴二十九年卒。则知陶集宋代已亡，南宋始收拾残篇，重为编辑。除傅霄所編集者外，又有明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一卷，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所辑陶弘景文等，下节将作专题讨论，此不赘述。

第三节 《华阳陶隐居集》研究

陶弘景文集的编纂始于陈祯明二年(588)，时为尚书令的江总受命主持其事，今正统《道藏》太玄部《华阳陶隐居集》中尚存江总原序，有云：

文集缺亡，未有编录。门人补辑，若逢辽东之本；好事研搜，如诵河西之篋。奉敕校之铅墨，緘以缙緌。藏彼鸿都，副在延阁。

考《隋书·经籍志》，存陶弘景文集两种，一为三十卷之《陶弘景集》，一为十五卷之《陶弘景内集》，两集皆失传，故江总所编究竟是文集还是内集，或两集均为江总纂辑，渺不可知，以下主要讨论后人所编《华阳陶隐居集》(简称陶集)的情况。

一、现存陶集版本情况

据孙启治、陈建华二氏整理的《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①介绍，现存陶集主要有以下数种：

① 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中华书局，1997年，349—350页。

华阳陶隐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口)傅霄辑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道藏·洞玄部;宛委别藏;指海·第二十集;道藏举要·第十类。

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明嘉靖史臣纪抄本。

梁陶贞白先生文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黄省曾辑 明嘉靖三十一年萧斯馨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萧斯馨刻朱多煌朱多炅重刻本。

陶贞白集二卷 汉魏诸名家集;汉魏诸名家集,傅增湘校并录文嘉、徐济忠、叶奕、彭元瑞等题识。

贞白先生陶隐居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明叶奕抄本。

梁贞白先生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明抄本。

梁贞白先生陶隐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 明朱大英刻本。

陶弘景[诗存](梁)陶弘景撰(明)冯惟讷辑 诗纪·梁卷二十六。

陶贞白集二卷(梁)陶弘景撰 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汉魏六朝诸家文集,傅增湘校。

陶隐居集四卷(梁)陶弘景撰(明)张燮辑 七十二家集。

陶隐居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姜东张氏刻本),佚名录何焯批校;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姜东张氏刻本),清何绍基评点。

陶通明集(梁)陶弘景撰 汉魏别解·南北朝文。

陶隐居集(梁)陶弘景撰 增定汉魏六朝别解·集部。

陶通明文抄一卷(梁)陶弘景撰(明)李宾辑 八代文抄。

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清刘氏味精书屋抄本，清刘海喜校。

华阳陶隐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 清抄本，缪荃孙校。

陶弘景[文存]（梁）陶弘景撰（清）严可均辑 全梁文卷四十六至四十七。

华阳陶隐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 观古堂所刊书、观古堂汇刻书·第一集、郇园先生全书。

陶贞白集一卷校勘记一卷（梁）陶弘景撰 校勘记（清）汪振之撰 金陵丛书乙集。

陶弘景[诗存]（梁）陶弘景撰 丁福保辑 全梁诗卷十一。

局限于条件，以上版本未能一一过目，因转录《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陶集后孙、陈二氏所加按语：

叶德辉云：梁陶弘景《华阳隐居集》，《道藏》太玄部澄字号作二卷，明毛晋汲古阁所刊《道藏》八种中有此书，盖即据以重刊者也。此外，明刻有汪士贤本，亦二卷。张溥《汉魏名家集》本作一卷。以汪本校张本，张多《真灵位业图序》一篇、《与亲友书》一篇、《与从兄书》一篇、《与释昙鸾书》一篇、《瘞鹤铭》一篇。近人严可均辑《全晋文》（当为《全梁文》）全据张本，注明出处，所增者惟《南史》本传所载《遗令》一篇而已，《全文》例不录诗，故张本载诗六篇严本无之。余合数本参校，知严辑为最精详，今据以附刊，增入张本诗六篇。（见《观古堂所刊书》本）按汪士贤本即据黄省曾本刻。冯惟讷辑得诗六首，与《百三名家集》本同，有载《华阳颂》十五首（当入文），丁福保亦辑诗六首。李宾辑文凡十五首，不出诸本之外。

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彭元瑞在《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①中亦论及陶集的情况：

《陶隐居集》一卷，明时旧抄本。犹在张天如未辑《汉魏百三家（集）》以前。卷末，自文休承以下，传写叙次井井，可宝也。据跋，崇祯元年抄，校字避熹宗讳，可证也。

按，彭元瑞所见本即孙、陈二氏所记之“贞白先生陶隐居集，明叶奕抄本”^②，其跋文后又由傅增湘过录到明汪士贤所刻《汉魏诸名家集·陶贞白集》后。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③载傅增湘所见陶集三种：

《梁贞白先生文集》二卷。明刊本，题五岳山人吴郡黄省曾编，小峰山人贛郡黄注校。有黄注序，谓得黄省曾抄本，为之校讎，增入文二篇，窜补字二百五十有奇。后有嘉靖壬子俞献可序。

《贞白先生陶隐居集》一卷。明叶林宗（奕）、李涵仲、奚静宜合抄本。

《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上下卷。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年辛酉，吴郡史臣纪传抄宋刊本。九行，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后有绍兴癸亥陈楠序。本书二、三行题昭台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陈楠校勘鏤板。史氏跋录后：嘉靖甲辰，文休承从玉山周生得绍兴刻本，手录藏之，予亦写此册。越十载，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后请雨词、梁元帝撰贞白碑、沈约书本传是也。辛酉冬日，吴郡史臣纪叔载题。

从以上题跋大致可知，今存陶集约可分为五类，即（1）由傅

①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6页。

② 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见《中国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5页。

③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1001页。

霄编集、陈桷校勘的《华阳陶隐居集》二卷；(2)由黄省曾所辑《梁陶贞白先生文集》二卷；(3)由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一卷；(4)由严可均所辑《全梁文》中陶弘景文；(5)后人所辑陶弘景诗。

五类陶集中年代最早者为傅霄编集的《华阳陶隐居集》，由前节引《茅山志》卷十六及傅增湘录明史臣纪题跋知此集成于南宋绍兴年间。内容最完善的应是明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以下将对这两种陶集进行比勘。

二、两种陶集内容比勘

傅霄所编《华阳陶隐居集》以明正统《道藏》本(简称“藏本”)为最早,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之《陶隐居集》(简称“集本”),实源于张燮《七十二家集》,然究其本源,仍出于藏本,但有增补、调整。为便比较,兹将两本篇目简列如表 2-2:

表 2-2 《道藏》本及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陶集篇目比较表

藏本	集本
卷上 江总序	张溥题词
寻山志	(赋) 水仙赋
水仙赋	云上之仙风赋
华阳颂	(表) 解官表
授陆敬游十贵文	(启) 与武帝论书启一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与武帝启二
题所居壁	与武帝启三
寒夜愁	与武帝启四
胡笳篇	与武帝启五
上梁武帝论书启	进周氏冥通记启
(附)① 梁武帝答书	(书) 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
上梁武帝启	答虞中书书

① 梁武帝作而藏本单列标题,加“附”字以示区别,下同。

续表一

藏本	集本
(附)梁武帝答陶隐居论书	答谢中书书
又上梁武帝论书启	答赵英才书
(附)梁武帝答隐居书	与亲友书(增)①
又上梁武帝论书启	与从兄书(增)
(附)梁武帝答书	答昙鸾书(增)
论书启	(序)登真隐诀序
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	真灵位业图序(增)
登真隐诀序	本草序
药总诀序	肘后百一方序
肘后百一方序	药总诀序
本草序	相经序
卷下 许长史旧馆坛碑	(论)难镇军沈约均圣论(增)
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	(志)寻山志
解官表	(颂)华阳颂
(附)诏答	(铭)瘞鹤铭(增)
进周氏冥通记启	(碑)许长史旧馆坛碑
(附)诏答	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
告游篇	茅山长沙馆碑
(残文)云上之仙风赋	太平山日门馆碑
茅山长沙馆碑	茅山曲林馆碑铭
太平山日门馆碑	(文)授陆敬游十贵文
茅山曲林馆铭	请雨词(增)
答谢中书书	(诗)寒夜怨
答虞仲书	胡笳曲
答赵英才书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相经序	题所居壁
	和约法师临友人(增)
	告逝篇
	附录 本传

① 集本新增文字,加“增”字以示区别,下同。

从表可见,集本删去了藏本中非陶弘景所作的几篇文字,并增加了与亲友书、与从兄书、答县鸾书、真灵位业图序、难镇军沈约均圣论、瘞鹤铭、请雨词、和约法师临友人等八篇,此外,集本按文体分赋、表、启、书、序、论、志、颂、铭、碑、文、诗等十二类,亦较藏本完善。

但事实上,张溥所辑瘞鹤铭,如本书第四章所论,实晚唐皮日休所作,非陶弘景文字,另外,可以考定为陶作者并不止以上几篇,故集本亦非尽善,实有重辑的必要。

三、新辑陶集的原则及拟目

既然藏本、集本皆存在缺陷,以此两本为底本进行重辑,显非合理,又有鉴于藏本、集本中的多数文字在现存南宋以前文献中尚有保存,则可以较早文献为底本,而以藏本、集本作参校,遇文献阙疑者,方以两本为底,以其他较晚的相关资料作参校。

集本分类详明,故文章次第主要依据集本排列。

遇仅存篇目而内容全佚者,列该类文字的最后,标注“文阙”。尚存疑问的文字,标注“存疑”。断句酌拟标题,作“某某断句”。新增文字,标注“增”。

新辑本与藏本一样,保留虽他人所作,但与本文相关的文字,标注“附”。

严可均所辑《全梁文·陶弘景》中校勘语甚有见地,用作参校。

以下是新辑本目录及辑复的详细说明。

江总序

此序系江总奉敕编纂陶集之作,藏本以此冠首。文以《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最早,取为底本,校以藏本。

赋

1、水仙赋

水仙赋作于建元四年(482),《华阳陶隐居内传》云:“桂阳王

登双霞台，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从宜都预焉。桂阳采名颂号，各令为赋，寘十题器中，先生探获水仙，大惬意。”又云：“沈约、任昉读之叹曰：如清秋观海，第见澶漫，宁测其深。其心服如此。”

以《艺文类聚》卷七十八断句为底本，缺处以藏本足之，校以集本。

2、云上之仙风赋

《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存断句，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

表

3、解官表

《华阳陶隐居内传》云“郑伟《史偶》云：先生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表云云，具集中”。

解官表以藏本为底本，校以《茅山志》卷一、集本。

3a、齐武帝：诏答（附）

《华阳陶隐居内传》云“表既入，诏答。诏云云，具集中”。因知江总所编陶集^①已将诏答附入，则藏本以此类文字入集，盖沿旧集之例，集本删之，实非。

诏答以藏本为底本，校以《茅山志》卷一。

启

4、上梁武帝论书启一

4a、梁武帝：答书一（附）

5、上梁武帝论书启二

5a、梁武帝：答书二（附）

6、上梁武帝论书启三

6a、梁武帝：答书三（附）

7、上梁武帝论书启四

^① 《华阳陶隐居内传》虽作于宋代，然贾嵩所称“具集中”，似应指江总所编之《陶弘景集》三十卷。

7a、梁武帝:答书四(附)

8、上梁武帝论书启五

陶弘景上梁武帝论书启凡五通,梁武帝诏答四通,启无年月,本书第四章于论书启之年代、顺序及相关背景详有考证。

论书启以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最早,取为底本,^①校以藏本、集本。另取《墨池编》、《书苑菁华》及《茅山志》卷一为参校。

9、进周氏冥通记启

9 a、梁武帝:诏答(附)

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在天监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据启称将自天监十四年五月以来,弟子周子良颇有冥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周卒,弘景乃将周子良入冥事迹厘为四卷,名《周氏冥通记》上奏梁武。

启及诏答均见《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周氏冥通记》卷一,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

书

10、与从兄书

集本所增。“与从兄书”见《本起录》,但《本起录》所记文字与集本略有参差,取《本起录》为底本,校以集本。

11、与亲友书

集本所增,未言出处,实录自萧伦《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其内容与上条“与从兄书”接近,疑本是一函,后人引用,另立标题。因无旁证,姑以《文苑英华》之陶碑为底本,校以集本。

12、答谢中书书

13、答虞仲书

14、答赵英才书

^① 《法书要录》、藏本、集本标题不统一,今径以论书启一、二、三、四、五为名,梁武帝答书,亦用一、二、三、四表示。本书第四章按时间先后重新排定了论书启的顺序,此处仍依《法书要录》原顺序,以存其旧。

以上三书《艺文类聚》卷三十七均仅存断句,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其中“答虞仲书”一函,《艺文类聚》、藏本同,集本误题为“答虞中书书”。

15、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

15a、来书(附)

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先为来书,次即陶弘景答辞,集本删去来书。以《艺文类聚》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

16、答昙鸾书

集本所增。文见《辩正论》卷六《内九箴篇第六》,又见《续高僧传》卷六。据《续高僧传》,昙鸾南渡访陶弘景事在大通中,因大通仅三年,故此书应作于大通二年。《辩正论》较早,取为底本,校以《续高僧传》、集本。

序

17、登真隐诀序

今《道藏》三卷本《登真隐诀》无序文。取藏本为底本,校以集本。

18、真灵位业图序

集本所增。取《道藏·真灵位业图》为底本,校以集本。

19、养性延命录序(增)

此书历来有陶弘景作、孙思邈作两说,如上节所论,确为陶作,^①按例取序文入集。序以《云笈七籤》卷三十二所载最早,取为底本,校以《道藏》洞神部方法类之《养性延命录》。

20、肘后方序

此文以《艺文类聚》卷七十五最早,然非全文,取作底本,以藏本足之,校以集本及《道藏》之《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22、本草经集注序

以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为底本,校以《证类本草》卷

① 详上节第60条。

一、藏本、集本。

23、药总诀序

此序藏本最早，取为底本，校以集本。

24、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序（存疑，增）

此著难定真贋，录其序文以待查考。

25、相经序

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五，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

26、古今刀剑录序（存疑，增）

此书《四库提要》谓属真伪参半者。据《四库全书》录其序文。

27、述异记序（文阙，增）

《本起录》谓陶弘景入山以前曾作《述异记·序》：“又作相书序、述异记序，如此等并在集中。”今藏本、集本皆无此序。

论

28、难镇军均圣论

28a、沈约：均圣论（附，增）

28b、沈约：答陶隐居难均圣论（附，增）

集本增此论，按例应附入沈约原文。论皆未著年月，以陶弘景称沈约为“镇军”，考沈约拜镇军将军在天监三年正月，故应为此年之作。三文见《广弘明集》卷五，取为底本，校以集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沈隐侯集》。

志

29、寻山志

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六，取为底本，以藏本足之，校以集本。藏本标题下有小字：“年十五作。”知此志作于宋泰始六年。

颂

30、华阳颂

《真诰·稽神枢》后所附华阳十五颂最早，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茅山志》卷二十八。

31、青溪宫颂(文阙,增)

《本起录》云:“年二十九,清溪宫新成,帝宴乐之,先生拜表献颂,又有伏曼容亦上赋。于是敕遣中书省舍人刘系宣旨褒赞,并敕豫旧宫金石会,于时上意欲刻此颂于石碑,王俭沮议而止。时献赋者五人,惟以先生为最。”今藏本、集本皆无此颂。

32、武进宫颂(文阙,增)

《本起录》云:“帝欲幸武进宫,先生复作颂,颂成而车驾废,不复得奏云。此颂体制爽绝,倍胜旧格。”今藏本、集本皆无此颂。

铭

33、瘞鹤铭(存疑)

瘞鹤铭非陶弘景所作,本书第四章有专节讨论,因集本有此,姑录存。

34、王法明墓志铭断句(增)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云:“王朗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师陶隐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隐居为制铭志,并设奠云:纁冕岂荣,随璜非宝,万里求真,絃兹内抱。”此铭不见藏本、集本。

碑

35、许长史旧馆坛碑

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取为底本,以藏本足之,校以集本、《茅山志》卷二十。据碑文云:“十七年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知此碑天监十七年作。

36、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

以藏本为底本,校以集本。

37、茅山长沙馆碑

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茅山志》卷二十一。

38、太平山日门馆碑

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茅山志》卷二十一。

39、茅山曲林馆碑铭

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取为底本，校以藏本、集本、《茅山志》卷二十一。

文

40、授陆敬游十赉文

据《华阳陶隐居内传》云：“是岁（永元元年），命弟子戴坦秉策执简，授门人吴郡陆敬游建连石之邑并十赉。”

以藏本为底本，校以集本、《茅山志》卷二十一。

41、请雨词

此集本所增，转录自《周氏冥通记》。陶弘景与弟子周子良乞雨事在天监十四年，《周氏冥通记》卷二记当日请雨事：“（天监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周子良夜梦神降曰：）昨所与陶隐居共有辞，欲须雨事，国主忧民乃至，但时运应尔。比诸处屡有章辞，皆不与报。陶既有功行，周方来此，当为验二人之德，不烦谦谦，恐悒望，故遣报。子良曰：比风日赫烈，塘湖皫竭，五谷焦枯，草木凋落，方虑饥乏，故冒共投辞，希垂沾润。此人曰：当不虑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辞（指陶弘景日间所作《请雨词》）言语乃好，但请雨应墨书，请晴应朱书，并青纸上。人惟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会处。诸如此者，世间非一。但无人报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无灵。愿更作墨书辞，勿同前语”。同卷并有陶弘景所作《请雨词》全文。

以《道藏》本《周氏冥通记》为底本，校以集本。

诗

42、寒夜怨

43、胡笳曲

44、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45、和约法师临友人

46、题所居壁

47、告逝篇

以上六诗除“和约法师临友人”为集本所增外，余五首藏本与集本同。其中“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引《谈薮》，“题所居壁”，《南史·陶弘景传》作“预制诗”，亦见《梁书·侯景传》，宜取为参校。

48、题桐叶作诗寄宜都王断句(增)

《华阳陶隐居内传》云：“常题桐叶作诗寄宜都王，其末云：愿为双白羽，长拂舆前尘。”此诗不见藏本、集本。

附

49、遗令(增)

严可均《全梁文·陶弘景》据《南史·陶弘景传》：“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襪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复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以“遗令”为题，录入此段文字。按，此文恐系后人转述陶弘景“口头遗嘱”，故藏本、集本皆未收载，宜作为附录。

50、自题墓铭(增)

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云：“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读其书，知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因书遗金陵天庆观黄冠，遂以入石。”《茅山志》卷八载其文云：“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口口口之三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并谓：“书迹神妙，当是隐居手书。”未详是否，亦作附录。

第三章 《真诰》丛考

魏晋以来,道经造作日多,即如《抱朴子·释滞》所说:“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在众多魏晋新出道经中,尤以《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影响最大,由陶弘景编订的《真诰》实为上清派经文降世过程的“原始记录”,透过《真诰》的记载,不仅可明上清经文的降授次第,更能窥见此派的宗教主张和政治动机。

第一节 诸真降授考

《三皇经》与《灵宝经》的出世,皆托言得之石穴。《抱朴子·遐览》云:

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古者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诸名山五岳皆有此书,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于山中得之,自立坛委绢,常化画一本而去也。

《抱朴子·辨问》云:

《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袂凡三篇,皆仙术也。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

晚出的《上清经》则采用了与《三皇》、《灵宝》不同的方式降世。《真诰》卷二十云：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邪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①

关于经文的降授情形，陈国符认为是“扶乩降笔”^②，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亦沿用其说，称“《上清经》乃系东晋哀帝兴宁（363—365年）间扶乩降笔，由杨羲用隶字写出”^③。这种解释并不准确。

与后世流行的飞鸾扶箕不同，降授无须凭借沙盘木笔诸器具，而是直接地口授笔录，如卷一描述九华真妃降诗的情况：

真妃见告曰：欲作一纸文相赠，便因君以笔运我鄙意，当可尔乎。某答：奉命。即爰纸染笔。登见口授，作诗如左。

而且，真灵所授之辞由附体者口述，为有声之音，旁观者皆能听到，同卷云：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岳夫人见授，令书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别室共论讲道，紫微、南岳二夫人声气语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书此，以答所共讲者之疑心也。

① 以下《真诰》引文悉以道藏本为底本，异文据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学津讨源本校改。

②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一·引用传记提要》，中华书局，1963年，233页。陈说可能是受许地山1940年出版的《扶箕迷信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在该书中，许地山共举扶箕例证132条，其第一条即《真诰》傅绿华诗，但许已明确提出《真诰》降授与扶箕有所不同，而陈则将二者混为一谈。

③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88年，343页。

亦与一般扶箕不同，真灵附体之人能够见到诸真的举止、服饰，如卷一描摹九华真妃初次降临的情形：

紫微王夫人见降。又与一神女俱来。神女着云锦褐，上丹下青，文采光鲜腰中有绿绣带，带系十余小铃，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差，左带玉佩，佩亦如世间佩，但几小耳。衣服条条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云发髻鬓，整顿绝伦，作髻乃在顶中，又垂余发至腰许。指着金环，白珠约臂。视之年可十三、四许。左右又有两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带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锦囊，囊长一尺二寸许，以盛书，书当有十许卷也。以白玉检检囊口，见刻检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绛带束络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许，整饰非常。神女及侍者容颜莹朗，鲜彻如玉，五香馥芬，如烧香婴气者也。

同卷还专门谈到，真人降授之时，虽灵附于所降之人，但决不借用尘浊之人的肉手来书写“三元八会”之书，“云篆明光”之章。杨羲问：

真灵既身降于尘浊之人，而手足犹未尝自有所书，故当是卑高迹邈，未可见乎。敢咨于此，愿海蒙昧。

紫微夫人答曰：

夫得为真人者，事事皆尽得真也，奚独于凡末之粗术，淫浮之弊作，而当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迁乎。夫人在世，先有能书善事者，得真仙之日，外书之变，亦忽然随身而自反矣。真事皆迹者不复废，今已得之浊书，方又受学于上文，而复重知真书者也。鬼道亦然，但书字有小乖违耳。且

以灵笔真手，初不敢下交于肉人，虽时当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陈书墨以显示于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复始来而作耳。所以尔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绪，又使吾等不有隐讳耳，冥中自相参解矣，内外自相关矣。又四极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听我等复为世间常书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将何趣，两为烦滥耶。

或正因为此，陶弘景云：“真诰者，真人口授之诰也。”“授”，即“授”之别写，正明口授之意。

因此，总结诸真降授的情形，作为“真灵”附体者杨羲，更多地是起“灵媒”(psychic)的作用，在降灵的当时，他既要用语言简单地叙述各位真灵下降的情况，继之以描摹诸真的言谈，同时以上真的口气回答与会者的问题，整个过程颇类似一台“独角戏”，而《真诰》正是这出戏演出时的“现场记录”^①，当然，也包括若干戏后的追记。

如果将降灵看做一出戏，那么，这出戏的编剧和导演是谁，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杨许关系

当众真降临之际，诸与会者固然如痴如醉，而作为“灵媒”的杨羲则肯定是清醒的，但降灵会的组织者二许父子的情况又如何呢？换言之，诸真降授究竟是杨羲一人“作秀”，还是杨、许三人“通同作弊”？如果整个降灵过程全系杨羲“自编自导自演”，则二许亦属受蒙蔽的对象；相反，若杨许串通，那么，许氏父子便应该是降灵的真正主谋，而杨则只是一件被利用的工具。对此问题需全面分析。

按《真诰》的说法，杨羲乃二许的“经师”，地位实在许之上，

① 其实，将《真诰》一书看做是若干次“降灵(神)会”(seance)的现场记录似更准确。

《真诰·叙录》云：

又按二许应修经业，既未得接真，无由见经，故南真先以授杨，然后使传，传则成师。所以长史与右英书云：南真哀矜，去春使经师见授洞房云云。而二许以世典隔，未尝礼敬，杨亦不敢自处，既违真科，故告云：受经则师，乃耻之耶。

但《真诰》卷十七中保存的杨羲致许谧的三十余通书信，所显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云：

羲顿首、顿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此覩返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云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羲别当自赍。谨白。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

信后有陶弘景的注释：

寻杨与长史书，上纸重顿首，^①下纸及单疏并名白，又自称名，云尊体，于仪式不正可解。既非接隶意，又乖师资法，正当是作贵贱推敬长少谦揖意尔，侍者之号即其事也。

按，六朝人书札体例今已不可详知，但陶弘景作为时代相先后之人，已从书信的尊卑体格看出问题，即杨致许函使用的乃是卑者禀上尊高的礼数，而非师下弟子的语气。

另一些证据也提示，许才是整个降灵事件的主谋。关于降真的开始时间，陶弘景在《真诰·叙录》中说：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邪王司

① “重顿首”，指杨函叠用“顿首”。

徙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

陶弘景的说法，实本于《南岳夫人传》中的谶语，《真诰·叙录》云：

《南岳夫人传》载青篆文云：岁在甲子，朔日辛亥，先农飧旦，甲寅羽水，起安启年，经乃始传，得道之子，当修玉文。

其后有陶弘景的解释：

谨推按晋历，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原注：历忌可祀先农。）四日甲寅雨水。（原注：正月中气，羽即雨也。）起者，兴也。安者，宁也。故迂隐其称耳。如此则兴宁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杨君诸经也。今检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惟三年乙丑岁六月二十一日定录所问，从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详检《真诰》中的记载，确如陶弘景所说，杨羲与上真交通的时间较谶语所提示的兴宁二年甲子晚一年，即兴宁三年乙丑。尽管陶弘景对此曲为解说，^① 坚持认为“兴宁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杨君诸经也”，但并不能自圆其说。

《南岳夫人传》中的这段谶语显然是为了配合降灵而杜撰，其造作时间应在兴宁元年，^② 目的自然是为了增加降灵的可信

① 陶弘景先后举中侯夫人令种竹事、茅定录乙丑六月喻许长史事、升平三年得绿华降羊权事，来证明上真降杨羲之事开始于兴宁三年以前。而事实上，以上三事并不能支持陶弘景的观点，请详后文讨论。

② 谶语决不会作于降灵事件发生以后，因为如果作于杨羲接真通灵之后，则不必称“岁在甲子”，径改为“岁在乙丑”，便可掩盖一切漏洞。谶语暗含兴宁年号，则其必作于兴宁改元以后，即兴宁元年（363）。

度。那么,杨羲有无可能如讖语所说于兴宁二年正月开始接真呢?

尽管陶弘景看到的降真文本“年月最先者惟(兴宁)三年乙丑岁六月二十一日”,但并不能排除杨羲兴宁二年接真文字亡佚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核检《真诰》中所有降真记录,确如陶弘景所说,“今所詮綜年月,惟乙丑岁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数条而已”。不仅如此,兴宁三年(乙丑)六月间的记录对降真过程描述得最仔细,如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岳夫人回答众人对上真语音低微的疑问。同日紫微夫人专门解释上真为何不亲自书写“三元八会”之书,“云篆明光”之章。^①由此看来,兴宁三年六月很可能正是杨羲以“诸真附体”方式降灵的开始。

而尤其重要者,在杨羲之前,已有灵媒奉命与上真交通,这便是许谧的姻亲华侨。《真诰·叙录》云:

又按众真未降杨之前,已令华侨通传音意于长史,华既漏妄被黜,故复使杨令授,而华时文迹都不出世。

《真诰·真胄世谱》后附华侨小传云:

华侨者,晋陵冠族,世事俗祷。侨初颇通神鬼,常梦共同飧醢,每尔辄静寐不觉,醒则醉吐狼藉,俗神恒使其举才用人,前后十数,若有稽违,便坐之为谴。侨忿患,遂入道,于鬼事得息。渐渐真仙来游,始亦止是梦,积年乃夜半形见。裴清灵、周紫阳至,皆使通传旨意于长史,而侨性轻躁,多漏说冥旨,被责,仍以杨君代之。侨后为江城县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诸华,皆其苗裔也。(原注:华与许氏有婚

^① 引文均已见前。事实上,这两项解释很可能是为了弥补这种特殊降灵方式的漏洞,而采取的预防措施:降授诸真既有男真,又有女仙,灵媒若一一模仿声音,难度太大;再者,如果令各仙“手写真迹”,即使杨羲的书法天赋再高,恐也难办到。

亲，^① 故长史书与裴君殷勤相请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则侨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阳传，即是侨所造，故与《真诰》为相连也。）

所谓华侨“漏说冥旨”，实大有深意。《南岳夫人传》中讖语的造作者实为二许，兴宁二年正月许氏父子选中的灵媒是华侨，^② 其后华言语间有所泄漏，令许氏十分愤怒，《真诰》卷五乃借茅定录之口宣布华侨的罪行：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华侨漏泄天文，妄说虚无，乃今华家父子被考于水官。华侨之失道，由华骑之佞乱，破坏其志念。华团、华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试观，试遂不过，侨于是得有死罪，故名简早削夺，寻输头皮于水官也。可密寻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谁者。

华侨的通灵方式尚只是“梦授”，后因华“漏说冥旨”，二许不得不弃华，另寻灵媒杨羲，其时已在兴宁三年。杨羲初次通灵，仍然是用华侨故技，即“梦授”，《真诰》卷十七有杨羲兴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所记梦高真事，此尤证明，杨羲以附体降灵的方式接真确开始于兴宁三年六月间也。

杨羲作为灵媒，从二许处取得的报答亦很丰厚，在经济方面，《真诰》卷十七有杨羲致许谧函云：

羲白。奉赐绢，使以充老母夏衣，诚感西伯养老之惠，然羲受遇过泰，荣流分外，徒衔戟恩眷，无以仰酬。至于绢帛之赐，非复所当，小小供养，犹足以自供耳。谨付还，愿深

^① 注谓“华与许氏有婚亲”，据《真诰·真胄世谱》，许谧次子许联（玉斧）妻为“晋陵华琦孙，名子容”，许、华二氏的姻娅关系或由此而来。

^② 如前所论，华侨是许氏姻亲，从理论上讲是保守机密的理想人选。但华侨小传提到，华嗜酒，其所以“漏妄被黜”，或许是“酒后吐真言”的缘故。

见亮。羲白。

此函虽是拒绝许谧绢帛之赐，而信中“受遇过泰，荣流分外”一语，实暗示杨从许处得到的财币远在绢帛之上。

二许不仅给杨以经济上的资助，又荐杨为官，《真诰·真胄世谱》云：

长史荐之相王，用为公府舍人，自随简文登极。

相王即晋简文帝司马昱，据《晋书·简文帝纪》，司马昱封会稽王，废帝太和元年(366，丙寅)始进位为丞相，此处称司马昱为“相王”，时间当在太和元年以后，即杨羲乙丑(365)接真以后之事。由此更加明确，这一切都是许谧在利用杨羲后，给予杨羲的酬谢。

至于陶弘景在《真诰·叙录》中认为杨羲与诸真交通始于兴宁三年以前，所举的三条证据，尚需辨明。陶云：

又按，中侯夫人告云：令种竹比字，以致继嗣。又云：福和者，当有二子，盛德命世。寻此是简文为相王时，以无儿所请，于是李夫人生孝武及会稽王。(原注：福和应是李夫人私名也。于时犹在卑贱。)孝武崩时，年三十五，则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岁。如此，众真降杨已久矣。

又定录以乙丑年六月喻书与长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书，此亦应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悖绿华以升平三年降，即已是己未岁，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虽非杨君，杨君已知见而记之也。

这三段的原文分别在《真诰》卷八、卷十一、卷一。其中种竹求嗣一事因涉及关系比较复杂，后文别有讨论，定录喻书事的原文为：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二日二书。^①（原注：此乙丑所受，则长史往年书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置书于述墟朱家静中，则非因华侨、杨君送之也。）

由此条的原注可以看出，许长史往年（癸亥、甲子年）上茅君书系长史亲自与茅交流，而非假手华侨或杨羲也。至于到了乙丑年六月，通过杨羲之口来转述茅定录的答复，目的不过是为了使杨与上真的沟通行为显得更加“逼真”，也使整个降灵过程更具有连贯性。

愕绿华升平三年下降的受书者是羊权，而非杨羲。此条由“杨君草书于纸上”，其目的陶弘景解释为“此乃为杨君所书者，当以其同姓，亦可杨权，相问因答其事，而既说之耳”，恐非如此。杨羲之所以抄录愕绿华降灵，很可能是为了向二许表明，这种“降灵”的方式较“梦授”为佳，值得借鉴。故对此陶弘景也承认：“按升平三年是己未岁，在乙丑前六年，众真并未降事。”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既然许氏父子为降灵的主谋，何以二许不自己接真，转而依赖灵媒，先华侨而后杨羲呢？陶弘景的解释是：

又按二许虽玄挺高秀，而质挠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为许立辞，悉杨授旨，疏以示许尔。

二许之所以未能接真，并非如陶言是“质挠世迹”的缘故。一方面，通灵需要特殊的表演才能，《真诰》中有诸真诗赋近百首，固然多数出于宿构，但要临场降笔书写，不仅要有书法功底，还需记忆工夫；被降者需要用口及时描摹降临诸仙的衣饰及各种动作，并模拟声音，亦非易事；在降授过程中上仙似乎还有物品赐与，如愕绿华降羊权时赠羊“火浣布手巾、金玉条脱”等物

① 《真诰·叙录》作：“曾得往年三月八日书”，与原文小异，疑叙录有脱讹。

事,这更需要具有魔术师般的手法。从杨羲的情况来看,《真诰·真胄世谱》称杨“工书画,少好读书,该涉经史,性渊懿沉厚,幼有通灵之鉴”,的确是灵媒的最佳人选。而更为重要的原因,若二许接真,终不免有“自说自话”之嫌,难以令人信服。

二、降灵的目的

论及杨、许降灵接真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三:造经、立教以及谋取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此外许谧的“家务事”似也牵连其中。分别讨论如下。

(一)造作经典

杨、许之所以采用降授的方式通灵,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方便经书的问世。可以想见,灵媒口述真言,手书真迹,真经便可源源不断地书写而出,这种造经形式的确较《三皇》、《灵宝》托言得之石穴方便得多。值得注意的是,《真诰》中有数处提到下降的真灵携带装有若干卷经文的书籍,如:

(南岳夫人)又云:《宝神经》是裴清灵锦囊中书,侍者常所带也。吾亦有,俱如此写西宫中定本。(卷一)

紫微王夫人见降。又与一神女俱来……左右又有两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带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锦囊,囊长一尺二寸许,以盛书,书当有十许卷也。以白玉检检囊口,见刻检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卷一)

乙丑岁晋兴宁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东卿来降,侍从七人入户……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书也。(卷二)

此外,又有梦中见书、得书者:

梦见卷书,见玉斧书先舒,惟见后是王君事,似四辅传,尽共在上,多论王君学道时见语学道历年事,自可须二三年间邪。(卷十八)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梦得一帙，有四小卷书，云是神母书，或云是传，皆以青细布为秩，秩两头红色，书皆是素。时先生亦在间，又为玉斧书此传上篇于户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兽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谨记。（卷十八）

这些内容正是为真经出世所埋下的伏笔。

按《真诰·叙录》的说法，上清经皆兴宁二年开始由南岳魏夫人降授杨羲，再由杨传二许。^①另据《南岳魏夫人传》云：

（清虚真人王君）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也。王君昔学道在阳洛山，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此三十一卷经，行之成真人，今所授者是南极、西城之本经也。^②

《云笈七籤》卷一百六题南岳夫人魏华存撰之《清虚真人王君内传》云：

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结誓而付。

从以上两条引文来看，杨、许降灵之前似乎已有《上清经》的雏形问世。但如卿希泰在《中国道教史》中所说：

① 即前文所引“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邪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

② 《南岳夫人传》见《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八，又见《太平广记》卷五十八，别有单行本，文字小异。此据《太平御览》。

虽然在上述诸真传中都谈到了许多经书的传授,但并不等于这些经书在撰写诸真传时便确已存在,故《真诰叙录》在谈到王灵期得到许黄民的真经之后,“乃窃加损益,盛其藻丽,依王、魏诸传题目,张开造制,以备其录”。所谓“王、魏诸传”,即指诸真传。说明诸真传中所列的一些经书,有的仅是一个题目。^①

我们甚至怀疑,《南岳魏夫人传》及《清虚真人王君内传》皆是二许及杨羲为配合降灵而杜撰,^②目的是使经典的降授显得师承有自。

值得注意的是魏、王传均提到授经三十一卷,《云笈七籤》卷四载《上清源统经目注序》亦云:“杨君师事南岳魏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一卷。”这应该是二许预计构造《上清经》的卷数。三十一卷经目不能确考,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中认为,《道藏》太平部《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之“上清大洞经目”,或与杨、许造经有关,经目云:

《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一卷;《上清太上隐书金真玉光》一卷;《上清八素真经服日月皇华》一卷;《上清飞步天刚摄行七元》一卷;《上清九真中经黄老秘言》一卷;《上清上经变化七十四方》一卷;《上清除六天文三天正法》一卷;《上清黄气阳精三道顺行》一卷;《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二卷;《上清金阙上记灵书紫文》一卷;《上清紫度炁光神玄变经》一卷;《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上经》一卷;《上清玉精真诀三九

①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42页。

② 《王君内传》虽题为魏夫人作,恐不可靠。据《真诰·叙录》有“杨书王君传一卷”,则此传或杨羲所作,托名魏夫人而已。至于《魏夫人传》的作者,据《真诰》卷七注云:“范中侯,名邈,即是撰《南真传》者。”由此看来,《魏夫人传》之作似早于二许。但如前文提到的《真诰·叙录》引《魏夫人传》佚文(不见于《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中关于兴宁二年甲子降授的谶语,则可证明《魏夫人传》至少是经过二许的修饰。详细考证见下节。

素语》一卷；《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一卷；《上清石精金宝藏景录形》一卷；《上清丹景道精隐地八术》上下二卷；《上清神洲七转七变舞天经》一卷；《上清大有八素大丹隐书》一卷；《上清天关三图七星移度》一卷；《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记》一卷；《上清太上六甲九赤斑符》一卷；《上清神虎上符消魔智慧》一卷；《上清曲素诀词五行秘符》一卷；《上清白羽黑翮飞行羽经》一卷；《上清素奏丹符灵飞六甲》一卷；《上清玉佩金钿太极金书》一卷；《上清九灵太妙龟山元录》三卷；《上清七圣玄纪徊天九霄》一卷；《上清太上黄素四十四方》一卷；《上清太霄琅书琼文帝章》一卷。（原注：此三十四卷，玉清、紫清、太清大洞经限，是王君授南真。）

此经目共三十部三十四卷，较三十一卷之数长出三卷，故陈国符认为：“此云三十四卷，盖其二卷、三卷诸经，或本为一卷，后析成二三卷，故总数由三十一卷，增至三十四卷耳。至此诸经为杨许真经，抑或王灵期伪造，已不可考。”^①

我们不完全同意陈的意见。按“上清大洞经目”所出这三十部经书之多数与《真诰》卷五二许父子所写裴君“道授”有关，兹录其文：

君曰：道有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真中经，老君之秘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经变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黄气阳精，藏天隐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经，道真之图。

君曰：道有黄素神方，四十四诀。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16页。

君曰：道有黄书赤界，^① 长生之要。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书，金根众文。

君曰：道有玉清真诀，三九素语。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录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隐地八术。

君曰：道有白简青策，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烛。

君曰：此皆道之经也，黄书世多有者，然亦是秘道之事也。

君曰：仙道有飞步七元天纲之经。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变神法七转之经。

君曰：仙道有大洞真经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隐书八粟十诀。

君曰：仙道有天关三图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变化胎精中记。

君曰：仙道有九赤斑符封山坠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极隐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秘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决辞，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黄水月华，服之化而为月。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为日。

君曰：仙道有镶刚树子，服之化而为云。

君曰：仙道有水阳青映，服之化而为石。

君曰：仙道有赤树白子，服之化而为玉。

君曰：仙道有绛树青实，服之化为黄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丹华，服之化为飞龙。

① 《道藏》本缺“界”字，据学津讨源本补。

右此十七条在灵书紫文中，并琅玕丹之所变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转神丹，服之化为白鹤。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气。亦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盖，以游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内文，以召天地神灵。（原注：右世中虽有，而非真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铛，以登太极。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铃，以摄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舆，以游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飞行之羽，以超虚蹶空。

君曰：仙道有紫绣毛帔，丹青飞裙。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华衣，金铃青带。

君曰：仙道有曲晨飞盖，御之体自飞。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种色之节，以给仙人。

将“道授”文字与经目对勘，除《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上清九灵太妙龟山元录》、《上清七圣玄纪徊天九霄》、《上清太霄琅书琼文帝章》等四经外，其余二十六种经名皆可在此篇中找到出处，但颇多割裂、臆造之迹。如道授谓“仙道有五行秘符呼魂召魄”，又“仙道有曲素决辞，以招六天之鬼”，经目合两句为一书，名《上清曲素决词五行秘符》；“道有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也”，本是一句，经目析为二书，即《上清太上隐书金真玉光》、《上清八素真经服日月皇华》；“仙道有玉珮金铛，以登太极”，“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所述者实系仙道法术，而经目分别衍为《上清玉珮金铛太极金书》、《上清白羽黑翮飞行羽经》；道授述仙

道十七条后云“右此十七条在灵书紫文中”，明此十七条尽出《灵书紫文》，而经目别出《上清金阙上记灵书紫文》。以上情况肯定非作“道授”者的原意，其出后人（如王灵期等）之手也必。

“道授”当然是二许托言裴君降授之伪作，其篇目中提到“在世”的经书有《八素真经》、《九真中经》、《除六天之文》、《石精金光》、《飞步七元天纲之经》、《大洞真经三十九篇》、《曲素决辞》等数种，^① 这些才应该是二许及杨羲已经造作好的经文，是否已符三十一卷之数，殆未可知。至于其他未降世的篇名，正为陆续造作埋下伏笔。

（二）别立宗派

造作经典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立教，毫无疑问，上清派之所以成立，正仰赖这一系列“上清大洞真经”。

上清派与天师道渊源甚深，《登真隐诀》卷下云：

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讳告南岳夫人口诀。（原注：天师于阳洛教授此诀也。按夫人于时已就研咏洞经，备行众妙。而方便宣告太清之小术，民间之杂事者，云以夫人在世尝为祭酒故也。然昔虽为祭酒，于今非复所用，何趣说之。此既是天师所掌任，夫人又下教之限，故使演出示世，以训正一之官。）

故陈国符认为：“据此，茅山宗嗣上清第一代太师魏华存曾为祭酒。”^②《真诰》中亦存若干二许与天师道交往之迹，如《真诰》卷十七杨羲记梦中得张天师书信：

得书，知洗心谢过，甚叙虚心，相行复来。张生顿首。
觉题云许君。

① 此外《三皇内文》原注云：“世中虽有，而非真本”，意谓“真本”尚未出世。

②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道藏割记·天师道与茅山宗》，中华书局，1963年，275-276页。

近知来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黄长命缕一枚，后复果不。张生顿首。

觉题云杨君。

梦见一人似女子，着鸟毛衣，赍此二短折封书来，发读。觉见忆昔由此及彼语，而犹多有所忘。又梦后烧香当进前室。（原注：此并记梦见张天师。书信云张生者，即应是讳，今疏示长史，故不欲显之。又见系师注老子，内解皆称臣生稽首，恐此亦可是系师书耳。）

杨、许亦有直接借重天师道者，卷八云：

若翻然奉张讳道者，我当与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豁矣。不然，往诣水官，所谓呜呼哀哉。（原注：张讳，即天师名也，杨不欲显疏也。）邪气入体，鬼填胸次，其将回惑于邪正，必不能奉正一于平气耶。如此，吾治疾之方，殆不可得。（原注：正一平气，即天师祭酒之化也。）

更以“师主祭酒”自命，同卷保命仙君答某问疾患有云：

今事结水禁，犹有可申。若许长史能于禁中若救之者，则一门全矣。亦是师主祭酒之宜请而为德惠乎。

但细绎《真诰》的内容，杨、许对天师道正一之法颇有微辞，如卷二清虚真人授书云：

黄赤之道，混气之法，是张陵受教施化为种子之一术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数见行此而绝种，未见种此而得生矣。百万之中，莫不尽被考罚者矣。千万之中，误有一人得之，得之远至于不死耳。张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变举亦不行此矣。

不仅如此,杨、许于当时奉天师道诸人,更极挖苦之能事,兹举数例。

郗愔为郗鉴之子,是天师道的虔诚信徒,^①《晋书·何充传》云:“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又《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云:

郗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为晋镇军将军,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书,与右军相埒,手自写道经将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

当杨、许降真之时,郗愔亦积极参与其事,如《真诰》卷三云: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许长史并与同学。(原注:同学谓郗回也。)

郗愔学道甚精进,《世说新语·术解》云: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而《真诰》于郗所学之道颇不以为然,《真诰》卷八云: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当为太清监也。若能闻要道而勤者,当至此格。若不专笃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则都失也。……郗回犹未足以论至道耶。

同卷涉及郗家事甚多,乃更有辱及愔父郗鉴者,如太元真人

^① 郗愔事天师道事,可参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三联书店,2001年,21-23页。

答许长史有云：

郗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怨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郗）回法应灭门，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脱，子孙岂得全耶。回当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远矣。

这样的胡言乱语，连陶弘景也觉得过分，乃曲为解说道：

郗回父鉴，清俭有志行，不应杀掠如此，或是初过江时摆弄所致。不尔，则在京时杀贼有滥也。鉴年七十余乃终，即得为鄧官职。

王羲之亦奉天师道，《晋书·王羲之传》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而《真诰》卷十六乃云：

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不仅如此，许谧之兄许迈，声名远在谧之上，然所奉道法似不与许谧相伴，《晋书·许迈传》称其从鲍靓游，《真诰》卷二十又谓迈师事天师道吉阳治左领神祭酒李东。^① 或因为此，杨、许乃于许迈亦有微辞，《真诰》卷四记许迈受考三官之事云：

汝（指许迈）本属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责，列在三官，而越幸网脱，奉隶真气，父子一家，各事师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阴考方加，有如此积罪，亦无仙者。当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录耶。

① 《真诰》卷十三陶弘景注称：“李东曲阿人，乃领户为祭酒，今犹有其章本，亦承用鲍南海法。东才乃凡劣，而心行清直，故得为最下主者使，是许家常所使。永昌元年，先生（指许迈）年二十三，就其受六甲阴阳行厨符。”于李亦有微辞。

又假造许迈升仙后与弟许谧函，^①褒许谧、玉斧父子而自贬，有云：

但恨吾遭良师之太晚也，反滞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状，艰辛情事，定录真君已当说之矣。崇赖成覆救济之功，天地不能渝也。（原注：此则是定录所说被试事也。）闻弟远造上法，（原注：上清诸道也。）偶真重幽，（原注：云林降也。）心观灵元，（原注：谢过法也。）气陶太素。（原注：五神事也。）登七阙之巍峨，（原注：飞天罡也。）味三辰以积迁。（原注：日月五星。）虚落霄表，精朗九元。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闻也。亦由下挺稟浅，未由望也。

前引张天师梦致杨、许的书信，不论此天师是张陵或张鲁（系师），函末署“张生顿首”，正隐喻杨、许与天师道的祖师平辈论交。而杨、许利用降授诸真之口不遗余力地讥贬郗、王、许诸人，其实是对天师道的侧面打击，^②目的是为了确立新创上清道派的正统地位。

（三）政治动机与经济目的

杨、许降灵接真在晋哀帝兴宁三年（365）至废帝海西公太和（366—371）年间，哀帝、废帝孱弱昏愤，当时诸王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后来成为简文帝的司马昱，《晋书·简文帝纪》云：

废帝即位，以瑯邪王绝嗣，复徙封瑯邪，而封王子昌明为会稽王。帝固让，故虽封瑯邪，而不去会稽之号。太和元年，进位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① 此函见《真诰》卷十八。《真诰·叙录》云：“先生（指许迈）成仙之后，与弟书一篇，留在下卷”，即指此函。

^② 杨、许所处的时代，正天师道影响最巨之时，杨、许虽欲创设新宗，为吸引信徒计，于三张之法亦不愿公开批评，如前文论杨、许指斥三张黄赤之法，亦委婉其辞。

司马昱亦曾参与杨、许的降灵活动，并得诸真赐谕，其堪注意者是右英所告的一段谶语，见《真诰》卷八：

德匠既凝，玄范自天，安危之事，未宜问也。公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难论耳。顷天气激逸，阴景屡变，太白解体于二辰之中，愆勃于紫房之下，王者恶焉。天子有忧，上相座动，今聊作谶，密以相示。（原注：有此及谶有掾写，在掾自记修事后共纸，寻真综回文令难解耳。今拘连取，又别疏出之。其授之时，维当道其辞，杨君后自更错义，皆是说晋代之事，并有明微也。）

.....

精气神妙参二仪，慎传凡人贤者施，封天制地无不宜，子能宝秘天知之，吾道要妙岂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规，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换运相推，明匠保德慎无思，驱恶除逆疾寻思，万金之术龙之熙，隆数其三失由儿，莫测其源刘向知，有凶拨乱皇复基，制逆者谁必定期，匠不足虑忧远危，五世之间真可悲，篡历有数帝座亏，当见变异纷纷来。金室在兹，枕麝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

这一大段谶语虽不能尽解，但其中“天子有忧，上相座动”数句，确实是在怂恿相王（司马昱）行废立事。同卷别有数条则与司马昱求嗣有关：

天观物适任，内顺明灵，托性命于高真，委形气于神摄者，亦剋疆以永遐，回秋龄以保真。今德匠既凝神杖信，澄心秘静，圆顺广敬，固天佑焉。然胤嗣不多，或时凋落，将犹灵关失纬，潜机未镇耳。当今五气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结华，每焕璇衡之内，是以玄润胎萌，遂其流根矣。

我案九合内志文曰：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宿

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诞亦寿考，微著之兴，常守利贞。此玄人之秘规，行之者甚验。

六月二十三日，中侯夫人告公。（原注：孝武壬戌生，此应是辛酉年。而后又云：上相座动，徒以临登极，乃是后午、未年，此为大愚。）

灵草荫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原注：似草竹言边，应说洗字。即《毛诗·蟋斯》羽洗洗兮，宜而子孙之义也。）繁茂昌，重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当有二子，盛德命世。（原注：福和似是李夫人贱时小名也。今《晋书》名俊容。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

同夜中侯告。

因司马昱李夫人所生两子，长子司马曜（即孝武帝）生哀帝隆和元年壬戌（362），故陶弘景疑本条降灵事发生在此前一年辛酉（即穆帝升平五年，361），实误。据《晋书·简文三子传》谓：“简文帝七子。王皇后生会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仪生临川献王郁、皇子朱生。王淑仪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会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并早夭。”司马道生、司马郁亦早卒，至废帝太和年间，独李夫人所生之司马曜（即孝武帝）及道子二人存。检《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云：

始简文帝为会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废黜，^①献王早世，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帝令卜者扈谦筮之，曰：后房中有一女，当育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时徐贵人生新安

① 《晋书·简文三子传》云：“（道生）性疏躁，不修行业，多失礼度，竟以幽废而卒，时年二十四。”另据《晋书·简文顺王皇后传》云：“永和四年（348），母子（指道生）并失帝意，俱被幽废。”

公主，以德美见宠。帝常冀之有娠，而弥年无子。会有道士许迈者，朝臣时望多称其得道。帝从容问焉，答曰：迈是好山水人，本无道术，斯事岂所能判。但殿下德厚庆深，宜隆奕世之绪，当从扈谦之言，以存广接之道。帝然之，更加采纳。又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意以为吉祥，向侪类说之，帝闻而异焉，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

孝武帝确如陶弘景所说，生哀帝隆和元年壬戌(362)，又据《晋书·安帝纪》云：“元兴元年(402)十二月庚申，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道子卒年三十九，则应生哀帝兴宁元年(363)。从《真诰》所降之辞来看：“胤嗣不多，或时凋落”，应是指刻下(降灵的当时)嗣子虽少，但仍有存活者，继言“福和者，当有二子，盛德命世”，则明确说李夫人已经生养的二子(即孝武与道子)，有望继承大宝，此必道子已生之后的事。因知这一段降授实缘于李夫人生二子后，简文帝一方面担心二子未能保全，同时又意犹未尽，尚期冀再有子嗣，乃作斯问。事实上，降辞称“相王”，亦明诸降发生在司马昱太和元年(366)进位丞相之后也。

许谧之结交司马昱，必在政治上有所企图，但简文帝登极未满一年即崩，未几许亦去世，^①而降灵的另一主谋许翊，已先许谧于太和五年(370)去世，故二许的政治目的未能实现，亦无法深究。至于灵媒杨羲，确藉此因缘，并通过许谧的介绍，得以成

① 关于许谧的卒年，《真霄世谱》存两说，陶弘景云：“按泰和二年丁卯岁司命所告云：丙子年当去，时年七十二。此则永兴二年乙丑(305)生，太元元年(376)去也。而谱(指许氏家谱)云：孝武宁康元年(373)去世，年七十一。此为泰安二年癸亥(303)生，为多二年。今以真为正。”按，陶弘景误以“真灵”的预言为信史，许谧确应如家谱所载，卒于简文帝死后之次年，即宁康元年(373)也。

为司马昱的公府舍人,简文帝登极后则不知所终。^①

除政治动机外,杨、许组织降灵会的另一个目的可能是敛聚钱财。传授经诀需盟金为誓,《真诰》卷九云:

欲行此道,皆盟金为誓。金之多少在人,尽诚而设也。

(原注:盟信既定无科,谓受此宜用金环二双。)

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经》中,传行以青金为誓,然后乃施耳。(原注:用盟信兼有青帛,令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传耳。谓青可二十尺,金环二双,此《四明玉经》三品元目也。)

至于杨、许去后,所遗“手书真迹”,更成为许氏及其后真经保有者的生财之道。《真诰·叙录》云:

至义羲(熙)中,鲁国孔默崇信道教,为晋安太守,罢职还钱塘,闻有许郎(许黄民),先人得道,经书俱存,乃往诣许,许不与相见。孔膝行稽顙,积有旬月,兼献奉殷勤,用情甚至,许不获已,始乃传之。

许见卷裹华广,诡信丰厚,门徒殷盛,金帛充积,亦复莫测其然,乃鄙闭自有之书,而更就王求写。

马朗既见许所传王经,卷目增多复欲更受,管理诡信。

马家遂致富盛,资产巨万。

(四)家务纠纷

在《真诰》中出场次数较多的人物,除许谧、许翔父子及杨羲以外,当数许联夫妇。据《真胄世谱》,许谧三子一女,长男名劭,庶出;次男名联,字元晖,小名虎牙;小男名翔,字道翔,小名玉斧。联与翔并许谧正室陶科斗所出,而诸真对许联的评价远在许翔之下,卷七云:“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而“玉斧清静藻

① 《真胄世谱》云:“长史荐之相王,用为公府舍人,自随简文帝登极,后不复见有迹出。”

洁，久斋濯魄，心近于仙”。不仅如此，对许联的妻子（姓华，《真诰》多称之为许厚、华新妇^①）尤多恶辞，如卷七云：

许厚自是其丈人所责，责亦至也，责不以家事往来之宾经意，意亦当得之也，云何每尔。此自家长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谢斗（即许联母陶科斗），当必释耳。……斗恒渴而饮不可饮，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妇不经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责耶。故宜以家事为勤。为尔不已，或能致之于丈人宇下受教耶。

又借真灵之口多次向虎牙夫妇索要贗信，同卷云：

纸三百，油三斗，青绢三十尺，银叉三枚。

右四条贗（贗）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虎之形以梦告于虎牙，使令夫妇明输此四种贗，以酬四帅之禽鬼者。

卷十八许谧记事有云：

牙诣夫人（指南岳夫人），贗当用双金环，汝无，吾当具交以谢恩也。厚若有金贯，便以奉夫人，云以谢吏兵。华功曹至，意密语新妇令知。密之密之。若无，便可以二双金环奉贗。勿吝勿吝。若欲得休上所宝玩者为好。（原注：华功曹似是华侨，而后又云杨意旨，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妇也。）……杨意旨中，谓可用钗，小君即言钗所以导达开通，自可用也，新妇有金钗，即可用。

乃径向许联之妻索要金环、金钗。许谧的家务纠纷固非后人所能详解，但虎牙之妻出自华氏，二许或仇视华侨而迁怒于虎

① 《真胄世谱》云：“华新妇者，牙妻也，似云名厚，即所谓许厚。”

牙夫妇,则必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余 论

许地山在《扶箕迷信的研究》一书中,曾对扶箕现象作了若干心灵学上的解释,其最终结论说:“扶箕并不是什么神灵的降示,只是自己心灵的作怪而已。”^①确有见地。正如本篇反复申论者,杨、许的一系列降灵附体活动,其实也是一套由二许主谋,杨羲负责具体实施的骗局。事实上,即使在降灵的当日,亦有怀疑杨、许所为者。《真诰》卷十七载许玉斧卒后,杨羲致许谧的数封书信,或许道出了部分事实:

羲近连亦梦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无他耳。亦欲不复信梦悟,故不上白耳。尊疾患未和,多当是注气小动所以尔耳。上章根具,亦当足灭之。谨白。

羲顿首、顿首。奉告,承尊体不和,余迹连动,悬情灼灼,想当偶尔行损。承欲章书自陈,亦足以断注鬼之害也。梦悟亦不可专信,惟当以心镇之耳。寻复平承。杨羲顿首、顿首。

承纪谒者还,欣之。尊已相见问其委曲耶。谨白。自小掾(许玉斧)去世后,略无月不作十数梦见之。又于睡卧之际,亦形见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尔。然不信既著,远近所嗤,不复敢言之也。

见告。今具道梦,聊复以白。愿不怪忤。若尊意为此为罔罔者,愿见还,当即付火。(原注:此书无题,亦是函封。掾恒面来共记,托以睡梦耳。于时诸游贵,或闻杨降神,信者多所请问,不信者则兴诮毁,故有此言以厉之。)

① 许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117页。

玉斧卒后，许谧、杨羲皆屡屡梦见，^① 杨羲乃作书劝慰许谧，信中一反平日断断于“梦授”之态，转云：“梦悟亦不可专信。”第三函末句“付火”云云，更道出了杨、许的真实想法——这一套降灵、梦授把戏，不惟“不信既著，远近所嗤”，连杨、许自己也未必相信。

第二节 降真人物考

杨、许试图利用降灵的方式构建一套神仙谱系，故《真诰》开篇便列出了一份长达三十八人的神灵名单：

东岳上真卿司命君

东岳九微真人金阙上相青童大君

蓬莱右仙公贾宝安（原注：郑人。自此后皆是称诸真人之字，非其人名也。氏族亦见世道书传中也。）

清虚小有天王王子登（原注：案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称讳字，此青虚是南岳之师，尚称字，独不显茅司命字，亦为难详也。）

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

青盖真人侍帝晨郭世幹（原注：卫人。）

戎山真人太极右仙公范伯华（原注：幽人。）

少室真人北台郎刘千寿（原注：沛人。）

嶠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宁（原注：常山人。）

大梁真人魏显仁（原注：长乐人。）

岷山真人阴友宗

陆浑真人太极监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张上贵（原注：楚人。）

① 此应是因思念所致的真梦，非《真诰》中其他的“梦授”也。

岱宗神侯领罗酆右禁司鲍元节(原注:东海人。)

华山仙伯秦叔隐(原注:冯翊人。)

葛衍真人周季通

阳洛真人领西归传淳于太玄(原注:西域人。)

潜山真伯赵祖阳(原注:涿郡人。)

勾曲真人定禄右禁郎茅季伟

郁绝真人裴玄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真人山世远

右二十三真人坐西起南向东行。(原注:此于礼乃是南向,以西方为上,而后女真东向,则应起南。今反北者,当是以侧近高真故也。)

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

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北汉七灵右夫人

太极中华右夫人

紫微左宫王夫人

沧浪云林右英夫人(原注:案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后,当位业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原注:此即魏夫人也,自说故不称姓。)

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原注:案有数号者,盖以多为高,西王母称九灵,则八灵宜在七灵前,而今反在后者,亦所未详。又受读黄庭事云,北岳蒋夫人,与今不同。)

上真东宫卫夫人

方丈台昭灵李夫人

紫清上宫九华安妃

朱陵北绝台上嫔管妃

北岳上真山夫人

西汉夫人

长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东向坐，北向行。

不仅如此，据《真诰》卷十七所载杨羲致许谧信函中透露，许谧还有编撰《仙传》的打算：

羲白。承撰集得五十许人，又作叙真，当可视乃益。味玄之徒，有以奖劝，伏以慨然。羲闻似当多此比类。暮当倒笈寻料，得者遣送。谨白。

羲白。季主学业幽玄，且道迹至胜，乃当在卷之上首耶。东卿大君大叹季主之为人，又美委羽之高冲矣。承撰集粗毕，极当可视，未睹华翰，预已欣叹。奉覲一二。谨白。

所撰要当令得七十二人，不审已得几人。若人少者，亦当思启冥中，求其类例也。然造一段作，且当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缮写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栖，乃希心于此者也。羲白。

羲白。孔安国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刘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陈长文撰耆旧亦七十二人。

仙传犹未得治益，要当代东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读之，故为名作，益以慨然。

虽然陶弘景说“长史此仙传遂不显世”，而事实上，《真诰》卷五二许所书“道授”中刘伟道、青乌公等近二十位仙人事迹，恐正是许氏《仙传》的别本。

杨、许构建这样一个繁复的神灵网络的目的，如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序》中所说：

祈祝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种,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万。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元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军。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①

《真诰》之神灵,大半出于杨、许虚构,即前引杨羲函所称“思启冥中,求其类例”,故难于索考,今乃择与降灵关系密切的南岳夫人魏华存、清虚小有天王王褒及三茅君等的采龙去脉,并结合陶弘景所作《真灵位业图》略作考订,以进一步明确杨、许的造神动机。

一、魏华存考

据《真诰·叙录》,魏华存尊号的全称是“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夫人”,省称多作“南岳夫人”,或“南真”。又因其为杨羲“玄中之师”,故卷九乃称作“玄师”。

关于魏华存,有《南岳夫人内传》一卷存世,见《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八及《太平广记》卷五十八,二传文字颇有不同,兹录《太平御览》全文:

南岳魏夫人内传曰:夫人姓魏,讳华存,字贤安,任城人。晋司徒文康公魏舒女也。少读老庄、春秋三传、五经百子事。常别居一园,独立闲处,服饵胡麻。父母逼之,强适太保公掾南阳刘幼彦。畴昔之志,存而不亏。后幼彦为修武令,随之县舍,闭斋别寝,入室百日,所期仙灵。

^① 当然,杨、许构建神仙谱系的目的,决不单纯如陶弘景所说,仅仅是“祈祝跪请”、“对真接异”之用,其宗教学上的深层意义,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521-530页)、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83-189页)、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5-77页)皆有讨论,可参看。

季冬月夜半，四真人来降于室，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青童君、碧海景林真、清虚真人王子登。于是夫人拜乞长生度世，青童君曰：此清虚真人者，尔之师也，当受业焉。景林真曰：尔应为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封南岳夫人也。夫人谢曰：此是婢子有幸，赐以性命。自陈毕，东华小童指而笑曰：丹心苦哉。于是清虚真人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瓮等。川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也。王君昔学道在阳洛山，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此三十一卷经，行之成真人，今所授者是南极、西城之本经也。阳洛山有洞台，是清虚之别宫也。王君当授魏夫人经之时，起立北向，而誓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太帝，太帝使教子魏华存。于是景林真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一名太上琴心，一名大帝金书，一名东华玉篇。令昼夜诵之。王君又告曰：子若不在山中隐身斋戒，则《大洞真经》不可妄读也。至于《虎经》、《龙书》、《八素隐文》之属，奇秘玄奥，若不斋戒，绝世不可施行。子今且可诵《黄庭内经》，步蹑七元，存五星之神而已。人间行之，亦足感通变化。欲成际会，我有以相迎矣。方诸青童怡然小留，四真吟唱。乃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璫；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云林玉女贾屈庭，吹凤戾之箫；飞玄玉女鲜于灵金，拊九合玉节。王君乃语口^① 诀诸要论，乃别去。

夫人守静日进，在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王君与东华青童来降，时岁在甲午。二真人与夫人药，题曰：隐迁白医川神散，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称疾忽行。克期有定，俱会阳洛宫。言毕，二真人去。夫人即服药，因称脚

① 原作“曰”，《广记》作“口”，因据改。

疾，闭目寝息，饮而不食，到七日，其夜半之后，太乙玄仙遣飚车来迎，驾气骋御，径入帷寝。其时子弟侍疾，众亲满侧，莫之觉也。夫人遂用藏景之法，托形剑化，徐登飚轮，径之阳洛，居隐元之台，志栖上元，诚感九天，丹心真契，澄神太素。夫人遂北诣上清宫，太微天帝遣九宫太真侍玉元晨郎李明朗，授夫人神凤之章，使封山召云；中央黄老君遣正一羽晨侯公阳子明，授夫人龙衣虎带、丹青飞裙、十绝华幡，使川登行上清，摄真命仙；三素高元君遣左华九成夫人范定英，授夫人流金火铃、九盖之辘，使弹制万魔，飞轮太无；太上玉晨大道君遣绣衣使者孟六奇，授九色之节、双珠月明、神虎之符、锦旗虎旌，使位主群神，以威六天；太素三元君遣保禁仙都衷文坚，右嫫元姬赵约罗，授夫人西华玉女三百，八景飞舆，玄景九龙，使侍卫执巾，上诣三清；扶桑太帝君遣八玄仙伯柯原首，五方天帝君简肃正等，授夫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使主诸学道死生图籍摄御之官，关校罪考；金阙后圣君命仙伯牙叔平，授夫人青琼之板，丹绿为文，位为南岳夫人，比秩仙公，给曲晨飞盖，以游九宫，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之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真仙者。令一月再登玉清，三登太素，四谒玉晨宫，宴扶桑之高台。于是，夫人授王母之命，且还王屋山小有之中，更斋戒三月。九微元君、龟山王母、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乔，并降小有清虚上官绛房之中，各命侍女，金石发响。于是，西母徘徊起立，折腰俯唱曰：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嘉会绛阿内，相与乐未央。歌毕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神灵迎官并至，西母等与夫人同去诣天台霍山台。

《太平广记》引文谓出自“《集仙录》及本传”，取与《太平御览》所载传记对照，两文有如下不同：

(1)《广记》载夫人适刘幼彦后，生有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又云“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御览》缺。

(2)记众真降临，《御览》谓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青童君、碧海景林真、清虚真人王子登等四真人来，《广记》则谓有七真：“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虽有关降授过程的描述，《御览》较《广记》简略，但《御览》云《黄庭内景经》“一名太上琴心，一名大帝金书，一名东华玉篇”。及王君告诫：“子若不在山中隐身斋戒，则《大洞真经》不可妄读也。至于《虎经》、《龙书》、《八素隐文》之属，奇秘玄奥，若不斋戒，绝世不可施行。”为《广记》所缺。

(3)《御览》、《广记》皆谓夫人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剑解，但述剑解后诣各处仙宫，授夫人诸般灵物，《广记》较《御览》简略。

(4)《广记》涉及夫人与天师道的交往，云：“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篆之诀。……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为《御览》所缺。

(5)《御览》记事迄于夫人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而《广记》此后复记其作《黄庭内景注》，晋兴宁三年降杨羲，及唐代诸事。

由此来看，《御览》与《广记》所载《魏夫人传》实非同一文本。复检史志，《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有范邈撰《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一卷，《新唐书·艺文志》除范传外，另有项宗著《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一卷。故知《魏夫人传》先后两本，一为范邈

所撰，一为项宗所撰，^①《御览》引文疑即范传的节略本，而《广记》所录，则主要出自项传。

项宗所作传记事迹最晚至中唐，故项为唐人无疑。而范邈其人则见于《真诰》，《真诰》卷七“范中侯言此”后，原注云：

范中侯，名邈，即是撰《南真传》者。

又《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引《真诰》云：

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王清虚弟子，……以成帝咸和九年，青童、清虚又降，授剑解之道，称疾隐化，……以兴宁中降杨君，又授许掾上经，自此后数数来降也。王清虚令弟子范邈作《内传》显于世也。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九引葛洪《神仙传》云：

中侯上仙范邈字度世，旧名冰，服虹景丹得道，撰《魏夫人传》。

《真灵位业图》中侯仙人居第二右位之末，有注云：

姓范，讳邈，字度世，曾名冰。汉桓帝侍郎，撰《魏夫人传》。

以上有关范邈的资料颇有可疑之处，《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引《真诰》文字不见于今本《真诰》，考其内容基本同于《御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谓《魏夫人传》实有三本，陈云：“《道藏阙经目录·卷上》著录《上清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三卷有符。（原注：陈援菴先生云：《道藏阙经目录》，即明正统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所著录道书，当在元藏中。）《顾氏文房小说》所收仅一卷，无符。盖此乃第三种《南真传》，今佚。”（中华书局，1963年，14页。）今按，此三卷本之《南岳夫人传》不见于唐、宋史志，或系宋、元间人所作，应非《太平御览》或《太平广记》所引用者。

览》所引《魏夫人传》，而较简略，但其末句“兴宁中降杨君”及“令弟子范邈作《内传》”云云则不见于《御览》所引《魏夫人传》。《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九引葛洪《神仙传》亦不见于今本，又考葛洪卒于建元元年(343)，^①距魏华存之卒年咸和九年(334)，未出十年，是否有可能见《魏夫人传》出世，殊为可疑。且葛洪最重金丹大药，斥《黄庭》诸书为“不急之书”，^②与魏夫人的道学主张大相径庭，恐也未必愿意在《神仙传》中称颂魏华存。至于《真灵位业图》说范邈为汉桓帝时人，尤属无稽。

尽管未必真有范邈其人，但至少可以肯定，托名范邈所撰的《魏夫人传》在兴宁三年(365)杨、许接真以前已经问世，这由《真诰》中的一系列记载可以证明，《真诰·叙录》云：

《南岳夫人传》载青篆文云：岁在甲子，朔日辛亥，先农飨旦，甲寅羽水，起安启年，经乃始传，得道之子，当修玉文。

如前节所讨论者，这一段《魏夫人传》中关于兴宁二年甲子降授的谶语，因隐含“兴宁”年号，故绝不可能出现于兴宁改元以前的传记中，必应是许谧为配合降授而杜撰的。

《真诰·叙录》又云：

掾抄魏传(指《魏夫人传》)中《黄庭经》，并复真授数纸。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此语，则所谓“掾(许玉斧)抄魏传”，实为“掾作魏传”，不过托名范邈而已。

《魏夫人传》作于兴宁元年前后，还有一项证据，《道藏》正一

① 葛洪的卒年凡三说，《晋书》本传谓卒年八十一，推算卒年在兴宁元年(363)；晋袁宏《罗浮记》则谓卒年六十一，推算卒年在建元元年(343)；钱穆《葛洪年谱》谓咸康二年(336)卒，年五十四。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附录·葛洪生卒年第七》，中华书局，1997年，795-806页，考据颇详，今用其说。

② 《抱朴子内篇·祛惑》云：“成都太守吴文，说五原有蔡诞者，好道而不得佳师要事，废弃家业，但昼夜诵咏《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详》之属，诸家不急之书。”

部陞字号有葛洪撰,陶弘景增补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该书卷一“救卒中恶死方第一”云:

按此前救卒死四方,并后尸厥事,并是《魏大夫传》中正一真人所说扁鹊受长桑公子法。寻此传出世在葛后二十许年,无容知见,当是斯法久已在世故。或言楚王,或言赵王,兼立语次第亦参差故也。

此段当系陶弘景所增补者,所谓“魏大夫传”应即《魏夫人传》之讹。陶云“此传出世在葛后二十许年”,考葛洪卒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距哀帝兴宁元年(363)正二十一年,可见,陶弘景亦承认《魏夫人传》出世于兴宁初年。

杨、许之所以看中去世已三十余年之久的魏华存,并造作传记,推为授经的本师,可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首先,魏华存具有浓厚的道教背景,尤其是她的天师道身份,有利于杨、许开宗立派。

魏夫人生前可能确如项传所说为天师道女祭酒,尽管《御览》所引《魏夫人传》无此记载,^①但《登真隐诀》已承认此事,《登真隐诀·卷下》云:

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诤告南岳夫人口诀。(原注:天师于阳洛教授此诀也。按夫人于时已就研咏洞经,备行众妙。而方便宣告太清之小术,民间之杂事者,云以夫人在世尝为祭酒故也。然昔虽为祭酒,于今非复所用,何趣说之。此既是天师所掌任,夫人又下教之限,故使演出示世,以训正一之官。)

宜注意陶弘景所加注释中“昔虽为祭酒,于今非复所用”数

^① 《太平御览》引《魏夫人传》恐系范缜所作传记的节略本,如《真诰》所称之“青篆文”,即不在其中。

语,证明魏华存生前确为天师祭酒,剑解后被杨、许等人尊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按上清派的说法,其位秩转在天师张陵之上,^①其所以接受张陵天师之诀,乃便于统理诸“正一之官”。换言之,杨、许以魏华存为本师,确有利于其笼络诸天师道信众也。

其次,从道教主张来看,魏华存所推重的是《黄庭经》,^②主存思内视,似未用三张“黄赤之道,混气之法”,这一思想对杨、许上清派教理的形成颇有影响,如被上清派奉为第一大经的《大洞真经》^③,其存思身神诸法,虽较《黄庭内景经》繁琐,但揆其根源,仍本于《黄庭》。杨、许之重视《黄庭》屡见《真诰》,卷十八记许谧诵读《黄庭》遍数,《真诰·叙录》记许玉斧抄写《黄庭》,卷九又云:

山世远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炼,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为合万过,夕得三、四过乃佳。北岳蒋夫人云:读此经亦使人无病,是不死之道也。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魏夫人传》中,《黄庭经》的授受不在《太上宝文》等三十一卷经之例,而由景林真别授,尤值得注意的是,《御览》引文中清虚真人王君关于持经的一段告诫:

子若不在山中隐身斋戒,则《大洞真经》不可妄读也。至于《虎经》、《龙书》、《八素隐文》之属,奇秘玄奥,若不斋戒,绝世不可施行。子今且可诵《黄庭内经》,步履七元,存

① 据《真灵位业图》,魏华存为第二位女真第二人,张陵为第四左位第一人,魏在张之上。

② 魏华存与《黄庭经》的关系,王明《道家道教思想研究·〈黄庭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24-371页。)认为:“魏夫人既得秘藏之黄庭草稿,撰为定本,自是《黄庭内景经》日渐流行。”

③ 《真诰》卷五云:“《大洞真经》读之万过便仙。”

五星之神而已。人间行之，亦足感通变化。

究其原因，《黄庭经》毕竟早出，^① 杨、许为创立宗派，虽多有借重《黄庭》之处，但实不愿过分推重此经，故将其地位列在上清派三十一卷“真经”之亚。

第三，杨羲与魏夫人的长子刘璞早有交往，《真胄世谱》云：

（永和）六年庚戌（350），又就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时年二十一。

《真诰·叙录》原注云：

又魏夫人小息还为会稽时，携夫人中箱法衣，并有经书自随供养，后仍留在山阴。于今尚在，未获寻求之。

由此可见，魏夫人的次子刘瑕亦保有部分“真经”，但其是否参与了杨、许的降灵活动，确不可知。

综上考证可以认为，所谓《南岳夫人内传》实许谧等为配合降灵接真而于兴宁元年左右伪造，托名中侯上仙范邈而已。至于推举魏华存为上清派祖师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利用魏的影响力，吸引天师道教徒和宣传上清派教理。

二、王 褒 考

王褒为魏华存之师，其授受渊源见前引《魏夫人传》。其尊号全称，《真诰》卷一作“清虚小有天王”，《真灵位业图》居第二右位，称“右辅小有洞天太素清虚真人四司三元右保公”。《真诰》中屡有提及王褒传记者，卷十二原注：

清虚王君、紫阳周君各自有传。

^① 《黄庭经》之名已见于《抱朴子内篇·遐览》，为郑隐藏书之一。

卷十四原注：

青精亦出彭传及王君传。

《真诰·叙录》云：

依王(清虚)、魏(夫人)诸传题目，张开造制，以备其录。
杨书王君传一卷。

《云笈七籤》卷一百六有题“弟子南岳夫人魏华存撰”之《清虚真人王君内传》，全文如下：

华存师清虚真人王君，讳褒，字子登，范阳襄平人也，安国侯七世之孙。君以汉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诞焉。洪基大业，世籍贵盛。君父讳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称，举茂才，除议郎，转中垒大夫、上党太守、黄门侍郎、侍中、左将军、雁门太守。楷正色形管，坦诚献替，纳言推谏，披衿拔领，率职莅民，政以礼成，舍刑宽赋，不肃而敬。天子贤之，迁殿上三老，使宾皇太子，讲《春秋》、《尚书》、《论语》、《礼》、《易》，恢恢仁长，循循善诱。微言既甄，搢绅乘其范，大义已陈，百王格其准。迁光禄大夫，谥曰文侯。夫人司马迁之孙，淑慎沈博，德配母仪。盖以清源高流，圆颖远映，灵根散条，芳华朗曜。是用忠孝启于上叶，善诱彰于文德，世载英施，斯人有焉。

君体六和之妙炁，挺天然之嘉质，含岳秀以植韵，秉灵符而标贵，晖灼焕于三晨，峻逸超于玄风。少读五经，傍看百子，综算象纬，通探阴阳，及风炁律吕，靡有不览也。父为埭丞相孔光女，娶妇在室，以和人伦。而君凝形淳观，明德独往，高期真全，绝不内盼。峨峨焉若望庆云之沓軫，浩浩焉似泛沧溟之无极。神栖万物之岭，气迈霄汉之津。鸿渐

邓林，展翮东园。将藏凤羽以翳于南风，匿龙华以沉于幽源。是乃夜光潜跃，映耀于难掩。遂名沸绝圃，声驰京夏，四府交辟。君即闲夜之感，喟然悲叹曰：人间尘藹，趣竞得失，利害相攻，有逾鸪鹑之视老燕矣。遂决志辞亲，入华山中九年，契阔备至，精感昊穹，神映幽人，体期冥灵，心唱至真尔。

一日夜半，忽闻林泽中有人马之声，箫鼓之音，须臾之间，渐近此山，仰而望之，见千骑万乘，浮虚空而至。神人乘三素云辇，手把虎符，朱钺启途，握节执旄，曲晨倾荫，锦旂蔽虚。神人暂停驾而言曰：吾太极真人西梁子文也。闻子好道，劬劳山林，未该真要，诚可愍也。勤企长生，实为至矣。君乃驰诣轮轂之下，叩头自持而言曰：褒以肉人，愚顽庸贱，体染风尘，恣躁乱性。然少好生道，莫知以度。真人曰：夫学道无师，无缘自解。我太极真人，神仙之司主试校学者，领举正真尔。子玄录上清，金书东华，名编清虚，位登小有，必当掌括宝籍，为天王之任尔。但注心四景，勤慕上业，道自成也。

后隐阳洛山中，感南极夫人、西城真人并降。南极夫人乃指西城曰：君当为王子登之师，子登亦佳弟子也。良久，西城真人长叹而谓君曰：夫学道者，谅不可以仓卒期，求生者不可以立尔综。故冥术，栖于玄元，而高偕太妙，凌重霄以累抗矣。夫道虽无形，其实有焉。妙虽昧昧，其实坦然。子当勤求其无，然后见其至有。子广延诸妙，然后究其坦大。得有则有生，得妙则年全也。子求生虽笃，而未见其涯。慕道虽勤，而未启其门。殆犹浚涌波以索鸟巢，寻长木而访渊鳞尔！是故子心疲于导引，而朱宫为之丧渍。肺弊于理炁，故神华为之凋落。肝劳于视盼，而魂精为之辽索。脾竭于守神，而丹田为之闰滞。肾困于经纬，而津液为之不泽。胆锐于趣竞，故四肢为之乱作。五脏相攻，六腑颠覆。

三焦滞而不泻，八关绝而无续。赖飧饭以劲汝身，恃丹青以固汝内尔！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犹不免必死之期会。徒有万年之寿，岂足贵乎。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结誓而付。乃将君观玄洲，须臾而至。四面大海，悬涛千丈，洲上官阙，朱阁楼观，琼室瑶房，不可称记。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处之。乃将君入紫桂宫，见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带神光，手把火铃，侍女数百，龙虎卫阶。太上丈人与西城真人相礼而已，相携共坐，君时侍侧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谓王子登乎？学道遭逢良师，将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毕，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设厨膳，呼吸立具，灵肴千种，丹醴湛溢，燔烟震檀，飞节玄香，陈钧天之太乐，击金璆于七芒，崆峒启音，彻朗天丘。于是龙腾云崖，飞凤鸣嘯，山阜洪鲸，涌波凌涛，云起太虚，风生广辽，灵歌九真，雅吟空无，玉华作唱，西妃折腰。尔乃众仙挥袂，万神迁延，羽童拊节，庆云缠绵。于是太上丈人会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称主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彼悠悠者，将西城之室客，上宰之宾友耶。视此子心眸澄邈，神滓形凝，圆晨不煊，六景发华，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贤王也，未彼果何人哉。于是西城真人笑而答曰：道君今何清音之不妙，曲问之陋碎哉。请粗陈其归要焉。盖夫圣匠剖太混之一朴，分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包，散为无穷之物。是故立三光，呼天而置晷仪，封区域，呼地而制五服，制漏刻以分日夜，正四时以财岁月，五位以正方面，山川以定险阻，城郭以自居焉，兵械以自卫焉，旌旗舆服以自表，用九谷以自养。凡此之类，象玄乎天，而形存乎地，日月有幽明之分，寒暑有生杀之气，震雷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节，类气浮乎上，而众精流乎

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班，吉凶之征，穷达之期，普陈矣。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故立之者天，而行之者道，受焉性合神同，混而为一，流通并行，不可细得分别也。于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运华、赵峻珠、王抱台等，发琼笈披绿蕴，出《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二卷授子登，又以云碧阳水晨飞丹腴二升赐君，君拜服之。

真人遂将君还西城，九年道成，给飞飏之车，东行渡启明、沧海，登广桑山，入始晖庭，诣太帝君，稽首再拜，太帝授以《龙景九文紫凤赤书》、《上清神图八道玉策》。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长离山，诣南极紫元夫人，一号南极元君，授以《九道回玄太丹绿书》。又诣赤台童子、华盖公，授以五云夜光云琅水霜。南极夫人曰：昔日之言，岂负举哉。君稽首谢恩辞退。次西行，渡度丘巨海，沉羽之津，登丽农山，诣紫盖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绿字回曜太真隐书》。次北游，渡彫柔玄海，济饮龙上河匏瓜津，登广野山，诣高上虚皇大道玉君。会其出游，驾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郁蔼黄素之云，勃蔚八景之曜，飞真万亿，不可称数。君再拜道侧，唱者曰：闻君乃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宝洞飞霄绝玄金章及赐《太极隐书》、龙明珠、绛和云芝，君拜而饮之，即身金色，项映圆光，七曜散华，流焕映形。又退登阊风之野，玄圃之宫，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变流景玉经》。乃越郁绝，济弱河，西诣龟台，谒九灵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斋三月，受《三华宝曜琼文琅书》、《灵晖上策》、《七晨素经》。退又清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山周回三万里，游行翌日，趋诣紫清太素琼阙，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处丹灵白玉宫，飞映绝曜，紫霞落焕，七光交陈，结于云宇之上，奇丽玄黄，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天尊，盖无数也。君既至，稽首再拜，诣琼阙之下，久时，

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绣衣命者西林藻授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铃谿落七元八景飞晨。又使清真左夫人郭灵盖、右阳玉华仲飞姬，赏神策玉玺授君，以为太素清虚真人，领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给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领上清玉章、太素宝玄、太极上品、九天灵文、六合秘籍、山海妙经，悉主之焉。又总括洞内明景三宝，得乘虎、金盖琼轮、八景飞舆，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寝宴太极也。后归西城，清斋三月，授书为太素清虚真人矣。

此传虽长，但其大半系描述王褒成仙的历程，语句与《魏夫人传》尤多雷同。如谈到师承，《清虚传》云：

南极夫人乃指西城曰：君当为王子登之师，子登亦佳弟子也。

《魏夫人传》云：

青童君曰：此清虚真人者，尔之师也，当受业焉。

对王褒仙位的预言，《清虚传》云：

真人曰：……子玄录上清，金书东华，名编清虚，位登小有，必当掌括宝籍，为天王之任尔。

《魏夫人传》云：

景林真曰：尔应为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封南岳夫人也。

至于二人受真经三十一卷，迁化后遍朝诸天得授经、策的过程更相类似，故疑此两传实出于一人之手。

《清虚传》首段涉及王褒身世，虽寥寥三百字，却谬误百出。

传谓王“范阳襄平人”，检《汉书·地理志》，范阳属涿郡，在今河北省保定市附近，襄平属辽东郡，^①即今辽宁省辽阳市，二地虽均属幽州刺史之部，但相距千里之遥，所谓“范阳襄平人”，实属不通。又谓褒系“安国侯七世之孙”，考《汉书·王陵传》云：“王陵，沛人也。……封陵为安国侯。”王陵为沛人，在今安徽境，亦与传称王褒的籍里不符。传称王父“除议郎，转中垒大夫、上党太守、黄门侍郎、侍中、左将军、雁门太守。……迁光禄大夫，谥曰文侯”。而通检《汉书》未见王楷其人，其为虚妄也必。^②

尽管《清虚传》出于附会，但取传中所出现的道经篇目与托名范邈作之《魏夫人传》及《真诰》对勘，或能窥见许氏父子造作经典的具体情形。表3-1列出王传、魏传中所见经籍的名称，并与《真诰》对照。

表3-1 王传、魏传与《真诰》所出道经对照表

道经篇目	王传	魏传	真诰	备注
太上宝文	+	+	+	《真诰》作《太上隐书》
八素隐书	+	+	+	《真诰》作《八素真经》
大洞真经	+	+	+	
灵书八道	+	+		《真诰》有《灵书紫文》
紫度炎光	+	+	+	《真诰》作《紫度炎光内视中方》
石精玉马	+	+	+	魏传作《石精金马》应即是此。《真诰》有《石精金光藏景化形》及《玉马经》。
神真虎文	+	+	+	真诰作《神虎文》，应即是此
高仙羽玄	+	+		
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	+			
龙景九文紫凤赤书	+			
上清神图八道玉篆	+			

① 《汉书·地理志》临淮郡下别有襄平属国，其地不详，约当在今江苏境内。

② 考《汉书》中得谥“文侯”者，惟丞相张苍一人，足见其尊贵，王楷若得此谥，史书必应有传。

续表一

道经篇目	王传	魏传	真诰	备注
九道回玄太丹绿书	+			
玉道绿字回曜太真隐书	+			
宝洞飞霄绝玄金章	+			
太极隐书	+			
解形遁变流景玉经	+			
三华宝曜琼文琅书	+			
灵晖上策	+			
七晨素经	+			
黄庭内经		+	+	
虎经		+		
龙书		+		

由表可见,《清虚传》中西城真人授王褒及《魏夫人传》中清虚真人授魏华存的三十一卷真经,即上表中《太上宝文》至《高仙玄羽》八种,两传完全一样,而这八种道经之多数,虽亦见于《真诰》,但篇名与王、魏两传小有不同,这似乎表明,二许构造两传在先,至杨羲降灵接真时对具体篇目有所调整。至于王传提到的《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等及魏传之《虎经》、《龙书》悉不见于《真诰》,这究竟是杨、许改变了造经计划,还是尚未造作完成的缘故,确不可知,但正缘于此,恰为后人继续造经奠定了基础,此即《真诰·叙录》所说:

(王灵期)依王、魏诸传题目,张开造制,以备其录。

三、三茅君考

《云笈七籤》卷一百四有题“弟子中候仙人李道^①字安林

① 按,“李道”当系“李遵”之讹。

撰”之《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于此传颇有考据，其略云：

《真诰》卷八有注：“李中侯，名遵，即是撰茅三君者。”又卷九有注：“右此说《玄真经》存之法，（按，见今《茅传》）其大经在《茅传》中。”又卷十三注：“此是《茅传》中言也。”又卷十一注：“凡此后紫书大字者，并《茅三君传》所记也，传既以宝秘，见之者稀，今仅抄取说山事，共相证显。”又注：“吾（按谓定录中君）有传记者，即是《三茅传》也。按长史甲子年书云，未见传记，则噉此书，或在癸亥年中也。”据此，则《茅三君传》系定录中君降授长史，即系出自长史，故亦于晋代出世也。又《真诰》卷十一：“昔年十余岁时，述虚（原注：此应是墟字，而由来皆作墟。即今之山西村名也。）闲耆宿有见语，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处，早已徙去。后见包公问动静，此君见答。今故在此山，非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门，通太湖芭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惟说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别长少，不道司命君尊远，别治东宫，未见传记。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级耳。辄敬承诲命，于此而改。（原注：此长史又更答书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录。而前纸断失，亦非起端语也。包公是鲍靓，句容人悉呼作包公也。答书时已是蒙示传记，是乙丑年初矣。）”据此，《茅三君传》乃增益父老传说而成。^①

陈氏将《三茅君传》的撰作之功归于许长史，确有见地。但与前论《王褒传》不同，《三茅君传》并非完全由二许向壁虚构，在二许之前，葛洪《神仙传》已有茅君条，其原文见《四库全书》本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10页。陈引《真诰》文字及标点略有讹误，今据《道藏》本校正。

《神仙传》卷五，又见《太平广记》卷十三征引，两本《神仙传》颇有不同。兹逐录《广记》引文，并将其与四库本及《云笈七籤》载托名李遵所作之茅传相异之处列作表3-2。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皆飞，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饌异果，芬芳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

表 3-2 《四库全书》、《太平广记》中两种《神仙传·茅君》与
《云笈七籤》所载《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对勘

《太平广记》	《四库全书》	《云笈七籤》
茅君。	茅君者,名盈字叔申。	真人姓茅,讳盈字叔申。
幽州人。	咸阳人也。	咸阳南关人也。
	高祖父濛,字初成,学道于华山。	高祖父讳濛,字初成,……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
学道于齐。	君十八岁,入恒山学道。	时年十八,遂弃家委亲,入于恒山。
	时君之弟名固,字季伟。次弟名衷,字思和。	祚有三子:长子讳盈,字叔申;次子讳固,字季伟;小子讳衷,字思和。
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	仕汉,位至二千石。	至汉宣帝时,二弟俱贵。衷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为执金吾。
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	君遂径之江南,治于句曲山。山有洞室,神仙所居,君治之焉。山下之人立庙而奉事之。	遂归句曲。邦人因改句曲为茅君之山。
	拜君为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	今敬授盈位为太元真人,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
	拜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皆例上真。	(茅固)位为定录,(茅衷)保命建名。
	每十二月二日、三月十八日,三君各乘一抱鹤集于峰顶也。	临去,告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复数相往来,旦夕相见。要当一年再过来于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游盼于二弟之处也。

由表可见,《太平广记》引文方是葛洪《神仙传》的原本,而四

库本此条，乃是后人据茅传重加修订者。^①

二许所作茅传不仅补足了三茅君的名号、表字，完善了茅氏世系，更为配合降灵接真增加了若干情节，颇与《真诰》相表里。^②关于茅盈的师承，茅传云：

盈于恒山积六年，思念至道，诚感密应，寝兴妙论，通于神梦，仿佛见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为君师，子奚不寻而受教乎？心豁灵畅，启徒内爽，觉悟流光之腾晔，自谓已得之于千载矣。明辰植晖，东盼霄迈，登岭陟峻，径到西城。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险，稽首灵域，卒见王君。

后二十年，从王君西至龟山，见王母。盈乃叩头再拜，自陈于王母曰：盈小丑贱生，枯骨之余。敢以不肖之躯，而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质，窃求积朔之期。虽仰远流，莫以知济，津途坚塞，所要无寄。常恐一旦死于钻放之难，取笑于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负笈幽林，贪师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见授治身之要，服气之法。于是静斋深室，造行

① 四库本此条的编纂年代恐在刘宋以后，四库本有云：“高祖父濂，字初成，学道于华山，丹成，乘赤龙而升天。即秦始皇时也。有童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天升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其事载《史记》详矣。秦始皇方求神仙长生之道，闻谣言，以为己姓符合谣讖，当得升天，遂诏改腊为嘉平。”检《史记·秦始皇本纪》，确有“更名腊曰嘉平”事，然未有言及茅君者，刘宋裴骃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纪》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此仙人之谣歌，劝帝求长生之术事。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两相对照，乃知四库本所谓之“其事载《史记》”，实指裴骃之《史记集解》，可证其必作于《集解》之后也。

② 茅传显系许谧所作，检《真诰》卷十一许谧答书有云：“昔年十余岁时，述墟闲曹宿有见语，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处，早已徙去。后见包公问动静，此君见答。今故在此山，非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门，通太湖菟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惟说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别长少，不道司命君尊远，别治东宫，未见传记。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级耳。辄敬承海命，于此而改。”这一段话中“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别长少，不道司命君尊远，别治东宫”数语，正与《太平广记》引文的情况相同，不仅证明《太平广记》所征引者系葛洪《神仙传》原文，较许作为先，尤能证明三茅君的名讳、尊号全由许谧所造。

其事。师重见告，以盈身非玉石，而无主于恒。气非四时，常生于内。正当率御出入，呼吸中适。和液得修，形神靡错。感应思积，则魂魄不滞。理合其分，气甄其适，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废也。若使精神疲于往反，津液劳于出入，则形当日凋，神亦枯落，岁减其始，月亏其昔矣。宜便妙访，求其长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见遣以要言，汝愿闻之邪？于是口告盈以玉佩金珰之道、太极玄真之经。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珰者，上清之华盖，阴景之内真，玉佩者，太上之隐玄，洞飞之宝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邀太极，寝宴高空，游行紫虚也。向说元始天王、太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隐书》，玉佩金珰之文章也。又有《阴阳二景内真符》，与本文相随太上法，惟令授诸司命。子玉札玄挺，录字刊金，黄映内曜，素书上清，似当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后别当付于子也。然不先闻明堂玄真之道，亦无由得《太霄隐书》也。

又授二弟茅固、茅衷以上清大道：

时二弟在官，闻盈玄迹眇迈，白日神仙，乘飞步虚，越波凌津，灵官奉从，著于民口，节盖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学，神灵可致。然后明松乔不虚，鼎湖实有。于是并各弃官还家，以日仄之年，方修盈糟粕遗事。不得口诀，未为补益。乃相与共叹而相谓曰：家兄得道，非他人也。曷不往从亲禀问秘诀，而留此按云云方书，以规度世乎？纵往而不达，兄之神仙，终不使吾等死于非所也。遂共弃家，扶舆自载，以寻斯举。以汉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于东山，遂与相见。悲忻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顽下，不达道德。愿赐长生，济弟元元。盈曰：卿已老矣，欲难可补复。纵得真诀，适可成地上仙耳。其上清升霄

大术，非老夫所学。今且当渐阶其易行，以自支住。于是并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气液之道，以住血断，补焦枯摄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长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气，以摄运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内，竭诚精思，神光乃见。于是六丁奉侍，天兵卫护。盈又各赐九转还丹一剂，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

最后谈到三茅君与茅山的关系：

于是盈与二弟诀别，而与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诸山川神灵有司迎启，引者将以千万矣。临去，告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复数相往来，旦夕相见。要当一年再过来于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游盼于二弟之处也。将可记识之。及有好道者，待我于是乎！吾自当料理之，以相教训未悟。于是季伟、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内，立宫结构于外。将道著万物，流润苍生。德加鸟兽，各获其情。神验祸福，罪恶必明。内法既融，外教坦平。尔乃风雨以时，五禾成熟。疾病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鹤，各治一山头。召雨灌早稻，陆田苗亦桑。妻子咸保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青天，何时复来游？

许谧之所以煞费苦心地造作茅传，实有原因。考二许接真地茅山，其最初之得名，固未必与茅君的传说有关，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

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内美釜山州慎之功，外演圣德，以应天心，遂更

名茅山曰会稽之山。

《史记·太史公自序》“上会稽、探禹穴”句，司马贞索隐云：

《越绝书》云：禹上茅山大会计，更名曰会稽。张勃《吴录》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会诸侯计功，改曰会稽。上有孔，号曰禹穴也。

而《真诰》卷十一则云：

汉有三茅君来治其上，时父老又转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鹤，各集山之三处，时人互有见者，是以发为歌谣，乃复因鹤集之处，分句曲之山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

《真诰》记茅山之得名，固属传说，但的确也表明两晋之时，茅山已经与茅君联系在一起了，作为本方神祇，二许不得不加以借重也。

最后，关于茅君传说，尚有一条文献需加以辨正。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二氏所辑《纬书集成·尚书帝验期》云：

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阕。王褒字子登，斋戒三月，王母授以《琼花宝曜七晨素经》。茅盈从西城王君，诣白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王母授以《玄真之经》，又授宝书，童散四方。洎周穆王，驾龟鼉鱼鳖为梁以济弱水，而升昆仑玄圃阆苑之野，而会于王母，歌白云之谣，刻石纪迹于山之下而还。^①

校勘记云：

^①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387页。此条辑自《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

按，诸辑佚书以昆仑之阙终文。《云笈七籤》引帝验期，有同类之文而更详也。《御览》依《云笈七籤》之文而为节引乎。

果如其说，则王褒、茅盈之名已见于汉代纬书。然细绎《云笈七籤》引文，事实恐非如此。检《云笈七籤》卷一百十四《壙城集仙录·西王母传》云：

《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洎九圣七真，凡得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轩，越积石之峰，济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谒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辰素经》。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乞长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珰二景缠练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又授宝书《四童散方》。洎周穆王满命八骏与七萃之士，骅骝赤骥，蹈骊山子之乘，驾以飞辔之轮，柏天导车，造父为右，风驰电逝三千里，越剖间无鬼之乡，犀玉玄池之野。吉日甲子，鼃鼃鱼龟为梁，以济弱水，而升昆仑玄圃阆风之野，而宾于王母。穆天子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之寿。歌白云之谣，刻石纪迹于山之上，而还中土矣。

古书虽无标点，而此段所引《尚书帝验期》仅“王母之国，在西荒之野”九字，绝无疑问，其后述茅盈、王褒、张道陵、周穆王事迹皆《壙城集仙录》作者唐杜光庭根据各种道书增衍而成，与《尚

书帝验期》并无关系。至于《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引《尚书帝验期》云云，乃是由《墉城集仙录》引文转引，而误将茅盈、王褒、周穆王等内容收入。^①

四、关于周、苏、裴传的讨论

本节经反复考证，将魏、王、茅三传的造作之功归于二许与杨羲，其中二许与之关系尤为密切，盖三传均作于兴宁三年以前，当时的灵媒尚是华侨，杨羲则未参与其事也。除上述三传以外，《云笈七籤》卷一百四之《玄洲上卿苏君传》（周季通集）、卷一百五之《清灵真人裴君传》（弟子邓云子撰）、卷一百六之《紫阳真人周君内传》（未著撰人），^②亦与《真诰》的降灵活动有关，故有必要加以讨论。

按，周季通（紫阳）、苏子玄、裴玄仁（清灵）三人皆与华侨有关，《真诰·真胄世谱》后华侨小传有云：

渐渐真仙来游，始亦止是梦，积年乃夜半形见。裴清灵、周紫阳至，皆使通传旨意于长史。（原注：今世中周紫阳传，即是侨所造，故与《真诰》为相连也。）

《道藏》本《紫阳真人内传》后所附之“周、裴二真叙”，述此事尤详：

江乘令晋陵华侨……于是背俗入道，诣祭酒丹阳许治，受奉道之法，群鬼各便消散，不复往来。奉道数年，忽梦见二人，年可五十，容仪衣服非常，后遂二人见，或一月三十日，时时往来侨家靖室中，惟侨得见。一人姓周，一人姓裴，裴雅重才理，非侨所申，周似不如此。二人先后教授侨经

① 《纬书集成》谓此系“《御览》依《云笈七籤》之文而为节引”，实误，《太平御览》成于宋太皇太后时，而《云笈七籤》仁宗时始进呈。此应是《御览》依唐代《墉城集仙录》之文而为节引。

② 周传亦见《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名《紫阳真人内传》，文字较《云笈七籤》略长。

书，书皆与《五千文》相参，多说道家诚行、养性事，亦有谶纬。所受二人经书，皆隐秘不宣。周自作传，裴作未成。裴所作乐序及周传如别。

至于苏子玄，则是周季通之师，故题“周季通集”之《玄洲上卿苏君传》开篇即云：

先师姓苏，讳林，字子玄，濮阳曲水人也。

综上引文可知，周、裴二人（尤其是周）之于华侨，正如魏华存之于杨羲，乃是其“冥中之师”，故周传确由华侨所造。周师苏子玄传题“周季通集”，亦与王褒传称“弟子魏华存撰”同出一辙，当然也出自华侨手笔。至于裴传，据“周、裴二真叙”所说：“裴作未成”，故陈国符将此传的年代定为梁后隋前。^①

因《真诰》卷十四所载杨羲致许谧函已提到《紫阳传》，故华侨作此传的时间，应在晋兴宁三年（365）杨羲接真以前，《真诰》云：

（司马）季主托形隐景，潜迹委羽，《紫阳传》具载其事也。昨夜东卿至，聊试问季主本末，东卿见答，令疏如别，一为上呈，愿不怪之，省讫付火。（原注：此杨君与长史书。今有华撰《周君传》，记季主事殊略，未见别真手书传，依此语则为非也。此前似有按语，今阙失一行。）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11—12页。）云：“此书引《三九素语》、《太上隐书》等，皆出自杨君。是书《真诰》未征引之。《隋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清虚（灵）真人裴君内传》一卷。故此书出世，在梁代以后，隋代之前。”按，陈说恐未必确切，检《真诰》卷二“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书，令与许长史”云：“清响散空，神风洒林，身超冥衢，志咏灵音，仁侯其人也。欲以裴真本末示郗者可矣。其必克谐。不善诱之心亦内彰也。裴亦何人哉。”（原注：郗即情也，小名方回。裴真人本末，即是《清灵传》也。有谢过及七经之士，故令示之。）由此看来，华侨本有制作裴传的打算，因循未成，至杨羲接真以后，乃托辞右英王夫人降授，欲令郗情重作。但今《云笈七籤》中之裴传是否郗情所作，不得而知。

但令人费解的是,《道藏》本《紫阳真人内传》后有一段题记云:

募召法主本,本是晋隆安三年太岁己亥正月七日甲子书毕。

晋隆安三年(399)去杨、许接真已三十四年,此时杨、许早已去世,华侨恐亦不在人间,由此而来现存《道藏》及《云笈七籤》中的周传必已经过后人修饰,而非华侨原作。尽管如此,但其增饰时间毕竟去华侨未久,现存文字中仍应存华作之梗概。

周传中涉及名山洞穴、神仙人物、经典篇章甚多,部分与《真诰》相合,但有关人物的授受关系,远较《真诰》完备,兹摘录如下:

闻蒙山栾先生能读《龙蹯经》,遂往寻之。

遇衍门子,于是授以《龙蹯经》及《三皇内文》。

登王屋山,遇赵佗子,受《芝图》十六首及《五行秘符》。

遇黄先生,受《黄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书四十四诀。

登礐冢山,遇上魏君,受《太素传》、《左乙混洞东蒙之策》、《右庚素文摄杀之律》。

登嵩高山,遇中央黄老君,……咏《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大有妙经》二十四章,修《太上素灵》二十一曲。……当以《上真道经》授子。

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受《泰清上经》。

登峨嵋山,入空洞金府,遇宁先生,受《太丹阴书八稟十诀》。

登岷山,遇阴先生,受《九赤班符》。

登岐山,遇臧延甫,受《忧乐曲素诀辞》。

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关三图》。

登牛首山，遇张子房，受《太清真经》。

登九嶷山，遇李伯阳，受《李氏幽经》。

登钟山，遇高丘子，受《金丹方》二十七首。

登鹤鸣山，遇阳安君，受《金液丹经》、《九鼎神丹图》。

登猛山，遇青精先生，受《黄素传》。

登陆浑山，潜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受《隐地八术》。

登戎山，遇赵伯玄，受《三元素语》。

登阳洛山，遇幼阳君，受《青要紫书三五顺行》。

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经命青图》、《上皇氏籍》。

登鸟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内视图中经》。

登曜名山，遇太帝侯夜神童，受《金根之经》。

登委羽山，遇司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

登大庭山，遇刘子先，受《七变神法》。

登都广建木，遇谷希子，受《黄气之法》、《太空之术》、《阳精三道之要》。

登桐柏山，遇王乔，受《素奏丹符》。

登太华山，遇南岳赤松子，受《上元真书》。

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受《黄水月华四真法》。

至合黎山，遇皇人，受《八素真人经》、《太上隐书》。

登景山，遇黄台万毕先生，受《九真中经》。

登玄壑野羽，遇玉童十人、九气丈人，得《白羽紫盖服黄水月华法》。

到桑林，登扶广山，遇青真小童君，受《金书秘字》。

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龚仲阳，受《仙忌真记》。

西游登空山，白元君、无英君、黄老君遂使受之《大洞真经》三十九篇。

我们推测周传系兴宁三年以前，当许谧倩华侨接真之际，华侨所作。华侨之作此传，乃是将周季通视为“冥中授经之师”，故传中述周学道、受经的历程极为详细，此一方面是为了抬高周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传记中提到如此众多的经典，也为以后降灵过程中真经渐次出世奠定基础。但其后华侨因“漏妄被黜”，灵媒换成了杨羲，冥中之师也由周季通变成了与杨羲关系密切的魏华存，^①但由于周传已经出世，故杨、许构造降授文辞时，不得不注意在整体上与周传保持一致。

第三节 论《真诰》的主体思想

两晋道教门派众多，举其要者有三：三张所创之天师道，或称五斗米道；由葛玄、郑隐、葛洪相传的丹鼎派，及其后演化之灵宝派；以及稍晚出的杨、许上清派。此外，影响相对较小者有于（干）家道、帛家道、李家道等。^②

各门派之间亦非完全势如水火，其中有交融也有排斥，以被杨、许推为“冥中之师”的魏华存为例，魏华存本是天师道的祭酒，但其所推重的《黄庭经》，却非源于三张，而其子刘璞所学，似又与灵宝派有关，《真胄世谱》云：

（永和）六年庚戌（350），（杨羲）又就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时年二十一。

同样，《真诰》中亦可见各派的影子，以下将通过分析《真诰》与天师道、丹鼎派，与《黄庭经》、《四十二章经》的关系，来概括《真诰》的主体思想。

① 杨羲曾从魏华存长子刘璞学道，见《真胄世谱》。

② 如于（干）家道、帛家道之类，所言“影响相对较小”，是指见诸现存文献而言，事实上，已无任何证据能确切地肯定两晋占主流地位的道派究竟是哪些。

一、张陵之道与杨许之道

杨、许所立之教与天师道渊源极深，不仅魏华存具有天师道祭酒身份，许谧亦是教中人物，《紫阳真人内传》后所附之“周、裴二真叙”有云：

江乘令晋陵华侨……于是背俗入道，诣祭酒丹阳许治，受奉道之法。

此处称“许治”，按“治”乃天师道靖室之专名，故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论及丹阳许氏的宗教背景云：

要之，吴地居民本多天师道信徒，许氏既世居丹阳，想其宗教信仰之遗传必已甚久。又后汉灵帝熹平元年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勾章，自称阳明皇帝，扇动诸县，众以万数。许昌既称妖贼，又以阳明为号，必系天师道，此许氏虽不必与丹阳之许同出一源，要为滨海地域天师道之党，与三张之徒先后同起者，则无可疑也。^①

或正因为此，《真诰》中乃多有借重三张之处，对此本章第一节论之已详，但杨、许与三张之最大不同，则在対天师道“黄书赤界”之法的否定。三张之教，被后人形容为“男女合气之术”^②，法琳《辩正论》云：

寻汉安元年，岁在壬午。道士张陵分别黄书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③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三联书店，2001年，35页。

② 《魏书·释老志》云：“（寇谦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

③ 见《广弘明集》卷十三。

张陵合气之术略见于现存残卷的《老子想尔注》中，^①如释《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有云：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句）谷者，欲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牝者，地也，体性安，女像之，故不击。男欲结精，心当像地似女，勿为事先。

（玄牝门，天地根句）牝，地也，女像之。阴孔为门，死生之官也，最要，故名根。男茶亦名根。

（绵绵若存句）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年以知命，当名自止。年少之时，虽有，当闲省之。绵绵者微也。从其微少，若少年则长存矣。今此乃为大害。道造之何？道重继嗣，种类不绝，欲令合精产生，故教之。年少，微省，不绝，不勉力也。勉力之计出愚人之心耳。岂可怨道乎？上德之人，志操坚强，能不恋结产生，少时便绝。又善神早成，言此者道精也。故令天地无祠，龙无子，仙人妻，^②玉女无夫，其大信也。

（用之不勤句）能用此道，应得仙寿，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

至杨、许时代，天师道仍以此术教人，如晋简文帝问子嗣于

① 早在1956年，饶宗颐、陈世骧两先生不约而同地得出《想尔》为“天师道一家之学”的结论。饶说见《老子想尔注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页。）陈说见《想尔老子〈道德经〉敦煌残卷论证》，载《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0-141页。）陈云：“想尔老子经注，既非出于刘表，则据初唐以来传说，为张鲁抑张陵，总属之汉末道教创始时期，自沛迁蜀，世称天师之张家，殆无异议。”

② 疑当作“仙人无妻”。

许迈，^①许迈告之当存“广接之道”，事见《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②虽然《真诰》卷五也说：“道有黄书赤界，长生之要”，但紧接着却明确表示此“黄书”与天师道之“黄书”有所不同：

黄书世多有者，然亦是秘道之事矣。（原注：天师取其名而布其化，事旨大略犹同，但每增广其法耳。此所云黄书赤界三一经，涓子所说黄赤内真者，非今世中天师所演也。）

更多的言论更对黄赤之道持批判态度，最激烈者莫如卷二“清虚真人授书”有云：

黄赤之道，混气之法，是张陵受教施化为种子之一术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数见行此而绝种，未见种此而得生矣。百万之中，莫不尽被考罚者矣。千万之中，误有一人得之，得之远至于不死耳。张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变举亦不行此矣。

不仅讥广接之道“非真人之事”，更谓“数见行此而绝种，未见种此而得生”。并进一步说“思怀淫欲，存心色观，而以兼行上道者，适足明三官考罚耳。所谓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观谓之黄赤，上道谓之隐书”。大有势不两立之意。卷六亦云：

又顷者末学互相扰竞，多用混成及黄书赤界之法。……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呜呼危哉。此虽相生之术，俱度之法，然有似骋飞车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于溺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万万。或违戾天文，谮害嫉妬，灵根郁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构怨连祸，王师败伤，或坑

① 许迈为许谧之兄，曾师事天师道吉阳治左领神祭酒李东，说见本章第一节。

② 直至六朝时期，天师道仍以黄赤合气之术教人，如北周甄鸾《笑道论·道士合气法》有云：“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见《广弘明集》卷九）

降杀服，流血膏野，或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绝命于匈奴之刀剑乎，身死于外，而家诛于内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见诸如此等，少有获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叹息于生矣。

又列举妄行黄赤术所致的危害：

道士耳重者，行黄赤气失节度也。不可不慎。（原注：此盖指戒长史也。）（卷九）

《真诰》取代黄书赤界的乃是“洞房偶景，隐书上道”，卷二紫微夫人授书有云：

夫黄书赤界，虽长生之秘要，实得生之下术也。非上宫天真流耕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长养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怀于淫气，兼以行乎隐书者，实足握水官之笔，鸣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谢亦不可得赖也。要而言之，贞则灵降，专则神使矣。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贵存乎匹偶，相爱在于二景。虽名之为夫妇，不行夫妇之迹也。是用虚名以示视听耳。苟有黄赤存于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见，灵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劳于执事，亦有劳于三官矣。

所谓“名之为夫妇，不行夫妇之迹”，正道出了偶景与黄赤的重大区别。

有关《真诰》中的偶景术，朱越利著“六朝上清经的隐书之道”^①，所论甚详，不劳赘言。但于上清偶景之术的实质，尚有需加讨论者。

《真诰》中详记有愕绿华与羊权、九华真妃与杨羲、右英夫

① 朱越利：六朝上清经的隐书之道，《宗教学研究》2001（2），1—12页。

人与许谧的偶对，而涉及偶景术的具体操作，《真诰》始终隐晦其辞。兹对九华真妃降杨羲的情形试做分析。

据《真诰》卷一，九华真妃首次出场在兴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夜，由紫微夫人的陪伴下降杨羲，杨详记其体貌：

神女着云锦褐，上丹下青，文采光鲜，腰中有绿绣带，带系十余小铃，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差，左带玉佩，佩亦如世间佩，但几小耳。衣服修修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云发髻鬓，整顿绝伦，作髻乃在顶中，又垂余发至腰许。指着金环，白珠约臂。视之年可十三、四许。

紫微夫人作介绍云：

此是太虚上真元君金台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虚元君昔遭诣龟山，学上清道。道成受太上书，署为紫清上宫九华真妃者也，于是赐姓安，名郁嫔，字灵箫。

真妃乃赠以枣，其味似梨，喻“火枣交梨”，复问杨羲生辰，并乞结姻缘，真妃言：

君师南真夫人，司命秉权，道高妙备，实良德之宗也。闻君德音甚久，不图今日得叙因缘，欢愿于冥运之会，依然有松萝之缠矣。

杨自称“沉湎下俗，尘染其质，高卑云邈，无缘握敬”，愿请求真妃进一步训示，真妃作诗，有句云：

愿为山泽结，刚柔顺以和。相携双清内，上真道不邪。紫微会良谋，唱纳享福多。

紫微夫人又作诗，乃以《易》咸、恒卦为喻：^①

上道诚不邪，尘滓非所闻。同目咸恒象，高唱为尔因。

次夕，真妃又降，再次乞为匹对，并谓与杨羲乃是姻缘前定：

非不能采择上室，访搜紫童，求王宫之良俦，偶高灵而为双，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我推机任会，应度历数，俯景尘沫，参龙下迈，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党耳。自因宿命相与，乃有墨会定名。素契玉乡，齐理二庆，携雁而行，鹄爵分味，醢衾结裳，顾俦中饋，内藏真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简，青书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齐矣，对景之好亦已域矣。得愿而游，欢兼昔旨，岂不冥乎自然。此复是二象大宗，内外之配职耳。……盖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谓得志怀真，情已如一，方当相与，结驷玉虚，偶行此玄，同握绛实于玉圃，并采丹华于阆园。分饮于紫川之水，齐濯于碧河之滨。紫华毛帔，日冕蓉冠。逍遥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凤扉云关。仰漱金髓，咏歌玉玄。浮空寝宴，高会太晨。四钧朗唱，香母奏烟。齐首偶观，携带交裾。不亦乐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顺运随会，妾必无辞，且亦自不得背实反冥，苟任胸怀矣。

言毕，南岳夫人复为总结之辞：

冥期数感，玄运相适，应分来聘，新构因缘，此携真之善事也。盖示有偶对之名，定内外之职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秽，而行淫浊之下迹矣。偶灵妃以接景，聘贵真之少女，于尔亲交，亦大有进业之益得，而无伤绝之虑耳。千神于是

^① 咸卦乃述夫妇之道，《荀子·大略》谓此卦是女上男下的性交体位，有云：“《易》之咸，见夫妇。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

可使试观，不得复陈矣。真旌必可剋往，云辇必可俱驾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为汝构及此意，今遂如愿，益使我欣欣，慎复疑矧于心胸矣。

如果我们冷静地看待这一段故事，从南岳牵线，紫微作筏，真妃求偶，杨羲由婉拒到欣然接纳，这一切可谓生动曲折，其实都只是出于杨羲自己的描述。但这并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①也不是精神病人的幻视，或其他情形下发生的个人心理历程。^②如第一节所论，杨羲作为降灵会的灵媒，他其实一直保持着清醒状态，他所记录的有关偶景的一切，乃是为了向信众们介绍一种他们（指杨、许）新创的，与三张黄赤术截然不同的房中秘术，因此，在真妃求偶成功以后，自然引出清虚真人、紫微夫人两段对黄赤术的抨击之辞，^③以显示上清新教与三张旧说不同，这才是杨、许创立偶景术的根本动机。

杨、许所倡的偶景术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正三张合气滥交之弊的作用，但其实质更接近于所谓的“意淫”，故我们决不赞同《真诰》是“夫妇双修的和谐派，是中古房中术最理智的一派”^④之类的说法。

① 李丰楙在评述九华真妃与杨羲的爱情时说：“当时上清派的内部已秘传一种神交的修行法门，既非世俗的缠绵情欲，亦非天师道的黄书赤道，而为静室中感应神女来现情好的上道，这应是精神上幻觉状态的一种修行秘法。”李丰楙：《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173页。转引自朱越利：《六朝上清经的隐书之道》，《宗教学研究》2001（2），11页，注27。

② 我们否认九华真妃降杨羲一段记述中可能掺杂有杨羲个人的心理情绪，但作为文字完整保存于《真诰》中的文本，其中真妃、紫微的两首长诗，以及真妃、紫微、南岳、清灵冗长的说辞，必然是经过事先预构，或事后编造者。如果把这些内容与《真诰》卷二云林右英夫人降许谧时的诗文对比，即可看出，二者完全出于一人之手，其造作者要么为许谧，要么是杨羲。因此，若欲将此作为心理学研究样本，其可信度的确值得怀疑。

③ 引文见前。

④ 此论由钟来因氏提出，见钟著《长生不死的探求——道经〈真诰〉之迷》，文汇出版社，1992年，及《〈真诰〉长生经精华录》，文汇出版社，1992年。

二、黄庭之道

房中术并不能概括《真诰》的全部内容,《真诰》乃至上清经典中谈得最多的是内观行气之术,此术与《黄庭经》的关系尤属密切。《黄庭经》丝毫不涉房中内炼之术,而《真诰》对此经的重视,决不在偶景隐书之下,黄庭一名见于《真诰》者,有以下数条:

山世远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炼,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为合万过,夕得三、四过乃佳。北岳蒋夫人云:读此经亦使人无病,是不死之道也。(卷九)^①

因语(赵)叔期曰:欲入天门,调三关,存朱衣,正昆仑。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头,就请要诀,因以一卷书与之,是《胎精中记》。拜受此书,入山诵之,后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征者,汝当识此言。(原注:三关事与《黄庭》同,并有说而无法。)(卷五)

经云:主诸关窍聪明始。(原注:此《黄庭经》中语。)(卷十八)

右此是长史自读《黄庭》遍数也。朱墨杂画者,是因修用时遇得笔,便提记之耳。(卷十八)

得佳清闲,云敕汝修《内经》,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当尔。然此非常意,皆发自冥妙,当作本末。答当奉行此意。口又无言,为不可也。(原注:《内经》或应是《黄庭》,不尔即应是洞房中法尔。)(卷十八)

始济浙江,便遇风沧漂,惟有《黄庭》一篇得存。(卷十九)

(许)掾抄魏传中《黄庭经》,并复真授数纸。(卷二十)

^① 此条亦见卷十五。《真诰》卷一“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句原注:“受读黄庭事云,(称)北岳蒋夫人,与今不同”,所指即是此条。

《黄庭经》有《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和《黄庭中景经》三种。其中《中景经》较为晚出,而《内景》与《外景》的出世先后颇有争议,王明作“《黄庭经》考”认为《外景》出世约在晋咸和九年(334),晚于《内景》,^①其说影响甚大。近年复有杨立华氏撰“《黄庭内景经》重考”^②,别创新说,认为今传本《黄庭内景经》的成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今传本《黄庭外景经》乃是《黄庭经》的祖本,此书“与《老子河上公章句》、《黄帝内经素问》皆言保爱精气,亦言五脏之神,然神形、名讳、长短、服色皆无,亦无存思之法,与上清经性质不同,或竟出于汉代”。第二阶段系经裴清灵等人改造,乃与上清经合流,成为《黄庭内景经》的早期传本。今本之《黄庭内景经》的成书,与魏华存有绝大关系,杨立华说:

魏夫人将《存神别法》与《诵黄庭经法》以七言形式“述”出,融入《黄庭经》(今本《黄庭外景经》)经文之中,复牵合其它上清经法,如《郁仪结璘》《隐地八术》等,对《黄庭经》部分经文加以解释、增扩,遂成今本三十六章《黄庭内景经》。

尽管王明与杨立华的观点相左,但二人都赞成今本《黄庭内景经》出于魏华存之手,^③这是毫无疑问的。杨立华通过比较《黄庭内景经》与上清派经典《紫度炎光》、《隐地八术》、《郁仪结璘》、《上清大洞真经》、《上清太上开天龙蹻经》等后认为,“《黄庭内景经》是上清系经典,而非内丹派著作”,这一观点极有见地,^④但杨进一步引申出来的结论:“是《黄庭内景经》抄袭上清

① 王明:《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24-371页。

② 杨立华:《黄庭内景经》重考,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6辑,三联书店,1999年,261-293页。

③ 王明说:“魏夫人既得秘藏之黄庭草稿,撰为定本,自是《黄庭内景经》日渐流行。”

④ 事实上,杨的这些比较对本篇的基本论点“《真诰》乃至上清经典中谈得最多的是内观行气之术,此术与《黄庭经》的关系尤属密切”,尤具启示作用。但杨既已申论在先,故本篇未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

经,而非相反”,则非我们所能同意者。

杨立华对魏、王、周、裴、苏诸真传信任太过,乃至以为王褒、周紫阳等皆真有其人,经文授受果有其事,遂驳斥陈国符“诸真传实皆出于晋代,且所记真经,撰传时尚未出世”的观点,得结论说:

(1)三十一卷上清真经非始出于杨羲;(2)上清诸经的成书不会迟于晋武帝太康九年(按是年魏夫人得王褒所授经书)。

而如本章第一、第二节反复讨论者,除魏华存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外,王褒、周紫阳等“高真”恐皆出于杨、许杜撰,魏传的作者也非所谓的“中侯上仙范邈”,而是许谧,造作的目的是为了配合降灵接真。历史上的魏华存(不是指杨、许所封的南岳魏夫人),她的真实宗教主张也未必与杨、许上清派完全一致,只是因为她所编定的《黄庭经》为杨、许看中,才被他们推举(应该说是追封)成了“冥中之师”。至于上清诸经,确如陈国符所论“所记真经,撰传时尚未出世”。换言之,杨、许作诸真传时所拟诸经名目,乃是为陆续造经埋下伏笔,而非诸经已经在世。正因为杨、许部分地接纳了魏华存《黄庭内景经》中的观点,故杨、许,乃至其后的如王灵期等人在造作上清派经典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黄庭经》思想融入上清经中。

三、葛洪与许谧

许、葛皆丹阳大姓,并有姻亲关系,据《真胄世谱》,许谧叔父(其父许副之弟)许朝,娶葛梯之女,乃葛洪之姐,^①则葛洪为许谧姻舅。许玉斧子黄民娶葛万安女,万安为葛洪第二兄之孙。

^① 《真胄世谱》云:“(许朝)妻葛梯女,抱朴姊也。”《晋书·葛洪传》云:“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弘胄。父梯,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

作为年代相接近的道教人物，分析葛洪对许谧思想的影响尤有意义。

尽管我们已无法真正了解两晋时期道教各派别之间的关系，但透过《真诰》，我们确能看到同时代而年龄稍长的葛洪，^①对许谧的影响力。《真诰》中有许多文字直接引自葛洪的《抱朴子外篇》：

众藻集而龙章成，群声会而云韶谐，辛酸备则嘉味和耳。（原注：中候夫人答。此二辞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卷七）

夫捐茅以茹荼，啜九成而悦北鄙者。（原注：捐茅至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语。）（卷八）

不仅如此，《真诰》更直接借用葛洪《神仙传》中的人物，杜撰出若干炼养口诀，见于卷十者有：青牛道士封君达、沈羲、吕恭、栾巴、刘京、程伟妻、凤纲、陈安世、李少君、刘纲妻等。而且对“道”的本体的认识，《真诰》的思想亦与《抱朴子内篇》有一致之处，《真诰》卷五云：

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故道有大归，是为素真。故非道无以成真，非真无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见乎。是以为大归也。见而谓之妙，成而谓之道，用而谓之性。性与道之体，体好至道，道使之然也。（原注：此说人体自然与道气合。所以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则同于道矣。）

但是，葛洪对长生之道的具体主张，与杨、许上清派毕竟有

^① 葛洪的卒年虽有争议，但其生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则各家无异辞，较许谧生太安二年（303）或永兴二年（305），年长二十余岁。

很大的不同,其根本分歧在于对待金丹大药的态度,葛洪说:

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金丹)》

不得金丹,但服草木芝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药,而不知还年之要术,则终无久生之理也。《(极言)》

可能是出于对葛洪的尊重,《真诰》对葛洪的金丹理论并无直接指斥之辞,这一点与其对三张黄书赤界的严厉态度很有不同。甚至在华侨所作的《紫阳真人周君内传》中,还以与葛洪一样的口吻推重金丹大药。周传谓长生之道当先服药杀三尸,复合四镇丸以断谷,再导引服气,食诸草木药,但接着说:

虽服此药以得其力,不得九转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飞仙矣。为可延年益寿,亦不^①辟其死也。

揆其所说,正与《抱朴子内篇·金丹》引《黄帝九鼎神丹经》之语如出一轍:

虽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

杨、许并不排斥金丹之道,但尽管其承认金丹的妙用,《真诰》中也提到许多神丹之名,如卷五云: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极隐芝。君曰:仙道有九转神丹,服之化为白鹤。

在卷五中还记载一系列通过服神丹金液而飞升的人物,如

^① 此据《道藏》本,《云笈七籤》卷一百六所引周传作“亦辟其死也”。

刘伟道、傅先生、毛伯道、刘道恭、高丘子、赵叔期等，卷十一提到三茅山中若干宜于合丹之处，但按杨、许的观点，金丹的功用毕竟不及上清圣典《大洞真经》，卷五说：

食草木之药，不知房中之法及行气导引，服药无益也，终不得道。若至志感灵所存必至者，亦不须草药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导引行气，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杓神丹，不须其他术也，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真经》者，复不须金丹之道也。读之万过毕，便仙也。

卷四亦云：

天帝曰：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

许谧与葛洪毕竟道有所不同，故在《真诰》构建的神仙谱系中，丹鼎派人物的地位甚低，如卷十二对葛玄、左慈的评价：

问葛玄。玄善于变幻，而拙于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仙人也。初在长山，近入盖竹，亦能乘虎使鬼，无所不至，但几于未得受职耳。亦恒与谢稚坚、黄子阳、郭声子相随。（原注：葛玄字孝先，是抱朴从祖，即郑思远之师也。少入山得仙，时人咸莫测所在，传言东海中仙人，寄书呼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长史所以有问，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灵宝所云太极左仙公，于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来，数在此下，寻更受职也。慈颜色甚少，正得炉火九华之益。（原注：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师也。魏武父子招集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寻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华丹。九华丹是《太清中经》法。小括即小括苍山，在永嘉桥谿之北。凡此诸人，术解甚多，而仙弟犹下者，并不是不闻三品高业故也。

许先生所以兴叹。)

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正秉此旨,列葛玄为第六地仙散位,葛洪名位稍高,亦只在第四右位之末,与居第二左位之许谧、杨羲,右位之许翊实不可同日而语也。

关于葛洪丹道理论的影响,任继愈《中国道教史》有一段总结之辞,颇值得注意:

作为上层道教流派之一的丹鼎道派,发展到了葛洪,已经十分成熟,具备了祭献、礼仪、修行、伦理条规等一般宗教要素。但由于本身的致命弱点,它注定不能取代其他教派。这弱点就是它只注意个人炼丹修行,而且其修行途径、方式难以在群众中普及,不易发挥作为一种官方宗教的社会职能。^①

或许是吸取了葛洪的经验,杨、许几乎放弃了有关玄道理论的阐述,也不再断断于神仙有无的讨论,^②而是利用“降授”这一神秘性更强,参与性更强的手段来传教,这在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东晋,自然比葛洪的理性说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修行手法上,存思内视,也比丹鼎升炼更加简便易行,尤其是从佛典中学来的“诵经功德”,更开了修行上的方便法门。此恐是杨、许上清派在南朝的影响力超过丹鼎派的重要原因。

四、《真诰》与《四十二章经》

宋人已经注意到《真诰》内容有窃取自佛家《四十二章经》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9页。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之畅玄、道意专论道的本体,颇近哲学家言,而《真诰》中除了前引卷五“道者混然”一段外,全书几乎不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有关神仙实有这一命题的讨论,《抱朴子内篇》可称雄辩之极,实际上已经为杨、许以神仙立教铺平道路,故亦不劳杨、许费辞。

者,黄伯思先申其说,《东观余论》卷下“跋《真诰》众灵教诫条后”云:

此下方圆诸条,皆与佛《四十二章经》同,恐后人所附益,非杨、许书。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亦云:

道书中有《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

胡适撰“陶弘景的《真诰》考”,从《真诰》第二甄命授中检出十三段文字抄自《四十二章经》,胡径将抄袭作伪之人指为陶弘景,胡适云:

陶弘景生于佛教的家庭,他又是博学的人,不见得不曾读过此经,大概他受了此经文字的引诱,决心把经中要义改成道教高真的训诫,所以他一口气偷了二十章。^①

胡适所下的结论未免有些武断,对于陶弘景与《真诰》的关系,下节别有讨论,此不赘言,关于《真诰》与《四十二章经》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杨、许究竟看中了《四十二章经》中的哪些内容,其宗教意义如何。汤用彤论《四十二章经》有云:

《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老庄玄理,虽其所陈朴质平实,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②

①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35页。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31页。

此论颇揭示出《四十二章经》的本质，杨、许之所以裁割近二分之一篇幅的经文以入《真诰》，实缘于此。若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真诰》几乎囊括了《四十二章经》中有关断灭爱欲的全部论述，如云：

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难，贫穷惠施难也；豪富学道难也；制命不死难也；得见洞经难也；生值壬辰后圣世难也。我昔问太上，何缘得识宿命？太上答曰：道德无形，知之无益。要当守志行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六情，守空净，亦见道之真，亦知宿命矣。

玄清夫人告曰：夫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牢狱桎梏会有原赦，而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祸，已犹甘心投焉，其罪无赦。情累于人也，犹执炬火逆风行也，愚者不释炬火必烧手。贪欲恚怒，愚痴之毒，处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殆，愚痴者火烧手之谓也。

南极夫人曰：人从爱生忧，忧生则有畏，无爱即无忧，无忧则无畏。

爱欲之大者，莫大于色。其罪无外，其事无赦。赖其一，若复有二，普天之民莫能为道者也。

从本质上讲，此实为杨、许借鉴《四十二章经》所拟定的上清派根本戒律，即彻底放弃功利之心，断灭爱欲之念。应该看到，此戒律与葛洪主张的“为道者当先立功德”^①，这一入世的戒条大相径庭，所偏重者乃是出世离欲，其思想根源固然可以追溯到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但其最直接的出处毕竟是佛家的《四十二章经》，由此确需认真讨论东晋佛道关系，以及佛家思想对《真诰》的影响。

^① 见《抱朴子内篇·对俗》。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葛洪对道戒有详细论述，但归根到底仍总结为：“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

从汉代以来,直到东晋,佛道两教并未发展为如后世般的势如水火,当时虽有老子化佛之说,揆其本意,乃为方便释道间之相互承认,^①年代稍后的沙门不敬王者之论,乃是佛、儒之争,亦无关道教,故当时士大夫于释道两教实未生太大的分别心。郗愔崇道,而愔子郗超佞佛,释支遁用功般若之学,复注释庄子内篇,此皆人所共知者,故杨、许将佛家内容牵涉入道教,实未可深怪。

《真诰》中涉及佛教的内容甚多,且皆无恶辞,卷九记佛法西来及《四十二章经》事:

汉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长丈六,项生圆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遍问朝廷,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国有得道者,号曰佛,传闻能飞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张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采写佛经四十二章,秘兰台石室第十四,即时起洛阳城西门外道北立佛寺,又于南宫清凉台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图,帝感非常,先造寿陵,亦于殿上作佛象,是时国丰民安,远夷慕化,愿为臣妾。佛像来中国,始自明帝时耳。(原注:此说粗与外书同,而长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与天竺属宾,而月氏无有,与此为异。今既欲说小方诸奉佛,故先宜叙此也。按张騫非前汉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见《汉书》,秦景、王遵等不显。此寺名白马寺,明帝乃葬显节陵,此云寿陵者,汉诸帝在位时,皆预造寿陵,犹今世人作寿冢,非陵名也。外书记亦云:遣侍中张堪,或云郎中张愔,并往天竺,写致经象,并沙门来至。又恐今此说未必是真受,犹可杨君旧语耳。但真经诰中,自亟有论及佛事也。)

① 此即汤用彤所说:“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道均籍老子化胡之说,会通两方教理,遂至帝王列两氏而并祭,臣下亦合黄老、浮屠为一,固毫不可怪也。”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43页。

按,此乃抄袭《牟子理惑论》者,^①《真诰》“秘兰台石室第十四”句,《牟子》作“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其意尤较《真诰》明晰。

卷十四谓真人裴玄仁、周季通、王子乔皆有弟子奉佛: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余者学仙道牖(原注:弟子刘显林、辛仲甫、赵子常。)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原注:入室弟子王玮达、李建道、泉法坚。)桐柏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学佛。(原注:入室弟子于弘智、竺法灵、郑文成、陈元子。此当略举标胜者耳。辛、泉、于、竺皆似胡姓也,当是学佛弟子也。)

卷九记小方诸之人多奉佛:

大方诸之西,小方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图,以金玉镂之,或有高百丈者数十层楼也。其上人尽孝顺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读夏归藏经,用之以飞行。(原注:按夏曰连山,殷曰归藏,与此不同。依如三弟子,虽奉佛道,不作比丘形服,世人谓在真菩萨家耳。)

① 《牟子》原文:“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此实系征引《牟子理惑论》之最早文献,而向未为前人注意。如法·伯希和《牟子考》云:“当此二百五十年间(指公元二世纪末至五世纪中),除《弘明集》所载孙绰《喻道论》或宗炳《明佛论》外,存留于今之撰述,尚未见有引证《牟子》之文者。”余嘉锡《牟子理惑论检讨》云:“六朝以前,典籍佚者十九,就见存诸书征引《牟子》最早者,莫如《世说新语》注。”是皆未能深考《真诰》者。伯希和及余嘉锡文见周叔迦辑撰,周绍良新编:《牟子从残新编》,中国书店,2001年,99-100页,138页。

《真诰》并不排佛，但述诸奉佛者得善果后，往往由佛转仙道：

君曰：昔有黄观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朝拜，叩头求乞长生，如此积四十九年，后遂服食入焦山，太极真人百四十事试之，皆过，遂服金丹，而咏《大洞真经》，今补仙官为太极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原注：此说与傅含真奉佛事亦同。）（卷五）

其一女真是傅礼和，礼和是汉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北地人，其家奉佛精进，女常旦夕洒扫佛前，勤勤祝誓，心愿仙化，神灵监其此心，亦得来此，久处易迁，今始得为含真台主也，常服五星气以得道。礼和善歌，歌则鸟兽飞聚而听声焉。（卷十三）

不过从《真诰》的描述来看，不仅杨、许并不真正了解佛道的差别，其实更反映出当时人士的普遍认识，即佛教只是长生方术之一种而已。换言之，我们甚至怀疑，杨、许在抄袭《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其实都是“外教”经典。或因此，陶弘景作《真诰叙录》，乃将《上清经》与佛书《妙法莲华经》等并列：

仰寻道经，上清上品，事极高真之业，佛经《妙法莲花》，理会一乘之致，仙书《庄子内篇》，义穷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万象，体具幽明。

也正因为此，随着六朝佛教势力的增大，《真诰》中的这些描述为后世的真经保有者由道转佛种下了前因，《真诰叙录》云：

（马）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尔。

马智晚为众僧所说，改事佛法，悉以道经数十卷送与钟。

吴昙拔者，上虞且靡人，颇有才致，初为道士，许丞以一瓢瓢书，皆三君小小要用杂诀，以与之。其后事佛出家，悉分散乞人都尽，后又罢佛还俗。

第四节 《真诰》的文献学研究

前面三节集中讨论了《真诰》的宗教学意义，重在考察杨、许创立上清派的若干问题，本篇则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真诰》文本的形成过程，尤其是陶弘景与《真诰》的关系。

一、真迹流传考

关于真迹流传情况，陈国符《道藏源流考》、^① 赵益“《真诰》的源流与文本”^② 皆详有研究，兹略述梗概，并补叙二氏所缺漏者。

《真诰》共分作七部分，即运题象第一、^③ 甄命授第二、协昌期第三、稽神枢第四、阐幽微第五、握真辅第六、翼真检第七。其中第七翼真检据陶弘景说：“此卷是标明真绪，证质玄原，悉隐居所述，非《真诰》之例。”前六篇皆是杨、许真迹，但第六握真辅稍有特殊，陶弘景云：“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记录，及书疏往来，非《真诰》之例。”

杨、许手书真迹的流传情况，备见于陶弘景《真诰叙录》，为简略计，依年代先后将事迹胪列作表 3-3：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7-62页。

② 赵益：《真诰》的源流与文本，《文献》2000(3)，50-56页。

③ 《真诰》正文题作“运象篇第一”。

表 3-3

真迹流传表

时间	事迹	备注
兴宁三年 (365)	众真降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传许谧、许翔,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	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真授四十余篇,多杨书。
太和五年 (370)	许翔卒。	
太元元年 (376)	许谧卒。 许翔子黄民,时年十七,乃收集所写经符秘笈历岁,于时亦有数卷散出。	散出数卷,即今(指陶弘景,下同)在句容所得者。
隆安四年 (400)	弘农杨洗于海陵得上经二十余篇,有数卷非真。	可知杨羲歿后即有造伪经者,非始于王灵期也。
元兴三年 (404)	许黄民奉经入剡,为马朗家所供养,钱塘杜道鞠亦数相招致。	当时诸人并未知寻阅经法,止禀奉而已。
义熙中(约 411前后)	孔默罢职回到钱塘,求许黄民以经书传之,因令王兴续写。王兴先为孔写,辄复私缮一通。	
	王灵期谓许黄民求受上经,乃窃加损益,依王魏诸传题目,张开造制,凡五十余篇。	王灵期所伪造者,传写既广,枝叶繁杂,新旧混淆,未易甄别。京师及江东数郡,略无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尔。王点缙手本,颇有漏出,即今犹存。
	许黄民见王造经获利,乃鄙闭自有之书,而更就王求写。	于是合迹俱宜,同声相赞,以致许王齐誉,真伪比踪。
	莱买亦从许受得此十数卷,颇兼真本。	莱买所受,其迹不复具存。
	马朗既见许黄民所传王灵期经卷增多,亦欲更受,未果。	
义熙十三年 (417)	东阳陈雷合丹,服后遁去,所得许谧《自步七元星图》今在其孙处。	
元嘉六年 (429)	许黄民欲移归钱塘,真经一卷子留马朗净室,携经传及杂书十数卷自随,至钱塘杜道鞠家,乃遣人取经,马朗不与,未几,许歿。	至此,许黄民处经书分归两处,一在剡县马家,一在钱塘杜家。在杜家者,即今世上诸经书悉是也。
	许黄民长子荣弟,从马朗求经不遂,乃以王灵期之经教授唱言,并注经后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许远游。	则知许荣弟亦曾伪造经书。
	许荣弟与马朗交涉数年,索得真经两三卷。	今王惠朗诸人所得者是也。
元嘉十一年 (434)	有山阴何道敬,为马家所供侍,经书法事,皆以委之,乃出真经令何摹写,何后多换取真书,窃还剡东墅青壤山。何既分将经去,马朗忿恨,乃洋铜灌厨篱,约敕家人,不得复开。	何性鄙陋,后多致散失,犹余数卷,今在其女弟子始丰后堂山张玉景间。
元嘉十二年 (435)	许荣弟歿于剡。	
元嘉中(约 438前后)	孔默卒,二子熙先、休先窃取看览,大致讥诮,因一时焚荡,无复孑遗。 王兴先济浙江,遇风沦漂,惟有《黄庭》一篇得存,后遇霖雨,纸墨霉坏。	于是孔王所写真经二本,前后皆灭,遂不行世。

续表一

大明七年 (463)	楼惠明携女师盐官钟义山眷属数人,就食于剡,马朗子马洪宗事之。楼因之出入堂静,备睹经籍,其先已见何道敬所记,意甚贪乐,而有憾严固,观览无方。	
大明七年 (463)	句容严虬以许翔书《飞步经》一卷售与同里王文清。	已还封昭台。
大明末 (464)	有戴法兴兄戴延兴作剡县令,好道,及吴兴天目山诸玄秀,并颇得写杜道鞠、杜京产父子家经。楼从弟道济及法真,钟兴女傅光,并得写楼、钟间经。	诸人所事符,殊多粗略,惟加意润色,潜译取好,了无复规矩锋芒,写经又多浮谬。
景和元年 (465)	嘉兴父季真自敕封取马处真经。楼惠明以景和帝(宋前废帝刘子业)猖狂,上经不可轻易出世,乃以真经、真传及杂授十余篇留置钟义山处,惟以豁落符及真授二十许小篇,并何道敬所奉二录等交父季真使呈景和帝。景和以付后堂道士。	
泰始初 (466)	父季真乃启将出私解。	此句意义不详。
	楼惠明自都返剡,向钟义山索经,为钟所拒,乃就起写,久久方得数篇。楼既因景和取经事与马洪为恨,乃移归东阳长山。马后遂来潜取,而误得他经。	楼惠明处真经似复有所零落,今犹应有一两篇在。其中二卷已还封昭台。
泰始三年 (467)	陆修静南下,立崇虚馆,因取真经在馆。	陆修静所取者,因是父季真所呈景和之豁落符及真授二十许小篇,并何道敬所奉二录等。
泰始四年 (468)	终于剡,移还始宁岍山。	此句意义不详。
泰始某年	句容葛巢以杨羲所书《灵宝五符》一卷示陆修静,陆以绢物易归,顾欢索观未得,惟以传东阳孙游岳及女弟子梅令文。	已还封昭台。
元徽五年 (477)	陆修静卒,真经随还庐山。其后,有徐叔标将经携至都下。及徐亡,仍在陆兄子璵文处。	此中有三君所书真受,后人糊连装褙,分为二十四篇。
建元三年 (481)	敕董仲民往庐山营功德,董欲求神异,徐叔标因分杨书一篇为两篇与董,董还上齐高帝,高帝以付五经典籍殿庆,戴庆出外,仍将自随。徐亡后,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落符以去。	自此,陆修静所取之经所余惟二十一篇,悉以还封昭台也。
永明八年 (490)	陶弘景入东阳道访求真经。	
年代不详	孔琬賾时,杜京产将诸经书,往剡南墅大墟住。始与顾欢、戚景玄、朱僧标等数人,共相料视。顾先已写在楼间经,粗识真书,于是分别选出,凡有经传四五卷,真授七八篇,今犹在杜家。	其经二卷并真授,已还封昭台。
年代不详	马智晚年为众僧所说,改事佛法,悉以道经数十卷送与钟义山,皆是何道敬先为其父马罕所写者,亦有王灵期所造杂经,惟四五篇并真授六七篇是真手。	其经二卷,此真授等悉已还封昭台。钟亡后,所余亡应在其儿女及戚景玄处。

续表二

年代不详	杨羲书《王君传》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处,中又在王文清家,后属茅山道士葛景仙。	已还封昭台。
年代不详	许翔书《西岳公禁山符》,杨羲书《中黄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吴县拔所得许丞一瓢瓶杂道书,吴以此二卷与褚伯玉,褚居南霍,游行诸山,恒带自随。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标间。	已还封昭台。
年代不详	许翔书《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回元隐道经》一卷,及《八素阴阳歌》一卷,并东阳章灵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时未识真书,惟言是道家常经而已,归东阳以示顾欢。	已还封昭台。
年代不详	许翔书《所佩列纪黄素书》一短卷,本许黄民以与弟子苏道会,道会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传朱僧标,僧标以奉钟法师,楼居士见而求取。	今犹应在楼间。
年代不详	许翔书《魏传》中《黄庭经》,并复真授数纸,先在剡山王惠朗间。	今应在是王惠朗女弟子及同学章灵民处。
年代不详	永兴有一姓解家者,昔曾供养许郎,又得小小杂书,后青山女道士樊妙罗,得其杨羲书鄠宫事一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间,沈又以与四明山孔总。	已还封昭台,解家所余,今绝踪迹。
年代不详	魏夫人小息刘瑕为会稽时,携夫人巾箱法衣,并有经书,自随供养,后仍留山阴。	于今尚在,未获寻求之。

表中所列,应是陶弘景所了解的真迹流传情况。复检《真诰》正文,其文献来源较为特殊者,尚有五例。卷八之末有太元真人告许长史云云,标题下原注:“此后非真说”,文末题记称:

右四条别一手书,陆修静后于东阳所得,不与诸迹同,辞事伪陋,不类真旨,疑是后人所作。

又有杨、许真迹为后人裁割者,如卷五道授许谧、许翔各有手书存世,其中保存于杜京产家的文本,涉及与三张黄书赤界有关的文字皆被篡改:^①

① 关于杜家藏本篡改真迹中黄书赤界的内容,其实是反映上清派宗教思想演变的一项重要证据,如第三节所论,杨、许立教之时,因多有借重天师道之处,虽不以三张黄赤术为然,但仍承认此术是道法之一,故列道授篇中其名目。刘宋以后,上清派影响日大,杜家的篡改,实际上是为了遮掩上清派曾经与天师道有过的联系。

君曰：道有黄书赤界，长生之要。（原注：长史书本，杜家剪除此一行。）

君曰：此皆道之经也。黄书（原注：杜家黽易此字为经方）世多有者，然亦是秘道之事矣。

卷十有“上清真人冯延寿口诀”，有注云：

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真人冯延寿，西岳之号，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后凡十四事，虽未见真书，类其事旨，不乖真法，故别撰录，附于卷末。

同卷末“养性禁忌口诀”后注云：

复有此诸条，亦未见真书，而似是二许抄事，皆仙人条用小诀，有助于施行，故并撰录。

卷十五后附有陶弘景所作华阳十五颂，题记云：

隐居今所安经昭灵台前，欲立小石碣子，刻书华阳颂十五篇，皆赞述此山洞内外事，庶以标诚灵府，永垂远世，而未办作石，今且载其文于此。

二、陶弘景与《真诰》

《真诰》是陶弘景搜集当时保存于各处之杨、许手书真迹及抄本，并参考此前顾欢所编《真迹》，重新整理编撰而成。兹就有关本书的成书经过、年代以及陶弘景对《真诰》的态度等问题讨论如下。

（一）从顾欢到陶弘景

在陶弘景之前，已有顾欢搜集整理杨、许手书，并编辑为《真迹》若干卷，顾撰虽不可见，《真诰叙录》尚载顾欢寻访真经诸事，

如顾向陆修静乞观杨羲书《灵宝五符》；从章灵民处得许翊书经；抄摹楼、杜间经；访山阴何道敬处经书等。但陶弘景颇以顾欢《真迹》之名为非，《真诰叙录》云：

真诰者真人口授之诰也，犹如佛经皆言佛说，而顾玄平谓为真迹，当言真人之手书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书为言，真人不得为隶字，若以事迹为目，则此迹不在真人尔。且书此之时，未得称真，既于义无旨，故不宜为号。

又批评顾撰：

书字中有异手增僮，多是许丞及丞子所为，或招引名称，或取会当时，并多浮妄，而顾皆不能辨，从而取之。

顾所撰《真迹》，枝分类别，各为部卷，致语用乖越，不复可领。

正有感于顾欢所撰的种种缺陷，于是陶弘景发心搜求真书手迹，重为编纂，《真诰叙录》中仅有一语提到陶弘景庚午年（永明八年，490）至东阳访经之事，而《本起录》叙此事始末则详：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484—486）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经历模写，意所未惬者，于是更博访远近以正之。戊辰年（488）始往茅山，便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490），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茆山谒法师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游历山

水二百余日乃还。爰及东阳长山、吴兴天目山，于潜、临海、安固诸名山，无不毕践。

《本起录》所提到的人物皆见于《真诰》，娄慧明《真诰》作楼惠明，诸僧标《真诰》作朱僧标，楼惠明、杜京产亦见于《南史·隐逸传》。《本起录》不言访问顾欢，或顾卒于永明八年陶弘景访经之前。^①

关于《真诰》的撰著与成书，赵益“《真诰》的源流与文本”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登真隐诀》而未及《真诰》，遂认为《真诰》属陶弘景“撰而未讫”者，“最后成书并开始流传，可能要晚在唐代中期”^②。这一说法颇有可议之处。

按，《隋书·经籍志》于道经、佛经皆仅记经目总数，不列书名，其所以提到《登真隐诀》之名，乃在是道经总叙中偶然涉及，与四部著录的性质完全不同，故《真诰》之不见于隋志，决不代表隋以前此书未曾流行。

《真诰》绝非“撰而未讫”者，全书起运题象第一，讫翼真检第七，内容编排井然有序，其寓意《真诰叙录》已有说明：

仰寻道经，上清上品，事极高真之业，佛经《妙法莲花》，理会一乘之致，仙书《庄子内篇》，义穷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万象，体具幽明。而并各二十卷^③者，当是璇玑七政，以齐八方故也。隐居所制《登真隐诀》，亦为七贯。今述此《真诰》，复成七日，五七之数，物理备矣。

① 《南史》、《南齐书》顾欢传皆不记卒年，仅云：“自剋日，自择葬时，卒于剡山，时年六十四。”

② 赵益：《真诰》的源流与文本，《文献》2000(3)，52页。

③ 疑原文当作“七卷”。《真诰》既欲比拟《庄子内篇》、《妙法莲华经》，庄子内篇有七，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亦七卷，故《真诰》凡七篇，此云“二十卷”者，当系编《道藏》时析分本书为二十卷，后人篡改。

《真诰》与陶弘景的另一部著作《登真隐诀》互为姊妹之作，故《真诰》中每有与《登真隐诀》互参的文字，如卷九云：

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诸杂事，并甚有节度，悉以别撰在《登真隐诀》中，今不可被皆注释。

又检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其叙录亦曾征引《真诰》：

《真诰》言：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疴，而怨咎于神灵。当风卧湿，反责佗人于失福，皆是痴人也。

此条见《真诰》卷七，由此知《真诰》必完成于陶弘景生前。

赵益之所以认为《真诰》撰而未讫，除隋志未著录外，更惑于《本起录》所云：

《真诰》一秩七卷，此一诰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居士已撰，多有漏谬，更詮次叙注之尔，不出外闻。

“不出外闻”与“撰而未讫”并非同义，《本起录》提到《登真隐诀》时亦说“不以出世”，而《登真隐诀》固非“撰而未讫”之书。复考《本起录》的撰著时间，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序》云：

陶翊乃作《本起录》，至齐末遂已，亦事多遗阙。（原注：不知何缘，至永元元年遂绝也。）

既然作于齐末永元元年（499）的《本起录》中已记载《真诰》七卷，则知《真诰》在此前已经完成。又考《真诰》中的纪年，最晚者亦为齐永元元年（499），卷十三陶注云：

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①

注称“齐之己卯”，正永元元年，由此可见，陶弘景《真诰》撰成时间确为此年。但另据元刘大彬《茅山志》卷十有云：

（天监）七年（508），以为林岩浅近，复思远游，乃改名氏，曰王整官，称外兵，夜半出山，至永嘉楠江青嶂山，梦佛授记，名胜力菩萨。住大若岩修所著《真诰》。

今按此说法颇可疑，《真诰》卷十一正文主要谈茅山的情况，陶注的内容颇涉及陶弘景当日在茅山的活动，取与相关传记互参，不难看出，本卷中陶弘景所有注释，皆未有超过齐末者，如云：

今有薛彪数人居之。

考《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引《道学传》云：

薛彪之，晋陵人也。齐建武二年停东川，采访真秘，三年乃返。启敕于大茅山东岭立洞天馆也。

则薛彪（之）人居茅山在建武三年（496），此可证明《真诰》作于公元496年以后。又云：

元徽中有数男人，复来其前而居，至齐初，乃敕句容人

① 《真诰》正文云：“昔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者，于伏龙地植李，酥满其地，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味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陶弘景驳斥说：“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意谓正文称“三千年”不准确，因为从帝尧元年至“齐之己卯岁”方才二千八百三年，更何况是东晋。从行文的体例来看，以“至齐之己卯岁”作参照，即时至今日之意，故知己卯确为著作之当年也。

王文清仍此立馆，号为崇元，开置堂宇厢廊，殊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资俸力，自二十许年，远近男女往来依约，周流数里，廨舍十余坊。

元徽(473-477)中至齐末永元元年正“二十许年”。又正文提到积金山“快可合丹”，陶注乃云：

惟启乞垂赐，所不论耳。意欲营转炼之事，亦指此山前临长涧东流水，至幽隐，有形势，若基构有期，当更宣述耳。

此言陶弘景相中积金岭为炼丹之所，然尚未构建，复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天监)四年春，先生出居(积金)岭东，使王法明守上馆，陆逸冲居下馆，潘渊文、许灵真、杨超远从焉。是岁有事于炉燧。

则陶弘景开积金岭炼丹事在梁天监四年(505)，作《真诰》时虽有此打算，尚未实施也。又云：

长史宅西北，近长隐小冈下，乃时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处，既经耕垦，基域不复存，而了无井，亦恐如长史井堙没耳。

则知陶弘景作《真诰》时许谧旧井尚无迹可寻，另据《书法研究》1985年4期陈世华文，^①1981年茅山玉晨观即梁朱阳馆故址出土井铭有云：

此是晋世真人许长史旧井，天监十四年更开治，十六年安阍。

^① 陈世华：《瘞鹤铭》、天监井栏与陶弘景书法，《书法研究》1985(4)，24-30页。

由此可见,如果陶弘景在入梁以后还曾修订过《真诰》,则必不会说“长史井堙没”,或言(炼丹事)“若基构有期,当更宣述”了,故《真诰》的撰著年代必在齐建武三年至永元元年(496—499)之间,完成以后未加修订。

(二)《真诰》陶注研究

在《真诰叙录》中陶弘景对《真诰》的编撰体例作了说明:

《真诰》中凡有紫书大字者,皆隐居别抄取三君手书,经中杂事,各相配类,共为证明,诸经既非聊尔可见,便于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则易得寻究。又此六篇中有朱书细字者,悉隐居所注,以为志别,其墨书细字,犹是本文。

今《道藏》所刻《真诰》,除大小字尚能分明外,朱书、紫书多混杂难别,惟卷十一所记句曲山事中恐有部分文字系紫书,^①墨书细字主要是许黄民父子所为,可考者有数条:

祖司徒府辟掾不赴,隐在本县茅山五年。(陶云:此十六字荣弟后所注。)(卷四)

尔时护军长史。(陶注:此六字亦荣弟所注)(卷四)

从曾祖本名映,改名远游。(陶注:此十字荣弟注。)(卷十八)

夫钟瑞物也,当金氏之世有六钟,将必见乎,晋朝五霸诸侯,厥德过之,故六种嘉瑞耳,非复耳,事误子孙也,预告宁无乎。(陶注:此注下四十八字,黄民手所妄益。)(卷十七)

更多的注释应出自陶弘景之手,就注释的内容来看,主要是

① 卷十一有注云:“凡此后紫书大字者,并茅三君传所记也,传既以宝秘,见之者稀,今谨抄取说山事,共相证显。”

对降授之辞的说明,而其中最可注意者,是陶弘景对降辞中前后抵牾之处提出的若干疑问。如卷一正文之“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卷十五又云“北岳蒋夫人”,陶注:

受读黄庭事云,北岳蒋夫人。与今不同。(卷一)

前篇有西岳蒋夫人。今又云北^①岳,未审有两人,为是误也。(卷十五)

《真诰》降辞既出杨、许杜撰,矛盾之处自多,陶弘景熟悉历史,精通历法,尽管其对文中不通之处尽可能地加以回护,但仍有若干难以自圆其说者,如《真诰》卷八污蔑庾亮:

庾道季身处阳官贵势,不能顺天用法。愤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积恶不改,其罪目已定,今临命方欲修德以自济免,徒费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考《晋书·庾敳传》称敳“好学,有文章”,“升平中代孔严为丹阳尹,表除重役六十余事”,故陶弘景亦只能据实为注:

庾敳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辞文义,升平中为丹阳尹,表除诸役六十余事,太和初为领军,如此行迹,不似为恶,恐是闻戒修善,故得申遂。

卷十提到郑玄之孙:

郑子真则康成之孙也,今在阳濯山,昔初学时,正患两脚不授积年,其晚用针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

陶弘景认为与事实不符,有注云:

① “又云北”三字《道藏》本断烂,据学津讨源本补。

郑玄惟有一儿，为贼所害，有遗腹子，名小^①同耳。既不入山，又复不病脚，此子真又非谷口者。进退乖异，莫辨质据。

卷十二云：

云王玮玄是楚庄王时侍郎，受术于玉君。

陶注：

若是春秋时楚庄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职，而汉楚王又无庄谥。

对杨、许编排神灵谱系中的荒疏之处，陶弘景亦予指出，但曲为解说，如卷十五云：

炎庆甲者，古之炎帝也，今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

陶注：

炎帝神农氏，造耕稼，尝百药，其圣功不减轩辕、颛顼，无应为鬼帝。又黄帝所伐大庭氏称炎帝，恐当是此，非神农也。

又周代周公、邵公、太公皆以盛德著称，而太公（望）载见《列仙传》，邵公（奭）在《真诰》中为鬼职，独周公（旦）则仙、鬼皆无与焉，陶弘景在卷十五中只好作如下解释：

按，周公、邵公、太公俱佐命克纣，公在不殊。而周公有

① 《道藏》本作“卜”，学津讨源本作“小”，据《后汉书·郑玄传》郑玄孙名“小同”。

圣德，仙鬼之中，并无显出。太公执旒秉钺，威罚最深，乃载出列仙。邵公恩流甘棠，翻为魁职。亦复难了。皆当各缘其根本业分故也。

其实，《真诰》正文中的这些失误，固然是杨、许杜撰降辞时疏忽所致，经陶弘景曲辞回护，勉强也能圆满其说，而偶景之术，毕竟前所未有的，其中的漏洞，如紫微、南岳二夫人是否参与俦结，其余男女诸真有无匹偶等疑问，陶弘景可能也曾考虑过，但解释起来措辞极其严厉，大有不容争论之势：

南真自是训授之师，紫微则下教之匠，并不关俦结之例。但中候、昭灵亦似别有所在，既事未一时，故不正的的耳。其余男真，或陪从所引，或职司所任，至如二君，最为领袖之主，今人读此辞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领其旨。

值得注意的是，陶弘景的注释还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如对天师道的态度，卷五正文中提到仙道有黄书赤界，为长生之要，陶注云：

天师取其名而布其化，事旨大略犹同，但每增广其法耳。此所云《黄书赤界三一经》，涓子所说黄赤内真者，非今世中天师所演也。

卷九正文语及《正一平经》云云，陶弘景作注特别指出其出于《太清经》，非天师道之正一平气：

泰清家有正一平气，今此悉载拜静众事，必应是《泰清经》，恐脱气字也。

正文中涉及其他道派的经典，陶注亦立场鲜明，卷五谓仙道有三皇内文，以召天地神灵，陶弘景云：

(三皇内文)右世中虽有,而非真本。

卷十三提到《洞玄经》,陶立即指出,此不得与灵宝派经书相混:

洞玄即《大洞玄经》,读之万遍,七祖已下并得炼质南宫,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称《洞玄灵宝经》也。

对灵宝派人物,陶弘景也无好感,如卷十二正文谓葛玄“非仙人也”,陶弘景于是幸灾乐祸地说:

葛玄字孝先,是抱朴从祖,即郑思远之师也。少入山得仙,时人咸莫测所在,传言东海中仙人,寄书呼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长史所以有问,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灵宝所云太极左仙公,于斯妄乎。

乃至对许谧之兄许迈,因其曾从鲍靓受道,又师事天师道吉阳治左领神祭酒李东,因其所学与上清派不侔,故陶弘景对许迈颇有微辞。陶针对顾欢《真迹》首列王羲之作《许先生(迈)传》,乃说:

(许)先生事迹,未近真阶,尚不宜预在此部,而顾遂载王右军父子书传,并于事为非。

卷十八载许迈成仙后致许谧函一通,按此函本系杨、许伪造,褒许谧父子而自贬,即便如此,因信中有“七考之福,既以播之于后”一语,陶弘景竟毫不留情地讥讽道:

子何功业,当复延及长史父子也。

不必争论陶弘景的这些注释是否正确,但至少反映出陶对《真诰》的态度既十分虔诚,又非常严谨,换言之,陶弘景完全相

信所谓杨、许手书真迹系上真降授，因此我们不同意胡适将《真诰》视为陶弘景伪造的结论。^①

三、《真诰》的文献学价值

唐人已经留心《真诰》，最早引用《真诰》者大约是玄宗时徐坚《初学记》，^②其后唐末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引《真诰》尤多。唐人更以《真诰》入诗，如韦应物《休暇东斋》云：“怀仙阅《真诰》，贻友题幽素”，白居易《味道》有句云：“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但真正注意到《真诰》的文献学价值，则是近代之事。

王国维著《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即据《真诰》卷十五陶注引文取“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为《竹书纪年》佚文。^③陈寅恪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注意到《真诰》卷八陶注“福和似是李夫人贱时小名也，今《晋书》名俊容”，加按语云：

寅恪案：《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作陵容，当据此改正。^④

又如王羲之的生卒，历代皆有争论，余嘉锡据《真诰》卷十六陶注“(王逸少)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详为考订，可

① 胡适在“陶弘景的《真诰》考”中反复申论，认为《真诰》众灵教戒诸条是陶弘景伪作，并说：“他（指陶弘景）的博学高名，他的严谨的校订方法，都使人不疑心他作伪。”（见《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35页。）我们不同意此说法，站在陶弘景的立场，如果他真有心改造或杜撰降辞，完全可以在编撰《真诰》时将前面提到的降辞中若干矛盾之处加以修订，而不必费尽心机地曲辞回护，甚至将杨、许降辞不合理之处一一揭出了。与胡的观点相反，正因为陶弘景忠实地保留了杨、许真迹，我们今天才有可能通过《真诰》正文及陶注去了解杨、许接真的内幕。

② 《初学记》卷二十三“句曲”条引《真诰》“秦孝王时，道士周大宾”云云，见《真诰》卷十三，“九灵”条引《真诰》“古英人改容于三阴之馆”云云，见《真诰》卷四，文字小有不同。

③ 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2页。

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三联书店，2001年，8页。

谓只眼独具。^①

但毕竟《真诰》属于较为冷僻的道书,文献研究者对其的利用程度还远远不够,如前节注释中谈到,《真诰》征引有《牟子理惑论》中的文字,这是最早引用此书的文献,实系研究《牟子》撰著年代的一项重要材料,而向未引起注意。兹再举数例。

用于考订史实。《真诰》除提供了王羲之生卒证据外,张鲁的卒年亦为《真诰》独有。《三国志·张鲁传》仅记其建安二十年(215)归降曹操,拜镇南将军,薨,谥曰原侯,未载卒年。《真诰》卷四陶注:

按张系师为镇南将军,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邳东,后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开,见尸如生,出著床上,因举麈尾覆面大笑,咤又亡,仍更殡葬,其外书事迹略如此。

用为校勘之助。如前面提到《本草经集注·序录》曾引用《真诰》,尚志钧所辑《本草经集注》此段取敦煌卷子为底本,《大观证类本草》、《政和证类本草》作参校,而未复校《真诰》,其正文为:

《真诰》言:常不能慎(校:“慎”《大观》作“谨”,《政和》作“慎”。)事上者,自致百疴,(校:“疴”此下,《大观》、《政和》有“之本”二字。)而怨咎于神灵。(校:“灵”此下,《大观》、《政和》有“乎”字。)当风卧湿,反责他(校:“他”《大观》、《政和》作“佗人”。)于失福,(校:“福”,《大观》、《政和》作“覆”。)皆是(校:“是”,《大观》、《政和》无。)痴人也。^②

检《道藏》本《真诰》卷七此句为:

学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疴,归咎于神灵。当风卧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修订本,631-632页。

② 陶弘景著,尚志钧辑:《本草经集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16-18页。

湿，反责他于失覆，皆痴人也。

对勘之下，《真诰》原文于“常不能慎事”后有读，意谓自不谨慎，乃招致诸疾，反归咎于神灵不佑。下一字作“尚”甚妥。而引文作“常不能慎事上(者)”，意转为若不慎事尊上者，乃招致诸疾，反归咎于神灵不佑。虽亦能通，但联系次句，实应以前说更佳。次句原文作“失覆”，卷子作“失福”，一字之讹，意义全非。^①前句尚且不论，“失覆”字既有参校文献作此，实应据改。

在辑佚方面，《真诰》正文及陶注征引文献甚多，颇有今亡佚不存者，举诸辑佚家未曾留意者两例。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八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辑庾阐《扬都赋》佚文，而不知《真诰》卷十七中尚有大段佚文：

若夫奇神诡，恢譎无方，阴阳之所煥育，川泽之所函藏。则羲和浴日于甘渊，乌飞司景于扶桑。江登湄而解珮，二女御风于潇湘。潜蛟龙战于玄泉，蕃丘丧马于淮阳。灵洲海运于南极，东山遥集于帝乡。骅骝抗轡于巨龟，江使感梦于宋王。是以洞庭虽广，济之不容刀。卢龙虽峻，越之不崇朝。岷山悬岭，绝阔千仞，束马绵竹，则安乐归晋。辽海泱泱，横带天渠，公孙不竞，则其亡忽诸。若夫飞壶白马，即墨天山，三江之漫，九河之源，尚曷足语哉。吾子飞轩结驷，驾晒林薄，徒闻山河之宝，魏国所以未究。夫吴起一言，而武侯心忤也。(原注：此二条是庾阐《扬都赋》中语也。)

今人刘纬毅作《汉唐方志辑佚》得晋潘岳《关中记》佚文 52

① 《真诰》原文可以意译为：“分明是自己不谨慎从事，乃招致种种疾病，却归咎于神灵不保佑。这就像自己迎风卧处湿地，招致种种疾病，却怨旁人没有替自己盖被子一样。都是蠢人。”卷子引文意译为：“对尊长有失尊重的人，自然会招致种种疾病，却归咎于神灵不保佑。迎风卧处湿地，招致种种疾病，却怨旁人没有福分。”显然卷子引文在逻辑上有失通顺。

条，^①而未考《真诰》卷十七尚有佚文数条：

秦始皇作长安渭水横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汉时桥北置都水令丞，领徒千五百人，署属京兆。董卓坏之，魏武帝更作，广三丈，今桥是也。

秦为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万人，庭中可受十万人，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宫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马相如所云，墓芜秽而不修者是也。

秦敛天下兵器，铸以为铜人十二，置（原注：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鱼烂，余十在，今足令成字如此。）之诸宫，汉时皆在长安，董卓坏以为钱。余二人徙在青门里东宫前。魏明帝欲徙诣洛，载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诸侯，以为郡县，正法律，均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书也。（原注：缺失秦字）庙中钟簴四枚，皆在汉高祖庙中，魏明帝徙二枚诣洛，故尚方南铜驰巷中是也。

汉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铜钟在长安，夏侯征西，欲徙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门里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钟，东者杜陵钟也。（原注：此后少始皇陵一事。）

鸿门在始皇陵北十余里，《汉书》云：张良解厄于鸿门者也。

秦王（原注：应是楚王，作秦王误耳。）项籍，以沛公为汉王，都汉中，而分关中为三，秦章邯为雍王，都大丘，今槐里是也。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万年县是也。董翳为翟王，都高奴，高奴县在咸阳西北，今省。

高祖自汉中北出袭三面，皆平之。《汉书》云：乘衅而

①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81-86页。

运,席卷三秦者也。此三县今皆有都邑故处也。(原注:此
后少十五六条事,当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许氏在杜县,葬于南原,立
庙于曲池之北,号曰乐游庙,因苑为名也。徙关东名族四十
五姓,以陪杜陵。司马相如吊二世云,临曲江之陀洲,谓曲
池也。(原注:此一条增损,语小异,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条,并杨君所写录潘安仁《关中记》语也。用
白笺纸,行书极好,当是聊尔抄其中事。

第五节 《真诰》与《登真隐诀》

《真诰》与《登真隐诀》互为表里之作,此二书的关系,确如贾
嵩《华阳陶隐居内传》所论:“《隐诀》以析纲目,《真诰》以旌降
授。”但《真诰》在流传过程中,虽卷帙由七卷衍为二十卷,其内
容基本完整,而今正统《道藏》中之《登真隐诀》只有寥寥三卷,仅
为原帙二十四卷的八分之一。

一、《登真隐诀》的撰著、流传与亡佚

陶弘景撰《登真隐诀》的目的乃在于辅翼真经,《登真隐诀·
序》云:

夫经之为言径也,经者,常也,通也,谓常通而无滞。亦
犹布帛之有经矣,必须经纬综绪,仅乃成功。若机关疏越,
杼轴乖谬,安能斐然成文。真人立象垂训,本不为蒙校设
言,故每标通衢,而略曲径,知可教之士自当观其隅辙。凡
五经子史,爰及赋颂,尚历代注释犹不能辨,况玄妙之秘途,
绝领之奇篇,而可不探括冲隐,穷思寂昧者乎。

此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卷二所言:

(陶弘景)以为学其诀者,当由阶而登。真文多隐,非诀莫登,故以名书。

撰著《登真隐诀》的工作实开始于陶弘景入山以前,《登真隐诀·序》云:

昔在人间,已抄撰《真经修事》两卷。于时粗谓委密,顷岩居务静,颇得恭洁,试就遵用,犹多阙略。今更反复研构,表里洞洽,预是真学之理,使(便)了然无滞,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论有以入无,或据显而知隐,或推机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

由此知《登真隐诀》乃是在《真经修事》的基础上完成者。尽管《真诰·序录》已提到“隐居所制《登真隐诀》,亦为七贯”。从子陶翊齐末所作之《本起录》也记载有“《登真隐诀》三秩二十四卷,此一诀皆是修行上真道经要妙秘事,不以出世”。但《登真隐诀》的最后完成,恐在梁代,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共引《登真隐诀》十四条,其中八条涉及陶弘景的行踪,如云:“壬辰年(天监十一年,512)六月,便乘海还永嘉。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墟,孤立海中,都无人居,甚可营合。”而记事年代最晚者,为记南岳邓郁之死,《华阳陶隐居内传》引《登真隐诀》云:

邓先生初云(去)^①,颜色如故,后三日安舆中,停置积日,尸不毁坏。

复据《南史·隐逸·邓郁传》邓卒于天监十四年(515),则陶弘景《登真隐诀》的最后成书,必在天监十四年以后。

在目录学著作中最早提到《登真隐诀》书名者为《隋书·经籍

① 原文作“云”,疑是“去”字。

志》:

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

此书两《唐志》并作二十五卷,宋《崇文总目》作六十卷,《宋志》作三十五卷,此或系传写之讹,或出宋人析分所致,未可确知,但无论如何《登真隐诀》在宋代仍基本完整。而今正统《道藏》洞玄部玉诀类所存《登真隐诀》仅三卷,则知《登真隐诀》之亡佚必在元明之间,^① 正统修藏乃收集残篇,厘为三卷也。

二、《登真隐诀》的内容与辑佚

无论《登真隐诀》的卷帙如《本起录》所谓为二十四卷,还是如两《唐志》所说为二十五卷,但此书应与《真诰》一样,均由七部分组成,这在陶弘景《真诰·叙录》中有所说明。《真诰·叙录》云:“隐居所制《登真隐诀》,亦为七贯。”今《道藏》本《登真隐诀》仅三卷,卷上有真符、宝章、九宫、明堂、洞房五篇,卷中记诸真授诀凡五十二事,卷下有诵黄庭经法、入静、章符、请官四篇。其内容远非完帙,然据此残本并《真诰》、《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等文献,及现存《登真隐诀》各种佚文,尚可大致了解《登真隐诀》七部分基本内容。

(一)总叙上清道派的主张

《道藏》正一部《上清经秘诀》云:

^① 至少两点能证明直至南宋《登真隐诀》尚保持完整,(1)今《道藏》三卷本《登真隐诀》无序文,而《道藏》本《华阳陶隐居集》则载之,按,陶集为南宋傅霄所编,其所据必为《登真隐诀》完帙。(2)南宋贾嵩作《华阳陶隐居内传》多处引用《登真隐诀》,亦不见于今本。均说明南宋时《登真隐诀》尚未亡佚。

《登真隐诀》云：所论一理者，即是一切众生身中清静道性。道性者，不有不无，真性常在，所以通之为道。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情，变化不测，通于群生，在人之身为神明，所以为心也。所以教人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生亡则道废，合道则长生也。

此段佚文论道性之理，疑出《登真隐诀》首篇。此外，《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八引《登真隐诀》云：

方诸青童云：人学道亦苦，不学亦苦，二苦之始乃同，为苦之终则异。为道者，缘苦得乐，不为道者，从辛苦而已矣。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获身至死，其苦甚矣。心脑积罪，生死不绝，其苦难说。况复不终其天之年老哉。此不为道之苦也。为道亦苦者，清静存真，守玄思灵，寻师劳苦，历试数百，用志不堕，亦苦之至也。此为道之苦。数十年中为苦之理，乃有甚于彼，得道之日，乃顿忘此苦，犹百日之饥，一朝而饱，岂复觉向之馁乏耶。非道则不可。

右英真人曰：夫内接家业以自羁，外综王事以杂役，此亦道之不专也。夫抱道不行，犹无道也。握宝不用，犹无宝也。

紫微元君曰：疾之所生，生乎念多，邪之所兆，兆于心散。念多则事广，事广则累繁，浮泛莫检，纷竞不息，内煎万虑，外劳百役，形神弊矣，众病安得不兴。高墉重关，犹恐寇至，况关扉去防，自我致寇也。智以无涯伤性，心以为恶荡真。形来在眼，声发入听，其为开意属

想，实有增美。魂者正神，神贵明信。魄者邪鬼，鬼尚狂悖。飞仙之想，触见必念，慈护之情，遇物斯极。以此为心，心即是道矣。

前两段文辞与《真诰》卷六、卷二略同，而有所发挥，第三段则不见于《真诰》。疑皆出《登真隐诀》首篇。

(二) 经传条例

《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后有宋陈景元跋云：

按《登真隐诀》第二经传条例云：《大洞真经》今世中有两本，一则大卷，前有回风混合之道，而辞旨假附，多是浮伪，一本惟有三十九章，其中乃有数语，与右英所说者同，而互相混糅，不可分别。惟须亲见真本，乃可遵用。又闻有得杨、许三十九章者，与世中小本不殊。自既未经眼见，不测是非。且宜缮写以补品目。又有玉注一卷，即是略释《洞经》中旨，亦可录也。

由此可知，《登真隐诀》第二部分的名称应为“经传条例”。又检《道藏》本《紫阳真人内传》后有注云：“贞白条例云有三千四百八十八字”，此处所称“贞白条例”，应即《登真隐诀》之“经传条例第二”。此外，《太平御览》引《登真隐诀》曰：

杨君、许长史共书《洞房经》于碧笺纸，又云篆书白麻纸。（卷六百七十二）

八素之经是圣君以白素之缁，八色之彩笔自书也。（卷六百七十二）

上清仙台，《金书》在其中。太极九玄台，《碧简文》

在其中。玄真皇龟台,《明堂玄真经》在其中。(卷六百七十三)

昆仑台,西王母之宫,所谓西瑶上台,《天真秘文》在其中。

另据《真诰·叙录》称:

又按三君手书作字有异今世者,有龟、龙、虚、华、显、服、写、辵、阙、关之例,三君同尔。其杨飞(掾飞);杨我(掾我);杨灵(长史灵、掾灵);杨真(长史真);杨师(掾师);杨恶(长史恶),^①此其自相为异者。又鬼魔字皆作摩;净洁皆作盛洁;盛贮皆作请贮。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备记,恐后人以世手传写,必随世改动,故标示其例,令相承谨按尔。此诸同异,悉已具载在《登真隐诀》中。

以上有关诸经书所在,杨、许手书经书,以及杨、许使用异体字的情况,疑皆在“经传条例”中。

(三)真经修用

法藏敦煌卷子 P2732 为道经写本残片,胡道静等编《藏外道书》,将其考订为《登真隐诀》佚文。^②此残片凡 127 行,大、小字杂书,大字为正文,小字系注释。首尾皆断烂。按其每段末之标题可分为:(1)中君告;(2)保命说此;(3)沧浪云林宫右英王夫人所出;(4)裴清灵说;(5)紫微夫人言;(6)标题缺。

其大字部分完全见于《真诰》正文,小字注则为《真诰》所无。为便讨论,兹将卷子 P2732 大字部分与《真诰》相应内容对照列为表 3-4。

① 文中“龟、龙、虚”,“飞、我、灵”诸字,《道藏》本《真诰》已作正体,故无从区别。

② 胡道静等主编:《藏外道书》,第 21 册,巴蜀书社,1994 年,342-344 页。

表 3-4

卷子 P2732 与《真诰》对勘表

卷子 P2732 大字	《真诰》正文
<p>(1)(前缺)……保全。出景藏幽,五灵化分,合明幽虚,时乘六云,和握我身,上升九天。毕,又叩齿七通,咽液七过,乃开目,事讫。此道神妙,神州玄都多有得此术者,尔可行此耶。久行之,常乘云雾而游也。又云,久服之,则能散形入空,与云气合体。</p> <p>右中君告</p>	<p>(卷十三)久服之,则能散形入空,与云气合体。……保全。出景藏幽,五灵化分,合明幽虚,时乘六云,和握我身,上升九天。毕,又叩齿七通,咽液七过,乃开目,事讫。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术者,尔可行此法耶。久行之,常乘云雾而游。</p>
<p>(2)杜广平所受介琰玄白之术,一名胎精中景玄白内法。常旦旦,坐卧任意,在泥丸中有黑气,(下缺)</p> <p>日芒忽变成火,以烧臂,使内外通而洞彻,良久,毕,乃阴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气分,流光焕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荡秽炼烟,洞彻风气,百邪燔燃,使得长生,四肢完全,止害鬼鬼,收付北辰。毕,存思良久,放身自忘。</p> <p>右保命说此</p>	<p>(卷十三)杜契者字广平……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术。(原注:一名此道为胎精中景玄白法也。)</p> <p>……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在泥丸中有黑气,存心中有白气,脐中有黄气,三气俱仙,如云以覆身上。因变成火,火又烧身,身通洞彻,内外如此。</p> <p>(卷十)良久,日芒忽变成火烧臂,使臂内外通而洞彻,良久,毕,乃阴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气分,流光焕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荡秽炼烟,洞彻风气,百邪燔然,使得长生,四肢完全,止害鬼鬼,收付北辰。毕,存思良久,放身自忘。</p>
<p>(3)常以生气时,咽唾二七过,毕,按体所痛处,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黄右黄,六华相当,风气恶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泽,上下宜通,内遣水火,外辟不祥,长生飞仙,身常体强。毕,又咽液二七过。常如此则无疾,又当急按所痛处卅过。</p> <p>右沧浪云林官右英王夫人所出</p>	<p>(卷九)常以生气时,咽液二七过,毕,按体所痛处,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黄右黄,六华相当,风气恶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泽,上下宜通,内遣水火,外辟不祥,长生飞仙,身常体强。毕,又咽液二七过。常如此则无疾,又当急按所痛处二十一过。</p>
<p>(4)恒以手案两眉后小空中三九过,又以手及指摩两目下权上,又以手旋耳,行三十过,摩惟令数,无时节也。毕,辄以手逆乘额三九过,从眉中始,上行人发际中,口傍咽唾,多少无数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书。以手乘额,内存赤子,日月双明,上元欢喜,三九始眉,数毕乃止。此谓手朝三元固脑坚发之道也。头四面以两手乘之,顺发就结,惟令多也。于是头流血散,风湿不凝。都毕,以手按目四眇二九,竟令见光分明。是检眼神之道。久为之,得见百灵。愚而行之,使手不离面乃佳。以成真人,就不度也。</p> <p>右裴清灵说此</p>	<p>(卷九)常以手按两眉后小穴中三九过,又以手心及指摩两目权上,以手旋耳,行三十过,摩惟令数,无时节也。毕,辄以手逆乘额三九过,从眉中始,上行人发际,口傍咽唾,多少无数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书。……以手乘额上,内存赤子,日月双明,上元欢喜,三九始眉,数毕乃止。此谓手朝三元固脑坚发之道也。头四面以两手乘之,顺发就结,惟令多也。于是头流血散,风湿不凝。都毕,以手按目四眇二九,竟令见光分明。是检眼神之道。久为之,得见百灵。愚而行之,使手不离面乃佳。以成真人,就不度也。</p>
<p>(5)夜卧觉,常更急闭两目,叩齿九通,咽唾九过,毕,以手案鼻之边左右上下数十过,微祝曰:太上四明,九门发精,耳目玄彻,通真达灵,天中之台,流气调平,骅女云仪,眼童英明,华聪见朗,百度妙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台郁泉,柱梁不倾,七魄澡炼,三魂安宁,赤子携景,辄与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当摧以流铃。万凶消灭,所愿必成,日月守门,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群响敬听。毕,又咽唾九过,摩拭面目,令小热,以为常。每欲也卧觉,辄按祝如此,勿失一卧也。真道虽成如我辈,故常行之也,但不复卧,自坐为之耳。</p> <p>右紫夫人言此</p>	<p>(卷九)夜卧觉,常更叩齿九通,咽液九过,毕,以手按鼻之边左右上下数十过,微祝曰:太上四明,九门发精,耳目玄彻通真达灵,天中玄台,流气调平,骅女云仪,眼童英明,华聪见朗,百度妙清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台郁泉,柱梁不倾,七魄澡炼,三魂安宁,赤子携景,辄与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当摧以流铃。万凶消灭,所愿必成,日月守门,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群响敬听。卧觉,辄按祝如此,勿失一卧也。真道虽成如我辈,故常行之也,但不复卧,自坐为之耳。</p>

续表一

卷子 P2732 大字	《真诰》正文
(6)天真 _二 是两眉 _一 之间 _二 ,眉之角也 _一 ;山源 _二 是鼻下人中之本侧 _一 ,在鼻下小人谷中也 _二 ;华庭 _二 在两眉之下 _一 ,是彻视之津梁。天真 _二 是引灵之上房 _一 ,旦中暮咽唾三九 _二 ,急以手三九阴按之以为常 _一 ,令人致灵彻见,杜遏万邪之道也,一日三过行耳。(下缺)	(卷九)天真 _二 是两眉 _一 之间 _二 ,眉之角也 _一 ;山源 _二 是鼻下人中之本侧 _一 ,在鼻下小人谷中也 _二 ;华庭 _二 在两眉之下 _一 ,是彻视之津梁。天真 _二 是引灵之上房 _一 ,旦中暮恒咽液三九过 _二 ,急以手三九阴按之以为常 _一 ,令致灵彻视,杜遏万邪之道也,一日三过行耳。

值得注意的是,与卷子 P2732 相对应的《真诰》各条下多有陶弘景注文,如卷十三陶注(即 P2732 第一条)云:

此服雾法,已别抄用,事在第三篇中,今犹疑存此,与本文相随也。

卷十三杜广平玄白术条陶注(即 P2732 第二条)云:

玄白事已重抄出在第三篇修用中。

卷九“清灵真人说宝神经”条有陶注(即 P2732 第四条)云:

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诸杂事,并甚有节度,悉以别撰在《登真隐诀》中,今不可备皆注释。

结合《真诰》陶注及 P2732 的体例可知,《登真隐诀》之第三部分乃专为注释《真诰》诸修真杂术者,其篇名疑为“真经修用”。

复按今《道藏》本《登真隐诀》卷中体例与卷子 P2732 全同,其中大字部分亦皆见于《真诰》,故也应属于《登真隐诀》第三篇。兹简列作表 3-5。

表 3-5 《道藏》本《登真隐诀》卷中与《真诰》正文对照表

《登真隐诀》卷中	《真诰》正文
(1)云林夫人曰:夜卧先急闭目东向……	(卷九)9/11a/6-9/12a/9①
(2)一面之上,常欲得两手摩拭之使热……	(卷九)9/3a/3-9/3a/9
(3)卧起,当平气,正坐随月王向方面……	(卷九)9/3b/1-9/3b/6
(4)卧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项中……	(卷九)9/3b/6-9/4a/1
(5)若体中不宁,当反舌塞喉漱津咽液……	(卷九)9/4a/3-9/4a/5
(6)耳欲得数按抑其左右亦令无数……	(卷九)9/4a/9-9/4b/2
(7)常能以手掩口鼻,临目微气……	(卷九)9/5a/6-9/5a/8
(8)常欲以手按目及鼻之两眦……	(卷九)9/5b/7-9/5b/9
(9)常欲闭目而卧,安身微气使如卧状……	(卷九)9/5a/9-9/5b/6
(10)坐常欲闭目内视,存见五藏肠胃……	(卷九)9/5a/4-9/5a/5
(11)临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	(卷九)9/13a/9-9/13b/2
洗澡时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愿……	(卷九)9/12b/6-9/12b/9
(12)理发欲向王地,既栉之始而微祝曰……	(卷九)9/9b/3-9/9b/9
(13)《真诰》云:栉头理发欲得多……	(卷九)9/9a/10-9/9b/1
(14)若履腌秽及诸不洁处,当洗浴……	(卷九)9/13b/10-9/14a/10
(15)服仙药常向本命服毕勿道死丧凶事……	(卷九)9/13b/6-9/13b/7
(16)君曰:常以夜半时去枕平卧……	(卷五)5/11a/6-5/11a/10
(17)君曰:式规之法使人目明……	(卷五)5/13a/7-5/13a/10
(18)君曰:欲为道,目想日月……	(卷五)5/13b/1-5/13b/3
(19)每当危险之路,鬼庙之间……	(卷十)10/8a/10-10/9a/10
(20)北帝杀鬼之法,先叩齿三十六下……	(卷十)10/10b/4-10/11a/4
(21)若冥夜、白日得祝,为恒祝也……	(卷十)10/11a/4-10/11b/4
(22)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其上下并有……	(卷十五)15/1a/4-15/2b/10
项梁城作酆宫颂曰……	(卷十五)15/4a/8-15/4b/5
(23)夜行常当啄齿,啄齿亦无正限数也……	(卷十五)15/10a/9-15/11a/8
(24)世有下土恶强之鬼,多作妇女……	(卷五)5/13b/5-5/14a/2
(25)明堂内经开心辟妄符王君撰用……	(卷九)9/17b/5-9/18a/1
(26)东华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卷九)9/19b/1-9/19b/4
(27)太虚真人南岳赤君内法曰……	(卷九)9/19a/1-9/19a/9
(28)东华宫有服日月芒法,已成真人……	(卷九)9/21b/9-9/22a/10
(29)西城王君曰: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	(卷九)9/22b/4-9/23a/1
(30)董初范监(某)云:所服三气之法……	(卷十)10/1a/8-10/1b/4 又见(卷十三)13/7a/2-13/7a/8
(31)含真台女真张微子所受东华玉妃……	(卷十)10/1b/6-10/2a/7
(32)杜广平所受介姨玄白之术……	(卷十三)13/14b/10-13/15b/9
(33)君曰:欲得延年,当洗面精心……	(卷五)5/13a/1-5/13a/3
(34)君曰:欲使心正,常当以日出三丈……	(卷五)5/10b/9-5/11a/1

在《真诰》陶注中称别见“第三篇”者尚有以下数条:

① 此表为节省篇幅,未详列《真诰》及《登真隐诀》的原文,兹借用[日]麦谷邦夫《真诰索引》的标注方法:9(第9卷)/11a(第11页右栏)/6(第6行)。

(1)此法亦以重抄书,在第三篇修有事中。(卷十三,范幼冲服三气法)

(2)又别云,曾为汉尚书郎,善解地理,以冢宅为意。此亦在第三篇。(卷十三,范监云云)

(3)洞宫官寮,司寮吴越非民,在任不过此四丞也。其下则有四师,事在第三篇中。(卷十三)

(4)此一遍咒论,六咏齿,毕,又咒,如此三过乃卧耳。此法已重抄在第三篇修事中耳。(卷十五)

(5)此四条并是可承用,事已别抄在第三篇中。(卷十五,山世远读《黄庭内景经》法)

(6)尸解之说复有多条,已抄记在第三篇中耳。(卷十六,尸解)

(7)梦冢墓祝,今在第三篇。(卷十八)

以上《真诰》注文中,(1)、(2)见上表(30)条,(4)见上表(22)条。至于(6)说尸解事,佚文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四引《登真隐诀》:

尸解者,当死之时,或刀兵水火痛楚之切,不异世人也。既死之后,其神方得迁逝,形不能去尔。

需加补充说明的是,《真诰》陶注中除十余条称“第三篇”外,尚有数条称“第三卷”,如卷一“清灵真人说《宝神经》云云”后陶注:“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复两载。”“紫微夫人喻书如

左云云”后陶注“事亦在第三卷”。此云“第三卷”，乃指《真诰》第三部分即“协昌期第三”，非《登真隐诀》第三篇也。^①

(四) 诸仙事迹

《真诰》陶注中有多处提到事见“第四卷”，即《真诰·稽神枢》，^② 惟有一条称“第四篇”，卷十七注：“所书东卿论季主事，本别书青纸，与此不相随，今在第四篇中”，若非出于笔误，则《登真隐诀》第四部分所记可能是诸仙事迹。^③

《太平御览》中此类引文甚多，简举数条：

昆仑瑶台，刊定真经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拟帝皇之尊；中品处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并大夫之流。

三昧真人乘风云龙车，下卫斋戒之士。太素真人辟始学者恶梦之法，金华真人刻大洞上经于天帝紫微宫玄琳殿东壁牖上，太虚真人说鸿鸟之经，太极真人诵王母之辞，典禁真人察人之善恶，妙行真人推劫运之数。

.....

有得见圣列纪者，玄篆书名，奏之上清，位为仙卿，若能行金阙真事，则拜为大夫。此谓列纪重于紫文也。既见之，非真受佩而已，谓知其中经目之轻重，求道之梯级，依此寻学，故胜于守紫文之单事也。（以上见卷六百六十）

三清九宫，并有僚属，例左胜于右，其高总称曰道君，次

① 凡《真诰》陶注称“在第三卷中”者，其内容皆能在《真诰·协昌期》（即《道藏》本《真诰》第九、第十卷）中找到，由此证明“第三卷”确指“协昌期第三”。

② 《真诰》陶注称“第四卷”者五处，即 1/ 5a/ 3、2/13b/ 2、2/15a/ 1、10/ 1b/ 4、10/ 2b/ 9。

③ 由于东卿论司马季主事确见于《真诰》第四篇稽神枢中（即《道藏》本《真诰》卷十四），故难于判断此处陶注之“第四篇”是否为“第四卷”之误。但从下文所举《太平御览》引《登真隐诀》佚文来看，《登真隐诀》中肯定有专篇收载诸仙事迹，至于“诸仙事迹”是否为《登真隐诀》的第四部分，证据确有未足。另一方面，如果从《登真隐诀》的撰写思路推测，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在“真经修用第三”论注《真诰》口诀之后，第四部分应为诸真传中修炼方法的注释，而“诸仙事迹”在第六部分。但两种可能的证据皆不十分充分，姑且存疑，以俟详考。

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诸小号官位甚多也。女真则称元君夫人，其名仙夫人之秩比仙公也。夫人亦随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所治处以为署号，并有左右。凡称太上者，皆一宫之所尊。又有太清右仙公、蓬莱左仙公、太极仙侯、真伯、仙监、仙郎、仙宾。（卷六百六十二）

董仲君，淮南人也，少时服气炼形，年百余岁不老，常见诬系狱，尸解仙去。

清平吉，沛人也，汉高祖时卒也。至光武时故不老，后尸解去。（以上见卷六百六十四）

太清正一真人张道陵，沛国人，本大儒，汉延光四年始学道，至汉末于鸟鹤山仙官来降，授以正一盟威之教，施化领民之法，号天师。即《真诰》云奉张道陵正一平气者是也。天师《灵宝五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并佳笔，别有传，已行于世。（卷六百七十一）

上清之境，九天之门，上皇太皇帝君玉尊集群仙于其中，以定天下万民之罪福。

西华堂在上清，王母所居。

文德宫，张叔隐处之。

八景城在上清，玉晨道君所居。

赤城，太元真人所居。

上清有杨寥殿，上皇太帝玉尊集群真于内。

希琳殿在上清东海八停山上，太帝君所居。

琅玕殿在上清，金阙圣君所居也。

……

上清境有希林台，太帝道君居之。（以上见卷六百七十四）

太玄上丹霞玉女戴紫巾，又戴紫华芙蓉巾及金精巾、飞巾、虎文巾、金巾。（卷六百七十五）

小有天王太素清虚真人登白空山，诣紫虚太真三元君，

受流金火铃，豁落符七元八景飞晨策玉玺。

太一有五玺金丹虎符。(以上见卷六百七十六)

太元真人乘白虎舆，有八色云辇。(卷六百七十七)

太极帝君宝章者东海青童君，授涓子以封掌名山。涓子剖鲤所获，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书素，佩之左肘，勿轻履汗秽，佩之八年而三一俱见矣。三一者，三元真一君也。授其封掌之教。

李翼字仲甫，以七变法传左慈，慈修之以变化万端。此经在茅真人传，后道士以还丹方殊秘，故略出别为一卷。(以上见卷六百七十八)

(五)仙传经诀

刘师培《读道藏记》“登真隐诀”条云：

此仅三卷，盖系残书。故唐宋诸道书所引，其为此三卷所无者，不下数百则。又本藏逊字号六列《上清明堂元真经诀》一卷，与此书体例悉同。(原注：此诀前半为茅传诀，后半为王传诀。茅传诀夹注有云，此诀《真诰》别授，则书出隐居明甚。)逊字号四列《上清三真旨要玉诀》一卷，亦与此书体例近，惟无夹注。疑均缺卷之别标书名者。^①

刘师培认为《上清明堂元真经诀》为《登真隐诀》遗篇，^②今从其体例分析，确如刘说，大字录经，小字为注，与《道藏》本《登真隐诀》甚合。又检《真诰》卷九“东卿司命曰：先师王君，昔见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经”条陶注云：“右此是说玄真经存之法，其大经

^① 刘师培：《读道藏记》，见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选辑：《道藏要籍选刊》，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19页。

^② 刘说《上清三真旨要玉诀》亦为《登真隐诀》遗篇，则恐非是。此诀虽摘抄《真诰》，但无注释，与《登真隐诀》体例不符。

在茅传中”，与《上清明堂元真经诀》首篇称“茅传诀”正合。

今《道藏》本《登真隐诀》卷上载“玄洲上卿苏君传诀”论真符、宝章及头中九宫，卷下“魏传诀凡五事”，即诵《黄庭经》法、入静、章符、请官，^①乃是分别注释《玄洲上卿苏君传》及《南岳魏夫人传》中之诀。此外《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一所引《登真隐诀》佚文，亦多有出于此部分者，文繁不具录。

又宋苏颂《本草图经》禹余粮、牡荆实条亦引有《登真隐诀》，^②禹余粮条云：

陶隐居《登真隐诀》载长生四镇丸云：太一禹余粮定六府，镇五藏。注云：按本草有太一禹余粮、禹余粮两种，治体犹同，而今世惟有禹余粮，不复识太一。此方所用，遂合其二名，莫辨何者的是。而后小镇直云：禹余粮，便当用之耳。余粮多出东阳山岸间，茅山甚有，好者状如牛黄，重重甲错，其佳处乃紫色，泯泯如面，啮之无复磳，虽然，用之宜细研，以水洮取汁澄之，勿令有沙土也。

按，禹余粮涉及四镇丸，出自《紫阳真人内传》，则此条必是《登真隐诀》注周传佚文。

牡荆实条云：

陶隐居《登真隐诀》云：荆木之华叶，通神见鬼精。注云：寻荆有三种，直云荆木，即是今可作拄杖者，叶香，亦有花、子，子不入药。方术则用牡荆，牡荆子入药。北方人略无识其木者。《六甲阴符》说，一名羊栳，一名空疏。理白而中虚，断植即生。今羊栳斫植亦生，而花实微细，药家所用者。天监三年，上将合神仙饭，奉敕论牡荆曰：荆，花白多

① 《登真隐诀》卷下小标题仅四条，而文末称“右魏传诀凡五事”，故疑末段“清虚王真人告夫人曰”为第五事，而标题缺漏。

② 分别见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三、卷十二。

子，子粗大，历历疏生，不过三两茎，多不能圆，或偏或异，或多似竹节，叶与余荆不殊。蜂多采牡荆，牡荆汁冷而甜。余荆被烧，则烟火气苦，牡荆体慢汁实，烟火不入其中。主治心风第一。于时即远近寻觅，遂不值，犹用荆叶，今之所有者云。

按，“荆木之华叶，通神见鬼精”句，出自王君注解之“太极真人青精乾石飣饭上仙灵方”，文见《云笈七籤》卷七十四。陶弘景在《登真隐诀》中注释此方的佚文亦见于《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一，其略云：

太极真人青精飣饭方。按《彭祖传》云：大宛有青精先生，能一日九食，亦能终岁不饥，即是此矣。真上仙之妙方，断谷之奇灵也。清虚真人说霍山中有学道者邓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饭吞日景之法，能夜中书。又仙人龙伯高受服青飣方，醉亡，隐处方台。又定禄君命告掾云，次服飣饭，兼谷勿违，益髓除患，肌肤充肥。又掾书告长史，觅米药来山，染作饭，恐草燥。又长史与大掾书，令饷小掾白米，是染作饭。凡此六事有书者也。太极真人青精十石飣饭上仙灵方，王君注解其后，大书者是太素本经及西梁口诀，墨注者是清虚王君所释，南岳魏夫人敷撰而使杨君书之，五真共成一法，足称灵妙矣。

牡荆条陶注还有一处值得注意，即提到了天监三年（504）梁武帝令合神仙饭之事，此尤可证明《登真隐诀》之最后完成时间实在梁代。

（六）修真仪轨

《云笈七籤》中引有《登真隐诀》数条：

《登真隐诀》云：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祇缘斯以达

信，非论斋洁、祈念、存思，必烧香。左右侍香金童，必为招真达意。

《登真隐诀》云：真人摄日晖以通照，役月精以朗幽，故然九光之微灯，晃八方之尽夜。（以上见卷三十七斋戒部）

《登真隐诀》曰：夫朝奏之时，先烈火丰香，使一举便到，了不宜绵绵翳翳。

《登真隐诀》曰：稽首者，先一拜额至地，乃再拜。

陶隐居曰：道虽心存，亦须形恭，口宣词列，进退足蹈，并使应机赴会，动静得宜，内以冲神，外以协礼。已上出《登真隐诀》。（以上见卷四十五秘要诀法·修真旨要）

以上杂述修真要领，疑单是一篇。

（七）杂记近事

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所引《登真隐诀》佚文，多有涉及陶弘景入梁以后行止，如云：

上馆以研虚守真，下馆以炼丹治药。

四年初营，自起火至限竟，用壅谷糠凡一千二百斛。药屋入夜复虑精物干触，必宜闭户，其烟气蓬勃可知矣。

壬辰年六月，便乘海还永嘉。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城，孤立海中，都无人居，甚可营合。

八月，至木溜，见其可居，始上岸起屋。十月，司徒慧明至。于时，愿得且停木溜，与慧明商榷，往复积日，永不敢

许，于是相随而还也。

甲午年，敕买故许长史宅宋长沙馆，仍使潘渊文与材官、师匠营起朱阳馆。

昔李明于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发掘基址，屡得破瓦器，乃其旧用。

宜都夷陵人。天监四年湘州刺史杨公则携下都，启闻，进见。权住蒋山，后敕给九转药具，令还山营合。

邓先生初去，颜色如故，后三日安舆中，停置积日，尸不毁坏。

以上诸事无关真经、仙传，应是《登真隐诀》最后一部分，其体例略如《真诰》之叙录也。

第四章 陶弘景书法丛考

陶弘景书法虽不足以比拟羲、献,亦堪独步当时。梁普通四年(523)尚书令袁昂奉敕品评古今善书者,有谓:“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庾肩吾《书品》云:“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均极称赏。

有关陶弘景书法成就及书迹流传的研究,清翁大年氏有《旧馆坛碑考》,卢仁龙氏作“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①,皆备极详赡,不容妄赞。本章主要讨论《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及《瘞鹤铭》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研究

保存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中的“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被认为是反映陶弘景书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并广为书法史研究者、道教史研究者所乐道。代表性言论如潘运告氏《汉魏六朝书画论》云:

对于陶弘景对书迹的鉴别,梁武帝给予充分地肯定,说他“区别诸书,良有精赏”。梁武帝将采集的钟王书迹装裱成册,要陶鉴别。如对第二十三卷,陶鉴别道:“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

① 卢仁龙:《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文献》1991(1),160-174页。

故颇有坏字。”对此卷中《臣涛言》一纸,他说:“此书乃不恶,而非右军父子,不识谁人迹,又似是摹。”对《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他说:“凡二篇,并是谢安卫军任靖书。”对《治廉沥狸骨方》一纸,他说:“是子敬书,亦是摹迹。”由此足见陶弘景的鉴别,确有独特精到之处。^①

道教研究专家王明亦说:

(陶弘景)不仅工于书法,而且善于鉴赏书法。弘景有与梁武帝论书启五首,具载《陶隐居集》和《法书要录》中。鉴别哪些是王羲之的真迹,哪些是后人摹仿王羲之的书法,哪些是王献之、张澄、谢安等书。并且认为王羲之学钟繇,“势巧形密,胜于自运”。“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他与梁武帝往返的信札里,表达了精于鉴赏书法的见解。^②

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细绎论书启,所蕴涵的信息量远不止此,详论如次。

一、论书启校理

论书启首载于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其后《书苑菁华》、《古今法书苑》、《墨池编》及各种版本的《陶隐居集》皆有收录,虽各本文字略有出入,每函的标题小有差异,但书启的顺序完全一样。^③ 启凡九首,其中陶弘景上梁武帝五函,梁武帝答书四通。在《法书要录》中,九通书简的标题依次为:

第一首(陶启一):陶隐居与梁武帝论书启“奉旨左右中

① 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90-191页。

② 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91页。

③ 惟元刘大彬《茅山志》卷一所载,以梁武帝旨在先,陶弘景启居后。

书……”

第二首(梁答一):梁武帝答书“近二卷欲少留……”

第三首(陶启二):陶隐居又启“乐毅论愚心……”

第四首(梁答二):梁武帝又答书“又省别书云……”

第五首(陶启三):陶隐居又启“二卷中有杂迹……”

第六首(梁答三):梁武帝又答书“省区别诸书……”

第七首(陶启四):陶隐居又启“启伏览书用前意……”

第八首(梁答四):梁武帝又答书“钟书乃有一卷……”

第九首(陶启五):陶隐居又启“逸少自吴兴以前……”^①

为方便讨论,将陶弘景上梁武帝启依次标记为陶启一、陶启二、陶启三、陶启四、陶启五,梁武帝答书标记为梁答一、梁答二、梁答三、梁答四。

日人大野修作氏已注意到九篇书启的次序,大野认为:九篇书启包括两次讨论,书启一至六主要谈论王羲之书迹的真伪,而书启七至九的中心则是关于笔法问题,两次讨论之间尚有一段时间间隔。^②

而事实上,九篇论书启的顺序,远比大野所说的复杂。如欲保持《法书要录》中书启第一至第九的次第,就书启的内容而论,颇多抵牾之处,举例如下。

陶启四云:

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觉劲密。

陶启一云:

^① 本篇所引论书启文字悉以范祥雍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之《法书要录》为底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部分异文若有校改,皆加注说明。

^② [日]大野修作:《法书要录》所收梁武帝·陶弘景往复书简的性格,《东方宗教》,2000年,第95号,1-22页。

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日觉劲媚，转不可说。

两段文字皆夸赞梁武帝书法精妙，陶启四谓已接圣旨三篇，而启一则说“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时间必在启四之后，其间，梁武帝尚有两旨。

陶启三云：

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

陶启二云：

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

启三欲观右军《劝进》、《洛神》等帖，因问尚存与否，而启二提到，近来想起《劝进》、《洛神》已不复存，则启三必在启二之前。

陶弘景有三启谈到《乐毅论》、《太师箴》的真伪，但自相矛盾，陶启一云：

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

陶启三云：

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其余五片，无的可称。

启一、启三认为《乐毅论》、《太师箴》尽管“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更成小拘束”，但均肯定其为真迹。而启二却说：

《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频涉有悟。箴咏吟赞，过为沦弱。

陶弘景对《乐毅论》真伪观点的改变，实缘于梁答一：

《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

因此，启二应是得到梁答一后所作，必居启三、启一之后。

可以推测造成九篇书简次第混乱的原因。作为往来书札，最初的保存者自然是受信人，而最终得以编纂成集，不外两种方式，其一，分别自茅山及大内征集，其二，源于内府所藏陶弘景来书及梁武帝诏诰副本，或得自茅山所藏诏书原件及陶弘景书信草稿。无论哪种来源，对受信者以外的人士而言，欲将往来书信一一对应，均非易事，更何况历数百年浩劫，至唐代张彦远编入《法书要录》时，书信已非完帙。今根据九篇书简提供的线索，试作疏理。

首先分析明确相关的信件。

陶启一、梁答一、陶启二应为一组。陶启一云：“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梁答一：“及欲更须细书如《论》、《箴》例，逸少迹无甚极细书。”显然是回答陶弘景的来书。梁答一又云：“《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陶启二则紧接着梁武帝的话题说：“《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频涉有悟。箴咏吟赞，过为沦弱。”

陶启三与梁答三为一组。陶启三主要谈对第二十三、二十四卷王羲之书迹的鉴别，有云：“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

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又云：“今谨上许先生书、任靖书如别。”梁答三首先对陶弘景的鉴定结论做出肯定，继云：“许、任二迹并摹者并付反。”

陶启四与梁答四为一组。陶启四提出请求：“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又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梁答四云：“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摹，微得钟体。逸少学钟的可知，近有二十许首，此外字细画短，多是钟法。今始欲令人帖装，未便得付来，月日有竟者，当遣送也。”

而陶启四的主题是针对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故其开篇即云：“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后字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文中“诸画虎之徒，当日就辍笔”云云，即套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句。“真迹虽少，可得而推”，则是该篇的原话。故知此前梁武帝必将所作《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写付。

至于陶启五，作为笺启，开篇即言右军末年书云云，体例有所未合，疑其前尚有脱文。^①但考其内容，似应与梁答四有关，而居其后。梁答四提到王羲之学钟繇之体的书迹若干首正在装池，暂不送上，陶启五因问：“不审前后诸卷一两条谨密者可得在出装之例，复蒙垂给至年末间不？”

与陶启五有关的还有梁答一，而居其后。梁答一云：“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

最难判断的是梁答二。梁答二开篇即云：“又省别疏云：故当宜微以著赏，此既胜事，风训非嫌云云”，“遂有独冠之言，览之背热”，按书信的体例，“故当宜微以著赏”云云、“独冠”云云，均

^① 陶启五之本文则肯定有脱漏，文中“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句，“阮研”后应缺供一句或数句。

应该是陶弘景来书中的原话,但陶启一至五中并未见类似语句,故梁武帝此函所答者应是陶弘景的另一封书信,而此信已佚。另一证据也表明确实存在这样一封信。在梁答二中梁武帝应陶弘景的请求,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笔法的观点,而陶启四首先对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表示赞同,接着说:“愚管见预闻,喜佩无屈。”管见云云,正是指这封已佚信件中的内容。由此可见,梁答二居陶启四之前。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现存的九封书信及《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串联起来,即:1、梁答二;2、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3、陶启四;4、梁答四;5、陶启五。以上五函基本连续。6、陶启三;7、梁答三;8、陶启一;9、梁答一;10、陶启二。以上五函完全连续。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将重新缀合的论书启附后,并略作疏。

二、论书启缀合

陶弘景上梁武帝启(佚)

按,此启当有称赏梁武帝书法及书法见解之语,故梁武帝答书有“览之背热”等谦词,并请梁武帝详述书法见解,即所谓“故当宜微以著赏,此既胜事,风训非嫌”。

梁武帝答书(梁答二)

又省别疏云:故当宜微以著赏,此既胜事,风训非嫌云云。然非所习,聊试略言。

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渐。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势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比并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廉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中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

相称，婉婉暖暖，视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众家可识，亦当复由串耳。六文可工，亦当复由习耳。一闻能持，一见能记，且古且今，不无其人。大抵为论，终归是习。程邈所以能变书体，为之旧也。张芝所以能善书，工学之积也。既旧且积，方可以肆其谈。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老而言之，亦复何谓。正足见嗤于当今，貽笑于后代。遂有独冠之言，览之背热，隐真于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艺之工，非吾所谓胜事。此道心之尘，非吾所谓无欲也。

按，此书即梁武帝应陶弘景启请所述之书法观。疑梁武帝随此函将所作《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抄附。

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闲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会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悞，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

余虽不习，偶见其理，不习而言，必慕之欤。聊复自记，以补其阙，非欲明解，强以示物也。傥有均思，思盈半矣。

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并非专为陶弘景而作，恐当时曾遍示群臣，如《法书要录》卷一所载萧子云启提到：“十余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达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不及逸少……”《法书要录》卷二袁昂古今书评云：“钟司徒书字十二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皆秉武帝《观钟繇

书法十二意》之旨。

陶弘景上梁武帝启(陶启四)

启,伏览书,^①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后字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一言以蔽,便书情顿极。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璫机神宝,旷世以来莫继。斯理既明,诸画虎之徒,当日就辍笔,反古归真,方弘盛世。

愚管见预闻,喜佩无届。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涅而无缁,不过数纸。今奉此论,自舞自蹈,未足遑泄日月。

愿以所摹,窃示洪远、思旷。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当赞仰踊跃,有盈半之益。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从子翊^②以学业往来,故因之有会。但既在阁,恐或以应闻知。摹者所采字大小不甚均调,熟看乃尚可,恐笔^③意大殊,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名偕老,益增美晚。

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觉劲密,窃恐既以盲发意,意则应言而新,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意得诸称。下情欢仰,宝奉愈至。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得摹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又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钟法,仰惟殊恩。

① 《法书要录》“书”后有“用”字,《道藏·陶隐居集》无此字,从《道藏》删。

② 《法书要录》原作“翊”,据《道藏·本起录》标题“从子翊字木羽撰”,知应作“翊”。

③ 《法书要录》原作“竟”,校勘记云:《书苑英华》作“笔”,似是。今《道藏·陶隐居集》亦作“笔”,因据改。

按,陶弘景云“前意虽止二六”,即指《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之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意,“后字不出二百”即该篇“字外之奇……学元常者如画龙也”,凡 193 字。陶启中提到“所奉三旨”,则梁武帝除梁答二外,应尚有两旨,今佚。在这封信的最后,陶弘景根据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所说:“真迹虽少,可得而推”,趁机提出请求,希望能够看到钟繇书法及王羲之学钟之作,至于王羲之自运之作,则不需看。陶弘景说:“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又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钟法,仰惟殊恩。”由此似乎暗示,在此之前,陶弘景并未从梁武帝处获观钟、王书作。

值得玩味的是启中“愿以所摹”一段,潘运告氏《汉魏六朝书画论》翻译为:“冒昧地用摹本私下示知洪远、思旷,此二人都是有相同的思想认识的,必将称赞敬仰踊跃,又增加一大片的益处。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侄子诩,因学业往来,时常因之而相会。只是既然在内阁,恐怕或许已经应该听说了。摹写者所装裱的字,大小不很均匀和协,久看才尚可,恐怕笔意大异。此篇宣传千载,所以应该使书迹随名同行,久而愈美。”^①恐不妥当。欲正确理解这段话,首先需明确“愿以所摹”中,所摹的内容是什么。所谓“摹”,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临摹》云:“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搨焉。”这样看来,如果所摹的只是一份古帖,固然可能由于工匠水平低而出现如陶弘景信中所说“笔意大殊”的情况,但决不会有“摹者所采字大小不甚均调,熟看乃尚可”的事情发生。“摹者所采字”云云,所谈的应该

① 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98页。

是“集摹”，即选集诸帖中合用之字摹为了一本。检《法书要录·卷三》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法书记》之说小有错误，据《梁书·周兴嗣传》云：“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据本传，周兴嗣以普通二年卒，故次韵王羲之千字文事必在普通二年以前。由此可以推断，梁武帝以殷铁石集摹的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示陶弘景，陶则有以上答复。此段可意译作：“私意认为可将（殷铁石）集摹的（王羲之千字文）拿给洪远、思旷看，他俩见解高深，必当赞叹，可收到事半功倍之益。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侄子陶靖在学业上与之有所往还，故（我）知道他（的情况）。不过，此二人既然在内阁，或许已经听说了（摹千字文之事）。（我认为）摹写者所采选的（王羲之）字，大小不很均匀和谐，久看也勉强可以，不过笔意大异（原本）。因考虑到此篇必将会流传千载，所以应该（力争）使书迹与名声同传久远，久而愈美。”^①

还需明确的是，本段提到的摹本，其摹书人肯定不是陶弘景自己，览后文云：以摹本示洪远、思旷，此二人“必当赞仰踊跃”，若摹本系陶弘景所为，语气与五篇陶启谦卑的态度迥异。故将此摹本确定为梁武帝令殷铁石集摹的王羲之千字文，应无问题。

梁武帝答书（梁答四）

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摹，微得钟体。逸少学钟的可知，近有二十许首，此外字细画短，多是钟法。今始欲令人帖装，未便得付来，月日有竟者，当遣送也。

^① 末句“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名偕老，益增美晚”，语意甚含蓄，委婉地指出：集摹千字文这一美事（即名），必然流传千古，而所集摹的文本（即迹），若也想流传千古的话，恐怕前面说的字迹大小不匀，笔意丧失等问题还需要纠正。

按，梁武帝此信正是对前函索观钟、王书迹的答复。梁武帝说钟书已无真迹，不看也可，王学钟书正付装池，待完成后送上。

陶弘景上梁武帝启(陶启五)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事。不审前后诸卷一两条谨密者可得在出装之例，复蒙垂给至年末间不？此泽自天，直以启审，非敢必觐。

按，本函首段恐佚。陶弘景说王羲之末年书作全系代笔，王献之全学此代笔者。据陶弘景所说，这一观点实由梁武帝首倡，即信中“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句。因“末年书”的问题不见于梁答，推测梁答四尚有缺佚。

因前函梁武帝提到王羲之字正付装池，暂不奉上，陶弘景遂接着请求：“不审前后诸卷一两条谨密者可得在出装之例，复蒙垂给至年末间不？此泽自天，直以启审，非敢必觐。”其中“年末”二字疑倒乙，应为“末年”，指王羲之“末年书”。信中提到的“出装书”，据陶启二解释：“帖注出装者，皆拟贲诸王及朝士。”由此看来，陶弘景是想趁梁武帝重装王羲之法书的机会，委婉地请问有没有可能将上方不入法眼的字迹，即“出装书”，譬如按皇帝您认为出于代笔人之手的右军“末年书”等赐下。

陶弘景上梁武帝启(陶启三)

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

毕。余条并非用意，^①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书体式，追以单郭为恨。伏按卷上第数甚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书似是宋元嘉中撰集，当繇自后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

第二十三卷。（今见有十二条在别纸。）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其余五片，无的可称。《臣涛言》一纸、（此书乃不恶，而非右军父子，不识谁人迹，又似是摹。）《给事黄门》一纸、《治麻沥》一纸、（凡二篇，并是谢安、卫军参军任靖书。）后又《治麻沥狸骨方》一纸、（是子敬书，亦是摹迹。）右四条，非右军书。

二十四卷。（今见有二十一条在）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一条，并非甚合迹，兼多漫抹，于事处难复委屈。前《黄初三年》一纸、（是后人学右军。）《缪袭告墓文》一纸、（是许先生书。）《抱忧怀痛》一纸、（是张澄书。）《五月十一日》一纸、（是摹王珣书，被油。）《尚想黄绮》一纸、《遂结滞》一纸、（凡二篇，并后人所学，甚拙恶。）《不复展》一纸、（是子敬书。）《便复改月》一纸、（是张翼书。）《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纸、（亦是王珣书。）《治咳方》一纸、（是谢安书。）右一十^②条非右军书。伏恐未垂许以区别，今谨上许先生书、任靖书如别，比方即可知。王珣、张澄、谢安、张翼书，公家应有。

按，此函系陶弘景收到梁武帝送来两卷（第二十三、二十四）法书后，所写的鉴定结论。梁武帝送书之时是否有诏，不详。很可能没有诏书，因陶弘景本次答书未提及此事，^③且此函与其

① 《法书要录》无“意”字，校勘记云：《墨池编》有此。因据补。

② “一十”二字，人美校本《法书要录》改作“十一”，校勘记云：“原本（指毛晋《津逮秘书》本）作一十，按上文云十一条，列目亦是十一条，显是倒误，从王本及《书苑（英华）》改正。”按据本文，此卷共二十一条，其中十一条为右军书，余十条则非，所列“《黄初三年》”等皆是他人所书，其数正十条，故云“右一十条非右军书”，因知毛本实不误，校本妄改。

③ 当然也不排除本函有缺佚的可能。

后的梁答三、陶启一连续，而陶启一云：“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是知自陶启四收到三篇圣旨后，又得两旨，即梁答四、梁答一，其间不应再有他旨。

陶弘景的上启提到自己亦摹有王羲之法书，即陶启五云：“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事。”当时未上呈，本次写信时虽尚未完成，仍然呈上，即本函所云：“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

梁武帝答书(梁答三)

省区别诸书，良有精赏。所异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尔。《给事黄门》二纸为任靖书，观所送靖书诸字相附近。彼二纸，靖书体解离，便当非靖书，要复当以点画波撇论，极诸家之致，此亦非可仓卒运于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许、任二迹并摹者并付反。右三纸正书二十六日至。嗣公。

按，此函系梁武帝对陶弘景所出鉴定结论的答复。后人得出梁武帝请陶弘景鉴定法书真伪，及认为陶弘景“良有精赏”，主要依据陶启三与梁答三，有关此问题的讨论详下文。

陶弘景上梁武帝启(陶启一)

奉旨，左右中书复稍有能者，惟用喜赞。夫以含心之菱，实俟夹钟吐气。今既自上体妙，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钟、王，论于天下，进艺方兴。所恨微臣沉朽，不能钻仰高深，自怀叹慕。

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日觉劲媚，转不可说。以讎昔岁，不复相类。正此即为楷式，何复多寻钟、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弥增爱服，俯仰悦豫，不能自己。启。

适复蒙给二卷，伏览裸帖，皆如圣旨。既不显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毕，不赴今信。纸卷先已经有，兼多

他杂，无所复取，亦请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冥^① 题中精要而已。

按，本函提到“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神笔云云，应指梁武帝手诏，而非右军书迹，由下文“以讎昔岁，不复相类。正此即为楷式，何复多寻钟、王”即可判定。则知本函所称“神笔三纸”，即陶启四之“所奉三旨”。

函中“适复蒙给二卷”，此二卷应非陶启三所鉴定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十三、二十四卷既已鉴定，当随前书奉还内府，此言“复蒙给”，再次给予也。其后之陶启五云：“前后都已蒙见大小五卷”，二十三、二十四为两卷，加上本次的二卷，及别赐纸卷一份，正符“大小五卷”之数。对梁武帝新给的两卷，陶弘景未作鉴定，只是含混地说：“伏览裸帖，皆如圣旨”，而不愿深谈。

在此函中陶弘景专门提到前次所赐的纸卷，^②尽管陶弘景字面的意思是说，纸卷内容并不佳，待下次奉还。联系其后梁答一、陶启一可知，陶弘景的真实思想是，纸卷是出装书，按例可以赐给臣下，因梁武帝数旨均未明确此事，故用此语做试探。

此外陶弘景还表示希望能继续看到如《乐毅论》、《太师箴》之类的小字，以仿写经卷。这表明直到此时，陶弘景仍然认为论、箴为右军真迹。

梁武帝答书(梁答一)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为异。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无正可取，备于此。及欲更须细书如《论》、《箴》例，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

① 《法书要录》作“冥”，校勘记云：王本作“冥”，《墨池编》作“宣”，《书苑菁华》作“具”。今按《道藏》本作“冥”，《真诰》亦屡称“冥中之事”云云，故作“冥”是。

② 纸卷非本次所赐，故陶弘景云：“纸卷先已经有。”

按，此书紧接前函。梁武帝同意陶弘景将新赐二卷再保留一段时间，并明确回答纸卷确是赐给陶弘景者。但梁武帝并不同意陶弘景认为论、箴为右军真迹的观点，梁武帝说：“《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最可注意的是本函末句：“上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至鉴”云云应该是一句反语，至于以“其外便无可付也”作为结束语，更是托词，据《法书要录》卷四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称，梁天监中，内府有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而陶弘景得见仅五卷，尚不足百分之一，梁武帝的意思显然是不愿再谈了。

陶弘景上梁武帝启(陶启二)

《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频涉有悟。箴咏吟赞，过为沦弱。许静素段，遂蒙永给，仰铭矜奖，益无喻心。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兼复两玩。先于都下偶得飞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尝别见，无以能辨，惟觉势力惊绝，谨以上呈。于臣非用，脱可充阁，愿仍以奉上。

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澄又云：帖注出装者，皆拟赛诸王及朝士。臣近见三卷，首帖亦谓久已分，本不敢议此，正复希于三卷中一两条更得预出装之例耳。天旨遂复顿给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见卷题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赐书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惊讶无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

前后都已蒙见大小五卷，于野拙之分，实已过幸，若非殊恩，岂可缺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无书可看，乃愿作主书令史，晚爱隶法，又羡慕掌之人。常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

流天壤，区区惟充恣五欲，实可耻愧。每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至今犹然。始欲翻然之。自无射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复以闲虚尘触，谨于此题事，故遂成烦黷，伏愿圣慈照录诚慊。

陶弘景确实很识时务，这封信首先接受梁武帝对论、箴的意见，但又说“《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则不免有强词夺理之嫌。在谢过梁武帝赐出装书“许静素段”后，陶弘景将己藏右军飞白书一卷进呈。

引马澄云云一段，中心思想其实是为了对陶启五、陶启一两次索要“出装书”之事作表白，辩称：“（索要出装书的目的只是）正复希于三卷中一两条更得预出装之例耳。”至于本段“今者赐书卷第遂至二百七十”句，是指卷帙编号为二百七十，并非陶弘景获观二百余卷。“近初见卷题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云云，则更加明确梁武帝首付给两卷为第二十三、二十四卷，第二次付给者为第二百七十及其他一卷。

末段再次感谢梁武帝的殊恩，结句“自无射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复以闲虚尘触，谨于此题事，故遂成烦黷，伏愿圣慈照录诚慊”。正是对梁武帝来书“其外便无可付也”的回应，表示不敢再为书法事麻烦启请了。因此，本篇确是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的最后一函。

三、论书启的时间及相关问题

九通论书启均未注明时间，但结合相关资料仍可做出推断。如前所论，陶启四系针对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而作。据《法书要录》卷二梁袁昂普通四年（523）奉敕所作《古今书评》云：“钟司徒书字十二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已提到梁武帝的十二意，证明《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成于普通四年以前。

又《法书要录》卷一梁萧子云启云：

(臣)二十六^① 著《晋史》一部，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止论飞白一势而已。十余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达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来，自觉功进。此秉自天论。

据《梁书·萧子云传》，萧生齐永明四年(486)，二十六岁作《晋史》，即梁天监十年(511)，此后十余年来约当天监十一年(512)至普通七年(526)。

在分析陶启四时，我们提到“愿以所摹”一段是指梁武帝令殷铁石摹王右军千字一事，若所论不误，还可进一步讨论集摹千字文的时间。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引《尚书故实》云：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

又据《梁书》，周兴嗣卒于普通二年(521)，而从陶启四来看，当时集字工作尚未完成，则进一步证实书启作于普通二年以前。最能反映论书启时间的是陶启二，其末句云：

自无射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复以闲虚尘触，谨于此题事，故遂成烦黜，伏愿圣慈照录诚慊。

按，“无射”本指音律，亦可指九月，如沈约《宋书·律历志》云：

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

① 《法书要录》原作“三十六”，《梁书》、《南史》本传皆作“二十六”，因据改。

检《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一年至普通二年各年中之九月均未见有重大事件发生，复于《魏书·肃宗纪》熙平元年（即梁天监十五年，516）条得一事：

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余口，皆漂入海。

淮堰即梁武帝天监十三年所筑之浮山堰，堰溃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

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

由此看来，陶启二所说“自无射（九月）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正指浮山堰溃之事，从而证明论书启必作于天监十五年。

关于论书启的年代，还可提供一项旁证。梁答四说“今始欲令人帖装”，表明当时正在装裱、整理王羲之法书。据《法书要录》卷四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

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以旧装坚强，字有损坏，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等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璽。

按，鉴定装池之事虽开始于天监中，以卷帙如此之浩繁，或天监十五年工作尚在进行中。

综上，论书启所见各种时间线索并无矛盾，故其年代确应为天监十五年。

论书启因有多处谈论王羲之法书的真伪，故后人多据此认为是梁武帝请陶弘景鉴别右军书迹，如宋姜夔《绛帖平》卷四云：

梁武帝藏钟、张、二王书至多，尝使虞龢、陶隐居辈订证。^①

事实并非如此，天监年间为梁武帝鉴定法书者已见前引张怀瓘《二王等书录》，类似记载亦见于《法书要录》卷四唐韦述叙书录：“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均未提到陶弘景之名。且陶弘景在信中自承：“前后都已蒙见大小五卷”，于内府所藏七百余卷之数，百分不及一，云何鉴定。

不仅如此，陶弘景给出的鉴定结论，基本不被梁武帝采信。如陶启三认为第二十三卷之《给事黄门》、《治廉沥》二帖是谢安、卫军参军任靖书，第二十四卷之《缪袭告墓文》是许先生（许近）书，并说：

伏恐未垂许以区别，今谨上许先生书、任靖书如别，比方即可知。

而梁武帝对比所附任、许书法后，却说：

省区别诸书，良有精赏。所异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尔。《给事黄门》二纸为任靖书，观所送靖书诸字相附近。彼二纸，靖书体解离，便当非靖书，要复当以点画波撇论，极诸家之致，此亦非可仓卒运于毫楮，且保拙守中也。

其首句“区别诸书，良有精赏”，乃是客气话，然后笔锋一转，

^① 按，姜夔此说实据《法书要录》卷二所载“梁虞龢论书表”及“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附会，虞龢论书表作于刘宋时，《法书要录》校勘记已作辩证。

“所异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尔”。意谓有关异同的比较实大可不必。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你通过比较所送任靖帖,认为《给事黄门》帖是任靖所书。^①但我觉得任靖的书体较支离,《给事黄门》二纸未必是任靖所书。再从(《给事黄门》帖)的点画波撇来看,更极诸家之致,如这样的拙厚沉稳,绝非仓促运笔所能办到的。

至于陶弘景鉴定为真迹的《乐毅论》,梁武帝则坚持认为“微粗健,恐非真迹”,以至陶弘景最后不得不违心地说:“《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乐毅论》究竟是真是伪,其原迹已缈,固然无法判断,但奇怪的是,除梁武帝有“恐非真迹”之论外,包括梁代的书法家、鉴定家在内,都认为此论是王右军最上第一的珍品。^②如《法书要录》卷二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云:

《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陶隐居云:《大雅吟》、《乐毅论》、《太师箴》等,笔力鲜媚,纸墨精新。斯言得之矣。

《法书要录》卷三唐褚河南搨本乐毅论记云:

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

最可注意的是智永“(《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子云)、阮(研)之流,莫不临学”一句,如梁武帝果真以《乐毅论》

① 梁武帝原句“《给事黄门》二纸为任靖书,观所送靖书诸字相附近”。应是转述陶弘景的鉴定意见,“彼二纸”以后方是梁武帝的看法。此句系倒装,即“(你认为)观所送靖书诸字相附近,(故知)《给事黄门》二纸为任靖书。”

② 今存《乐毅论》石刻本,卷末有“异、僧权”押署,即朱异、徐僧权,皆为梁武帝鉴定法书者,若此押署非伪,由此证明梁代鉴定家确认为此论系真迹,那么,梁武帝在论书启中所说“(《乐毅论》)微粗健,恐非真迹”,则完全是敷衍陶弘景。

为伪作，则不会有“梁世模出，天下珍之”之事，且萧、阮皆是武帝近臣，自能体会圣怀，二人亦不会临学。由此看来，梁答二中“恐非真迹”云云，或系敷衍之词，目的是拒绝陶弘景进一步索看右军书迹。再将梁答二数句连读：“《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已经至鉴”四字，语含讥讽。

另一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论书启中陶弘景、梁武帝二人的语气。五篇陶启，自始至终可谓小心翼翼，且不乏违心之论。先看陶弘景对梁武帝书法的评价：

伏循字迹，大觉劲密，窃恐既以言发意，意则应言而新，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意得谐称。下情欢仰，宝奉愈至。

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日觉劲媚，转不可说。以讎昔岁，不复相类。正此即为楷式，何复多寻钟、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弥增爱服，俯仰悦豫，不能自己。

其实，梁武帝的书法远非如陶弘景所说的那样精妙，据梁武帝自承“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故唐李嗣真《后书品》以陶弘景为“中中品”，而列梁武帝为“下下品”。唐张怀瓘《书估》以陶弘景为第五等，谓“可敌右军草书四分之一”，梁武帝则不与焉。张怀瓘《书断》卷下评梁武帝书法：“好草书，状貌亦古，乏于筋骨，既无奇姿异态，有减于齐高矣。”应是持平之论。

再看对钟、王的评价，梁武帝尊钟贬王，尤贱小王，《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有云：

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

陶弘景秉承此旨，也说：

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后字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一言以蔽，便书情顿极。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璿机神宝，旷世以来莫继。斯理既明，诸画虎之徒，当日就辄笔，反古归真，方弘盛世。……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溷而无缙，不过数纸。

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逸少）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钟法，仰惟殊思。

关于右军“末年书”的问题，梁武帝谓系代笔人所为，并认为王献之的笔法得自此人，并非右军真传。按，此论与前人对“末年书”的评价迥异，如刘宋虞龢《论书表》云：

二王末年皆胜于少……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道美之时。

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殆其末年，乃造其极。

陶弘景依然附和梁武帝之论：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

在涉及王羲之具体书法的评价时,陶弘景更加小心。论第二十三、二十四卷右军书迹真伪,陶在肯定真迹的同时,总不忘缀以一些贬词,如谓《乐毅论》“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更成小拘束”,而其余五片,“无的可称”。二十四卷中的十一条真迹“并非甚合迹,兼多漫抹”。

故当梁武帝对二十三、二十四卷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以后,陶弘景对后给二卷十分明智地采取敷衍态度:“伏览褫帖,皆如圣旨”,而不加详论,其借口是“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

陶启中的许多言论都预留余地,如建议将摹本送与洪远、思旷观看,为避嫌疑,陶弘景声称:“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从子翊以学业往来,故因之有会。”陶启五的主题本是向梁武帝索要“出装书”,却先引梁武帝关于右军“末年书”非真迹的意见,继插入“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一句,暗示“末年书”是真是伪“不复可别”,其后又在陶启二中引马澄的话作解释,表示并非故意索要。将所藏右军飞白书上呈,则预先声明:“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尝别见,无以能辨,惟觉势力惊绝,谨以上呈”,表示对此书真伪不负责任。

与陶弘景书启始终谦谨不同,四封梁答的态度则越来越倨傲。梁答二、梁答四甚谦虚,至梁答三,虽不以陶弘景的结论为然,但用词仍委婉,看得出对陶弘景的尊重,而至最末一札即梁答一,忽然用很不耐烦的语气说:“上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是什么事情触犯了梁武帝呢?检五通陶启,最有可能的是陶启一的末句:

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冥题中精要而已。

陶弘景拟借观右军真迹来摹写道经,这正是梁武帝所不能容忍的。梁武帝早年信道,至天监三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梁武帝

则舍道入佛,并于佛前自誓忏悔,有诏云:

弟子比经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翳,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十一日诏更明确以老教为邪,佛教为正,诏云:

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

至天监后期,梁武帝对佛教的信仰尤笃,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令道士皆反俗,事见《佛祖统记》卷三十七。天监十八年又幸等觉殿,从释慧约受菩萨戒,见《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大通以后梁武帝更屡次幸同泰寺舍身。

由此看来陶弘景的请求确属自讨无趣。

最后需要说明者有二:首先,本篇绝无意否定陶弘景的鉴定水平,这可由《真诰》中陶弘景对杨羲、许谧、许玉斧手书的精鉴为证明,但也应该看到,五通陶启并非陶弘景鉴定水平的真实反映。至于在书法理论方面,陶弘景附和梁武帝尊钟卑王之论,究竟是陶弘景的真实思想,还是违心之论,仅由九篇论书启而论,证据实有未足,下节将作专题讨论。

其次,本篇也无意贬低陶弘景的人品,尽管在论书启中陶弘景对梁武帝不乏阿谀之辞,但正如本书第一章“陶弘景与梁武帝”一节,在分析陶弘景礼塔受戒原因时所论,陶弘景的这些举动都是在当时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者。

第二节 再论陶弘景尊钟卑王之论

上节在分析陶弘景的书法理论时,提到陶弘景尊钟卑王之

论,究竟是其真实思想,还是附和梁武帝的违心之论,尚需进一步研究,本篇乃结合陶弘景、梁武帝的宗教背景详加讨论。

一、陶弘景的书法渊源

据《本起录》记载,陶弘景的祖父即工书法,其父尤有书名,《本起录》云:

父讳贞宝,字国重,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辟为侍郎,迁南台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闲骑射,善兼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书体以羊欣、萧思话法。

宜分析羊欣、萧思话的书法背景。羊欣书法得自王献之真传,南齐王僧虔论书云:

羊欣、丘道护,并亲授于子敬。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正乃不称。^①

虞稣《论书表》云:

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②

庾肩悟《书品》云:

羊欣早随子敬,最得王体。^③

至于羊欣本人对王羲之的评价,更是推崇备至,据《法书要录》卷一齐王僧虔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羊欣称王羲之书法:“古今莫二。”

①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

②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③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萧思话出于羊欣,王僧虔论书云:

萧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

《本起录》谓陶贞宝书用羊欣、萧思话之法,其属二王一派无疑。陶弘景学书启蒙甚早,《本起录》云:

先生四、五岁便好书,今犹有六岁时书,已方幅成就。

《南史》本传亦云:

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

陶弘景书法的启蒙老师自然是陶贞宝,因此我们十分同意卢仁龙氏在“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①中所下的结论:“陶弘景早年书学渊源所自,归美二王,自非大过。”

陶弘景少慕道法,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陶弘景)自云年十二时,于渠阁法书中见郝愔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欣然有志。

据《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云:

郝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为晋镇军将军,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书,与右军相埒,手自写道经将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

陶弘景于永明二年(484),从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②其后有感于孙游岳所授符图经法摹写失真,为编著

① 卢仁龙:《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文献》1991(1),161页。

② 《本起录》云:“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

《真诰》，乃竭毕生之力访求杨羲、许謐、许翔真人手书真迹。陶搜求三真手书，固然是出于宗教目的，但杨、许书法确有特点，据《真诰叙录》云：

又按三真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邈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许翔）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于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迥非人功所逮。长史（许謐）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

由此看来，杨许之书乃效法郗愔，兼参二王。郗愔乃是王羲之妻弟，《晋书·郗愔传》云：

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

因此，陶弘景成年以后的书法必仍以二王为正宗，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七中对陶弘景书法的评价，应是写实之论：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

陶弘景不仅自己习王书，乃以右军书法教弟子，元张雨《玄品录》卷四云：

孙文韬，一名韬，字文藏，会稽剡县人。入茅山师隐居，参受真法。及见杨、许三真手书上经，稍学模写，遂大巧妙，后学大王书，殊有深分，当时称之。

再从宗教信仰上分析，二王皆是虔诚的道教信徒，据《晋书·

王羲之传》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羲之与道士许迈交谊甚深，《晋书·王羲之传》云：

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极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按，许迈即茅山许谧之兄，先谧而卒，王羲之曾为作《许先生传》。^①在《宝晋斋法帖》中有王羲之的书官奴帖一通尤堪注意，其略云：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痢，至今转笃。又苦头痛，头痛以溃，尚不足忧。痢病少有差者，忧之焦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惟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以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

《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对此帖考证甚确，有云：

此帖不是一封书简，很像是道家的“上章”。上章乃消灾度厄之法。所书如章表之仪内容无非是陈述自己的过失，奏上天曹，请为除厄。王氏是奉道世家，故有此举。王献之遇疾亦如此，《晋书》卷八零载：“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上章一般由他人书写，王献之遇疾，是家人为上章，玉润病笃，是其祖父王羲之为之上章，亦属家人。”^②

① 王羲之曾为许迈作《许先生传》，如《晋书·许迈传》云：“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本起录》亦云：“有似王右军作许先生传。”

②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荣宝斋，1991年，408页。

此外,《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① 还提到王羲之与天师道宗师杜子恭的交往:

王羲之有病,请杜灵。灵谓弟子曰:王右军病不差,何用吾为。十余日而卒。

王献之不仅信道,更曾手画符篆,宋米芾《画史》云:

李公麟云:海州刘先生收王献之画符及神一卷,咒小字,五斗米道也。

综上理由,陶弘景不仅书宗二王,即使从宗教感情出发,也理应更倾向于二王,若非特殊的原因,决不会有意诋毁。

二、梁武帝尊钟臯王之论的背景

梁武帝的臯王之论,除见于《论书启》及《观钟繇书法十意》外,在《书苑菁华》卷三所载梁武帝草书状中亦有表达:

其(指草书)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

按梁武帝编排的顺序,二王草书远居杜度、张芝、卫觊、索靖及范口^②之亚。不仅如此,在赏评臣下书法时,也以钟繇为极则,而罕以右军父子作比拟,如《梁书·萧子云传》载梁武帝称子云书法:

① 此条亦见《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御览》误题为《太平经》。

② 按,此“范”不考是何人,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217页释为范怀约,恐误。

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

梁世臣工自然体会上意,论书纷纷将二王抑置于张、钟之次。袁昂普通四年(523)奉敕作《古今书评》云:

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钟司徒^① 书字十二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

臣意谓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②

庾肩吾《书品》上上之品三人,依次为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则为上中,居崔瑗、杜度、师宜官、张昶之后。论曰: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萧子云论书亦云:

① 按,“钟司徒”为钟繇子钟会,钟繇当称“钟太傅”。然此处之“钟司徒”疑系“钟太傅”之讹,因《古今书评》罗列王右军至李斯二十五人,并无钟繇,其后复云:“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又云:“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书。”张芝及二王皆在二十五人之中,独钟繇见遗,于理不合。

② 很难理解袁昂将钟繇与萧思话、薄绍之并列,并将三人书法推崇至高无上地位的真实意图,至少后人无法接受袁昂的评价,故《书苑菁华》所载托名梁武帝着之《古今书人优劣评》,将有关萧思话的评语移在王羲之名下,云:“王羲之之书字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为训。”

十余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达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来，自觉功进。此秉自天论。臣先来犹恨已无临池之勤，又不参圣旨之奥，仰延明诏，伏增悚息。

而事实上，梁武帝可能根本没有见过钟繇真迹。据虞龢《论书表》称：

大凡秘府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

这是刘宋时内府收藏钟书的情况，迭经宋齐变迁，钟繇真迹已无只字得存，故当陶弘景请问“今论旨云，（钟繇）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时，梁武帝不得不承认：

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摹，微得钟体。

言下之意其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所谓“（钟繇）真迹虽少，可得而推”云云，不过是想当然耳。

那么，梁武帝如此之推美钟繇，确很难说是出于书法的原因，褒钟其实是为了贬王，结合前述王羲之家族的道教背景，不难看出，贬王的真正动机是排道。这样一来，梁武帝将自己精心策划的尊钟卑王之论拿给茅山宗师陶弘景看，就大有深意了，这也是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时如此谨慎的原因所在。

三、再论陶弘景对钟、王的评价

就论书启的内容来看，陶弘景至少在表面上是赞同梁武帝尊钟卑王之论的，对此前节已有讨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陶启五有关右军“末年书”的说法，这不仅关系书法史上的一段公

案，其实也含蓄地反映了陶弘景对钟、王的评价，不妨再引原文：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事。不审前后诸卷一两条谨密者可得在出装之例，复蒙垂给至年末间不？此泽自天，直以启审，非敢必覲。

陶弘景在此启中将王羲之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陶对早期的时间概念十分含混，仅云“自吴兴以前”，据郭康夫《王羲之评传·王羲之、王献之年表》将右军官吴兴系于咸康三年，^①今用其说，王羲之时年三十五岁。^②陶弘景对王羲之此期书法的评价十分明确：“犹为未称。”

王羲之早期书法“犹为未称”，并非陶弘景的创见，虞稣《论书表》已提到：

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

细绎“犹为未称”之说，与梁武帝的观点并不一致，《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云：

① 考证参见郭康夫：《王羲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53页。

② 王羲之生卒颇有争议，此据陶弘景《真诰》卷十六注称“升平五年（361）亡，年五十九岁”推算。

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

按《法书要录》卷一所附“传授笔法人名”云：“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则梁武帝说“逸少学钟的可知”（梁答四），应是实情。但从书家的成长历程分析，焉有早年“自运”，中年以后转又“摹仿”之理。由此看来，陶弘景说王羲之早期书法“犹为未称”，其实是对梁武帝“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之论的委婉否定。

中期以右军出守会稽为标志，据《晋书·王羲之传》：“（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羲之代述”，则时间当在永和七年（351），右军四十九岁。陶弘景认为此期书法皆是“好迹”。那么，右军在永和十一年（355）告誓以前的书法，究竟是自运，还是学钟呢？《法书要录》卷一“南齐王僧虔论书”云：

亡曾祖领军（王）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

按，王洽是王导第三子，羲之从弟，据《晋书·王洽传》称：“升平二年（358）卒于官，年三十六。”^①王僧虔所引王洽与右军书事应在洽末年，即永和末，王洽所说虽是自己变体不法钟、张，但既然为右军首肯，则右军当时必亦不法钟、张矣。同样的道理，陶弘景说王羲之此期书法皆是“好迹”，也是对梁武帝“及其独运，意疏字缓”之论的否定。

晚期以“失郡告灵不仕”为标志，按陶弘景的说法，此期王羲之“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因羲之末年代笔一事不见前代记载，故颇令人怀疑。杨臣伟氏在分析了王羲之辞官的原因及晚年的身体状况后，认为

①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中兴书》则云：“年二十六而卒。”

末年代笔之事系陶弘景捏造。^① 我们基本赞同杨的观点,但在讨论陶弘景编造此故事的原因时,杨说:

梁武帝对王羲之的法书推崇备至,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古今书人优劣评》)……梁武帝对羲之的评价可谓高矣。但是,梁武帝在“今不如古”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他曾说:“子敬之不迨逸少,尤逸少之不迨元常。”羲之作品的“意疏字缓”毕竟是背离钟繇之法(古法)的;而古法又是万万不可背离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同“意疏字缓”,背离古法,这两者势难统一。梁武帝深深陷于两难之中了。善于揣摩皇帝心理的陶弘景赶紧出来救驾,虚构一个“代笔人”替羲之承担“缓异”的责任。变着法儿替皇帝收回“及其独运,意疏字缓”的结论。抽掉了羲之“背离古法”的实证,“背离古法”的过失也就难以成立了。剩下一句空洞的“逸少不迨元常”,不可能对“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崇高评价构成威胁。两难也就变成了两全,既不违背“今不如古”的信条,又把羲之及其作品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陶弘景把“发现”代笔人的功绩归于皇帝,煞有介事地说:“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梁武帝体面地摆脱了困境,又捞得一项“发现权”,也就不出来揭露陶弘景的假话了。

我们不能接受杨的解释。首先,杨所引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实后人据袁昂《古今书评》伪托,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五《袁昂古今书评》前有按语云:

按此两书评,小有多寡异同。或以为武帝,或以为袁

① 杨臣伟:王羲之末年“皆使此一人(代笔)”质疑,《书法研究》,1991(1),110—113页。

昂。疑作袁昂者得之。《梁书·萧子云传》载武帝论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与此评全别。又萧特乃萧子云之子，王褒乃袁昂外孙，并名辈晚出，范怀约，武帝尝令写妇人事以给后宫，事见张率传，人品猥下，岂当以之入评。此皆后人取袁昂评增入，妄名为武帝语耳。

如前引《古今书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本是袁昂对萧思话的评语，杨臣伟氏将其视为梁武帝对右军的评价，进而引出陶弘景为梁武帝摆脱困境的结论，甚误。陶弘景编造此故事的原因，仍只能从论书启中寻找答案。

在评价王羲之“末年书”时，陶弘景用了“缓异”一词，这显然是沿用梁武帝对右军自运之迹“意疏字缓”的说法。站在陶弘景的立场，他不得不顺承武帝“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的观点，但其内心深处并不以此论为然，故在不违背梁武帝旨意的前提下，陶弘景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的责任推给了并不存在的“代笔人”，这样做的目的，确如陶所说，是为了使“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即在当时举国卑王的大环境下，使王羲之的形象少受损害，根本谈不上杨说的“为梁武帝摆脱困境”。

当然，这样一来王献之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尴尬，献之将陷入“取法其下，得其更下”的境地，但这已非陶弘景所能虑及的了。或是作为一种补救，陶弘景在此启中很突兀的插入一句“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恐怕别有意味。“不复可别”应是此句的重点，先说代笔人摹王羲之的书法“世中不能别”，继称王献之学代笔人“遂成与之相似”，亦属“不复可别”，由此而来，王羲之一代笔人一王献之三者之间亦应该“不复可别”，从而间接地提高了王献之的地位。

作为题外之论，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梁武帝的臣子们

对钟、王高下的意见。袁昂论钟繇书法“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看似推崇备至，但如前所引，袁昂将钟的评语与萧思话“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薄绍之“舞女低腰，仙人啸树”并列，而萧、薄实未入流，恐怕暗寓有钟繇书法不过如是之意。庾肩吾品张、钟、王，则以一段绕口令似的文字搪塞：“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说到最后却以羊欣对王羲之的评价作为结论：“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绕了一大圈，仍然以王为第一。萧子云口称“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而颜之推的评语依然是：“萧晚节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

毕竟钟繇真迹在梁代已所存无几，而二王声名宋齐以来如日中天，梁武帝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提出的尊钟卑王之论，既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又无墨迹可参，故即使在当时，也未真正得到广泛认可。包括陶弘景在内，虽不敢直斥其非，但对梁武帝的意见都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第三节 《瘞鹤铭》作者平议

《瘞鹤铭》原刻镇江焦山江边崖上，铭文书法雄健开张，故北宋以来即为金石书法家重视，欧阳修《集古录》以降著录不绝。因此铭题署“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等皆是隐名，故从宋代开始即对其年代、作者争论不休，举其要者有王羲之、陶弘景、颜真卿、顾况、王瓚、皮日休诸说，又有谓出于梁隋之间、^① 隋代、晚唐无名书家之手者，其争议之烈，古

^① 韩国学者金裕则作“瘞鹤铭的铭文内容及其理想——陶弘景与焦山道教”一文，载陈鼓应、冯达文主编：《道家与道教（道教卷）——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41—155页。认为瘞鹤铭制作时间在梁至隋初之间，“在铭文的撰述和石刻的制作上，茅山派道教团起了主导作用，并直接与陶弘景相关联而完成”。

今论者之多,恐仅在王羲之兰亭帖之亚。^①其中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首将《瘞鹤铭》的书撰之功归于陶弘景,后人多附和其说,即如清汪鉴《十二砚斋补瘞鹤铭考》所言:“焦山《瘞鹤铭》书撰姓氏自宋迄今纷无定论,然指为陶隐居者十之七。”及今,《瘞鹤铭》为陶弘景代表书作几成定讞。但综合所有线索,无论将《瘞鹤铭》的作者指为王、陶、颜、顾、王、皮之任何一人,均有扞格难通之处,究其原因实恐与宋人对《瘞鹤铭》文本的篡改有关,详细讨论如下。

一、《瘞鹤铭》文本的考察

今可用于《瘞鹤铭》文本考据的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传世拓本,一为宋元以来文献著录的文本。其中拓本又有“水前本”与“出水本”之别,所谓“出水本”指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陈鹏年鸠工自江水中挽出残石五块,嵌焦山定慧寺壁间以后传拓者,“水前本”则此前石卧江滩,趁冬季水枯石现之际椎拓之本。传世可信之“水前本”流传极少,今为讨论方便,姑借用清·汪士鋐《瘞鹤铭考》中所附“瘞鹤铭图”^②,将康熙出水的五石依其位次标记为A、B、C、D、E五段,其中间石佚空白处则标记为X(图4-1),另附张伯英旧藏五石整纸拓片以资参考。^③(图4-2)

清人所见《瘞鹤铭》已裂为五石,因传世“水前本”较少,只能通过前人的记载加以分析。今存《瘞鹤铭》全文著录

① 古今参与《瘞鹤铭》争论者几近百人,尤以宋、清两代为多,宋四家除苏东坡外,蔡、黄、米皆曾与论,清顾亭林以降,钱竹汀、赵陋北、朱竹垞、洪北江、王竹云、翁覃溪、王兰泉、何义门、江节甫、张叔未、梁退庵、何子贞、莫即亭等,或考据,或著录,或题跋,皆有意见发表。另据《中国丛书综录》载《瘞鹤铭》考证专著单独梓行者即有六种之多:明顾元庆《瘞鹤铭考》一卷、清张力臣《瘞鹤铭辨》一卷、汪退谷《瘞鹤铭考》一卷、翁覃溪《瘞鹤铭考》一卷、张开福《山樵书外记》一卷、吴东发《瘞鹤铭考》一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存目》所云:“自宋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者数十家,彼此讥驳,几如聚讼。”

② 汪士鋐《瘞鹤铭考》,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影印。

③ 张伯英藏本今归徐州博物馆,见《书法丛刊》1998(3),41页影印。

本宋代有五，即黄伯思《东观余论》卷末所附“邵资政考次瘞鹤铭文”（简称“邵本”），董道《广川书跋》卷六“张子厚记瘞鹤铭文”（简称“张本”）及“刁景纯所得金山经度唐人书瘞鹤铭文”（简称“刁本”），南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著录之瘞鹤铭文（简称“刘本”），又有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六本，乃据邵本迳录。元明以后版本繁多，如俞希鲁《至顺镇江志》本、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本、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本、玉烟堂法帖本等，但价值不大，今迳录宋代四本文字如下。

邵本：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_{阙一字当为丰}甲午岁化于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_{阙一字当为寥}靡邪奚夺_{阙一字}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
山之下仙家无_{阙四字}我竹_{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彼胎禽浮丘_{阙二字}余欲无言尔_{阙五字当有雷门二字}去鼓_{阙一字当作丰}表
留_{阙二字当为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_{阙五字}厂_{此字不全又阙五字}惟
宁后荡洪波前固重局右_{丰字二}门；；_{又阙八字}华亭爰集真侣瘞
尔_{阙二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

丹阳真宰_{此四字不知其次}

张本：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_{阙一本有书字}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_{阙一字当为丰}甲午岁化于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_{阙一字当为寥}靡邪奚夺_{阙一字}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
山之下仙家无_{阙四字}我竹_{此字不全}故立石旌其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_{阙二字}余欲无言尔_{阙三字当有雷门二字}去鼓_{阙一字当为丰}表

留闕二字当为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闕五字 厂 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
宁后荡洪流前固重局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华亭爰集真侶瘞
尔闕兩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

丹杨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刁本：

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
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帟藏之兹山之下故立
石旌其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名真唯仿佛事亦微冥西
什法里宰耳岁辰鸣语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
前固重局我欲无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侶瘞尔作铭宜直示之惟将进
宁

丹杨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刘本：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人逸少书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
吾翔寥廓耶奚夺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帟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
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经籒微前事出于上真我欲无言纪尔岁辰雷
门去鼓华表留声我唯仿佛尔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宁后荡洪流
前固重局此缺一字割荆门未下华亭爰集真侶瘞尔作铭

笮山微士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可将以上四种文本按 ABCDE 及 X 归类,列为表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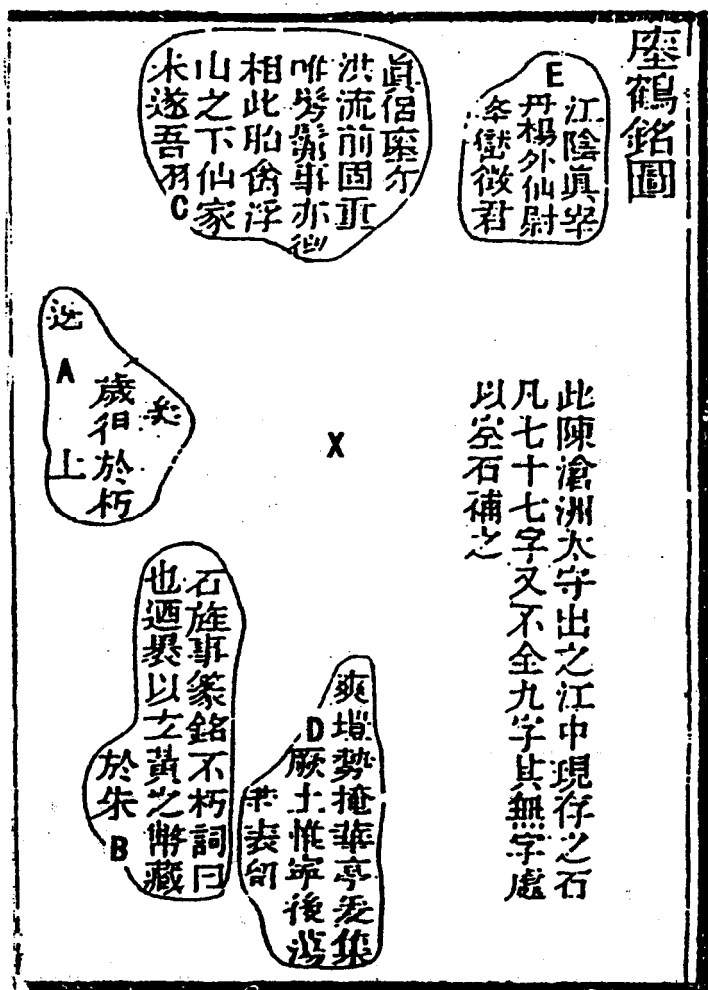


图 4-1 清康熙五十一年“出水本”瘞鶴銘圖



图 4-2 张伯英藏“出水本”瘞鹤铭全拓

表 4-1 四种文本《瘞鹤铭》与“出水本”分段比较表

	出水本	邵本	张本	刁本	刘本
A	1、撰 上皇 2、岁得于华	1、 2、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	1、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 2、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	1、 2、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得于华	1、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逸少书 2、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
B	1、于朱方 2、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 3、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1、 <u>亭</u> 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 2、口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 3、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1、 <u>亭</u> 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 2、口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 3、故立石旌其事篆铭不朽词曰	1、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 2、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之兹 3、故立石旌其事篆铭不朽词曰	1、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 2、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 3、有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C	1、未遂吾翔 2、山之下仙家 3、相此胎禽浮丘 4、唯仿佛事亦微 5、洪流前固重 6、真侣瘞尔	1、未遂吾翔 2、山之下仙家无 3、相彼胎禽浮丘 4、唯仿佛事亦微 5、洪波前固重局 6、真侣瘞尔	1、未遂吾翔 2、山之下仙家无 3、相此胎禽浮丘 4、唯仿佛事亦微 5、洪流前固重局 6、真侣瘞尔	1、未遂吾翔 2、山之下 3、相此胎禽 4、唯仿佛事亦微 5、洪流前固重局 6、真侣瘞尔	1、未遂吾翔 2、山之下仙家 3、相此胎禽浮丘 4、唯仿佛尔亦微 5、洪流前固重局 6、真侣瘞尔
D	1、华表留 2、厥土惟宁后荡 3、爽垲势掩华亭爱集	1、 <u>华</u> 表留 <u>形义</u> 2、厂口惟宁后荡 3、华亭爱集	1、 <u>华</u> 表留 <u>形义</u> 2、厂口惟宁后荡 3、华亭爱集	1、华表留名真 2、后荡 3、爱集	1、华表留声我 2、解化惟宁后荡 3、华亭爱集
E	1、条嶽微君 2、丹杨外仙尉 3、江阴真宰	1、 2、丹阳 3、真宰	1、 2、丹杨 3、真宰	1、 2、丹杨仙尉 3、江阴真宰立石	1、条山微士 2、丹杨外仙尉 3、江阴真宰立石

	出水本	邵本	张本	刁本	刘本
X		1、□□□□ 我竹 2、“吾翔” 后)寥廓耶 奚夺 3、“浮丘” 后)□□余欲 无言尔□□ □雷门去 鼓 4、“事亦微” 后)冥尔将何 之解化□□ □□□ 5、“重肩” 后)右□□□ ? □□□ □□□□□ 6、“瘞尔” 后)□□	1、□□□□ 我竹 2、“吾翔” 后)寥廓耶 奚夺 3、“浮丘” 后)□□余欲 无 言 尔 □ 雷门去鼓 4、“事亦微” 后)冥尔将何 之解化□□ □□□ 5、“重肩” 后)右□□□ □□□□□ □□□□□ □ 6、“瘞尔” 后)□□	1、 2、“吾翔” 后)寥廓耶 奚夺余仙鹤 3、“浮丘” 后)仙家之真 山阴降迹 4、“事亦微” 后)冥西竹法 里宰耳岁辰 鸣语解化浮 丘去莘左取 曹国右割荆 荆 5、“重肩” 后)我欲无言 尔也何明 6、“瘞尔” 后)作铭宜直 示之惟将进 宁	1、 2、“吾翔” 后)寥廓耶奚 夺 3、“浮丘” 后)著经迺微 前事出于上 真余欲无言 纪尔岁辰雷 门去鼓 4、“事亦微” 后)冥尔其何 之 5、“重肩” 后)右□荆门 未下 6、“瘞尔” 后)作铭

从表看出,著录各本 ABCDE 五段由于年代原因,较“出水本”文字虽略有参差,但差异不大,且年代最早的全文著录本,即邵本、张本凡注“阙”字处,皆与“出水本”石断处相合,由此证明宋代《瘞鹤铭》原石已碎裂为数块。至于 X 段,四本出入甚大,则说明此一片石在宋代即已湮灭,各本所著录者皆系后人臆补,决非原文。取四本相同文字可大致推知宋人所见五块残石的内容。

A 段: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

此段 2 行 22 字,前三本无异文,张本谓“上皇山樵”后别本

有“书”字。独刘本作“上皇山樵逸少书”，殆后人为附会王羲之所作臆增。撰书人前是否有“瘞鹤铭”标题，据清张力臣康熙六年（1667）实地考察拓得之本，谓标题“鹤”字依稀可识，^①出水后则碎烂不可辨。

B 段：

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
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
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此段 3 行 34 字，张力臣康熙六年所见与此相同，“出水本”每行前后数字略有缺损。值得注意的是，张力臣认为“此（指 B 段）宋人补刻三行三十四字，即在仆石之背。”王澐《竹云题跋》卷二亦谓：“左下一块，宋人补刻三行。”今细审“出水本”整纸全拓（图 4-2），不惟 B 段，并 A 段残存数字的笔势亦明显异于 C、D、E 段，故张、王说系宋人重刻，恐有道理。

C 段：

未遂吾翔
山之下仙家无
相此胎禽浮丘
唯仿佛事亦微
洪流前固重肩
真侣瘞尔

此段 6 行 32 字，邵本“相此胎禽”作“相彼胎禽”，“洪流”作“洪波”，恐系传写之讹。张力臣康熙六年所见仅 30 字，第二行缺“无”，第五行缺“肩”。据马子云、王壮弘称^②，故宫藏北宋拓

① 见汪士鋐《瘞鹤铭考》所附张力臣“瘞鹤铭原图”。

② 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134 页。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年，218 页。

仰石本(即 C 段碑文)一册,有南宋“游似”印,清潘宁、王文治、铁保跋,存 30 字,内容与张力臣所见者同,由此亦证明宋代 C 段的确仅存 30 字左右。

D 段:

华表留形义

厥土惟宁后荡

华亭爰集

此段 3 行 15 字,张力臣康熙六年所见第三行前多“爽垞势掩”四字。盖此一片石因倒插江水沙石中,传拓不易,故宋人所见转较清人为少。据《广川书跋》卷六引张子厚跋语:“熙宁三年(1070)春,余与汾阳郭逢原公域、范阳范祜子厚索其遗逸于焦山之阴,偶得十二字于乱石间(原注:表留惟宁七字完,余二字讹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后可读,故昔人未之见,而世不传。”则知 D 段迟至熙宁三年(1070)始为张子厚发现。又据张力臣“瘞鹤铭辨”(据汪士鋐《瘞鹤铭考》转引)描述拓制此段的情况:“扑石之下仰拓为难,仆之两手又不能兼理拓具,予乃取其旁落叶藉地,亲仰卧以助之。”其艰难程度与张子厚同,由此证实清张力臣所见之 D 段确为宋张子厚发现之原石。

E 段:

峯口微君

丹杨外仙尉

江阴真宰

此段 3 行 12 字,情况与 D 段类似,宋代四本中年代最晚的刘本字数最多,作“峯山微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与清代“出水本”作“峯口山微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接近。据同上引张子厚跋语:“其后又有丹杨外仙、江阴真宰八字。”知此段亦张子厚熙宁三年发现,但不详《广川书跋》卷六所载张本为

何只有“丹杨真宰”四字。

在《东观余论》、《广川书跋》之前最早著录《瘞鹤铭》的应是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十，凡两条，有“集本”、“真迹”之别，文辞小异，其“集本”云：

右《瘞鹤铭》，题云华阳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几而已。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

文中“惟余所得六百余字”一句，据《东观余论》考证认为：“盖印书者传讹，误以十为百，当时所得盖六十余字，故云比数家本为多。”另据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引《集古录》亦作“惟余所得六十余字，独为多也”。可证欧阳修所见《瘞鹤铭》确为六十余字。

《集古录》虽未明言原石是否断烂，但从“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及仅得六十余字已叹为多来分析，应知在欧阳修的时代《瘞鹤铭》已崩坠江中。欧阳修所得拓本仅六十余字，明显少于年代稍晚的邵本、张本，那么，欧阳修所见究竟是哪六十余字呢？如前所论，D、E 两段熙宁三年始为世知，则其所见必为 A、B、C 三段，^①但三段合计 88 字，与所称“六十余字”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专门提到“碑无年月”，这究竟是指此铭不书帝王年号，还是欧阳修所见拓本并

^① 《集古录》已提到 A 段中的“华阳真逸撰”，“鹤寿不知其几”，故所见必有此段，若仅见到 A、B 两段或 A、C 两段，合计字数均不及六十，由此推知所见必为 A、B、C 三段。

无后世盛称的“壬辰”、“甲午”干支纪年,不得而知。但如果结合欧阳修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考察,若将有干支纪年的碑文信口称为“碑无年月”,的确有失严谨,且既然欧阳修推测此铭的作者为顾况,根据顾的活动年代(约730—820),很容易就可推算出壬辰为天宝十一载(752)或元和七年(812),甲午为天宝十三载(754)或元和九年(814),从而绝不会说“不知何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可能确未见有“壬辰”、“甲午”干支纪年。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黄伯思以前的论者,无论将铭文的作者指为王羲之(如苏舜卿)、为隋人(如蔡襄)、为顾况(如欧阳修),均无一语涉及铭文中“壬辰”、“甲午”纪年。如《蔡襄集》卷三十四云:

《瘞鹤铭》非逸少字。东汉末多善书,惟隶书最盛,至于魏晋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瘞鹤铭》文字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殊无仿佛也。^①

考隋起开皇元年辛丑(581),迄义宁二年戊寅(618),享国37年,恰无壬辰、甲午,若蔡襄当日见有“壬辰”、“甲午”纪年,以文学、书法见长的蔡君谟想应不致荒谬如此。

如前所说,清初张力臣等已发现B段系宋人补刻,今据《集古录》A段首句作“鹤寿不知其几”,《舆地碑记目》等引《集古录》亦作“不知其几”,与邵、张等本作“不知其纪”不同,若非版刻讹误,则A段也可能出宋人之手。以上事实确可证明,今日流传之本(包括拓本和邵、张等著录本)含有“壬辰”、“甲午”干支纪年的A、B两段皆非欧阳修所见的原貌。

事实上,宋人记载中已隐隐透露出重刻A、B两段的消息。

^① 此据校本《蔡襄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27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引蔡襄语与之小异。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提到宋人凿取《瘞鹤铭》文字的情况：

《瘞鹤铭》在今镇江府大江中焦山后岩下，冬月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绍兴（1131—1162）中访旧本，有使者过，命工凿取之。石顽重，不可取，只得十许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两字去，弃其余，今通判东厅者是也。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十一^①“焦山瘞鹤”条引宋古洲马子严题词云：

予淳熙乙酉岁（1189）为丹阳郡文学，暇日游焦山，访此石刻。初于佛榻前见断石，乃其篇首二十余字。寺僧云：往年于崖间震而坠者。予亦信然。遂拏舟历观崖间，尚余兹山之下二十余字，波间片石倾倒，舟人云：此断碑水落时亦可摹拓。予因请州将龙图阁直学士张子颜出之，张欣然发卒挽之，既出，则甲午岁以下三十余字。偶一卒复白：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觉隐指如有刻画。遂并出之。疾读其文，则与佛榻所见者其文一同，持以较之，第阙二字，而笔力颖异，乃知前所见者为寺僧给耳。因摹数本以遗故旧。^②

马子严所说“篇首二十余字”即 A 段，“甲午岁以下三十余字”即 B 段，“兹山之下二十余字”即 C 段，据此则知宋代确有单独翻刻之 A 段，但不详江中者与马子严佛榻前所见者孰真孰伪，或二者皆是翻刻，亦未可知。

二、陶弘景与《瘞鹤铭》

将《瘞鹤铭》的作者指为王羲之、颜真卿、顾况、王瓚，以附会的成分居多，前人辨之亦详，不赘引，论据相对充分的是陶弘景。

①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75页。

② 此文亦见汪士铎《瘞鹤铭考》，但文字小异。

宋黄伯思力主《瘞鹤铭》出陶弘景之手,《东观余论·跋邵资政考次铭文》云:

此铭相传为王右军书,故苏舜钦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鹤经,京口新传《瘞鹤铭》。(欧阳)文忠以为不类王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瓚。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者,岂其别号欤。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住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此铭后又题丹阳仙尉山阴宰数字,及唐王瓚诗,字画以颇似《瘞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瓚书,误矣。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而闲居,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

蔡條《西清诗话》亦附和黄说,并补充证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二引《西清诗话》云:

丹阳焦山断崖有《瘞鹤铭》,或传为王逸少,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而碑言华阳真逸撰,欧公集古跋云顾况道号,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鹤经,京口空传《瘞鹤铭》,真作右军书矣。余读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道书言华阳金坛之地,第八洞天,东北门俱润州境也。丹阳与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茆陶故居,则《瘞鹤铭》为隐居无疑。

董道《广川书跋》则以陶弘景为铭文作者，书手另有其人：

黄伯思学士以《瘞鹤铭》示余，世谓晋右军将军王逸少书，欧阳公疑华阳居士唐顾况道号。然逸少、逋翁其书可见，不与此类。尝考次其年，羲之生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当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岁在甲午逸少当三十二岁，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会稽，其时未尝至朱方，华阳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为称。顾况卒于贞元末，当元和七年为壬辰，九年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岁为天宝十一载，况当儿稚，其号华阳子，盖自贞元以后，皆不合于此。昔陶弘景尝以其居华阳观故自号华阳隐居，贞白平时著书不称建元，直以甲子纪其岁，今日壬辰岁得之山阴，甲午岁丧于朱方，壬辰岁当天监十一年，甲午则其十三年也。隐居以天监七年游海岳，住会稽，来永嘉，至十年还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贞白作传，即十一年在华阳，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然华阳真逸特其撰铭，若其书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号自别，固不得识其姓名，疑皆隐君子也。

宋代以降，将《瘞鹤铭》书撰之功归于陶弘景者尚有王观国《学林》、李石《续博物志》、刘昌诗《芦浦笔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都元敬《金薤琳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翁方纲《瘞鹤铭考补》等，文繁且乏新意，不备录。可将诸家所列论据作一总结：(1)名号相符；(2)不书年号为陶弘景著作习惯；(3)壬辰、甲午陶弘景正在华阳；(4)书法风格接近。

兹先辨上列论据中与事实不符诸处：关于陶弘景的道号。董说“陶弘景尝以其居华阳观故自号华阳隐居”，不妥。陶弘景隐居茅山事在齐永明十年(492)，据陶弘景从子陶翊《华阳隐居

先生本起录》^①云：

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称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缙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号。

此即“华阳隐居”得名之由。陶弘景隐居以后，乃于大茅、中茅间之积金岭西筑华阳上下馆，据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十华阳上馆在天宝七年改为华阳宫，非如董说为“华阳观”。

蔡说“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宋修道藏已不可见，今正统道藏仅有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②，无外传，检贾嵩《内传》未见“晚号华阳真逸”的说法，另检现存宋代以前有关陶弘景的传记资料如《梁书》、《南史》、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梁简文帝《华阳陶先生墓志铭》、宋王质《绍陶录·陶华阳谱》及《云笈七籤》中唐李渤《梁茅山贞白先生传》、《真系·梁茅山贞白先生》亦未见陶弘景有“华阳真逸”的别号，故疑系蔡絛杜撰。

关于陶弘景著书不书年号。检现存陶弘景著作，其入梁以前所作文字确如黄说少书年号，如《肘后百一方·序》径称作“太岁庚辰”，考庚辰即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又黄所举“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己卯为永元元年（499），按永元年间内乱纷起，陶弘景预知齐祚将倾，乃隐居茅岭，静以观变，即《梁书·陶弘景传》所说：“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其不书萧齐年号也宜。但入梁以后则奉萧梁正朔，其著述皆记年号，如所撰《周氏冥通记》卷一云：“天监七年（508）隐居东游海岳”；自作《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

① 见《云笈七籤》卷一百七。

② 《华阳陶隐居内传》未署著作年代，据卷下收入宋宣和封诰，知作者贾嵩为宋人。

坛碑》称：“(天监)十七年(518)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古今刀剑录》谓“普通中，岁在庚子(520)命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等，哪有“平时著书不称建元”之事。

关于弟子周子良的卒年。黄谓周卒于天监十四年(515)，董云十二年(513)均误。据《周氏冥通记》陶弘景弟子周子良自天监十四年五月以来，颇有冥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时年二十，十一月三日葬于东冈。

事实上，以上错误并无关大局，将陶弘景考定为《瘞鹤铭》的作者(无论是撰还是书)，最不可解的正是“壬辰”、“甲午”纪年。壬辰为梁天监十一年，甲午为天监十三年，按黄、董所列陶弘景此三年间的行踪，看似能够符楔，但仔细研究却存在明显的漏洞。

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陶弘景以天监七年四月离开茅山，往东阳(浙江金华)、永嘉(浙江温州)等处，住楠江青嶂山大若岩时间最久，天监十年乃有霍山之行，元刘大彬《茅山志》卷二十《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云：“十年涉海诣霍山。”《内传》亦同。而最令人关心的陶弘景天监十一年(壬辰)的行踪，在陶弘景自撰《登真隐诀》、《周氏冥通记》及《华阳陶隐居内传》、《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茅山志》卷十中均有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基本无矛盾。《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引《登真隐诀》云：

壬辰年六月，便乘海还永嘉。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墟，孤立海中，都无人居，甚可营合。八月，至木溜，见其可居，始上岸起屋。十月，司徒慧明至。于时，愿得且停木溜，与慧明商榷，往复积日，永不敢许，于是相随而还也。

《周氏冥通记》卷一云：

(周子良)十一年从(陶)还茅岭。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云：

（十一年）复自海道还永嘉，至木溜，形势殊好，会上使司徒慧明迎还旧岭，道中书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

《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云：

十一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征先生还茅山，别给廨宇。

《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云：

十一年夏还木溜屿，其年十月奉敕迎还旧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

《茅山志》卷十云：

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武帝有敕迎还旧山，因诣鄞县礼阿育塔，自誓受五大摄戒。既归，入住东涧。

由以上记载可知，陶弘景直至壬辰年十月尚在木溜屿^①，是月奉诏还，先至鄞县（浙江宁波）礼阿育王塔，经晋陵（江苏常州）还茅山。因按《周氏冥通记》的说法当年即至茅山^②，费时仅两个月，由鄞县至晋陵最短路径应该是：鄞县（宁波）——山阴（绍兴）——吴兴（湖州）——义兴（宜兴）——晋陵（常州），恐无机会转道吴郡（苏州）赴华亭（松江）买鹤。

再看陶弘景甲午年（天监十三年）的情况，据《华阳陶隐居内

① 木溜屿其地不详，度其位置应是温州湾中近海岛屿。

② 据《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云：“十三年正月至茅山”，则还山的时间用了一年两个月，这与梁武帝迫切命归的诏令不合，疑误。且《周氏冥通记》还提到：“（天监）十二年秋，其（指周子良）家中表亲族来投山居。”亦证明天监十二年陶弘景、周子良均在茅山。

传》卷中引《登真隐诀》云：

甲午年，敕买故许长史宅宋长沙馆，仍使潘渊文与材官师匠营起朱阳馆。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云：

至南岳还，鼎事累营皆不谐，乃非都无仿佛，每开鼎皆获霜华。

则知陶弘景还山后忙于营建、炼丹诸事，应无暇往焦山葬鹤。同样的道理，甲午年陶弘景既然没有离开茅岭，他的仙鹤又怎么会死在朱方（镇江），更何况茅山林木幽胜，陶弘景又怎么会选择将仙鹤卜葬于百数十里外的焦山江边呢？

三、皮日休与《瘞鹤铭》

将皮日休与《瘞鹤铭》联系在一起，发端于清程嗣章，在《张力臣瘞鹤铭辨书后》中程说：

（皮日休）诗集内有悼鹤诗云：欲向人间葬令威，此瘞鹤之证也。又一诗，序云：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始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陆鲁望和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证也。^①

今检《松陵集》卷九有皮日休悼鹤诗并序七律、七绝各一首，及李穀、张贲、陆龟蒙、魏朴和诗，全文逐录如下：

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始

① 转引自袁枚：《袁枚全集·随园随笔》卷十九，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350页。

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南阳润卿博士、浙东德师侍御、毗陵魏不琢处士、东吴陆鲁望秀才及厚于余者，悉寄之，请垂见和（皮日休）

池上低摧病不行，谁教仙魄反层城。
阴苔尚有前朝迹，皎月新无昨夜声。
菰米正残三日料，筠笼休碍九霄程。
不知此恨何时尽，遇著云泉即怆情。

莫怪朝来泪满衣，坠毛犹傍水花飞。
辽东旧事今千古，却向人间葬令威。

奉和裴美先辈悼鹤二首（李穀）

才子襟期本上清，陆云家鹤伴闲情。
犹怜反顾五六里，何意忽归十二城。
露滴谁闻高叶坠，月沉休藉半阶明。
人间华表堪留语，剩向秋风寄一声。

道林曾放雪翎飞，应悔庭除闭羽衣。
料得王恭披鹤氅，倚吟犹待月中归。

奉和（张贲）

池塘萧索掩空笼，玉树同嗟一土中。
莎径罢鸣惟泣露，松轩休舞但悲风。
丹台旧蹇难重缉，紫府新书岂更通。
云减雾消无处问，只留华发与衰翁。

渥顶鲜毛品格驯，莎庭闲暇重难群。
无端日暮东风起，飘散春空一片云。

奉和(陆龟蒙)

一夜圆吭绝不鸣,八公虚道得千龄。
 方添上客云眠思,忽伴中仙剑解形。
 但掩丛毛穿古堞,永留寒影在空屏。
 君才幸自清如水,更向芝田为刻铭。

鄮都香稻字重思,遥想飞魂去未饥。
 争奈野鸦无数健,黄昏来占旧溪枝。

奉和(魏朴)

直欲裁诗问杳冥,岂教灵化亦浮生。
 风林月动疑留魄,沙岛烟愁似蕴情。
 雪骨夜封苍藓冷,练衣寒在碧塘轻。
 人间飞去犹堪恨,况是泉台远玉京。

经秋宋玉已悲伤,况报胎禽昨夜亡。
 霜晓起来无问处,伴僧弹指绕荷塘。

皮日休悼鹤事迹与《瘞鹤铭》相符之处甚多:(1)皮诗“却向人间葬令威”言瘞鹤事,陆诗“更向芝田为刻铭”言作铭事;(2)得鹤地点为吴中之华亭,与《瘞鹤铭》称“得于华亭”同;(3)饲养年许而卒,与《瘞鹤铭》之壬辰得,甲午化基本吻合^①;(4)皮诗序云邀诸友和诗,与《瘞鹤铭》“爰集真侣,瘞尔作铭”相符;(5)用典接近。《瘞鹤铭》“华表留形”用《搜神后记》丁令威化鹤归辽东,集城门华表柱故事,皮诗“辽东旧事今千古,却向人间葬令威”,李诗“人间华表堪留语,剩向秋风寄一声”皆用此典。《瘞鹤铭》“□□华亭”疑用《世说新语·尤悔》二陆兄弟“华亭鹤唳”之典,李

① 壬辰至甲午为三年,但若壬辰岁未得,甲午年初化,仍可言“养之始经岁”。

诗“陆云家鹤伴闲情”同。《瘞鹤铭》“相此胎禽”，传说鹤系胎生，故鲍照《舞鹤赋》云：“伟胎化之仙禽”，魏诗“况报胎禽昨夜亡”同。《瘞鹤铭》“浮丘[著][经]”，《相鹤经》传说为仙人浮丘子著，传王子晋，子晋藏之于嵩山石室，为淮南八公所得，陆诗“八公虚道得千龄”亦用此典。

这一组悼鹤诗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皮陆五人在诗中几乎用尽了有关鹤的掌故，却偏偏不肯以就在吴中的《瘞鹤铭》入诗，若此铭果真出于陶弘景之手，这本应该是最切题的典故^①。更令人费解的是，《悼鹤诗》未用《瘞鹤铭》典，而皮日休的另一首题为“顾道士亡，弟子以束帛乞铭于余，鲁望因赋戏赠，日休奉和”的诗，却有句云“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有铭”，则显然是用《瘞鹤铭》典。这种当用而不用的怪现象惟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哀顾道士诗后作，^②句中“仙鹤亡来始有铭”即指前面悼鹤赋诗，瘞鹤勒铭之事。

已有论者注意到“从鹤铭内容及其瘞鹤一事观之，撰者平生对鹤之爱好，感情之深厚必非同常人”^③。检《全唐诗》中皮日休诗作，用鹤典极多，其爱鹤之情可见一斑。《七爱诗·白太傅（居易）》“处世似孤鹤”；《鲁望读襄阳耆旧传见赠五百言……次韵》“两鹤思竞闲，双松格争瘦”；《初夏即事寄鲁望》“片石共坐稳，病鹤同喜晴”；《初夏游楞伽精舍》“愿力悦不遗，请作华林鹤”；《公斋四咏·小松》“叶健似虬须，枝脆如鹤胫”；《公斋四咏·鹤

① 以《瘞鹤铭》典故入诗词，代表作如南宋刘克庄《贺新郎·二鹤》：“家有仙禽二。早追随、先生杖屦，互乡童子。旦旦池边三薰沐，夜夜山中警睡。且伴我、人间游戏。此老生平哀大陆，到未梢、始忆华亭唳。评往事，败佳思。古云鹤算谁能纪。叹归来、山川如故，人民非是。但愿主君高飞去，莫爱乘轩禄位。更赛过、令威千岁。假使焦山真羽化，待华阳贞逸铭方瘞。我拍手，渠展翅。”

② 皮日休《悼鹤》及《伤开元观顾道士》二诗均收入《松陵集》，看不出时间先后，但两诗张贲（广文）皆有和作，其《奉和裴美伤开元观顾道士》有句云“几度吊来惟白鹤”，“几度”即二度，证明悼鹤事在先，哀顾道士在后。

③ 陈耀东：《瘞鹤铭非陶弘景作考辨》，《书法研究》1985（4），16—23页。

屏》“三幅吹空穀，孰写仙禽状”；《太湖诗·晓次神景宫》“默听语时鹤”；《太湖诗·三宿神景宫》“素鹤警微露”；《太湖诗·桃花坞》“清阴减鹤睡”；《太湖诗·孤园寺（梁散骑常侍吴猛宅）》“静鹤啄柏蠹”；《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樊榭》“井香为大药，鹤语是灵篇”；《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青棣子》“衔来多野鹤，落处半灵泉”；《五贶诗·华顶杖》“量泉将濯足，阑鹤把支颐”；《初冬章上人院》“尚关经病鹤，犹滤欲枯泉”；《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奉题屋壁》“鹤静共眠觉，鹭驯同钓归”；《鲁望示广文先生吴门二章》“鹤翻希作伴，鸥却觅为群”；《虎丘寺殿前有古杉一本……三百言以见志》“品格齐辽鹤，年龄等宝龟”；《新秋言怀寄鲁望三十韵》“鹤鸣转清角”；《奉和鲁望秋日遣怀次韵》“鹤共心情慢”；《江南书情二十韵寄秘阁韦校书贻之商洛宋先辈垂文二同年》“瘦去形如鹤”；《华山李炼师所居》“孤云尽日方离洞，双鹤移时只有苔”；《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鹤雏入夜归云屋，乳管逢春落石床”；“将开丹灶那防鹤，欲算棋图却望云”；《暇日独处寄鲁望》“园蔬预遣分僧料，廩粟先教算鹤粮”；《开元寺客省早景即事》“鹤静时来珠像侧，鸽驯多在宝幡中”；《奉和鲁望独夜有怀吴体见寄》“病鹤带雾傍独屋，破巢含雪倾孤梧”；《卧病感春寄鲁望》“昨夜眠时稀似鹤，今朝餐数减于僧”；《奉和鲁望病中秋怀次韵》“因分鹤料家资减，为置僧餐口数添”；《新秋即事三首》“酒坊吏到常先见，鹤料符来每探支”；《初冬偶作寄南阳润卿》“迎潮预遣收鱼笱，防雪先教盖鹤笼”；《冬晓章上人院》“松扉欲启如鸣鹤，石鼎初煎若聚蚊”；《寄题玉霄峰叶涵象尊师所居》“闲迎仙客来为鹤，静喫灵符去是龙”；《奉和鲁望寄南阳广文次韵》“琼函静启从猿觑，金液初开与鹤尝”；《题支山南峰僧》“池里群鱼曾受戒，林间孤鹤欲参禅”；《伤开元观顾道士》“鹤有一声应是哭，丹无余粒恐潜飞”；《褚家林亭》“争得共君来此住，便披鹤氅对清风”；《宿木兰院》“木兰院里双栖鹤，长被金钲聒不眠”；《初冬偶作》“酒病

校来无一事，鹤亡松老似经年”；《润卿、鲁望寒夜见访，各惜其志，遂成一绝》“清风月白更三点，未放华阳鹤上人”；《苦雨中又作四声诗寄鲁望·平人声》“荷倾还惊鱼，竹滴复触鹤”。

复检《松陵集》中皮、陆诗作，词句与《瘞鹤铭》类似者亦夥。

(1)“华阳”：皮诗《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华阳馆主未成翁”，《送润卿博士还华阳》“华阳居士半酣归”，《润卿、鲁望寒夜见访，各惜其志，遂成一绝》“清风月白更三点，未放华阳鹤上人”，《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住在华阳第八天”；陆诗《寄怀华阳道士》，《洞宫夕（一作华阳观）》“月午山空桂花落，华阳道士云衣薄”，《丁隐君歌》“华阳道士南游归”，《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2)“真逸”：陆诗《独夜有怀因作吴体寄裘美》“云虬涧鹿真逸调，刀名锥利非良图”。(3)“上皇”：陆诗《开元杂题七首·汤泉》“上皇初解云衣浴，珠棹时敲瑟瑟山”。(4)“徵君”：皮诗《寄题罗浮轩辕先生所居》“乱峰四百三十二，欲问徵君何处寻”，《七爱诗·卢徵君（鸿）》“吾爱卢徵君”。(5)“真宰”：皮诗《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竞抵元化首，争扼真宰咽”，《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石窗》“窗开自真宰，四达见苍涯”，《早春病中书事寄鲁望》“可怜真宰意，偏解困吾曹”，《奉和鲁望病中秋怀次韵》“清词一一侵真宰，甘取穷愁不用占”，陆诗《自遣诗三十首》“应是也疑真宰怪，休时犹未遍林峦”，《奉和裘美古杉三十韵》“真宰诚求梦，春工幸可医”。(6)“朱方”：陆诗《庆封宅古井行》“吴分岩邑号朱方”。(7)“玄黄”：皮诗《太湖诗·包山祠》“公心与神志，相向如玄黄”。(8)“寥廓”：皮诗《奉和添酒中六咏·酒龙》“初疑潜苑囿，忽似挈寥廓”，《初夏游楞伽精舍》“人声渐疏旷，天气忽寥廓”，《太湖诗·晓次神景宫》“终然合委顿，刚亦慕寥廓”。(8)“兹山”：皮诗《太湖诗·太湖石（出鼇头山）》“兹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9)“立石”：陆诗《奉和裘美二游诗·徐诗》“立石刻五经，置于太学前”。(10)“不朽”：皮诗《顾道士亡，弟子以东帛乞铭于余，鲁望因赋戏赠，日休奉和》“琼板欲刊知不

朽,冰纨将受恐通灵”,陆诗《添酒中六咏·酒船》“荒唐意难遂,沉湎名不朽”。(11)“浮丘”:陆诗《奉和袭美公斋四咏次韵·鹤屏》“空资明远思,不待浮丘相”。(12)“无言”:皮诗《添鱼具诗·背篷》“深拥竟无言”,《馆娃宫怀古五绝》“郑姥无言下玉墀”,陆诗《奉和袭美馆娃宫怀古次韵》“苍翠无言空断崖”。(13)“洪波”:皮诗《题潼关兰若》“昔时驰道洪波上,今日宸居紫气西”,陆诗《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练渚》“苍苍束洪波”,《渔具诗·沪(吴人今谓之簖)》“万植御洪波,森然倒林薄”。此外尚有相近似者,皮诗《太湖诗·入林屋洞》“遂招放旷侣,同作幽忧行”,“放旷侣”与《瘞鹤铭》之“真侣”意义接近,而《读书》“案头见蠹鱼,犹胜凡俦侣”,“凡俦侣”与“真侣”为反语。

尽管以上词汇之多数都比较通俗,属诗歌常用者,但短短百数十字的《瘞鹤铭》与皮、陆诗篇居然能有这样多的重合,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此铭与皮、陆的关系。

四、疑问与推测

与将陶弘景确定为《瘞鹤铭》的作者一样,将《瘞鹤铭》径指为皮日休之作也有扞格难通之处。卞孝萱《冬青书屋笔记》卷四中罗列了《瘞鹤铭》非皮日休所作的理由:^①

皮日休《华亭鹤闻之旧矣,……请垂见和》首句云:“池上低摧病不行”。从诗题、诗句可以看出:(1)皮日休的鹤,是在“吴中”“池上”喂养,与华阳真逸的鹤,在焦山大自然中喂养,不合。(2)皮日休的鹤,“养之殆经岁”即死,与华阳真逸的鹤,“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不合。(3)皮日休对友人,入仕者称官衔(“博士”、“侍御”),未仕者称“处士”、“秀才”,与华阳真逸对友人,皆称“真侣”,不合。陆龟

① 卞孝萱:《冬青书屋笔记·从文章内容看瘞鹤铭》,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359页。

蒙《和裘美先辈悼鹤》诗有句云：“但掩丛毛穿古堞。”翁方纲《瘞鹤铭考补》指出：“则当日裘美所葬之鹤，乃依城隅葬之耳，非在焦山崖下江流乱石之间，亦可知矣。”

针对程嗣章在《张力臣瘞鹤铭辨书后》中所云：

裘美为唐咸通八年进士，崔璞守苏，辟为军事判官。自叙以九年从北固至姑苏，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裘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

卞孝萱辩驳说：

皮日休《破山龙堂记》云：“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阳皮日休记。”《河桥赋》序云：“咸通癸巳岁，日休游河桥。”可见皮日休咸通十三年在常熟，十四年已北上。《新唐书·艺文志三·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注“皮日休，字裘美，咸通太常博士”。（《唐诗纪事》卷六十四同）《河桥赋》即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入京为太常博士“游河桥”时作。乾符元年皮日休不在吴中，怎能有焦山瘞鹤刻铭之事？

今按卞说确有道理，不仅如此，无论主张皮日休作的程嗣章，还是反对者如翁方纲、卞孝萱都忽视了一件重要事实，即皮日休葬鹤之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乾符元年甲午（874）。

皮日休悼鹤诗载《松陵集》卷九，此集所收以皮日休、陆龟蒙唱和诗为主，间有他人参与唱和之作，据皮日休所撰《松陵集·序》云：

（咸通）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牧于吴，日休为部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字鲁望者以其业见造……余遂以词诱之，果复之不移刻……凡一年，为往体各九十三首，今体各一百九十三首，杂体各三十八首，联句问答十有八篇在其

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①

由序可知集中诸作皆成于咸通十年至十一年间,最迟不超过十二年,则皮日休悼鹤葬鹤亦必此两、三年间事,确与《瘞鹤铭》之“壬辰岁(咸通十三年)得于华亭,甲午岁(乾符元年)化于朱方”不合。

除此而外,针对皮日休《顾道士亡,弟子以束帛乞铭于余,鲁望因赋戏赠,日休奉和》诗“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有铭”之句,清人也提出怀疑,汪士鋐《瘞鹤铭考》在欧阳修跋后加按语云:

此瞻云:皮袭美《顾道士亡弟子乞铭》诗云: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有铭,正用《瘞鹤铭》。事若近出逋翁,(皮日休)肯以对庄子乎。

言下之意即使《瘞鹤铭》出于逋翁(顾况)之手,皮日休诗也不可能取此近事与庄子旧典对仗,更不用说铭文为皮日休自作了。

诸论者未予注意的还有一事,欧阳修《集古录》提到:“《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据《舆地纪胜》卷七引镇江府碑记称《润州图经》唐孙处玄作。检《唐书·隐逸传》处玄武后长安中为左拾遗,中宗神龙初去官还乡,若《瘞鹤铭》为皮日休所作,则不应为孙处玄所见。

不解决以上疑问,《瘞鹤铭》作者问题依然悬而难决,对此试作如下推测。

(1)关于卞氏提出的几条疑问,以牵强的成分居多。卞谓“华阳真逸的鹤,在焦山大自然中喂养”,纯为无根之言,《瘞鹤铭》无一语涉及鹤的饲养环境,“天其未遂吾翔寥廓”只是鹤主人

① 按其数相加应为六百四十八首,与集中皮、陆各体诗作的实际数目相符。

由亡鹤而产生的感叹,用抒怀才不遇的情怀,这恰与皮日休当日的境遇相合。^① 卞谓皮日休的鹤养之仅经岁,与铭称壬辰至甲午不合,前注已辩之,不赘。至于皮日休对友人的称呼见于诗者尚有“山人”(《伤史拱山人》),而“徵君”、“真宰”已见前引皮、陆诗作,称“某某山樵”则见陆诗《小鸡山樵人歌》,“真侣”虽不见皮诗,但“放旷侣”及与之相对的“凡俦侣”则见之,说已见前。

(2) 翁方纲据陆诗“但掩丛毛穿古堞”,认为皮日休葬鹤处在城隅,与《瘞鹤铭》葬鹤江滩不同,亦不确。从皮诗来看,反复说“阴苔尚有前朝迹,皎月新无昨夜声”,“莫怪朝来泪满衣,坠毛犹傍水花飞”,是知诗成于鹤死之日或次日,悼鹤赋诗在前,卜地葬鹤在后,皮诗“却向人间葬令威”,是言将葬,并未言已葬,葬处既未定,和者信笔用“古堞”一词,并非实指。

(3) 关于皮日休诗“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有铭”,此系与陆龟蒙唱和诗,应结合前后两诗加以分析,先录皮、陆原句:

顾道士亡,弟子乞铭于裴美,既而奉以束帛,因赋戏赠
(陆龟蒙)

童初真府召为郎,君与抽毫刻便房。
亦谓神仙同许郭,不妨才力似班扬。
比于黄绢词尤妙,酬以霜缣价未当。
惟我有文无卖处,笔锋销尽墨池荒。

顾道士亡,弟子以束帛乞铭于余,鲁望因赋戏赠,日休
奉和(皮日休)

师去东华却炼形,门人求我志金庭。
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有铭。
瑗板欲刊知不朽,冰纨将受恐通灵。

^① 据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八所附皮日休行年简表,咸通九年皮日休应宏词不第,离京东游,自华山、荆山,直至扬州、苏州。

君才莫叹无兹分，合注神玄剑解经。

从二诗的先后来看，皮诗旨在答复陆龟蒙的牢骚“惟我有文无卖处，笔锋销尽墨池荒”，兼有劝慰之意。结合皮在“仙鹤亡来始有铭”句后所加的注“前朝文集未有道士铭志”，意为为道士作墓铭自我而始，确有自矜之意，但语气中也蕴涵有作道士铭志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以你陆龟蒙的才学“合注神玄剑解经”，才是大手笔。“大椿”一词虽典出庄子，此处则两句连续共说一事，^①为枯死的大椿作记，乃直喻为顾道士作墓志，绝非旧典，对以瘞鹤勒铭这一新事，亦无不妥。而且“新为记”与“始有铭”语意雷同，若不计平仄，易作“大椿枯后始为记，仙鹤亡来新有铭”，也未尝不可。

(4)关于《润州图经》。检《唐书·经籍志》著录《润州图经》二十卷，孙处玄撰，而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却作《润州图注》二十卷，孙处玄撰。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润州图经》与《润州图注》并非一书，孙处玄撰者为《润州图注》，而欧阳修《集古录》所征引的《润州图经》为唐末五代晚出之书。^②

(5)平心而论，前贤对《瘞鹤铭》作者的论断，王羲之、颜真卿之说纯属所谓的“名人效应”，全无事实依据。王瓚不过偶然题诗铭侧，诗的内容既无关瘞鹤之事，其生平更缈不可知，^③确难看出其与《瘞鹤铭》有何瓜葛。顾况则只因为别号中有“华阳”二字，却让欧阳公产生了错误联想。陶弘景则除了“华阳”二字相符外，铭文中壬辰、甲午纪年亦与其行踪基本吻合。而皮日休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除了纪年不符外，其他的一切都与《瘞鹤铭》有惊人的相似。因此澄清壬辰、甲午纪年的来龙去脉，应是解决

① 此联作合掌对，实未见佳。

② 这一推测应该合理，因欧阳修主撰《新唐书》，熟悉唐代史事，若《集古录》所引《润州图经》果为武则天时代孙处玄所作，欧阳修就绝不可能将《瘞鹤铭》的作者推定为晚于孙处玄的顾况。

③ 五代别有王瓚，为唐河中节度使王重盈之子，传见《旧五代史》，与此王瓚无关。

《瘞鹤铭》作者问题的关键。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得出含有壬辰、甲午纪年的 A、B 两段系宋人重刻的结论,而且认为欧阳修、蔡襄等人所见拓本并无干支纪年,若进一步分析有关线索,还能推断出重刻的大致年代。

先据《宋史》、《京口耆旧传》列出欧阳修及曾全文著录《瘞鹤铭》的邵、张、刁三人生卒,至于黄伯思、董道、刘昌诗因年代较晚,不列。

刁约,字景纯,丹徒人,1001? - 1083?,天圣八年进士,庆历初与欧阳修同知太常礼院。刁《宋史》无传,据《京口耆旧传》云:“年八十余,元丰五、六年间(1082 - 1083)卒。”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1007 - 1072,累官至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谥文忠。

邵亢,字兴宗,丹阳人,1014 - 1074,熙宁中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出知越州。熙宁七年薨,年六十一,谥安简。

张壘,字子厚,常州人,? - 1105,《宋史》称其闭门读书四十年,崇宁四年(1105)卒。

从以上情况来看,刁、邵皆是镇江土著,张在常州,亦近京口,他们对《瘞鹤铭》的记载理应较欧阳修更加可信,但事实并非如此。

先看年龄最长的刁景纯,他提供的文本是《广川书跋》所称“刁景纯所得金山经度唐人书瘞鹤铭文”,这一文本虽无缺字,但其可信度却远在邵、张本之下,理由有三:(1)“天其未遂”句,邵、张本皆作:“天其未遂吾翔口廓耶奚夺口遽也”,均谓“夺”后缺一字,刁本却补“余仙鹤之”四字,与石面空白处不合。(2)“相此胎禽”后,连清代拓本都存“浮丘”二字,刁本却作“相此胎禽仙家之真”,而将“浮丘”二字移到后面,作“浮丘去莘”。(3)其铭辞之错

乱,以至于著录此本的董道都说:“昔刁景纯就金山经度中得唐人于经后书瘞鹤文,以校(邵)兴宗、(张)子厚,其字错杂失序多矣。”

邵、张二本差异不大,但据前引张子厚跋语,知 D、E 段系张子厚熙宁三年(1070)发现,而邵、张本皆有此两段,据张本后之跋语年月“(熙宁三年)二月一日南阳张墾子厚记”,则由黄伯思《东观余论》著录之“邵资政考次瘞鹤铭文”(即邵本)必成于熙宁三年以后。同样的道理,刁景纯于金山经度中得见的所谓“唐人写本”,实际上是张子厚熙宁三年发现 D、E 两段之后,后人根据张本补缺、杜撰的,其年代较张、邵本更晚。

再分析欧阳修的情况,据欧阳修在《集古录·自序》中所题年月“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即 1063 年,故知欧阳公著录《瘞鹤铭》确早于张、邵、刁三本。值得注意的是,《集古录》关于《瘞鹤铭》的记载凡两条,一条称“集本”,一条称“真迹”,文字小异。据《四库全书·集古录·提要》解释:

修自书其后,题嘉祐癸卯。至熙宁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复摭其略,别为目录,上距癸卯盖六年。而棐记称录既成之八年,则是录之成当在嘉祐六年辛丑。为真迹跋尾则多系治平初年所书,亦间有在熙宁初者,知棐之目录固承修之命而为之也。

由四库提要知所谓“真迹”,其年代当在嘉祐八年编目以后,治平(1064—1067)、熙宁(1068—1072)间所书,为欧阳修晚年定稿。《集古录·瘞鹤铭》条“集本”文字已见上文所引,兹录“真迹”如下:

右在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摸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几而止。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独若此之多也。按《润州图经》以为王

羲之书，字亦奇放，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或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铭其所作也。

两相对照，晚出的“真迹”对“集本”的内容作了修订：(1)删去“余所得六十余字”；(2)删去“碑无年月，不知何时”；(3)虽然仍不能绝对确定为顾况所书，但语气中增加了肯定的成分。这种修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欧阳修晚年已经看到多于六十余字，且有年月的拓本。由此看来，A、B 两段的重刻可能发生在欧阳修完成《集古录》初稿至其逝世以前的一段时间，即 1063 - 1072 之间。如所论不误，则现存 A、B 两段根本就是宋人根据当时残存的铭文首段 30 余字^① 杜撰，或者作伪者径将原刻本中“某某岁得于华亭某某岁化于朱方”句中已漫漶的干支纪年添改为壬辰、甲午，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与陶弘景的行踪相吻合。

如前所论皮日休悼鹤、瘞鹤事在咸通十一年前后，最晚不会超过咸通十二年。结合皮日休《松陵集·序》及相关诗作，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认为皮日休咸通十年秋入苏州崔璞幕，并与陆龟蒙订交，直至咸通十三年春尚在吴中，^② 考据甚精审。则皮日休于咸通九年或十年华亭得鹤，十一年或十二年鹤死，乃悼之以诗，瘞于润州(镇江)焦山之下，并勒铭壁上，应该是完全合理的。

最后，还可对《瘞鹤铭》中“华阳真逸”等人的情况作些推测。我们注意到《瘞鹤铭》撰书及题名凡五人，而皮日休悼鹤赋诗亦恰是五人，若确定皮日休为《瘞鹤铭》的作者，二者之间必有联系。

瘞鹤勒铭固然属风雅之事，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毕竟

① 欧阳修“集本”所见为六十余字，减去 C 段的 32 字，则首段还应有原文 30 余字。

② 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八《皮日休·陆龟蒙》，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 年，497 - 516 页。又《唐才子传校笺》卷八《皮日休·陆龟蒙》，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 年，430 - 435 页。

非庄重君子所宜为,这恐怕是铭文题署全用隐名的原因所在。唐人用化名题碑,皮日休之前已有先例,李邕号称“碑版照四裔”,其所书碑铭,刻工多为黄仙鹤、伏灵芝,后人疑此二人皆李邕化名,如杨慎《字说》云:“北海(李邕)手书自刻之者数碑,碑中黄仙鹤刻,或云伏灵芝刻,或云元省己刻,皆公自刻而诡撰此名。”

《瘞鹤铭》的撰者为“华阳真逸”,从铭文的语气来看,“天其未遂吾翔寥廓”、“爰集真侣”,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故作者应是鹤的主人。但皮日休是否有可能自称“华阳真逸”呢?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记其别号有醉吟先生、醉士、间气布衣,陆龟蒙呼其鹿门子,未见“华阳真逸”之号。复检《松陵集》卷九皮日休有《润卿、鲁望寒夜见访,各惜其志,遂成一绝》诗云:

世外为交不是亲,醉吟俱岸白纶巾。
清风月白更三点,未放华阳鹤上人。

诗中“放鹤”用支遁(道林)典,出《世说新语·言语》:

支公好鹤,住剡东岭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铍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考张润卿(贲)在茅山学道,皮日休《寒夜文宴润卿,有期不至》诗“草堂虚洒待高真,不意清斋避世尘”,以“高真”呼张,是其证也。此诗既用佛门典故,必非指隐居华阳(茅山)的张贲,则“华阳鹤上人”应是作者自况,而如前所引皮日休咏鹤诗作,其爱鹤之情的确不在支道林之下。

书铭的“上皇山樵”可能是张贲。按,“上皇”为道家名词,

“上皇山”则不见地志，清吴东发《瘞鹤铭考》^①谓上皇山隐喻茅山，其说可参，吴云：

查地志无所谓上皇山者，元刘大彬《茅山志》云：初元始七传而至紫虚，紫虚九传而至隐居。元始有上皇天帝之称，是华阳之教始自上皇，以之名山，隐喻华阳也。

张贲善书，故陆龟蒙和张贲诗有句云：“玄堪教凤集，书好换鹅群。”正以王羲之写经换鹅为比。张润卿笃嗜茅山道教，居华阳雷平山，《松陵集》中皮、陆赠张诗多用茅山典故，兹录皮日休《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

先生一向事虚皇，天市坛西与世忘。
环堵养龟看气诀，刀圭饵犬试仙方。
静探石脑衣裾润，闲炼松脂院落香。
闻道征贤须有诏，不知何日到良常。

冥心惟事白英君，不问人间爵与勋。
林下醉眠仙鹿见，洞中闲话隐芝闻。
石床卧苦浑无藓，藤簟开稀恐有云。
料得虚皇新诏样，青琼板上绿为文。

凤骨轻来称瘦容，华阳馆主未成翁。
数行玉札存心久，一掬云浆漱齿空。
白石煮多熏屋黑，丹砂埋久染泉红。
他年欲事先生去，十赉须加陆逸冲。

诗中两称“虚皇”，据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一神阶中位即

^① 吴东发《瘞鹤铭考》，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涉闻梓旧丛书排印。

为“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正与《瘞鹤铭》“上皇”意同。

“𡵓口徵君”疑指毗陵处士魏朴(不琢)。政府征召而不仕者可曰“徵君”，与“处士”略同，^①如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诗云“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徵君”，呼陶渊明为“陶徵君”，而王冕《申屠子迪游兰亭次韵答之》“谁信无钱陶处士？脱巾潇洒卧浔阳”，则称“陶处士”。据皮日休《五贶诗·序》云：

毗陵处士魏君不琢，气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纪，闭门穷学，是乎里民不得以师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誉之……日休尝闻道于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

魏不琢隐居不仕，皮日休《寄毗陵魏处士朴》云：

文籍先生不肯官，絮巾冲雪把鱼竿。
一堆方册为侯印，三级幽岩是将坛。
醉少最因吟月冷，瘦多偏为卧云寒。
兔皮裘暖蓬舟稳，欲共谁游七里滩。

至于“徵君”前残字“𡵓(此字仅存右半)口”，应系地名。《瘞鹤铭》“出水本”作“𡵓(此字仅存右半)口山徵君”，或释作“𡵓嶽”，谓“嶽”字异写为上“𡵓”下“山”。吴东发《瘞鹤铭考》释作“降真山”。恐皆有误。今疑应为“绛巖(岩)山徵君”。“巖”与“嶽”形近，或古人因此字漫漶而误识。按《瘞鹤铭》题名“华阳”、“江阴”、“丹杨”及“上皇山(如前所考为茅山之别称)”，皆是茅山附近的地名，且均系道家圣地，则“𡵓口山”亦应如此。检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六“绛岩山”条云：

^① “徵君”见《后汉书·黄宪传》“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徵君。”“处士”见《荀子·非十二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二者小异，然姚思廉《梁书》将“徵士”(见梁武帝诏)何点、“山中宰相”陶弘景等悉纳入“处士传”中，是知“徵君”、“处士”亦无大别。

《图经》云：在句容县西南三十里……《江南地志》云：汉丹阳县北有赭山，其土赤，因为郡名，本名赤山，唐天宝六年改名绛岩山。

按，张敦颐之说并不甚确，“绛岩”一词东晋茅山杨、许已用之，《真诰》卷十七许玉斧诗云：“五芝被绛岩，四阶植琳瑯。”^①皮日休喜以《真诰》典故入诗，故颇疑“绛岩山徵君”一名由此而来。

“丹杨外仙尉”疑指李穀。“仙尉”典出《汉书·梅福传》，梅福曾任南昌县尉，上书言事，正直敢言。因不满王莽专权，乃弃家隐遁，传其为仙。唐人诗多用此典，如李白《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仙尉赵家玉，英风凌四豪”，孟浩然《送王七尉松滋得阳台云》“愁君此去为仙尉，便逐行云去不回”，韦庄《南昌晚眺》“芳草绿遮仙尉宅，落霞红衬贾人船”，常建《送楚十少府》“愁烟闭千里，仙尉其何如”等。检李穀和皮日休悼鹤诗结衔“前浙东观察推官兼殿中侍御史”，称其为“仙尉”也宜。至于作“外仙尉”，则可能是根据陶弘景曾化名“王外兵”^②附会。

“江阴真宰”可能是指陆龟蒙。从“绛口徵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的次序来看，皮日休曾从魏朴闻道，其位最尊，李穀生平虽不可考，但既署“前浙东观察推官兼殿中侍御史”，其年齿必长于当时尚未届而立之龄的陆龟蒙。^③但不可解之处在于江阴本是魏朴的籍里（即毗陵），陆则为吴郡人氏，何以称“江阴真宰”，确不可知，姑且存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华阳真逸”等五个名号既然是隐称，则很可能是皮日休在撰铭之时即兴所起，并非此五人真正使用

① 此诗亦见《云笈七籤》卷九十六。

② 按，“外兵”本是职官，三国以来即有之，“外仙尉”之称则甚奇特。

③ 陆龟蒙生年虽不可知，但其应与皮日休年龄相若而稍小，考皮日休生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用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八《皮日休》之说），咸通十一年（870）正三十岁，则陆在当时确未至而立之龄。

过这些别号。事实上,如“秖口徵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三号基本上都属不可能自用的名号。“徵君”亦曰“徵士”,指征引不仕之人,但仅局限于第二、第三人称,即如赵翼《陔余丛考》所言:“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徵召而不仕者曰徵士,尊称之则曰徵君。”颜延之《陶徵士诔》“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是其证也,从未有自称“徵君”者。自称“仙尉”已嫌托大,而“真宰”一词,源出《庄子·齐物论》是造物主之义,若属自称,则真僭越不敬之至。这可能正是前贤费尽心机欲在典籍中寻找能与“华阳真逸”等名号对应的人物,却劳而少功的原因所在。

第五章 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

陶弘景年谱所见惟宋王质《绍陶录》中《陶华阳谱》一种，^①该谱甚简略，仅十三条，且有讹误。今核检有关陶弘景传记资料，当以永明十年（492）谢朓所作之《陶先生小传》为最早，此后弘景从子陶翊于齐末作《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记弘景辞官以前事极详。^②传、录皆存《云笈七籤》卷一百七。但《云笈七籤》中之《本起录》并非全帙，于陶弘景永明十年入山以后之事尤多残缺，部分佚文尚保存于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中。

继《本起录》之后，弘景弟子潘泉（渊）文又有编年之作，^③其文已佚。弘景传记资料，除《梁书》、《南史》本传外，唐李渤《梁茅山贞白先生传》、李渤《真系·梁茅山贞白先生》、^④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元刘大彬《茅山志》等，亦为研究弘景生平之重要史料。今以王质《陶华阳谱》（简称陶谱）为蓝本，兼参《梁书》、《南史》本传，陶翊《本起录》、李渤《梁茅山贞白先生传》（简称陶传）、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简称陶碑）、简文帝《华阳陶先

① 《绍陶录·华阳谱》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十万卷楼丛书排印本，全文又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六。

② 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序》云：“陶翊乃作《本起录》，至齐末遂已，亦事多遗阙。”（原注：翊，先生元子也。《本起录》乃粗似详究，而患文气太平，叙述繁杂。自云：今此未便为传，且撰行业，以备遗失耳。不知何缘，至永元元年遂绝也。）

③ 《华阳陶隐居内传·序》云：“其后潘泉文复踵其作，（原注：泉文，先生门人也。自云：陶翊《本起录》迄于齐末，从此已后二十余年并未有题记，遽且随年载录，后撰传人自更详述。）始天监元年，至七年夏四月，于时先生改名氏潜游遐岳，（原注：天监七年夏四月先生改名南游，其事具于传中。）旁无知觉，于是泉文又绝笔于此。”

④ 李渤两传见《云笈七籤》卷五、卷一百七，内容全同。

生墓志铭》(简称陶志)、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简称内传)、刘大彬《茅山志》等文献,及诸道经、弘景著作、相关诗文集等详为编定。^①

年谱体例,先列本年重大事件,次传主本年活动,次与传主相关事件,殿以与传主相关人物之生卒。正文用宋体大字,考据用楷体大字,相关文献用宋体小字,陶谱凡十三条,分置相应条目之末,用宋体大字。又有数事虽见于前代文献或罗国威氏《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简称“罗谱”),然可考定非属陶弘景者,仍以宋体大字列入正文,其前标(?)以示区别,考据文字仍以楷体列其下。

陶弘景字通明。

自承为帝尧陶唐之苗裔,尧治冀州平阳,故以平阳为祖籍。

《本起录》云:“陶氏本冀州平阳人,帝尧陶唐之苗裔也。尧治冀州平阳,因居焉。”陶碑云:“本冀州平阳人,其先出自帝尧陶唐氏之后,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此。”

西汉初,有陶舍为高祖右司马。

《本起录》云:“汉兴,有陶舍为高祖右司马。”

舍子青,擢位至丞相。

《本起录》云:“(舍)子青,擢位至丞相。”按,《史记·张丞相列传》卷九十六云:“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

① 年谱草稿完成后,又得罗国威氏《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见刘跃进主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 291—328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因复校一过,据罗谱略作增补,不敢掠美,特作说明。别有日人麦谷邦夫氏《陶弘景年谱考略》刊于[日]《东方宗教》第 47、48 号(1976 年),未能检得。

相。”《史记集解》徐广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谥夷。”

自十三世祖陶超，于西汉末渡江，始移家丹阳。

按，十三世祖陶超南渡，移家丹阳事，《本起录》云：“十三世祖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陶碑云：“后至汉末南渡，始居丹阳。”^①内传云：“十三世祖超始渡江，是为丹阳人。”皆未言渡江时间为前汉、后汉，据《本起录》七世祖濬，仕吴为镇南将军，已是三国时人，故定十三世祖陶超南渡时间在西汉末。罗谱此条置“东汉有司空陶敦”后。

(?)东汉有司空陶敦。

按，《本起录》及陶碑述陶氏世系不及陶敦，罗谱据内传有此条。内传云：“西汉丞相(陶)青，东汉司空(陶)敦，皆赫然有名，论董卓烧雒阳”。检《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卷六云：“(延光四年，125)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李贤注：“敦字文理，京县人也。”则知陶敦确非丹阳陶氏，罗谱袭内传之误。

七世祖濬，仕吴为镇南将军，荆州刺史，降晋拜议郎散骑常侍尚书。

《本起录》云：“七世祖濬，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吴为镇南将军，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户，与孙皓俱降晋，拜议郎散骑常侍、尚书。”陶碑云：“七世祖濬，仕吴为镇南将军、荆州刺史。”按，陶濬传附《晋书·陶璜传》卷五十七后。另据《真诰·

① 《内传》卷下引陶碑，此句作“后汉末南渡”，较《文苑英华》所载陶碑“后”字后夺一“至”字。

真宵世谱》所载，陶濬之女适许谧祖父许尚，陶濬从子陶威（陶璜子）之女陶科斗适许谧。

六世祖谟，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领屯军。

《本起录》云：“六世祖谟，濬第三子，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领屯军，随王出许昌。因败，仍复过江，为大将军王敦参军。敦为丞相，转军諮祭酒。后随敦南下，而情惧祸及，乃启分属籍，禁锢积年。晚起为车骑丞相参军，不就。升平四年卒，始别葬白石山之岭，瞻湖北。”按，《晋书·陶璜传》卷五十七载濬子湮、猷，独未及第三子谟。

高祖毗，不肯游宦，州郡辟命并不就。

《本起录》云“高祖毗，有理识，器干高奇。以文被黜，不肯游宦，州郡辟命并不就，后板授南安正佐，亦不起，元兴三年卒。”

曾祖兴公，举郡功曹，察孝廉，除广晋县令。

《本起录》云“曾祖兴公，多才艺，巨营产殖。举郡功曹，察孝廉，除广晋县令，义熙二年卒”。

祖隆，行参征南中郎军事，侍从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晋安侯。

《本起录》云：“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状，有气力，便鞍马，善骑射，好学，读书善写，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行参征南中郎军事，侍从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晋安侯，除正佐，固辞。颜峻恃宠，就求宅以益佛寺，弗与，因辞官，见潜削爵，徙广州。后被恩除南海西平县令。后监新会郡。大明五年卒于彼。”内传略同，惟“侍从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晋安侯”句作“从宋孝武破姚泓有功，封晋安原丰侯”。

父贞宝，字国重，博涉文史，迁南台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

《本起录》云：“父讳贞宝，字国重，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辟为侍郎，迁南台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闲骑射，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书体以羊欣、萧思话法。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好文章，美风仪，凡游从，与萧思话、王钊、刘秉周旋，多为诸贵所赏遇。”内传云：“父贞宝，字国重，为江东名人。”

弘景祖、父皆解医药，多所拯救。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云：“余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内获家门，傍及亲族。其虚心告请者，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数百千人。”

母东海郝夫人，讳智湛，精心佛法。

《本起录》云：“母东海郝夫人，讳智湛，精心佛法，及终，有异焉。”

陶氏世居丹阳秣陵西乡桐下里白杨巷。

《本起录》云：“翊从叔隐居先生讳弘景字通明，丹阳人也。宅在白杨巷南冈之东。宋初土断，仍割秣陵西乡之桐下里，至今居之。”据《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云：“白杨巷，在今府城东南十八里，谢几卿免官，居白杨之石井。又何安居白杨巷，与青杨巷萧春齐名。”另于网页上检得有关陶弘景出生地研究论文一篇，未著撰人，其说尚可参，转录如后：

陶氏生于南朝宋代，卒于梁代。《南史》、《梁书》谓其为“丹阳秣陵

人”。但目前出版的各种著作说法却不甚一致。《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中国医学史》(范行准)、《中医人物辞典》等谓其为“南京人”(或是说“南京市人”);《中国医学史略》(贾得道)谓其为“南京东南人”;《中医人名辞典》谓其为“江苏江宁县东南人”;《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谓其为“江苏镇江附近人”;《中国古代医学》谓其为“江苏句容人”;还有的谓其为“丹阳人”。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对南朝宋代之“丹阳秣陵”相当于现在何地作一深入细致的考察所致。

南朝《宋书》记载,南朝宋代丹阳郡属扬州府管辖,丹阳郡下设八个县,分别是建康、秣陵、丹阳、江宁、永世、溧阳、湖熟、句容。秣陵县设于秦代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其治所在今江宁县秣陵镇。以后,随着朝代的变迁,其名称及所治区域亦几次发生变化。《万历重修江宁县志》对此记述得十分清楚,该书载:“江宁古扬州之域,自越灭吴,范蠡筑城在长干里。周显王四十八年,楚熊商筑石头,置邑曰金陵,秦改秣陵县,汉封刘缠为秣陵侯,县废。建武初复属丹阳郡,吴改秣陵为建业。晋太康元年复曰秣陵,分淮水南为秣陵,北为建业,又改建业为建康,寻分地置临江县,明年改江宁,寻废。永嘉中复置,宋、齐、梁、陈因之皆为赤县,属丹阳。”这里水即古秦淮河。考古秦淮河,本名龙藏浦,汉时起称淮水,唐以后始有秦淮河之名。此河有两个源头,东源句容河,出自句容县城北 30 公里的宝华山,汇集赤山湖水,由东向西进入江宁县湖熟镇,到龙都乡西北村与南源汇合。南源溧水河,自溧水县东南 10 公里的东庐山向北经溧水县城和江宁铜山、禄口、秣陵、龙都等地,流到西北村与东源汇合后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经南京市城区旁流入长江。按其“南为秣陵,北为建业”之划分,今南京市城区在秦淮河之北,在南朝宋代当属建康县,而不属秣陵县区域范围,故谓其“南京市人”之说便不尽正确了(这里南京市指狭义概念,即指南京城区),如从广义的南京来说,它包括城区、郊区、郊县,也终因范围太广而失去实际意义。谓“句容”、“丹阳”人则是臆说。如确为“句容”或“丹阳”人,因句容和丹阳均为丹阳郡之下属县,史书必记载其为“丹阳句容人”或“丹阳丹阳人”,就不会记载为“丹阳秣陵人”了。谓其“镇江附近人”更缺乏依据而不足取。

那么,陶弘景到底为何地人呢?笔者认为,当是今江宁县西北部(包括西中部)人,且家居沿江附近。清代陈文述著《秣陵集》论及陶弘景故里时说:“所著学苑、孝经、论语……秘密不传,及撰而未又讫十部,惟弟子得

之,故里在石城坞,今地名陶家渚。”考陶家渚一地,^①南朝确有此地。据《南史》载:“陈高祖永定二年,新作太极殿,欠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三尺,自流泊陶家后渚,监军邹子庆以闻,招以建殿……”渚者,水中之小块地也,说明陶家渚在沿江附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认为石头坞(即石城坞)在江宁县内。再从有关史料来看,晋太康三年,划分淮水南为秣陵,北为建业后,又在秣陵西南地设置临江县,不久改称江宁县,直至南朝时其区域未见变化。此时秣陵县的地理位置大体是:北隔秦淮河与建康县相邻,南与丹阳县、永世县相邻,西边西南部与江宁县相邻,西边中部与西北部则与此长江相邻,东与湖熟县相邻,形成一块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的近似椭圆型地区,相当于现江宁县中部、西北部(包括西中部)及南京市雨花区沿江一部分。因陶家渚在沿江附近,故不可能为今江宁中部及东南地带人,所谓“江宁东南人”之说难以成立。又据地学方面考证,南朝宋代时雨花区沿江地区尚属长江水域,陆地至以后才渐渐冲击而成,故属今雨花区人也不可能。至此,陶弘景属今江宁县西北部(包括西中部)人已无疑。

综上所述,陶弘景系南朝宋代丹阳秣陵陶家渚人,即今江宁县西北部(包括西中部)人,家居沿江附近。由于历代文献记载欠详,要最终确定为某乡某村人,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陶潜云:通明高风,发于梁、齐、宋去就之际,君祖父皆食宋禄,身又生宋代,自齐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齐,益退藏。平时以师待君,然大节有定操,岂复以恩礼推移。暂至丹阳,应简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怀,抑何其坚忍。壮年果于遗世,照之审,故判之不疑。^②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 丙申(456) 一岁

① 陶家渚亦见《至正金陵新志》卷五:“陶家渚,在石城坞西,古钱北使处,《长江图》谓渚西对蔡洲,吴时陶璜,或云晋陶回宅之后渚也。”按,陶弘景七世祖陶潜为陶璜之弟,说陶家渚为陶氏故宅,确有道理。

② 此条见《绍陶录》卷上“书陶通明潜”。

四月三十日甲寅夜半生，次日为夏至。父贞宝，字国重，母东海郝氏，讳智湛。

《本起录》、《茅山志》卷十并云弘景甲戌日生，据《二十史朔闰表》此年四月乙酉朔，三十日当为甲寅。

按，《梁书》本传未著弘景生年，仅云：“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五。”《南史》云：“以宋孝建三年景（即丙）申岁夏至日生。”又云：“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五（中华书局校点本改为八十一）。”若以弘景大同二年（536）八十五岁计，则当生于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壬辰，钱大昕《疑年录》卷一即用此说。今核齐梁时文献，陶碑云：“以大同二年岁在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别迁化，春秋八十有一。”陶志略同。又《本起录》撰于弘景生前，亦谓其生孝建三年。因知《梁书》、《南史》卒年八十五云云，必为八十一之误，弘景生孝建三年无疑矣。

其生有异事。

《本起录》云：“先是，贞宝携家随萧（思话）之郢州，孝建二年，萧亡。其年九月，母觉有娠，仍梦见一小青龙，忽从身中出，直东向而升天，遂视之，不见尾。既觉，密语比丘尼，云：弟子必当生男儿，应出非凡人，而恐无后。尼问其故，以所梦答。尼云：将出家。又答：审尔亦是所愿。时年二十五。其冬，仍随萧部伍还都，住东府射堂前参佐廊中。以孝建三年太岁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诞焉。是年乃闰三月，明日朔旦，便是夏至，母即沐浴而起，了无余患。”陶传：“初娠，母梦日精在怀，并二天人降，手持香炉。觉语左右曰：当孕男子，非凡人，亦恐无后。”

是年，萧道成三十岁，刘秉二十四岁，萧颐十七岁，沈约十六岁，

萧嶷十三岁，江淹十三岁，范云六岁，谢淪三岁。

按，以上年岁具用罗谱之说。

陶谱云：君生于丹阳秣陵，今上元县冶村是。母郝氏，梦两天人持炉，薰香来，有娠。今世为君，再世为孙思邈。两世肇基于郝。故其兆先形，当是本居天仙趣，报尽还人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异。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极阴日，悉禀纯阳，多起飞心，累功积行，所升当益高。推佛言，参君迹，略见。

大明元年 丁酉(457) 二岁

正月改元大明。

大明二年 戊戌(458) 三岁

大明三年 己亥(459) 四岁

大明四年 庚子(460) 五岁

始学书。

《本起录》云：“先生四五岁便好书，今犹有六岁时书，已方幅成就。”内传云：“五六岁时酷爱学书，虽戏弄罗前，惟持笔砚。”《南史》本传云：“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陶碑云：“六岁便解书，能属文。”

陶谱云：君年五岁。常持荻画灰学书。

大明五年 辛丑(461) 六岁

祖父陶隆卒于新会。

《本起录》云：“祖隆……大明五年卒于彼(新会郡)。”

大明六年 壬寅(462) 七岁

始读经书。

陶碑云：“七岁读《孝经》、《毛诗》、《论语》数万言。曼倩幼习典坟，公干少诵诗赋，方之于古，彼有多惭。”

大明七年 癸卯(463) 八岁

大明八年 甲辰(464) 九岁

闰五月宋孝武帝崩，前废帝刘子业即位。

读书著文。

《本起录》云：“九岁、十岁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杂书等，颇以著文为意。”内传云：“八九岁时读书千余卷，颇善著文。”

梁武帝萧衍生。

《梁书·武帝纪》云：“高祖以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

宋前废帝永光元年

景和元年

宋明帝泰始元年 乙巳(465) 十岁

正月改元永光，八月又改景和。十一月前废帝崩，十二月明帝刘彧即位，改元泰始。

读《神仙传》，心生向往。

《梁书》本传云：“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歛白日，不觉为远矣。”陶碑云：“有乡人得葛洪《神仙传》，见淮南八公诸仙事，乃叹曰：读此书便使人有凌云之气。于是寝兴讽诵，晨夜不辍。”

陶潜云：君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即有志养生。语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觉为远。及长，博读书，遂解文武诸伎。自后，天文、地理、人事，虽至渊妙，咸臻底极。当时已罕传，历年愈远，行世浸稀。梁传所载十二种，今传惟三种，传不能纪十种。唐志所载九种，今传惟四种。传有志无八种，传无志有五种。本草，后人增衍，考证益详，间与《集注》差异。

泰始二年 丙午(466) 十一岁

正月晋安王刘子勋潜即帝位于寻阳，改元义嘉，八月，沈攸之兵至寻阳，斩刘子勋，传首建康。

为司徒左长史王钊子王晃博士。

《本起录》云：“年十一为司徒左长史王钊子晃博士。”内传云：“作晃对答书启如老成人。”

按，据《宋书·王钊传》：“太宗（宋明帝）初，（钊）为司徒左长史。”与《本起录》之说正合，若弘景生元嘉二十九年，则十一岁为孝武大明六年，与王钊为司徒左长史时间不合，此

亦弘景生孝建三年之证也。

泰始三年 丁未(467) 十二岁

见郗愔手写之太清丹法。

内传云：“自云年十二时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欣然有志。”按，《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云：“郗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为晋镇军将军，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书，与右军相埒，手自写道经将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又按，罗谱缺此条。

泰始四年 戊申(468) 十三岁

泰始五年 己酉(469) 十四岁

弘景随父贞宝从吏部尚书刘秉至淮南郡。

《本起录》云：“十三，父贻宅席卷随吏部尚书刘秉之淮南郡。”罗谱据此系此事于泰始四年。

按，据《宋书·宗室·刘秉传》云：“(泰始)五年，出为前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还复本任。”则贞宝、弘景随刘秉至淮南事当在此年。

泰始六年 庚戌(470) 十五岁

自淮南还，寓憩中外徐冑舍。

《本起录》云：“十五归都，寓憩中外徐冑舍。后仍立别宅，从此不复还旧庐。”

作《寻山志》。

按,《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全梁文·陶弘景集》所载《寻山志》皆未著撰年,独《道藏·华阳陶隐居集》题下有小注云:“年十五作。”此志已初见出世之心,有谓:“轻死重气,名贵于身,迷真晦道,余所弗承。”所期望者“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涓兮弗远,必长年兮可期”。

泰始七年 辛亥(471) 十六岁

四月,明帝不豫,陆修静率众建涂炭斋祈禳。

泰豫元年 壬子(472) 十七岁

正月,改元泰豫,四月明帝崩,后废帝刘昱即位。

随刘秉至丹阳,与秉次子侯交好。

《本起录》云:“十七乃冠。常随刘秉尹之丹阳郡,得给帐下食,出入乘厖马。”陶传云:“年十七与江敳、褚炫、刘侯为宋升明四友。”《本起录》云:“(刘)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时为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与先生日夜搜寻,未尝不共味而食,同车而游。侯与江敳、褚炫等俱为顺帝四友,故最以才学得名。侯作《宋德颂》,连珠七警,当世称绝。”

按,据《南齐书·褚炫传》:“升明初,炫以清尚,与刘侯、谢朓、江敳入殿侍文义,号为四友。”陶传谓弘景与江、褚、刘为四友云云,疑误。且《本起录》亦仅云侯与江、褚等俱为顺帝四友,弘景不与焉。

宋后废帝元徽元年 癸丑(473) 十八岁

正月改元元徽。

始学道。

内传云：“及年二九，授上道，见上清太极法。”

元徽二年 甲寅(474) 十九岁

陶谱云：君年十九。萧将军录尚书，引为诸王侍读。故事，止典文学，无他务。除奉朝请，故事，止奉朝会请召，本不为官，虽在宦途，亦居静地。及求县，乃不遂，缘势可见。

按，陶谱所记萧道成引为诸王侍读，及除奉朝请事皆在宋末及萧称帝以后，不当系于此。

元徽三年 乙卯(475) 二十岁

既冠，不肯婚娶。

内传云：“先生既冠而不肯婚。先生澡洁去嗜欲，盖一生全不迹于声色也，且曰，吾欲萧条其魂也。长七尺二寸，疏眉长额，右肩有紫志如钱。右股有数十黑子阑干如斗形。不乐荤膻，惟进青麦占饭。酷爱松声，居必手植。常嫌读书未满万卷，乃以内书兼之。”按，罗谱缺此条。

元徽四年(丙辰,476) 二十一岁

是年冬，父贞宝出使北魏。

《本起录》云：“元徽四年冬，（父贞宝）衔使虏庭，通邻国之好，甚得雅称。”按，元徽四年当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检《魏书》承明元年不言有南使朝贡，而前一年（延兴五年）十二月则云：“庚寅，刘昱遣使朝贡。”因疑陶贞宝出使事当在元徽三年冬。又按，罗谱缺此条。

元徽五年

宋顺帝升明元年（丁巳，477）二十二岁

七月，后废帝被弑，顺帝刘准即位，改元升明。

父贞宝从北魏还。

《本起录》云：“（父贞宝）升明元年还都，具撰游历记并诗数千字及所造文章等，刘秉索看，仍值石头事，亡失，无复别本，不得传世。”

八月，司徒袁粲入镇石头，十二月，粲与刘秉等谋诛萧道成，弘景亦参与其事。事败，弘景侥幸得脱，而秉及子侯、佺死，弘景不避祸患，为刘侯料理身后。

《本起录》云：“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随刘丹阳入石头城就袁粲建事，先生与韩贵、糜淡同掌文檄。及事败城溃，即得奔出。侯及弟佺为沙门以逃，为人所获，建康狱死，人莫敢视，先生躬自收殓瘞葬，查劂旧墓，营理都毕，自此弃世，寻山而止。”又云：“侯既亡后，文章皆落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内传云：“先生乃喟然而叹曰：人无愚智，同尽百年，所贵身名遗芳寄世，惜乎刘生，名迹俱丧。”按，刘侯诗文今仅《南史·刘秉传》中存断句十三字：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

三月初二日陆修静卒，年七十一。

按，修静字元德，吴兴人，性喜道术，隐居庐山，后应宋明帝之请进京，住天印山崇虚馆，为茅山第七代宗师，谥曰简寂先生。

升明二年 戊午(478) 二十三岁

正月，沈攸之攻郢不剋，自经死，传首京师，萧道成镇东府，气焰日炽。

贞宝、弘景父子因曾参与袁粲、刘秉反萧道成事，心怀忧惕，以纪僧真之介与道成结交，道成使弘景为第五子暉、第六子暄侍读，旋除巴陵王侍郎。

《本起录》云：“值宋齐之际，物情未安，既结刘宗，常怀忧惕。父乃因纪僧真求事高帝于新亭，即蒙帐内驱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从还东府，公仍遣使侍第五息暉、第六息暄侍读，兼助公间管记事，先生时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

按，罗谱以弘景结交萧道成事系于上年。按袁粲、刘秉死石头，事在升明元年十二月，弘景尚参文檄，不当有此举也。故弘景父子之结交萧道成，必在袁、刘败后，不得已而为之者。

升明三年

齐高帝建元元年 己未(479) 二十四岁

四月，废宋顺帝为汝阴王，萧道成即皇帝位，国号齐，改元建元。

高帝登极，除太尉豫章王侍郎，不拜。

《本起录》云：“明年，侍从高祖登极，还台住殿内，除太尉豫章王侍郎，先生云，革运之际，颇有微勤，何处不容三两阶级，遂不拜。”

建元二年 庚申(480) 二十五岁

安成王萧曷除冠军将军，出镇石头，弘景随之前往。

《本起录》云：“又明年，随安成王出镇石头。”据《南齐书·高祖十二王·安成恭王脩传》：“建元二年，除冠军将军，镇石头戍，领军事。”与之正符。

建元三年 辛酉(481) 二十六岁

是年夏，父贞宝卒于郢州。弘景往郢奉迎亲棹，冬还都安厝。

《本起录》云：“次岁夏，丁孝昌府君忧，上郢奉迎，冬还都安厝。”又《南史》本传云：“父为妾所害。”

建元四年 壬戌(482) 二十七岁

三月高帝崩，武帝萧赜即位。

除宜都王萧铿侍读。

《本起录》云：“世祖即位，以振武将军起宜都王侍读。齐世侍读任皆总知记室手笔事，选须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诸侍读多有惭惮，颇致谗嫉，先生亦任

之,不以介意。”陶碑云:“年二十七,为宜都王侍读,总知管记事,榜道求贤,禁林招士,朝难其选,咸曰得人。”

作《水仙赋》,存《陶隐居集》中。

内传云:“桂阳王登双霞台,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从宜都预焉。桂阳采名颂号,各令为赋,寔十题器中,先生探获水仙,大惬意。”又云:“沈约、任昉读之叹曰:如清秋观海,第见澶漫,宁测其深。其心伏如此。”

齐武帝永明元年 癸亥(483) 二十八岁

正月改元永明。

服阕,拜左卫殿中将军。

《本起录》云:“年二十八,服阕,诏拜左卫殿中将军,颇郁时望。先生惊,亦不解所以,即告庾道敏,论诸屈滞。庾为面启武帝,武帝云:先帝昔亲命此官,卿不知耶,何其辞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叹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翻为此职?驛马非驥騄。犹欲固辞。庾切言之云:太元以来,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从此转员外郎,但问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为尔误我事。庾于时正被委托总知诸王府事。先生不获已而拜矣。”

永明二年 甲子(484) 二十九岁

母郝氏卒,年五十五。

《本起录》云:“母东海郝夫人讳智湛,精心佛法,及终有异焉。”据《本起录》孝建二年九月,郝夫人有娠,时年二十五,则永明二年卒时得春秋五十又五。

武帝构清溪宫成，弘景拜表献颂，颇称旨，将欲迁擢，会母丧去职。

《本起录》云：“年二十九，清溪宫新成，帝宴乐之，先生拜表献颂，又有伏曼容亦上赋。于是敕遣中书省舍人刘系宣旨褒赞，并敕豫旧宫金石会，于时上意欲刻此颂于石碑，王俭沮议而止。时献赋者五人，惟以先生为最，将欲迁擢，会母忧去职。”陶碑云：“齐代好治宫室，方修苑囿，青溪旧馆，更就起筑，仍奏表上颂，辞事兼美，迈彼乐职之篇，逾乎景福之制，帝省览久之，益以为善。”《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云：“青溪宫，在城东二里。《南史》齐武帝元嘉二十七年生于建康之青溪宫，后为芳林苑。”按，弘景所作清溪宫颂，已佚。

又检《南齐书·武帝纪》清（《南齐书》作青）溪宫金石乐会在八月，则陶母之逝必在此稍后。

弘景于石头城中大病，不知人事，七日乃苏，从此形容清癯。

《本起录》云：“闻人说（弘景）小来本神仪端洁，十五以上弥为美茂，每出路，人多叹美，虽冬月，行常执扇自障。年二十九时，于石头城忽得病不知人事，而不服药不饮食，经七日乃豁然自差，说多有所覩见。从此容色瘦瘠，言音亦跌宕闳缓，遂至今不得复常。”

弘景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丁忧守制，乃得间从兴世馆主孙游岳咨稟道家符图经法。

《本起录》云：“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稟道家符图经法。”内传亦云：“是岁（永明二年）东阳孙游岳始授先生道家符图。”按，罗谱将陶弘景

从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事系于永明四年，误。

又按，《梁书》、《南史》本传均先述弃官，继言：“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而考孙游岳以永明七年五月十五日卒，其时陶弘景尚在官，故绝无可能永明十年以后再从孙游岳游。

永明三年 乙丑(485) 三十岁

孙游岳诏任兴世馆主。

《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云：“孙游岳字玄达，东阳永康人也。却粒，饵麻屑松与术。齐永明三年敕征为兴世观主也。”而据《云笈七籤》卷五则云：“齐永明二年诏以代师，并任主兴世馆。”

(?)除奉朝请。

按，罗谱据《本起录》：“三年还都，方除奉朝请，拜竟，怏怏。”遂将除奉朝请事系于此，实误。考永明三年弘景尚在服中，且年三十六始为奉朝请见与从兄、与亲友书“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本起录》“三年还都”云云，疑文有夺误。

永明四年 丙寅(486) 三十一岁

永明五年 丁卯(487) 三十二岁

服阕，授振武将军，随宜都王进京。

《本起录》云：“寻授振武将军，起，特赐酒食省禄，随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进宫，先生复作颂，颂成而车驾废，不复得奏云。此颂体制爽绝，倍胜旧格。”按，颂佚。

又按，罗谱此条系永明二年，误。《本起录》先言“会母忧去职”，继云“寻授振武将军，起，特赐酒食省禄”，考当时陶父已卒，为母守制三年，古礼也，《本起录》云：“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亦其不在官之证。故《本起录》此句疑应作“起，寻授振武将军，特赐酒食省禄”，其义方允。

永明六年 戊辰(488) 三十三岁

弘景以孙游岳所授道家符图经法因历经摹写，有所失真，因于是年往茅山访求杨羲、许謐、许翔真人手书真迹，颇有所获。其著《真诰》殆始于是时。

《本起录》云：“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内传云：“游茅山，获前真杨、许兴宁中手书。”

永明七年 己巳(489) 三十四岁

五月十五日孙游岳卒，年九十一。

据《茅山志》游岳字玄达，从陆修静得杨许真法，建兴世馆于茅山，号兴世明德先生，为茅山第八代宗师。

孙游岳徒众甚多，一时名士沈约、陆景真、陈宝识咸往就学，孔德彰、刘孝标等争结尘外之好。而孙于弘景特加青睞，弘景因尽得其学，后为茅山第九代宗师。

《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引《道学传》云：“（孙游岳）密修至道，殷勤诱接，伏膺受业者常数百人。”《云笈七籤》卷五引李渤《真系》云：“（孙游岳）门徒弟子数百人，惟陶弘景入室焉。自恭侍六载，义贯千祀，惟贵知真，故特蒙赏识，经法

诰诀，悉相传授。”《茅山志》卷十云：“先生尝梦茅君曰：青华小童复降句曲汝弟子中，善护持之。永明间陶弘景入山，先生异其丰神超迈，且闻身有斗文，引省所梦曰：青华小童岂非斗中真人耶。即尽授其法。”

永明八年 庚午(490) 三十五岁

茅山所获仍有未足，乃于是年启假东行，往浙越各处访寻隐逸，搜求杨、许真迹，历二百余日乃还。

《本起录》云：“至庚午年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兆山谒法师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爰及东阳长山、吴兴天目山、于潜、临海、安固诸名山无不毕践。”按，《本起录》提到之娄慧明、杜京产、钟义山、诸僧标等，皆杨、许手书保有者，娄慧明、杜京产传记均见《南史》卷七十五《隐逸上》，其略云：“（楼）惠明字智远，立性贞固，有道术。……宋明帝召不至，齐高帝征又不至。……齐武帝敕为立馆。”“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也。……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与同郡顾欢契。……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辞疾不就，卒。”钟义山、诸僧标见《真诰·翼真检》，“诸僧标”《真诰》作“朱僧标”。弘景以所得真书手迹，尽编入《真诰》中。

永明九年 辛未(491) 三十六岁

是年还都，除奉朝请，意颇快快，乃有退隐之意。

按，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见《资治通鉴》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品秩甚低。《宋书·百官志》上云：“奉

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

作与从兄书、与亲友书。

《本起录》载与从兄书云：

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宿昔之志，谓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

又作与亲友书，见陶碑：

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今已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无为自苦也。

按，罗谱载与从兄书，未载与亲友书。

永明十年 壬申(492) 三十七岁

五月，拜表解职求去，武帝诏可。

《本起录》云：“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职，求托岩林，青云之志于斯始矣。是年永明十一年（按，当作十年）壬申岁也。先生初隐不欲辞省，出仍脱朝服挂神武门，鹿巾径出东亭。已约语左右曰：勿令人知尔。乃往与王晏语别，晏云：主上性至严治，不许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贻罪咎，便恐违卿此志，诤可作？先生嘿思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为名，若有此虑，奚为所宜。于是即不诣省，直上表陈诚。诏赐帛十疋，烛二十挺，又别敕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先生既遂命，理舳东下。”

按，弘景解官表存《陶隐居集》中，云：

臣闻尧风冲天，颖阳振饮河之谈；汉德括地，商阴峻餐芝之气。臣栖迟早日，簪带久年，仕岂留荣，学非待禄，恒思悬纓象阙，孤耕垄下，席月洞门，横琴天际，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灭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东阙，故乡就望，睽言兴念，临波泻泪。臣舟棹已遄，无缘躬诣，不任攀恋之诚。谨奉表以闻。

齐武帝答诏见《茅山志》卷一：

卿遣累却粒，尚想清虚，山中闲静，得性所乐，当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需，便可以闻。仍赐帛十疋，烛二十铤。

又：

朕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

又按，齐武帝此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误著为梁武帝，入《全梁文》卷三，严可均谓见《道藏·陶隐居集》。今检《道藏》，此诏答附解官表后，并未言出梁武帝之手，且前引《本起录》已明言赐帛、烛、茯苓、白蜜等，事出齐武，《南史》、《梁书》赐给事亦与辞官连书，其为齐武帝事也明。钱锺书《管锥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条第一九二，亦袭误以此诏为梁武帝，并云：“（梁武帝）自戒蜜而以蜜给人，岂以陶为道士，不同佛弟子多禁断欤？则此诏当颁于陶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之前矣。”

又，《梁书》、《南史》本传皆先叙弘景辞官，于茅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居事，乃云：“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甚谬。孙卒于永明七年，陶从孙问道实在永明二年。

众于征虏亭饯行，与宜都王惨然作别。

《本起录》云：“众宾并饯于征虏亭，举酒挥袂，皆云江东比来未有此事，乃见今日尔。”内传云：“将行，与宜都王别，彼此呜咽，各不能发一言，左右莫能仰规。或谓宜都王云，

相爱重如此，那听其去。王云，今为天下胜事，天子许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镜赠，别给在山吏役数人。”《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云：“征虏亭在石头坞，东晋太元中创。《世说》注：《丹阳记》曰，太元中，征虏将军谢安止此亭，因以为名。”

乃隐于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于大茅、中茅间之积金岭西筑华阳上下馆，因自号华阳隐居。

《本起录》云：“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称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挂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号。”陶碑云：“尔乃杖策孤征，游践山岳。既而到于句容，登于茅岭，以此地神仙之官府，灵异之栖托，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今我义通无复其一，请同求志之业。故自称隐居，亦犹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又《登真隐诀》云：“上馆以研虚守真，下馆以炼丹治药。”

按，《至正金陵新志·茅山图考》论茅山形势甚详，摘要引录如次：

茅山在句容县东南四十五里，周回一百五十，初名句曲山，像其形也。茅君得道，更名曰茅山。三十六洞天之数，第八曰金坛华阳之天，此山是也。《史记》禹封泰山，禅会稽。晋灼曰，本名茅山。《吴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群臣，更名茅山为会稽。一曰苗山。《茅山记》曰：大茅山独高处，黑帝命东海神埋大铜鼎于山顶，深八尺，上有盘石镇之，黑帝即颞项也。又曰：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游会稽，还登句容北垂山，埋白璧一双，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守苍川，勒铭素璧。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邕，赉黄金白玉铜钟五口，赠三茅君。光武建武七年三月，遣使者吴伦赉黄金五十斤帛玉，献三茅君。近山顶有埋金处，上有聚石。又曰：中

茅山独高处，司命君埋西胡玉门丹砂六千斤，深二丈，上有盘石镇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饮之延年益寿。左真人就司命君乞得一十二斤，以合九华丹。山顶石坛石案今存。今三阳百姓多长寿者。盖太阳、北阳、朱阳三村耳。《茅君内传》：句曲山秦时华阳之天，汉宣帝时，三茅君居之，遂名茅山。内有积金山，因以金为坛，周时名其源泽为曲水之穴，秦时名勾金之坛。似己字，故以勾曲名焉。真诰曰：金陵句容之句曲洞，为第八洞天。又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种民，是处五灾不干。又曰：金陵者，洞虚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履之者万万，知之者无一。按《茅山志》，茅庵字初成，华阳人也，隐华山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升。是时有民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降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始皇闻之，问故老，答曰，此仙谣也。于是有寻仙之意。庵之孙玄盈，得道于金陵句曲山，上升为东岳上清司命真君，太元真人。居赤城时，来句曲，弟茅固、茅衷皆得道于此。邦人改句曲为茅君山。《洞天福地记》：福地七十二，地肺为第一。即金陵是也。金陵之地，水至即浮，故比之于肺。《抱朴子内篇》：别有地肺山，乃玉留屿。又商山亦名地肺。今以内传正。山中有大茅峰，（山顶有圣祐观，奉大茅君真应真君。峰北华阳洞之东，有崇禧万寿宫，东南有崇寿、华阳二观。）中茅峰，（山顶有德祐观，奉中茅君妙应真君。西有升元观，旧为白鹤庙，与祠宇宫相邻。清真观在大罗源。）小茅峰，（山顶有仁祐观，奉小茅君神应真君。与德祐、圣祐二观皆延祐三年定额。）抱朴峰，（大茅峰北。）白云峰，（中茅峰西有白云崇福观。）五云峰，（小茅峰侧，有五云观。）积金峰，（大茅中茅二峰之间，陶隐居弘景所住。有元符万宁宫、华阳观、天圣观、栖真观。）叠玉峰，（大茅东南，有藏真观。）华盖峰，（在崇寿观东南。）四平山，（大茅西南，俗称方山。）良常山，（茅山北垂。）华姥山，（大茅崇禧宫南。）郁冈山，（小茅峰东北，有乾元观。）龙尾山，（大茅东。）东方山，（东连仙几山。）伏龙山，（在柳口之间，有抱元观。）雷坪山，（伏龙山东，有玉晨观。）方隅山，（雷坪山东北，有无洞宫。）秦望山，（良常山东北。）丁公山，（积金山西，有紫阳观。）自大茅山后，菲山、竹山、吴山，连峰叠嶂，达乎吴兴天目诸山，许迈所谓洞庭西门，潜通五岳。（洞庭，即今太湖。）陶弘景亦云：三茅山东通王屋，西达峨眉，南接罗浮，北连岱岳。朱文公谓岷山之脉，由衡山南出，而东度大

庾岭者，包彭蠡之源，而北尽于建康。然者茅山形势，实与西蜀峨山峨眉相为首尾，蒋山、金陵，特其脉之尽者。其为扬州之镇山，为江南之名藩会府，岂不宜哉。^①

与陶弘景一同入山者有弟子陆逸冲。

按，陶弘景《授陆敬游十赉文》云：“昔我纡绂帝闱，侍笏梁席，虽迹混教途，而心标异境。芝田之想，无忘晓夜。濠颖之志，岁月已深。至德有邻，风云相会。尔之来也，爰移两春。于是僦带青墀，挂冠朱阙，携手东驱，创居兹岭。”则知陆逸冲是陶弘景弃官之前所收弟子，并随师入山。罗谱缺此。

女弟子钱妙真亦于是年前后入山。

说见普通三年“女弟子钱妙真于燕洞宫迁化，年四十九”条。罗谱缺此。

弘景一生著述甚多，年代不能确考，据《茅山志》卷九列弘景在世所著书计十二种，参以《本起录》、内传等，可确定为弘景辞官以前作者凡二十种。

今考其著述，目录详列如下：

《学苑》一百卷（《本起录》云：“此一书先生常云：群书舛杂，欲探一事，不可遍检。乃抄古今要用，以类相从，为一百五十条，名为《学苑》，比于《皇览》十倍该备。近赐翊语：吾无复此暇，汝可踵成之。此书若毕，于学问手笔家无复他寻之劳矣。”）；《论语集注》十卷；《孝经集注》一卷（以上两书皆见《隋志》，《本起录》云：“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共一秩十

^① 《南京文献》，第四册，上海书店，1991年，32页。

二卷。”)；《三礼序》一卷(《隋志》作《三礼目录注》)；《注尚书毛诗序》一卷(《隋志》作《毛诗序注》)；《老子内外集注》四卷；《三国志赞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语阙字》二卷(《本起录》云：“依陆文更以意造世语所阙者。”)；《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古今州郡记》三卷(《本起录》云：“并造西域图一张。”)；《帝王年历》五卷(《本起录》云：“起三皇至汲冢竹书为正，检五十家书历异同共撰之也。”《南史》本传云：“著《帝代年历》，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员仪集》三卷；《玉匱记》三卷(《本起录》云：“说名山福地事。”)；《七曜新旧术》二卷；《占筮略要》一卷；《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算数艺术杂事》一卷；《举百事吉凶历》一卷。此外，《真诰》之资料搜集虽开始于永明初，而其最后成书，则在入山以后。

除著作外，弘景尚造有浑天象等。

《本起录》云：“又作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见伏早晚，以机转之，悉与天相会。云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时轮转循环，不须守视，而患涧水易生苔垢，参差不定，是故未立。”《南史》、《梁书》本传略同。

弘景既辞官入山，谢朓从吴兴还都，闻之，甚嗟赏，因作《陶先生小传》。

《本起录》云：“永明十年，太岁己卯，谢詹事朓先从吴兴还，闻先生已辞世入山，甚怀嗟赏。于路中仍为前传，虽未

能究洽，而粗举大纲，有似王右军作《许先生传》。”按，谢传载《云笈七籤》卷一百七，其略云：

先生讳弘景，丹阳人也。幼标异操，聪明多识，五经子史皆悉详究，善书，得古今法，不肯婚宦。以资营未立，且薄游下位，为宜都王侍读。年二十余便稍就服食，遵行道要，所得符文妙法，并是真人遗迹，于是业行渐进，乃拂衣止于茅山焉。观其神仪明秀，盼睐有光，形细长项，耳间矫矫，显然异众矣。

陶谱云：君年三十七。家贫，求宰县不遂，脱朝服挂神武门去，止句曲山。体即轻捷，性嗜山水，所历必吟咏盘旋不已。语人，吾见朱门广厦，虽适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难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禄，得辍差舛。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亦缘势使然。此语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缘，次有势，相符乃入。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惟难契，故旷世难就。

永明十一年 癸酉(493) 三十八岁

七月武帝崩，郁林王萧昭业即皇帝位。

是年宜都王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姑熟。弘景有诗寄之。

按，《南齐书·高祖十二王列传》云：“十一年，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姑熟。”内传云：“（弘景）常题桐叶作诗寄宜都王，其末云：愿为双白羽，长拂舆前尘。”

沈约为东阳郡守，邀弘景，不至。

《梁书》本传云：“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按，沈约除东阳郡守在永明末，今《沈隐侯集》中《与陶弘景书》或即当时所作，书云：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独远，列霓羽带，总轡云霞。方当名书绛简，身游玄阙，凭星夕卧，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暖焉难睹。虽欲下风问道，未知厥路。若夫栖迟间远，咀嚼琼芝，出入清都，师友灵圣，循崖反迹，无缺惟心。

作《华阳颂》十五首。

罗谱以《华阳颂》系于此年，未言所据。按，此颂实陶弘景《真诰·稽神枢》后首载之，前有小序云：“隐居今所安经昭灵台前，欲立小石碣子，刻书华阳颂十五篇，皆赞述此山洞内外事，庶以标诚灵府，永垂远世，而未办作石，今且载其文于此。”

陶谱云：君年三十八。沈约为东阳，屡要不至，自栖句曲不出。所谓徧历名山，求访仙药，或未然。一至句章，礼育王塔。一至丹阳，应太子召。他适皆无考。又言，往东阳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亦无考。惟杨羲灵宝五符传句容葛粲，粲以传陆修静，陆以传孙许翊。二景歌，章灵民出都遇得，以与孙。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间，非远适而后传。

按，陶谱所云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事，当在永明二年。且孙游岳乃东阳人，谱言往东阳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亦谬。应太子召及礼阿育王塔云云，皆梁武即位，弘景晚年之事，不当记于此。又谱漏记弘景天监七年化名出游事，而谓“他适皆无考”，亦属失考。以上事迹，详相关各条。

齐郁林王隆昌元年

齐恭王延兴元年

齐明帝建武元年 甲戌(494) 三十九岁

正月,改元隆昌,七月废郁林王,恭王萧昭文即位,改元延兴,十月废,明帝萧鸾即位。

十一月明帝诛宜都王,弘景因著《梦记》用为缅怀。

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延兴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月十八日忽梦王云云。先生眠觉,悲怛惊怪,明日使人出都参访,云(王)以此月十日致薨矣。”据《南史·齐高帝诸子传》,是年,明帝诛高、武、文惠诸子,宜都王萧铿仰药死,年十八。《南史》云:“初铿出阁时,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云:某日命过。身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著《梦记》云。”《本起录》云:“《梦记》一卷,先生自记所梦征想事,不以示人。”《梦记》已佚。按,弘景初为宜都王侍读在建元四年,王方稚龄,弘景适永明十年入山,侍王近十年,情谊极深。据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先生昔为安成、宜都二王侍读,而通与诸王少长款狎。武陵、鄱阳、桂阳、衡阳皆眷遇殊常。每一往辄言话终日。永泰之世,慎避形迹,恒示疏退,由是无声累。宜都幼有识度,且待受最久,弥尽亲密,先生亦竭诚陪赞。及闻先生当辞世绝俗,屡致涕泗,临行告别云云。”则弘景所撰《梦记》必是沉痛之作,有干时忌,故《本起录》谓“不以示人”。

建武二年 乙亥(495) 四十岁

明帝夺位后,颇笼络道众,乃有敕令弘景东祈名山。

《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云:“齐建武二

年，陶受敕东祈名山，因寻经典也。”按，罗谱缺此条。

答谢中书书疑作于本年。

《陶隐居集》中有“答谢中书书”一篇，谢中书应即谢朓，据《南齐书》本传，朓建武初曾“掌中书诏诰”，故得称“谢中书”，至建武二年夏谢朓出守宣城，友朋唱和乃呼为“谢宣城”，不称“谢中书”矣，如沈约有《和谢宣城》。另据“答谢中书书”本文皆描述永嘉风景，考陶弘景平生东游凡三次，一在永明八年（490），一在天监七年（508），一即本年之“东祈名山”，谢朓卒于永元元年（499），故知此书必作于建武二年（495）也。罗谱缺此。

建武三年 丙子（496）四十一岁

二月，明帝又遣使迎弘景出居蒋山，固辞，乃止。

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齐明帝三年二月，敕迎先生出居蒋山，先生固辞，并因江祐陈启，乃停。从此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餉赐重叠，随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

按，明帝召弘景出山事亦见《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然说法有异，录此备考：“及齐明帝践祚，恐幽祇未协，固请隐居诣诸名岳，望帙展敬。遂周旋五郡，经历三年，事迄，迎还。令憩钟岭。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餉赐重叠，随意所求。”

明帝又有问“山中何所有”，弘景以诗代答辞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按，此诗《陶隐居集》标题作“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未言答何帝之问。考此诗最早见于北齐阳玠松《谈

藪》，云为答齐高祖问，而齐无高祖，故《古诗源》引作齐高帝，然高帝时弘景尚未入山，亦不应有此问。颇疑高祖为高宗（明帝）之讹，正此年邀弘景出山时之问也。诗谓“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云云，正明志之辞。

弘景入茅山之先，已有蒋负刍于建元二年（480）在山建崇阳馆修道，后蒋又于许长史（许谧）旧宅立陪真馆，乃与弘景之华阳馆毗邻，至此年，又有薛彪之从东川移居茅岭，明帝为筑洞天馆于大茅山东岭以居之，三人共修上法。

《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引《道学传》云：“薛彪之，晋陵人也。齐建武二年停东川，采访真秘，三年乃返。启敕于大茅山东岭立洞天馆也。”《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道学传》云：“薛彪之闻陶隐居委绂，架石室与蒋负刍邻居接宇。彪叹曰：彼二人者可为道友，何为久滞东川。于是命棹来归，便相就共住，日夕讲习。”

与弘景同游道友尚有潘洪，《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道学传》云：“潘洪字文盛，山阴人。幼辞家入山，修禀上法。陶贞白见而悦之，遂与投分共游诸处，寻求真书。”

建武四年 丁丑（497）四十二岁

弘景为杜绝干扰，乃于是年于华阳上馆侧筑三层楼。

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四年，筑架层楼，规欲杜绝。”

建武五年

永泰元年 戊寅（498）四十三岁

四月，改元永泰，七月，明帝崩，东昏侯萧宝卷即位。

谢朓卒。

按，朓字义洁，谢庄之子，谢朏之弟，永明十年作《陶先生小传》。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 己卯(499) 四十四岁

正月，改元永元。

弘景所造三层楼落成，移居其中，不与物接。

《梁书》本传云：“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僮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永元元年移住，便与物顿隔，外间简牘亦削去。”沈约作《华阳先生登楼不复下赠呈》云：

侧闻上士说，尺木乃腾霄。云骈不展地，仙居多丽谯。卧待三芝秀，坐对百神朝。衔书必青鸟，佳客信龙骖。非止灵桃实，方见大椿凋。

至是年弘景入山已七载，门人吴郡陆敬游为其营建馆舍，独任其劳，弘景因为其筑连石之邑于积金山，并遣总事弟子戴坦授陆十贲文，赐其为“栖静处士”。

据《内传》云：“是岁，命弟子戴坦秉策执简，授门人吴郡陆敬游建连石之邑并十贲。”《三洞珠囊·救导品》引《道学传》云：“陆逸冲字敬游，海盐阳渎人也。少笃道法，接物则贵贱均意。善于抚众，为远近所依也。”

弘景从子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应作于是年。

按,《本起录》虽不著撰年,而记事据内传云:“不知何缘,至永元元年遂绝也”。(内传引《本起录》文字实迺于天监中,殆门人潘渊文补作者。)内传又引弘景门人潘渊文语“迺于齐末”,故知其必为入梁以前之作。

褚澄卒。

按,褚澄字彦道。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称道褚澄医术云:“褚澄疗寡妇、尼僧,异乎妻妾,此达其性怀之所致也。”

杜京产卒。

按,杜京产字景齐,杜道鞠子,杜子恭玄孙,吴郡钱唐人。杜家累世奉道,道鞠、京产父子保有杨、许真书手迹甚多,《本起录》谓陶弘景永明八年曾“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真诰》卷十二记陶弘景与杜京产交往有云:“钱唐杜微士事京产,先与隐居共有诗咏,以赞述斯德,别在集中。”《南齐书·隐逸·杜京产传》云:“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

谢朓卒。

见《南齐书》本传,年三十六。

陶潜云: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筑楼高三层,身处其上,弟子居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不娶,无子,他眷亦不通。先断此根,可议他事。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聆响为乐。间独游泉石。此门忌浊便清,神仙上景多云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类是。所谓熟之、养之、复之。若欲成办,必加将护,大要离尘换境为上。

按,陶潜谓“他眷亦不通”,实未必然。永明十年后,从

子陶翊之《本起录》仍记事详明,可见来往甚密。又,弘景虽不妻无子,然从兄以子松乔为嗣,见《南史》本传。

永元二年 庚辰(500) 四十五岁

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知帝使人刺己,遂与吕僧珍等,以“昏主暴虐,恶逾于纣”,于襄阳起兵叛齐。

弘景虽居深山,颇留心时事,知齐祚不久,乃暗中与萧衍通音书。

陶传云:“永元二年,深托向晦。”

作《肘后方》。

陶弘景《肘后方·序》云:“太岁庚辰。”按,《肘后方》为葛洪所著,载方八十六首,弘景将其合并为七十九首,复添二十二首,得一百零一首,用佛经“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意,取名《肘后方》。此书今存《道藏》中,又别有单刻本,但皆文字错乱,难于卒读,今人尚志钧有补辑重校本,尚称完善。

又按,据《肘后方》自序知,弘景另两部医药著作,《效验方》(据《本起录》,此书全名为《效验施用药方》)及《药总诀》已先于《肘后方》完成,但具体时月不可考,姑系于此。两书均佚,《药总诀》尚有陶弘景自序一篇存《华阳陶隐居集》中。

永元三年

齐和帝中兴元年 辛巳(501) 四十六岁

三月,齐南康王萧宝融于江陵即皇帝位,改元中兴,以萧衍为左仆射。九月,萧衍督军围建康,十二月入城。

当萧衍兵围建康未克之际，时人多存犹豫观望之心，而弘景乃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称颂。

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先生自永元以来，深托向晦，闻义师西下，日夕以覬及届于新林，便指毫赞奖，遣弟子戴猛之假道传送，行达皂荚桥，不能得造至登石头，复使李嗣公仰奏，即获闻答，时十一月朔日也。时台堞犹自严固，时人惩崔氏复匱，多怀犹豫，先生不疑，庶事必决也。”按，戴猛之疑即为陆敬游授十赉文之“总事弟子”戴坦。

陶谱云：君年四十六。萧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谒。初，齐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遂以梁建国。后覆没，亦预言朱点己巳，诗叹朝阳重离七元，卒验。虽隐茅山，不却人主询谋。中大通初，献善胜、成胜二刀。度武帝徂陈庆之覆魏洛阳，好大之心浸侈，参会侯景，大触骇机，岂尽忘救世者，但观时耳。早慕张良甚深，黄石编书，盖传真秘谍兵法。其间余事，推己及物，亦致平绪术。此门隐除魔，显定乱，学道者问及。君著水镜、握镜当是早为，岂挂晚念。

中兴二年

梁武帝天监元年 壬午(502) 四十七岁

二月，齐和帝下诏禅位于梁王萧衍。四月衍即皇帝位，立国号梁，改元天监。

和帝既有禅代之议，而国号未决，弘景乃援引图讖，称梁字为应运之符。

《南史》本传云：“弘景援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

进之。”内传云：“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中水刃木处，及诸图讖，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

春末夏初之际，复请弘景为定登极时日，梁武帝用四月八日丙寅。

内传引《本起录》佚文云：“春末夏初，当就昭告，沈约宣旨，又请尅日。先生虽疏数日，而正拣四月八日丙寅也。”

梁武帝即位，弥加钦重，令其核造历书，并有意邀之出山，弘景乃绘两牛，一在野悠闲，一在田力作，以明心迹，帝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然国家大事每以咨之，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南史》本传云：“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按，梁武以太清三年崩。）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惟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敦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多不纳受，纵留者即作功德。”内传云：“（梁武）乃与先生书曰：今万乘为累，欲东向修弟子礼，其可得乎？因问享国之期曰：吾历数奢促如何？先生启云：再环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则直上七七，然后乘彼白云。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预轸来兆，皆此类也。”

弟子桓闾得《太平经》古本，以示弘景。

《三洞珠囊·教导品》引《道学传》云：“桓闾字彦舒，东海丹徒人也。梁初昆仑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内有黄素写

千君所出《太平经》三部。村人惊异，广于经所起静供养。闾因就村人分求一部，还都供养。先呈陶君。陶君云：此真千君古本。闾将经至都，便苦劳瘵，诸治不愈。陶贞白闻云：此病非余，恐取经为咎。何不送经还本处。即依旨送，病乃得差耳。”

(?)八月十五日，弘景弟子桓闾卒。

《桓真人升仙记》谓桓以大梁天监元年八月十五日升仙。实误。按，桓闾又作桓法闾，又作桓凯，号清远。《升仙记》于弘景颇多贬损之辞，殆后人因不满弘景崇佛而作，其中记事颇有可疑。又检陶碑有云：“门人桓法闾等，慕逸风于缙氏，结遗想于乔阳，勒玄碑而相质，腾绛霄之流芳。”则大同二年弘景卒时，桓尚在世。

陶谱云：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与游，及即位，恩礼弥笃，问讯弗绝，屡诏不出。画两牛，一牧放水草之间，一金络头，人执杖驱之，知不可复致。旁族季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尝叹，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门风，何繇乃尔。

天监二年 癸未(503) 四十八岁

范云卒，年五十三。

按，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仕宋、齐、梁三朝，曾作《答句曲陶先生诗》云：

终朝吐祥雾，薄晚孕奇烟。洞涧升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怀贞士，被褐守冲玄。石户栖千秘，金坛谒九仙。乘鹄方履汉，警鹤上腾天。
(见《文苑英华》卷二二七)

天监三年 甲申(504) 四十九岁

四月初八佛诞日，梁武舍道入佛，于佛前自誓忏悔。

梁武帝诏云：“弟子比经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散，弃迷知反，今舍旧翳，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十一日诏更明确以老教为邪，佛教为正，云：“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事见《法苑珠林》卷五十五《舍邪归正》，又见《广弘明集》卷四。

弘景应梁武之请，为其开炉炼制九转神丹。

《南史》本传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内传云：“天监三年，夜梦有人云，丹亦可得作。是夕，帝亦梦人云，有志无具，于何轻举，式歌汉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黄陆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阙。宜及真人，真心无难言也。先生初难之，吾宁学少君邪？帝复以梦旨告焉。乃命弟子陆逸冲、潘渊文开积金岭东以为转炼之所。凿石通涧，水东流矣。先生以谓丹品盖多，黄帝九品九丹、王君虹景、左慈九华、五灵七变、神精召魂之属，或方法舛略，难可凭用，或品例卑近，不得高通。复有二金液，亦营合有碍。高真上法有四，而四蕊未显，琅玕渊重，曲晨精妙，惟九转所用药石，皆可寻求，制方之体，辞无浮长，历然可解，乃緘愿毕志。”

沈约作《均圣论》崇佛，弘景则有《难镇军沈约均圣论》非之。

按，两论皆未著年月，以沈约此年正月为镇军将军，故定为本年之作。又按，沈约《均圣论》疑秉梁武帝崇佛之旨，陶弘景以道教立场辩之，约乃复作书为答。其答辩文之末

句用词尤重，云：“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文皆详二人集中。

八月十五日，华阳上馆侧作井，有铭。

《茅山志》卷八云：“陶真人丹井，在华阳上馆前石桥之东，水甘冷，遇旱不竭。政和初，道士庄慎质修索得之，初去土三尺许得石井栏，已破，段合之尚全，环刻大字云：先生丹阳陶，仕齐奉朝请，壬申岁来山。栖身高静，自号隐居。同来弟子，吴郡陆敬游，其次，杨、王、吴、戴、陈、许，诸生供奉阶宇，湖孰潘遵及远近宗稟，不可具记，悠悠历代，诤勿识焉。梁天监三年八月十五日，钱唐陈慙宣书。”

是年梁武帝欲合神仙饭，有敕问陶弘景，令论中药牡荊功效。

《证类本草》卷十二引《本草图经》载陶弘景《登真隐诀》佚文云：“天监三年，上将合神仙饭，奉敕论牡荊曰：荊，花白多子，子粗大，历历疏生，不过三两茎，多不能圆，或偏或异，或多似竹节，叶与余荊不殊。蜂多采牡荊，牡荊汁冷而甜。余荊被烧，则烟火气苦，牡荊体慢汁实，烟火不入其中。主治心风第一。于时即远近寻觅，遂不值，犹用荊叶，今之所有者云。”

是年为许谧六世孙许灵真立嗣真馆于茅山。

陶弘景《许长史旧馆坛碑》云：“今有玄孙灵真在山，敕立嗣真馆，以褒远祖之德。”据《茅山志》卷十五，此馆天监三年立。

天监四年 乙酉(505) 五十岁

是年春，弘景移居积金岭东涧，专事炼丹。

内传云：“四年春，先生出居岭东，使王法明守上馆，陆逸冲居下馆，潘渊文、许灵真、杨超远从焉。是岁有事于炉燧。”

按，陶弘景炼丹事之起因说者不一，《南史》本传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似是陶弘景欲炼神丹乞帝给药石，而《隋书·经籍志》则云：“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如天监三年条引《内传》云云，知《隋书》所说差近事实。

是年，梁武又令南岳道士邓郁之合丹。

内传引《登真隐诀》云：“（邓）宜都夷陵人。天监四年湘州刺史杨公则携下都，启闻，进见。权住蒋山，后敕给九转药具，令还山营合。”

陶谱云：君年五十。移居积金涧，泉石益奇，无蛇虎，有嘉木及杂药。初乏青林，及来居，皆自茂。在句曲东塋。

天监五年 丙戌(506) 五十一岁

元旦、重九、岁末三次开炉，丹皆未成。而与梁武之约，似以五年年末为期，弘景心怀忧虑，乃以地近朝市，岩林浅近为托词，遂有移徙远游之心，武帝阻之，其心稍安。

内传云：“明年元日，开鼎无成，重九复燧，亟多不偶，限竟开鼎，复无成。先生平居，凜然如斋戒，自摄心转炼，弥能谨笃。至于燃鼎用阳燧，日中取火，盖其精如此。性少睡，未尝昼寝，夜坐往往及晓。常于月明读书，及是为积烟所

熏，火下欲不见字，帝知之，送波律烛。先生以为营非常事，宜声迹旷绝，而此山密迳朝市，岩林浅近，人人皆云有望，事丹家酷忌。姑改服易氏，遐遁东迈，当去建晋中。以其山海深旷，民不知道，见所营为无关视听。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为，是独济小道。若脱尔便逝，不可以为教迹。乃以意启梁武，梁武难之。先生撰意直往，不复疑异，惟是心计旁无知觉。”

按，内传引《本起录》云：“年末限意（疑应是竟字）开鼎，下鼎绕（疑有脱文）。”又引《登真隐诀》云：“四年初营，自起火至限竟，用壘谷糠凡一千二百斛。”皆言“限竟”，因知炼丹之事必与梁武帝先有约定也。

又按，罗谱此年仅记元旦、重九两次开鼎。

天监六年 丁亥(507) 五十二岁

天监七年 戊子(508) 五十三岁

四月，弘景托言静斋，乃于夜半携从者二人，化名王整官，号外兵，从茅山出走。转道东阳，暂居楠溪青嶂山，僦田自作。

按，内传正文虽未记出走年月，其序云：“天监七年夏四月，先生改名南游，其事具于传中。”正文云：“称静斋五旬，一皆断绝，乃以夜半出山，天大晦冥，人莫能见。负笈以从者二人，改名氏曰王整官，称外兵。初欲入剡，或度天台至浙江，值潮波甚恶，乃上东阳，仍停长山，闻南路有海掠不可行，稍进赤岩，宿瞿溪石室，梦人告云：欲求还丹，三永之间。乃自思惟，知是永嘉、永宁、永康之际。因是出访村人，咸云过此室上百余里至永康，兰中山最为高绝。诘朝乃往。经纪山，良可居，惟田少，无议聚糠。后入楠溪青嶂山，爱其稻田，乃居。”又引集卷云：“先生因以此行皆不偶，自缘海数郡

从来晏如，二三年来，无山不寇，先生亦僦田自作。”

任昉卒，年四十九。

按，任昉字彦升，颇有才名，时人有“任笔沈诗”之称。据《本起录》弘景曾为《述异记》作序，文佚。祖冲之、任昉皆有《述异记》之作，从陶弘景与任昉关系来看，此序极有可能是为任昉《述异记》而作。

天监八年 己丑(509) 五十四岁

居青嶂山期间，生皈依佛法之心。

《茅山志》卷十云：“至永嘉楠江青嶂山，梦佛授记，名胜力菩萨。住大若岩修所著《真诰》。”按，罗谱缺此条。

天监九年 庚寅(510) 五十五岁

约在此年，由青嶂山到永宁，投永宁令陆襄，住天师治堂，收弟子周子良，授以仙灵箓、老子五千文、西岳公禁虎豹符等，周时年十二。见弘景所著《周氏冥通记》。

按，《冥通记》未著至永宁之时月，而谓周生建武四年，弘景与周相遇时周十二岁，由此推知。又按，罗谱缺此条。

约在此年左右，沈约有《奉华阳王外兵》诗。

沈诗云：

餐玉驻年龄，吞霞反容质。眇识青丘树，回见扶桑日。烂熳蜃云舒，嵌崆山海出。

天监十年 辛卯(511) 五十六岁

以连年饥谨，炉火所需谷糠难寻，是年乃携周子良作霍山之行。

据《茅山志》卷二十《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云：“七年往永嘉楠江青嶂山，十年涉海诣霍山。”内传云：“会荒伦连岁不谐，兼寇掠充斥，乃曰：尝闻五岳图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乃自海道往焉。过牛岑，出海口，东望扶桑，乃慨然叹曰：平生使无学而不学，今日一皆休矣。霍山连略当六七百里，隐隐如阵云，岩崿惊拔，特异他处。先生足躐真境，心注玄关，大有灵应感对，事秘不书。”

天监十一年 壬辰(512) 五十七岁

在霍山仍患田少乏糠，以是年六月复还永嘉，八月住木溜屿。

内传引《登真隐诀》云：“壬辰年六月，便乘海还永嘉。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墟，孤立海中，都无人居，甚可营合。八月，至木溜，见其可居，始上岸起屋。”

会梁武遣司徒慧明召弘景，十月，慧明至木溜屿宣敕，固辞不允，乃与之还。

内传引《登真隐诀》云：“十月，司徒慧明至。于时，愿得且停木溜，与慧明商榷，往复积日，永不敢许，于是相随而还也。”

其间，假道鄞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

按，弘景礼阿育王塔受戒事，《梁书》、《南史》本传均无异辞，然皆不书年月，陶谱更误系于大同二年条。今据《茅山志》卷十云：“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武帝有敕迎还旧山，因诣鄞县礼阿育塔，自誓受五大摄戒。既归，入住东涧。”又按，罗谱缺此条。

至晋陵，有敕进京，辞以疾，乃于年底还山。

内传云：“会上使司徒慧明迎还旧岭，道中书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

按，陶弘景还山时间当在当年年底，陶碑云：“十一年有敕遣司徒慧明征先生还茅山，别给廨宇。”《周氏冥通记》卷一云：“（周子良）十一年从（陶）还茅岭。”惟独《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云：“十一年夏还木溜屿，其年十月奉敕迎还旧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若谓由木溜还山费时一年，确与梁武帝迫切命归之诏令不合，又检《周氏冥通记》卷一云：“（天监）十二年秋，其（指周子良）家中表亲族来投山居。”亦证明天监十二年陶弘景、周子良均在茅山。罗谱从《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以陶弘景天监十三年正月还茅山，恐误。

天监十二年 癸巳(513) 五十八岁

沈约卒，年七十三。

按，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仕宋历征西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入齐为太子家令，历尚书左丞，吏部郎，东阳太守，五兵尚书，梁武受禅，除仆射，尚书令，封建昌县侯。约以诗文著名，其与陶弘景交往甚密，今存赠陶诗四首，其中《华阳先生登楼不复下赠呈》、《奉华阳王外兵》已见前，《还园宅奉酬华阳先生》云：

早欲寻名山，须待婚嫁毕。二事虽云已，此外复非一。忽闻龙图至，仍睹荣光溢。副朝首八元，开壤赋千室。冠缨曾拂露，风雨未尝栉。鸣玉响洞门，金蝉映朝日。惭无小人报，徒叨令尹秩。岂忘平生怀，靡盬不遑恤。

《酬华阳陶先生》云：

三清未可覩，一气且空存。所愿回光景，拯难拔危魂。若蒙九丹赠，

岂惧六龙奔。

弘景有诗哭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按，此诗见《陶隐居集》，题作《和约法师临友人》，未言所哭临友人之姓字。约法师即释慧约，驻锡钟山草堂寺，称草堂法师，弘景曾作《草堂法师传》。考沈约与慧约交谊尤深，《沈隐侯集》中有《与约法师书》、《憩郊园和约法师采药诗》等，又检《续高僧传》卷六记沈约与法师交往事，其略云：“（沈）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满。以沈词藻之盛，秀出当时，临朝莅职，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未）尝以朱门蓬户为隔。……（天监十一年，法师）曰：檀越福报已尽，贫道未得天度。词旨凄然，俄而沈殒。”则此必慧约以诗悼沈约，弘景和之也。又按，罗谱缺此条。

天监十三年 甲午(514) 五十九岁

是年，梁武为迎弘景还山，买茅山前真许谧长沙馆故宅，为弘景建朱阳馆，萧绎（梁元帝）曾撰《陶先生朱阳馆碑》。

按，此碑《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元帝集》皆题作《隐居先生陶弘景碑》。内传引《登真隐诀》云：“甲午年，敕买故许长史宅宋长沙馆，仍使潘渊文与材官师匠营起朱阳馆。”《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云：“宋初长沙景王就许长史宅地之东起道士精舍，梁天监十三年敕置此精舍立为朱阳馆也。”又按，罗谱缺此条。

(?)作《瘞鹤铭》。

按，罗谱有此。《瘞鹤铭》云：“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

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故罗系于此。《瘞鹤铭》题“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其撰书之人颇有争议，本书以为非陶弘景作，详第四章第三节“《瘞鹤铭》作者平议”。

天监十四年 乙未(515) 六十岁

四月，陶弘景梦将被召作蓬莱都水监。

《周氏冥通记》卷三云：“隐居此年(天监十四年)四月自得梦，应被召，云官府已整，惟作印未成，意甚惻惻。”

六月，久旱不雨，弘景乃与弟子周子良作《请雨词》，表告上天乞雨。

按，《请雨词》存《陶隐居集》中，《周氏冥通记》卷二亦记当日请雨事“(天监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周子良夜梦神降曰：)昨所与陶隐居共有辞，欲须雨事，国主忧民乃至，但时运应尔。比诸处屡有章辞，皆不与报。陶既有功行，周方来此，当为验二人之德，不烦谦谦，恐悞望，故遣报。子良曰：比风日赫烈，塘湖焦竭，五谷焦枯，草木凋落，方虑饥乏，故冒共投辞，希垂沾润。此人曰：当不虑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辞(指陶弘景日间所作《请雨词》)言语乃好，但请雨应墨书，请晴应朱书，并青纸上。人惟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会处。诸如此者，世间非一。但无人报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无灵。愿更作墨书辞，勿同前语。”

七月，有贼人寇茅山，颇有损失，所幸人员无伤。

《周氏冥通记》卷三云：“岭里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寇，似有六七人，皆执杖，奄至阶前。前一人唤言，在倒杖中蒙假还东畔等数人之资粮，故来就先生乞。于时已闭户未眠，闻

此便开户，当对呼进随意所须，衣服物器，一皆舍与。别屋两小儿并被录置，既从来未尝见此，不能不惧，而犹向其道，但各取重担徐去，必无告讨正。恐君劫道士罪重，我当作好意，相与使后也。”

朱阳馆成，弘景仍住东涧，敕令移居，固辞不准，乃于是年冬移往，并于馆东建药室、静院，以供炉鼎。

内传云：“上使营朱阳馆以居先生，三让之，诏不从。自于馆东建药屋、静院，云躡玄洲之迹。”《茅山志》卷二十云：“十四年冬，徙来此馆。”

南岳邓郁之合丹成，不以上贡，乃自饵之，尸解去。

内传云：“时有邓郁之居南岳。敕给九转丹具，令营合。限尽开鼎，上有钟乳霜雪，光明照耀，永无杂色。邓不以献奉，自饵之。乃云病病，八日去。”又引《丹经》云：“（邓郁之）乙未正月开鼎，云上有钟乳霜雪，下滓作丸，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飞华都不与人，亦无献奉，独将往南岳间，一皆藏之也。”又引《登真隐诀》云：“邓先生初去，颜色如故，后三日安舆中，停置积日，尸不毁坏。”而《南史·邓郁传》记载有所不同：“梁武帝敬信殊笃，为帝合丹，帝不敢服。”罗谱缺此。

天监十五年 丙申(516) 六十一岁

九月，浮山堰溃，缘淮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

按，《魏书·肃宗纪》云：“（熙平元年，即梁天监十五年，516）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法书要录》卷二载“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陶弘景上梁武帝启有云：‘自无射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

“无射”即九月，国政方殷云云，应指堰溃之事。

梁武帝遣人于茅山造井十五口。又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

按，《金石萃编》载天监十五年井铭云：“梁天监十五年，太岁丙申，皇帝愍商旅之渴乏，乃诏茅山道士口口永若作井及亭十五口。”又据《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引《道学传》云：“梁天监十五年，为陶隐居建太清玄坛，以均明法教也。”又按，罗谱缺此条。

弘景由朱阳馆移居郁冈斋静修。

《茅山志》卷二十云：“十五年移郁冈斋室静斋。”

八月，弟子王法明在茅山主持涂炭斋。

《周氏冥通记》卷四云：“尔日（八月九日）在中堂，王法明为皇家涂炭斋。”

此年九月前后，陶弘景与梁武帝与书札来往。

按，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陶弘景《上武帝论书启》五通及武帝批答四首，《南史》本传称陶弘景与梁武帝“月中常有数信”，疑即指此类信函。论书启未著年月，本书第四章陶弘景书法丛考有专文考证，确定书启作于天监十五年。罗谱缺此。

自去年五月以来，弘景弟子周子良颇有冥通，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周卒，时年二十，十一月三日葬于东冈。

按，周字元猷，豫州汝南人，齐建武四年（497）正月二日生，年十二从弘景学道，事迹见《周氏冥通记》。

天监十六年 丁酉(517) 六十二岁

梁武帝既誓永弃道教，遂于是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反俗。又有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牲牷皆代以面，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按，梁武废道观事《佛祖统记》卷五十四、卷三十七载之，因未见正史，难知确否。惟宗庙荐羞始用蔬果事亦见《梁书·武帝记》“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去宗庙荐脩，始用蔬果”。弘景茅山道观虽未受影响，而检《桓真人升仙记》云：“（陶）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之心，实负杀禽之罪。”盖当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已遭物议。

十二月十六日，弘景将去岁弟子周子良人冥事迹厘为四卷，名《周氏冥通记》，上奏梁武。

按，此记今存《道藏》，《上冥通记表》及梁武批答，并见《陶隐居集》。

疏浚朱阳馆侧许长史旧井，置井栏并镌刻铭文记事。

按，此铭1981年出土于茅山玉晨观，即梁朱阳馆故址，见《书法研究》1985年4期陈世华文。铭云：“此是晋世真人许长史旧井，天监十四年更开治，十六年安阑。”又按，罗谱缺此条。

天监十七年 戊戌(518) 六十三岁

弘景修缮许长史故宅，为立《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陶弘景自撰，弟子孙文稻书丹。

按，《茅山志》卷二十谓此碑普通三年立，误。今据碑文云：“十七年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清翁大年有《旧馆坛碑

考》详论其事，以为碑首“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弟子华阳隐居丹杨陶弘景谨造”二十四字系陶弘景亲笔，正文为弟子孙文韬书。因系于此年。

是年前后，弘景于茅山大兴土木，先后整修长沙馆、曲林馆、崇虚馆等，又建昭真台，供养杨许真迹经诰，并自撰碑文。除建道家馆舍外，兼造佛像、起佛塔。

按，陶碑云：“大造佛像，爰及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梦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启闻，蒙敕许可。”又陶所撰长沙、曲林两碑文尚存《陶隐居集》中。

天监十八年 己亥(519) 六十四岁

四月初八日，梁武帝幸等觉殿，从释慧约受菩萨戒。

按，梁武帝受戒之事见《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其略云：

皇帝□凋反朴，信无为道，发菩提心，构重云殿。以戒业精微，功德渊广。既为万善之本，实亦众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长，若须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缘此以成。十力三明，因兹而立。帝乃博采经教，撰立戒品。修章毕举，仪式具陈。制造圆坛，用明果极。以为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且帝皇师臣，大圣师友。邃古以来，斯道无坠。农、轩、周、孔，宪章仁义。况理越天人之外，义超名器之表。以(慧)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梨之尊，层当智者之号。逡巡退让，情在固执。殷勤劝请，辞不获命。……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凋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再三之敬。暂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躬诚肃。于时日月贞华，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庆。自是(慧约)人见，别施漆榻。上先作礼，然后就坐。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庶士，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

陶弘景归茅山以来，炉鼎事仍不谐，开炉虽有所得，但与丹经记载相去甚远，至此年所获之丹，光采特异，亦不敢轻服，乃欲先以之试作黄白，验其真伪，后因梦人告云：“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遂不试，亦不服。

内传云：“自南岳还，鼎事累营皆不谐，乃非都无仿佛，每开鼎皆获霜华。门人金谓此为成，先生验丹家说云：琅玕丹成，其飞华光彩三十七种；曲晨丹成，其飞华百杂乱色，光照流焕，玄气徘徊；太清金液丹成，其飞华状奔月坠星，云绣九色，其气似紫华之见太阳，其精似青大之映景云；九转丹成，则飞精九色，流光焕明。不尔未成也。累年所得，截轻华霏霏，或光明廉棱如霜雪，无杂色。十八年所获，严铿光华，过于前者，皆似五六出华，剑锋雁齿，而下滓枯磕浹黑碎之如星，焚作朱黄，烟气当犹火势，或羸或猛，朱黄不得飞翥。”又云“累年所得，一皆埋藏，而十八年飞华虽无杂色，光彩特异，欲试作黄白，以验成否。是夕摄心乞感，忽见有人来，朦胧如烟云中，语云：不须试，试亦不得。今人多贪，忽闻金玉可作，便求，竟毁天禁。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复作叹声云：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渐服自可知。言訖，飒然东去。于是乃不试”。

普通元年 庚子(520) 六十五岁

正月，改元普通。

萧纲(简文帝)授南徐州刺史，召弘景，与谈数日，颇为敬重。

《南史》本传云：“简文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敬异之。”《梁书》本传同。

(?)梁武帝令陶弘景造神剑十三口。

《古今刀剑录》云：“梁武帝萧衍，以天监二年即位，至普通中，岁在庚子，命陶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用金银铜锡铁五色合为之，长短各依剑术法，文曰：服之者，用治四方，并小篆书。”按，《古今刀剑录》虽题陶弘景撰，而称“梁武帝萧衍，以天监二年即位”云云，殊可疑，又庚子为普通元年，非普通中也。姑存疑。按，罗本缺此条。

普通二年 辛丑(521) 六十六岁

普通三年 壬寅(522) 六十七岁

五月初五日，镌《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

《旧馆坛碑》立于天监十七年，碑阴记则此年所立，罗谱以为碑亦此年所立，实误。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十四云：“《梁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丹阳陶弘景撰并书，天监十三(应为七)年立。碑阴刻《华阳颂》，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立。”碑阴记颇涉茅山道派及陶弘景活动史料，因据《茅山志》卷二十转录如下：

华阳隐居陶弘景，丹阳秣陵西乡下里人。宋孝建三年丙申岁夏至之日未晓时生。仕齐高、武世诸王侍读，奉朝请，永明十年壬申岁投绂栖山，住中茅岭上，立为华阳馆，至梁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七年往永嘉楠江青嶂山，十年，涉海诣霍山，十一年夏还木溜屿，其年十月奉敕迎还旧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入住东涧，十四年冬，徙来此馆，十五年，移郁冈斋室静斋。

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吴郡海盐陆逸冲

上清弟子宗元前馆主东海剡县杨超远

上清弟子朱阳馆主丹阳湖熟潘渊文

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晋陵丁景达

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晋陵冯法明
上清弟子嗣真馆主丹阳句容许灵真
上清弟子四明山馆主会稽山阴潘文盛
上清弟子太平山馆主吴郡钱塘仲俨
齐世祖武皇帝
太宗明皇帝
衡阳王萧筠
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
荆州刺史闻喜公萧遥欣
尚书令太子少保丹阳尹建昌侯沈约
开府仪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吕僧珍
侍中吏部尚书吴兴太守谢览
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马季延青
交州刺史始兴王司马阮研
临海太守伏曼容
晋安太守谢朓
晋熙太守纪僧猛
梁武皇帝
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
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
南平王世子萧恪
侍中豫章内史太尉长史谢举
临川王世子前罗平侯萧立正
廷尉卿虞权

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记。

按，碑阴记虽题“普通三年”，据《六朝事迹编类》卷十四云：“唐紫阳观主刘行矩等重勒。”故碑称“梁武皇帝”实系重刻者所改。

五月十五日，领道士正吴郡张绎立《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孙文韬书。

文见《茅山志·卷二十》。

女弟子钱妙真于燕洞宫迁化，年四十九。

《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云：“《旧经》云：梁普通三年，晋陵县女子钱妙真幼年于此修行，诵《黄庭经》，积功三十年，道成，佩白练飞升，洞中有石室、醮坛存焉。”按，此事亦见《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梁普通中有晋陵女子钱氏妙真，年十九，辞家学道，师事陶隐居。独居幽岩，诵《黄庭经》，积三十年。佩白口入洞。”然两记语意皆含混，不详钱妙真是普通三年始入山，或于是年飞升。另考内传：“有女侄钱，亦居华阳，师事先生，授经及符图。忽一日，辞。先生问何之？钱曰：上宾于金阙。先生曰：吾门人先吾去者数矣。钱曰：师当为蓬菜都水监。先生乃过岭送之，因赠诗云云。”因知钱卒于陶弘景生前。又据《至正金陵新志》“年十九师事陶隐居”推算，钱妙真入山当在永明十年左右。罗谱缺此。

普通四年 癸卯(523) 六十八岁

作《吴太极左仙公葛公碑》。

文见《陶隐居集》。据碑文云：“天监七年，郡邑豪旧遂相率與出……舍而留止，于兹十有五载，将欲移憩坛上……乃复建新碑于其所。”因知为此年所作。按，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云：“青元观。《旧经》云：本吴朝葛仙公宅也。梁天监七年建，有一丹井在祠宇前，去句容县西南三百余步。”

二月五日，内侍中、尚书令袁昂奉敕上《古今书评》，评陶弘景书法云：“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长成，而骨体甚骏快。”

按,《古今书评》载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罗谱缺此。

二月十七日,阮孝绪作《七录》,著录陶弘景著作:《毛诗序》一卷、《三礼目录注》一卷、《集注孝经》一卷、《集注论语》十卷、《陶隐居本草》十卷、《本草经集注》七卷、《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陶氏效验方》五卷。

按,阮孝绪《七录序》云:“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又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见《广弘明集》卷三)《隋书·经籍志》称“梁有”云云,即《七录》佚文。其中涉及陶弘景著作有“《毛诗序》一卷,梁隐居先生陶弘景注”;“《三礼目录》陶弘景注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经》一卷”;“陶弘景《集注论语》十卷”;“《陶隐居本草》十卷”;“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七卷”;“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陶氏效验方》五卷”。罗谱缺此。

普通五年 甲辰(524) 六十九岁

再次开炉。

内传云:“普通五年复涂鼎起火。”

普通六年 乙巳(525) 七十岁

正月开鼎,乃得丹成,以贡梁武。

内传云:“明年正旦甲子开鼎,光气照烛,动心煥目,形质似前者,而加以彩虹杂色。始天监四年初有志于此,及是凡七营乃成。”又《南史》本传云:“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按,《南史》本传云:“天监中,献丹于武帝。”核以内传记载,恐误。

普通七年 丙午(526) 七十一岁

普通八年

大通元年 丁未(527) 七十二岁

三月,梁武幸同泰寺,舍身。改元大通。

约在是年,弘景以善胜、威胜二刀献梁武。

按,此事见陶传、《梁书》、《南史》本传,但陶传、《梁书》作“大通初”,《南史》作“中大通初”,而《玉海》卷一五一引《神剑录》又作“大通中”,今姑取大通初为正,系于此年。又按,此二刀当极珍贵,故昭明太子薨后,梁武以二刀赐简文帝,用作传位信物。《艺文类聚》卷六十引《梁简文帝谢敕善胜威胜刀启》有云:“五宝初成,曹丕先得其一。二胜今造,愚臣总被其恩。”正以魏武授魏文龙刀为譬。又《金楼子·终制》云:“吾之亡也,可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礼,《曲礼》一卷、《孝经》一帙,《孝子传》并陶华阳剑一口以自随,此外珠玉不入,铜铁勿藏也。”亦可见陶弘景冶铸之精。

大通二年 戊申(528) 七十三岁

是年,北魏僧昙鸾闻江南陶隐居广博弘贍,海内宗重,乃入梁访弘景,求本草仙术。先致书通问讯,弘景有答书及昙鸾至茅山,弘景授以仙方十卷。

按,事见《续高僧传》、《法苑珠林》。罗谱缺此条。昙鸾魏雁门人,曾注《大集经》,东魏兴和四年(542)卒,年六十七。《续高僧传》卷六载此事甚详:

(释昙鸾,雁门人,注《大集经》未半而感气疾,因感人命苦短,闻江南陶隐居者,方术所归,广博弘贍,海内宗重,遂往从之。既达梁

朝，时大通中也……（先诣梁武帝，说佛法精义，为武帝称赏，帝）问所由来，昙鸾曰：欲学佛法，恨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帝曰：此傲世遁隐者，比屡征不就，任往造之。鸾寻致书通问，陶乃答云：去月耳闻音声，兹辰眼受文字，将由顶礼，岁积，故使真应来仪。正尔整拂藤蒲，具陈花水，端襟敛思，竚聆警锡也。及届山所，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远意……（昙鸾还魏，欲依方修炼，逢中国三藏菩提留支）鸾往启曰：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不死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也。鸾寻顶受，所贲仙方并火烧之。

是年，王远知生。

据《茅山志》称远知弱冠从宗道先生臧矜进习隐居经法，入唐加封国师，卒谥升玄先生，继弘景以后为茅山第十代宗师。

大通三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529) 七十四岁

九月，梁武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舍身。十月，改元中大通。

正月十四日，弟子王法明卒。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真诰》云：“王朗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师陶隐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隐居为制铭志，并设奠云：“纸冕岂荣，随璜非宝，万里求真，絃兹内抱。”按，此必非《真诰》语，《御览》误注引书出处。罗谱缺此。

陶谱云：君年七十四。遇异人宣闾，以本草用虻虫、水蛭之属，凡十余种，伤物，迟一纪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世传，闾至青城来句曲，先升，以君闻帝，录其积水之功，化后，为蓬莱都水监。见仙传及拾遗，甚略，今茅山相传稍详，但微涉异。

按，陶谱宣闾乃桓闾之误，桓闾本弘景弟子，此条殆由《桓真人升仙记》附会而来。

中大通二年 庚戌(530) 七十五岁

中大通三年 辛亥(531) 七十六岁

四月，昭明太子萧统薨，七月以晋安王萧纲为太子。

十月、十一月，梁武两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是年庾肩吾四十五岁，为太子萧纲东宫通事舍人，其《答陶隐居赉术煎启》、《答陶隐居赉术蒸启》应作于是年前后。

按，两启皆见于庾集，系答谢陶弘景赠术煎、术蒸者，年月不详，姑系于此。庾肩吾别著《书品》列弘景书法为中下，谓：“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答陶隐居赉术煎启》云：

窃以绿叶抽条，生于首峰之侧，紫花缥色。出自郑岩之下。百邪外御，六府内充，山精见书，华神在策。木荣火谢，尽采撷之难，启旦移申，穷淋漓之剂。故能竞爽云珠，争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砚，役倦攀桃，岂可立致还年，坐生羽翼。临洮仙井，方觉可捐，郾县菊泉，无劳复汲。庶得遨游海岸，追涓子之尘，驰骛霍山，共陈王为侣。谣俗轻施，尚曰难酬，出世鸿恩，宁知上报。

又，《答陶隐居赉术蒸启》云：

味重金浆，芳逾玉液，足使芝惭明丽，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铭戴。

中大通四年 壬子(532) 七十七岁

中大通五年 癸丑(533) 七十八岁

二月，梁武再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金字摩诃般若经》。

中大通六年 甲寅(534) 七十九岁

大同元年 乙卯(535) 八十岁

正月，改元大同。

九月，释慧约卒，年八十四。见《续高僧传》。

按，慧约字德素，俗姓娄，东阳乌场人，住锡钟山草堂寺，称草堂法师，入梁封国师，弘景曾作《草堂法师传》一卷。《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云：“(大同元年)智者约法师亡。帝辍朝三日。素服哭之。从师受戒者四万八千人，皆服缌麻哭送，塔于志公之左。”

大同二年 丙辰(536) 八十一岁

三月十二日巳时，弘景卒于茅山朱阳馆，年八十一。十四日葬于雷平山。诏赠中散大夫(《南史》作“太中大夫”，误)，谥曰贞白先生。

《南史》云：“无疾，自知应逝，逆剋亡日，仍为《告逝诗》。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

氛氲满山。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靸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复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陶传云：“大同二年告化，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屋中有香气，积日不散。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仍遣舍人监护丧事。”又陶弘景卒前作《告逝篇》示门人云：

性灵昔既肇，缘业久相因。即化非冥灭，在理澹悲欣。冠剑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此昭轩侣，结彼瀛台宾。倘或踵留辙，为子道玄津。

弘景卒后，劭陵王萧纶撰《梁解真中散大夫贞白先生陶隐居碑》，简文帝作《华阳陶先生墓志铭》。

按此《墓志铭》，内传、《茅山志》并误作昭明太子撰。

《南史》本传又云：“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复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篋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梁书·侯景传》所云亦同，惟诗小异。

弘景入山以后著作，除前已述及之《梦记》、《肘后百一方》、《效验施用药方》、《药总诀》、《真诰》、《周氏冥通记》外，尚有多种。

见于《本起录》者：《登真隐诀》二十四卷（《本起录》云：“此一诀皆是修行上真道经要妙秘事，不以出世。”今《道藏》仅存三卷）；《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茅山志》卷九作《合丹节度》四卷）；《集金丹黄白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

化三十六水法》一卷(今《道藏》有《三十六水法》,不详即是此否);《服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灵方妙奥》一卷;《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撰集服气导引法》一卷(疑即是今《道藏》中之《养性延命录》);《集人间却灾患法》一卷;《本草经集注》七卷。

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者:《真人水镜》十卷、《握镜》一卷、《太清玉石丹药要集》十卷、《草堂法师传》一卷。

见于《茅山志》卷九者:《炼化杂术》一卷、《太清诸草木方集要》三卷、《服饵方》三卷、《古今刀剑录》一卷、《陶先生内集》十五卷。

序见于文集者:《相经》。

弘景卒后,文字散失甚多,至陈祯明二年(588)始由江总纂为《陶隐居集》。

按,此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十卷,今亦亡佚。今《道藏·华阳陶隐居集》作上下卷,以江总序冠首,题作:“昭台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陈楠校勘。”

又按,《道藏·陶隐居集》首篇《寻山志》文中央有小注云:“先生去世后,久无人编录文集,至陈武帝贞明二年,敕令侍中尚书令江总始撰(纂)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驾,至是五十三载矣,文章颇多散落。”当是傅霄所加按语。另据《茅山志》卷十六,霄字子昂,宋晋陵人,由儒入道,住持茅山玉晨观,重编隐居集,修茅山旧记,以绍兴二十九年卒。

陶谱云:君年八十一。只眼或方,梦胜力菩萨受菩萨记。乃诣鄞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传吕岩从钟离权受剑诀,后二百余年,来参黄龙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觉,别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岛,绝于人境。报尽还来,散入诸趣。晚年始坚此愿。《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师传。当时佛教虽隆,禅宗未开,圆觉以大通元年

至,以是年去,留台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见。

按,陶谱以弘景礼阿育王塔受戒事系于此年,误。又误信《南史》、《梁书》卒年八十五之说,以弘景卒于大同六年。

陶谱云:大同六年庚申,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为告逝诗。及卒,颜色如常,香气弥山。华阳颂云:号期行当满,亥数未终丁。迨乃承唐世,将宾来圣庭。化后,一遇丁亥,为陈临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为唐太宗贞观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圣庭当是此时。初,隋文帝辅周,以国子博士召孙思邈,不应。密言,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以济人。宣政元年至贞观元年,适满五十年,应命来见。太宗官之,不受,辞归太白山。风素极类隐居,它无种不类,形有转移,神无变易。自是至丁卯,独孤信镇洛阳之时,正七岁。至丁亥,太宗召至长安之时,得八十七岁。暮龄有少容,所以惊嗟。卢照邻称其自谓生开皇辛酉,当时已不信。若尔,岂得圣童之称。博士之召,贞观丁亥,方二十七岁,岂得少容之叹。若言数百岁,岂得七岁弱冠之誉。度思邈之生,适继隐居之没,其为后身何疑。挺契颂又云:重离倘或似。谓简文与武帝俱非令终。又云:七夕乃扶胥。谓武帝凡七改元。世称推戴为策立,侯景尝为怀朔镇功曹吏,自是纂梁称汉,故云扶胥。所谓篇中字皆有义旨,后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则机萌一颂二十字,顾岂虚设,矧又彰明。业运颂又云:济神既有在,去留从所宜。神既济矣,在于何所,华原孙氏,即其所在也已。当知佛言报尽还来,及舍身趣生。

按,陶谱以陶弘景卒于梁大同六年,实误,又以孙思邈为陶弘景后身,更属无稽。

附录一 陶弘景传记资料汇编

见诸记载的陶弘景传记有十余种之多，本篇汇录现存重要传记九种、碑铭及墓志两种。首冠《梁书》、《南史》两传，其次诸传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一）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一《处士·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初，母梦青龙自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遂产弘景。幼有异操。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及长，身長七尺四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取决焉。

永明十年，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及发，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朝野荣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居。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圆通谦逊，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辄觉。建武中，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梦

铿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秘异，因著《梦记》焉。

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懂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

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莫比”。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鄞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太宗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与谈论数日而去，太宗甚敬异之。大通初，令献二刀于高祖，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申如恒。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仍遣舍人监护丧事。弘景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二)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六《隐逸·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参军。父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岁夏至日生。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父为妾所害，弘景终身不娶。及长，身長七尺七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黑星文。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

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

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

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桓欲就之。且永明间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惟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懂得侍其所。本便马善射，晚皆不为，惟听吹笙而已。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历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飨地祇，以为神理宜然，硕学通儒，咸所不悟。又尝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相会。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张良为人，云“古贤无比”。

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

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惟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戮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多不纳受，纵留者即作功德。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仙书云：“眼方者寿千岁”，弘景末年一眼有时而方。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鄞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简文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敬异之。天监中，献丹于武帝。中大通初，又献二刀，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无疾，自知应逝，逆剋亡日，仍为告逝诗。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鞅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复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诏赠太中大夫，谥曰贞白先生。

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篋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

殿。

初，弘景母梦青龙无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无子。从兄以子松乔嗣。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及《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惟弟子得之。

(三) 齐谢朓《陶先生小传》(《云笈七籤》卷一百七)

陶先生小传 (吴兴谢朓永明十年作)^①

先生讳弘景，丹阳人也。幼标异操，聪明多识，五经子史，皆悉详究。善书，得古今法。不肯婚宦，以资营未立，且薄游下位，为宜都王侍读。年二十余，便稍就服食，遵行道要，所得符文妙法，并是真人遗迹。于是业行渐进，乃拂衣止于茅山焉。观其神仪明秀，盼睐有光，形细长项，耳间矫矫，显然异众矣。

(四) 梁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云笈七籤》卷一百七)

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从子翊字木羽撰)

永明十年，太岁己卯，^② 谢詹事朓先从吴兴还，闻先生已辞世入山，甚怀嗟赏。于路中仍为前传，虽未能究洽，而粗举大纲，有似王右军作《许先生传》。翊从叔隐居先生，讳弘景，字通明，丹阳人也。宅在白杨巷南冈之东，宋初土断，仍割秣陵县西乡之桐下里，至今居之。

陶氏本冀州平阳人，帝尧陶唐之苗裔也。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焉。汉兴，有陶舍为高祖右司马，子青擢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七世祖潜，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吴为镇南将军，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户，与孙皓俱降晋，拜议郎散骑常

^① 《云笈七籤》所录“陶先生小传”有节略，不及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序》所引完善，可参该传。

^② 永明十年岁在壬申，越七年永元元年方为己卯。

侍、尚书。六世祖谖，谖第三子，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领屯军随王出许昌。因败，仍复过江，为大将军王敦参军。敦为丞相，转军谘祭酒。后随敦南下，而情惧祸及，乃启分属籍，禁锢积年，晚起为车骑丞相参军，不就。升平四年卒，始别葬白石山之岭，贍湖北。高祖毗，有理识，器干高奇，以文被黜，不肯游宦，州郡辟命并不就，后板授南安正佐，亦不起，元兴三年卒。曾祖兴公，多才艺，叵营产殖，举郡功曹，察孝廉，除广晋县令，义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状，有气力，便鞍马，善骑射，好学，读书善写，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行参征南中郎军事，侍从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晋安侯，除正佐，固辞。颜峻恃宠，就求宅以益佛寺，弗与，因辞官。见谖削爵，徙广州，后被恩除南海西平县令，后监新会郡。大明五年，卒于彼。父讳贞宝，字国重，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辟为侍郎，迁南台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闲骑射，善薰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书体以羊欣、萧思话法。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好文章，美风仪，凡游从，与萧思话、王钊、刘秉周旋，多为诸贵胜所赏遇。元徽四年冬，衔使虜^①庭，通邻国之好，甚得雅称。升平元年还都，具撰游历记并诗数千字，及所造文章等，刘秉索看，仍值石头事亡失，无复别本，不得传世。建元三年于县亡，背丧还葬旧墓。母东海郝夫人，讳智湛，精心佛法，及终，有异焉。

先是，贞宝携家随萧之郢州，孝建二年，萧亡。其年九月，母觉有娠，仍梦见一小青龙，忽从身中出，直东向而升天，遂视之，不见尾。既觉，密语比丘尼，云：弟子必当生男儿，应出非凡人，而恐无后。尼问其故，以所梦答。尼云：将出家。又答：审尔亦是所愿。时年二十五。其冬，仍随萧部伍还都，住东府射堂前参佐廨中。以孝建三年太岁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诞焉。是年乃闰三月，明日朔旦，便是夏至，母即沐浴而起，了无余患。

① 原文作“虜(肤)”，误，据《内传》引《本起录》作“虜”，因据改。

先生四五岁便好书，今犹有六岁时书，已方幅成就。九岁、十岁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杂书等，颇以属文为意。年十一，为司徒左长史王钊子昊博士。十三，父贻宅席卷，随吏部尚书刘秉之淮南郡。十五归都，寓憩中外徐冑舍，后仍立别宅，从此不复还旧庐。十七乃冠，常随刘秉尹之丹阳郡，得给帐下食，出入乘厩马。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时为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与先生日夜搜寻，未尝不共味而食，同车而游。侯与江敫，褚炫等俱为顺帝四友，故最以才学得名。侯作《宋德颂》，连珠七警，当世称绝。侯既亡后，文章皆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是岁升明元年冬，先生年三十二，随刘丹阳入石头城，就袁粲建事，先生与韩贲、糜淡同掌文檄，及事败城溃，即得奔出。侯及弟^① 倓为沙门以逃，为人所获，建康狱死，人莫敢视。先生躬自收殓瘞葬，查劂旧墓，营理都毕，自此弃世，寻山而止。

值宋齐之际，物情未安，既结刘宗，常怀忧惕。父乃因纪僧真求事高帝于新亭，即蒙帐内驱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从还东府，公仍遣使侍弟五息翬、六息曷侍读，兼助公间管记事。先生时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明年，侍从高祖登极，还台住殿内，除太尉豫章王侍郎。先生云：革运之际，颇有微勤，何处不容三两阶级？遂不拜。又明年，随安成王出镇石头。次岁夏，丁孝昌府君忧，上郢奉迎，冬，还都安厝。世祖即位，以振武将军起侍宜都王侍读。齐世侍读任皆总知记室，手笔事选须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诸侍读多有惭惮，颇致谗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阙，召拜左卫殿中将军，颇郁时望。先生惊，亦不解所以，即告庾道敏，论诸屈滞，庾为面启武帝，帝云：先帝昔亲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辞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叹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翻为此职，驛马非驥驥。

① 原文作“第”。

犹欲固辞。庾切言之云：太元已来，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从此转员外郎。但问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为尔误我事。庾于时正被委任总知诸王府事，先生不获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宫新成，帝宴乐之，先生拜表献颂，又有伏曼容亦上赋。于是敕遣中书省舍人刘系宣旨褒赞，并敕豫旧宫金石会。于时上意欲刻此颂于石碑，王俭沮议而止。时献赋者五人，惟以先生为最，将欲迁擢，会母忧去职。寻授振武将军，起，特赐酒食省禄，随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进宫，先生复作颂，颂成而车驾事废，不复得奏云。此颂体制爽绝，倍胜旧格。三年还都，方除奉朝请，拜竟，怏怏。与从兄书云：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高迈。宿昔之志，谓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

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职，求托岩林，青云之志，于斯始矣！是岁永明十一年^① 壬申岁也。先生初隐，不欲辞省，出仍脱朝服，挂神虎门，鹿巾径出东亭，已约语左右曰：勿令人知尔。乃往与王晏语别，晏云：主上性至严治，不许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贻罪咎，便恐违卿此志，诂可作？先生嘿思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为名，若有此虑，奚为所宜？于是即不诣省，直上表陈诚。诏赐帛十疋、烛二十铤，又别敕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先生既遂命，理舳东下，众宾并饯于征虏亭，举酒挥袂，皆云：江东比来未有此事，乃见今日尔！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称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挂人间书疏，皆以此号代名。先善稽古，训诂七经，大义备解，而不好立义，异于先儒，议论惟著纸，不甚口谈。尤好五行阴阳，风角气候、太一遁甲、星历算数、山川地里、方国

① 当作“永明十年”。

所产,及医方香药分剂,虫鸟草木,考校名类,莫不该悉。善隶书,不类常式,别作一家,骨体劲媚。琴棋骑射,亦皆领括。常言心中恒如明镜,触形遇物,不觉有滞碍。为人少忧戚,无嫉竞,淡哀乐,夷喜怒。时有形于言迹者,云皆是欲显事厉物,了无欢愠于胸襟。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经历模写,意所未惬者,于是更博访远近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剡山谒法师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爰及东阳长山、吴兴天目山,于潜、临海、安固诸名山,无不毕践。身本轻捷,登陟无艰。瞻恤寒栖,拯救危急,救疗疾恙,朝夕无倦。其别有阴恩密惠,人莫得知之。虽惜人书,随误治定。在人间制述甚多,了不存录,谨条先生所撰记世道书,名目如左:

《学苑》十秩百卷。此一书,先生常云:群书舛杂,欲探一事,不可遍检。乃钞撰古今要用,以类相从,为一百五十条,名为《学苑》,比于《皇览》,十倍该备。近赐诵语:吾无复此暇,汝可踵成之。此书若毕,于学问手笔家,无复他寻之劳矣。《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共一秩,十二卷。《三礼序》共一卷。并自注。注《尚书》、《毛诗序》共一卷。《左传》已有刘实、贺道养注。《易略例》即是《易序》,不假复注。《老子内外集注》四卷。并自立意。《三国志赞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语阙字》二卷。依陆文更以意造《世语》所阙者。《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古今州郡记》三卷。并造《西域图》一张。《帝王年历》五卷。起三皇至汲冢竹书为正,检五十家书历异同共撰之也。《员仪集》三卷。《玉匱记》三卷。说名山福地事。《七曜新旧术》二卷。《占筮略要》一卷。有十三法。《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有十法。《算数艺术杂事》一卷。《举百事吉凶历》一卷。《本草经注》七卷。《肘后百一方》三

卷。增补葛氏。《效验施用药方》五卷。此二十四种并世用所撰目书，又作《相书序》、《述异记序》，如此等并在集中。《登真隐诀》三秩。二十四卷，此一诀皆是修行上真道经要妙秘事，不以出世。《真诰》一秩七卷。此一诰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居士已撰，多有漏谬，更詮次叙注之尔，不出外闻。《梦记》一卷。此一记先生自记所梦征想事，不以示人。《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药白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灵方秘奥》一卷。《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撰集《服气导引法》一卷。集《人间诸却灾患法》一卷。此九种，所撰集道书，自先生凡所撰集，皆卷多细书大卷，贪易提录，若大书皆得数四，又有图象杂记甚多，未得一二尽知尽见也。

又作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见伏早晚，以机转之，悉与天相会。云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时轮转循环，不须守视，而患山涧水易生苔垢，参差不定，是故未立。

先生形细，身長七尺二寸，腰止围二尺六寸。薄皮肤，露筋骨，青白色，长头面，疏眉目，鼻小而平直，长额耸耳，左耳内轮有大黑志如豆，耳两孔里各有十余大毛出外二三寸。方颐秃鬓，露颞少须发。右肩上有一紫志如两钱大，右股内有数十细黑子，多作七星形，起正方，如铁枪脚。眼中常见有异光象。左右各类，未尝言其状。闻人说，小来本神仪端洁，十五已上，弥为美茂，每出，路人多叹羨。虽冬月行，常执扇自障。年二十九时，于石头城忽得病，不知人事，而不服药，不饮食。经七日，乃豁然自差，说多有所睹见事。从此容色瘦瘁，言音亦跌宕阐缓，遂至今不得复常。音响本清正，大小称形，言词率易无姿制。行步举动，翩翩轻利，颜仪和明不严毅，小大见之，皆乐悦附，而自令人畏服。门徒胥附，承奉祗肃，有如宫庭。小来与人有隔，数岁便不与人共瓿箸饮食。及长，游处宿息，常自然安置。性不嘲调，世中戏

谿，一切不为。为人强精魂，夜行独宿，无所疑畏，一生不识魔。入山以来，巾褐未尝离体。

(五)唐李渤《真系·梁茅山贞白先生传》(《云笈七籤》卷五)^①

吴荆牧陶潜七代孙，名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母初娠，梦日精在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金香炉。觉语左右曰：当孕男子，非凡人也。然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成而博达。因读《神仙传》，便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革、褚炫、刘侯为宋升明四友。仕齐，历数王侍读，皆总记室，笺疏精丽，为时所重师法。及清溪宫成，献颂，宣旨褒赞，兼欲刻石，王俭议之乃止。年二十余服道，后就兴世馆孙先生谘禀经法，精行道要，通幽洞微。转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勤，赐与其厚。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帐之盛，咸云自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如此代名。特爱松风，庭院皆植之，每闻其响，便欣然为乐。至明帝时，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赆，常为烦剧。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其下，令一小竖传授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霞人，可谓感而遂通。身長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斯应。少忧戚，无疾竞，灭喜怒，澹哀乐，或有形于言迹者，是显事广物。深慕张良之为人，率任轻虚，飘飘然有云霞气。其所修为，皆自得于心，非傍识能及。尤长于铨正伪谬，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用。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纂《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至永元二年，深托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乃引诸讖记，梁是应运之符。又择郊禅日，灵验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游，自此之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诀，以为神丹可成，每苦无药，帝皆给之。又手敕咨迓，先生画两牛，一牛散放于

^① 此传亦见《云笈七籤》卷一百七，内容全同，但讹误较多。

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或时有大事，无不前已奉陈，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以大通初献刀二口，一名善胜，二名成胜，为佳宝。梁帝《金楼子》云：于隐士重陶贞白，于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情转无穷，真一时名士也。先生常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并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屋中有香气，积日不散。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仍遣舍人监护丧。马枢《得道传》云：授蓬莱仙监。弟子数十人，惟王远知、陆逸冲称上足焉。

(六)《真白先生》(《太平广记》卷十五《神仙感遇传》)

真白先生陶君，讳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濬七世孙，丹阳人也。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香炉。觉语左右，言当孕男子，非凡人，多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敳、褚炫、刘俊，为宋朝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转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时，议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赉，恒为繁极。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令一小竖传度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灵人，可谓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深慕张良之为人，率性轻虚，飘飘然颇有云间兴。其所通者，皆得于心，非傍识所能及。长于诂正谬伪，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撰《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至永元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

乃引诸谶记，定梁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敕使人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交游，自此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旨妙诀，以为神丹可成，恒苦无药，帝给之。又手敕咨诹，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龟，岂可致邪。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已前陈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渐悟之，后诣张天师道裕，建立玄坛三百所，皆先生之资也。梁帝《金楼子》云：“予于隐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精博无穷，亦一时名士也。”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室中香气，积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诏追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敕舍人监护。马枢《得道传》云：受蓬莱都水监。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惟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宝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邵陵王萧纶为碑铭焉。

(七) 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道藏》)

华阳陶隐居传序

薛萝孺子贾嵩撰

或曰，贞白先生在《梁书·高士传》，今而为传，何谓？(《梁书》云：陶君讳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母梦两天人手执香炉云云。齐高作相，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不交外物。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虎门，上表辞禄，诏许之，公卿送之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江东以来未有斯事。于是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特爱松风，庭院皆植。及梁武即位，书问不绝，月常数信，^①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常云云。今具此传

^① “数信”，原文作“信数”。

于注者，盖明其简略也。此又兼郑晔《史集》陶传同录于此。）曰：《梁书》之传先生，犹《史记》之述老氏也。其叙事颇删略，俾仙圣行业不得昭著而纷纶其间。（韩非与老子同传，论之者多矣。而《梁书》列先生在沈麟、阮孝绪、范元琰^①之间矣。）夫先生识洞古今，事炳山世，神栖寂泊，精骛玄枢。定三品以除浮伪，分五域以镜区贯，著《隐诀》以析纲目，述《真诰》以旌降授。激扬隐微之外，驰骋清虚之际。乃玄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也。况发挥坟典，游泳百家，穷天地星辰之文，究阴阳龟筮之术。至于鲸死彗出，麟斗月蚀，铜山崩而钟铎响，蚕珥丝而商弦绝。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此性理冥濛，金谓之感。先生商榷其微，非感非应。夫然，将叔向、子产、京房、郭璞拟先生，以为博乎。齐永明十年，谢詹事藩自吴兴闻先生弃官隐华阳，乃于道中作传，（谢詹事作传云：先生讳弘景，丹阳人也。幼标异操，聪明多识，五经子史，皆悉详究。善书，得古今法。在人间便有乘云驭龙之志，不肯婚宦，以资营未立，且薄游下位，为宜都王侍读，虽处朱门，恒独居一室，罕接外物，昼夜寻写，研集奇奥，二十余年，稍就服食，殆通幽洞微，其事多秘，于是业行渐进，乃拂衣止于茅山焉。观其神仪明秀，眄睐有光，形细长项，耳间矫矫，显然异众矣。谢传乞此。此传并《梁书》弥为脱略，吾不解谢藩既闻先生隐山，甚怀嗟赏，乃忻然道中作传，所宜详究功行，而卒然如此也。陶翊乃云：王右军作许先生传者正如此也。）传疏略不用，陶翊乃作《本起录》，至齐末遂已，亦事多遗阙，（翊，先生犹子也。《本起录》乃粗似详究，而患文气太平，叙述繁杂。自云，今此未便为传，且撰行业以备遗失耳。不知何缘，至永元元年遂绝也。）其后，潘泉文复踵其作，（泉文，先生门人也。自云陶翊《本起录》迄于齐末，从此已后二十余年并未有题记，谨且随年载录，后撰传人，自更详述。）始天监元年，至七年夏四月，于时先生改名氏潜访遐岳，（天监七年夏四月，先生改名南游，其事具于传中。）旁无知觉，于是泉文又绝笔于此。呜呼，前二传既太简，（谓《梁书》及谢詹事所作传。）门人编录，复无条贯，俾君子辟世之道，清真养翮之迹，其几乎磨灭欤。乃于《登真隐诀》及《真诰》、《泰清经》、先生文集揣摩事迹作三卷焉。

① “琰”后原文衍一“马”字。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上

先生讳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

《本起录》云：宅在白杨巷。

其命氏自帝尧，帝尧治冀州，世居平阳。西汉丞相青翟，^① 东汉司空敦，皆赫然有名，论董卓烧雒阳。十三世祖超，始渡江，是为丹阳人。七世祖潜，仕吴为镇南将军。

《本起录》云：即交州刺史璜之弟也。

封句容侯，吴灭，入北，永嘉之乱南迁。

《本起录》云：世祖，潜第三子也。

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领屯兵随王出许昌，因败，仍复过江，为大将军王敦参军。敦乃启分属籍，晚乃起为车骑丞相参军，不就。高祖毗，清拔尚气，不肯仕。曾祖兴公，为郡功曹。

《本起录》云：多才艺，颇营产殖，郡功曹，察孝廉，除广晋县。祖隆，长七尺五寸，美姿表，善药术，以拯救为劳。从宋武帝破姚泓有功，封晋安原丰侯。

《本起录》云：颜峻就求宅以益寺，弗与，因辞官。见潜削爵，徙广州，后稍迁新会郡。

父贞宝，字国重，为江东名人，由南台侍御史作江夏孝昌相。

《本起录》云：亦善骑射，解药术，博涉子史，美风仪，与萧思话、王钊、刘秉友善。元徽四年冬，衔使虏庭，通邻国之好，作游历记并诗。

初，先生母郝夫人，

《本起录》云：夫人东海人，讳智湛，及终有异焉。

梦青龙自怀而出，擎空东上。

《本起录》云：有青龙忽从身出，直东向上升天。《梁书》云：

^① 此句《内传》有误。《本起录》云：“（陶舍）子青，擢位至丞相。”《内传》误读作“子青擢（翟），位至丞相”。据《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云：“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知确应作“陶青”。

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与此颇异。《本起录》是先生犹子翊所作，其究详事理，岂漏于史官乎。

逐之无尾。明日谓人曰：当生非凡男，然必无后。或对曰：无乃为仙乎。

《本起录》云：既觉，密语周旋，必当生男儿，应出非凡也。以宋孝建三年四月三十日夜半，先生诞焉。

《本起录》云：岁丙申，日甲戌。此年乃闰五月，^①明旦便是夏至。

诘旦，母沐浴，体忘微苦，乃起。先生始生，无惊啼。始坐，殊警惠。五六岁时，酷爱学书，虽戏弄罗前，惟执笔砚。八九岁时读书千余卷，颇善属文，读葛稚川《神仙传》见淮南八公事。

《本起录》云：乡亲鞠氏舍得葛洪《神仙传·第六》一卷。夜抱卷与寝，乃曰：攀青云白日，其何云远。繇是耽重信悟，窅然有方外之志矣。神表孤迈，肤色皙泽，每出，路人辄聚观，咸曰：陶郎是玉京中落仙。乃执羽扇以自障，虽冬月不除。年十一作王昊博士。

《本起录》云：昊是司徒长史钊之子。作昊对答书启如老成人。十五自南州还。

《本起录》云：先生年十三，父随吏部尚书刘秉之淮南，十五归都，寓憩中外徐冑舍。

作《寻山志》。

其志云云具集中。
先生既冠而不肯婚。

先生澡洁去嗜欲，盖一生全不迹于声色也。
且曰：吾欲萧条其魂也。长七尺二寸，疏眉长额，右肩有紫志如钱。

按《金阙后圣列记》青童君云：此皆仙相也。

① 《本起录》作“闰三月”，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此年闰三月，《内传》“五”为“三”之讹。

右股有数十黑子，阑干如斗形。不乐荤膻，惟进青餽饭。

《清虚真人传》内有方，以南烛为主。盖上仙所服饵也。酷爱松声，居必手植。常嫌读书未满万卷，乃以内书兼之。于是少出，州府辟召皆不起。初，父与刘秉友善，秉为丹阳尹，其子侯少知名，酷好文学，先生复与之游。出则共载，食乃同味。于时，宋氏失德，苍梧王遇害。

《宋书》曰：废帝昱，明帝长子也。既即位，荒乱酷暴，以齐高帝复为射的，既遇害，进谥苍梧王。

萧道成立顺帝，仍执政。荆州刺史沈攸之拥兵不从，道成人守朝廷。

《宋书》云：顺帝第三子。^①齐高既专废立，不从者半，齐高乃入守朝廷。

司徒袁粲据石头，谋诛道成，刘秉预焉，遂奔石头，以其属随先生与韩贲、麋淡同管文檄。道成勒兵攻破石头。

《宋书》云：司徒袁粲据石头，谋诛道成不果，旋见覆灭。《本起录》云：先生年二十二，随刘丹阳入石头，就袁粲建事。先生始终久要，不遗旧故，虽危疑患难，不求自退也。

先生乃得出，侯为沙门间行。

《本起录》云：尔夕城溃，侯与弟侄逃走向京。

为人所获，死建康狱。人莫敢视，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殓。

《本起录》云：先生躬自殓瘞葬沓硎旧墓。^②

先是侯与江革、褚炫等俱为顺帝四友，作《宋德颂》，连珠七警，当世称绝，至是，遂亡其本。先生乃喟然而叹曰：人无愚智，同尽百年，所贵身名遗芳寄世，惜乎刘生，名迹俱丧。

《本起录》云：刘侯既石头奔溃，文章皆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

① 此句有误，检《宋书》应作“明帝第三子。”

② 此句有误，《本起录》原文作：“先生躬自收殓瘞葬，沓硎旧墓。”

明年，道成封齐公，假黄钺，天命识所归矣。先生既常结刘氏，内怀忧惕。

《本起录》云：先生自石头出，仍欲弃世，寻山而止。而正值宋齐之际，物情未安，既世结刘宗，恒怀忧惕。

乃因纪真^①求见于新亭，大相推爱，俾居帐内。沈攸之平，从还东府，仍为其子侍读。

《本起录》云：沈攸之平，从还东府，使为第五息熇、第六息脩侍读，兼知公间管记事。时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

齐高帝既登极，除太尉豫章王侍郎。

《梁书》云：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误矣。

先生知为帝之左右者排逐，再除，不受。^② 明年，随安成王出镇石头。世祖初，拜振武将军，宜都王侍读。齐世侍读皆总知记室参军，先生于吉凶内外，笺启疏牒，莫不绝众，凡濡毫落纸，人皆楷模之。

《本起录》云：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来承授以为准格。

数王侍读咸切齿谗忌，先生处之怡怡如也。桂阳王登双霞台，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从宜都预焉。桂阳采名颂号，各令为赋，瓘十题器中，先生探获水仙，大惬意。

其赋云云具集中。

沈约、任昉读之叹曰：如清秋观海，第见澶漫，宁测其深。其心伏如此。寻除左卫殿中将军，时论称屈，庾道经亟言于武帝，帝曰：先帝昔亲作此官，裴松之从此转员外郎，吾之重也，卿那不知。

《本起录》云：时年二十九，青溪宫新成，帝锐意游宴，先生拜表献颂，于时称绝。

忽一日于石头城恍然若有所适，无所知觉者。七日乃豁然自差，

① 《本起录》作“纪僧真”，是。

② “受”原文作“授”，据文义改。

云睹见甚异事，秘不得知。

《本起录》云：年二十九，于石头中忽得病，不知人，不服药，不饮食。经七日，乃豁然自差，说多有所睹见。从此容色疲瘁，言音亦跌宕闳缓者矣。

是岁东阳孙游岳始授先生道家符图，虽云相承真本，而历经摹写，意所未惬，明年游茅山。

《本起录》云：戊辰年始往茅山。按先生木披^①访经法，而拂衣长往，经始于是行也。

获前真杨、许兴宁中手书。

按，《真诰》晋兴宁三年太元真人茅君、紫阳真人周君、紫微夫人、九华安妃及诸真仙并降杨君羲于茅山，及许长史父子皆同传口受。而杨、许感降，皆有文迹炳然，先生于是并获，盖天付其人也。

诚心感跃，如亲睹灵人，乃寻三真往来书疏，知所获者犹多亡阙，更搜访远近。于是启假而东，谒楼惠明于大洪山，遇杜京产于太平山，又寻沙门钟义山于峩山，皆卑辞膝请，获真人手迹十余卷，游历二百余日乃还都。

《本起录》云：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

未几复往，更求遗迹，多有所得。爰及东阳长山，吴兴天目，于潜、临海、遂安诸名山，无不探历。身本轻捷，登涉无艰，每遇崩崖断壁，但褰拍蹠越，或逢幽岩深涧，便吟啸盥漱，盘桓坐卧，采掘花药，泊猿鸟吟栖，尚不能去。往往独宿麋鹿中。常言：见朱闾广厦，虽识是华乐，而初无欲往之心，望高岩广泽，亦知此难立，正自恒欲往就，不解所以，必是缘使之然。还都，由振武将军除奉朝请。先生为儿时每言：朝市非乐。既长大，值宋、齐相授，见时之未可，遂栖下位，盘桓风火，及是知兵灾纷起，乃振衣东顾曰：去矣。常言大天之内，复有三十六洞天。

① “木披”二字疑误。

《茅传》云：大天之内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又八海中诸神山皆亦有洞宫，或方千里、五百里，非三十六之例。

江左伏龙山，乃其第八，谓之金坛华阳洞。汉有三茅君得道，实居之。吾其长往于此。仲尼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我今日义达无复其方，请从求志之业。乃自称华阳隐居。

《本起录》云：绛间书疏，皆以此号代名。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是岁永明十年也。

《本起录》云：壬申年，时年三十七。行有日矣，约左右，令先出都，吾辞省已。乃抱朝服挂神虎门，袭鹿皮巾，迺出东亭，因与王晏别，语及此事，晏云：主上性至存严治，不许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自貶咎，便恐违卿山志如何。先生默思良久，曰：吾本为身，非为名，若有此虑，亦奚如此为。于是不诣省，直表辞而已。

郑晔《史隽》云：先生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虎门，上表辞禄，诏许之。此乃知其始而不知其末也。表云云具集中。表既入，诏答。

诏云云具集中。将行，与宜都王别，彼此呜咽，各不能发一言，左右莫能仰规。或谓宜都王云，相爱重如此，那听其去。王云：今为天下胜事，天子许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镜赠，别给在山吏役数人。

《本起录》云：先生昔为安成、宜都二王侍读，而通与诸王少长款狎。武陵、鄱阳、桂阳、衡阳皆眷遇殊常。每一往辄言话终日。永泰之世，慎避形迹，恒示疏退，由是无声累。宜都幼有识度，且待受最久，弥尽亲密，先生亦竭诚陪赞。及闻先生当辞世绝俗，屡致涕泗，临行告别云云。或谓宜都，那听其去，王曰：近武陵欲引其领郡五官，我苦论得免，慎之，三日不与武陵相见。今为天下胜事，我岂得以私情割其久。仍停省钱集，明旦，裘镜九种赠，别给衣书车乘，出使亲侍左右五、六人送至湖熟，吏役数

人，长给在山，触事营理。书驿旬朔，武陵、桂阳、鄱阳亦各赠诗，并诸致遗人力经纪云云。

先生既命舳东川，齐公卿并送于征虏亭，举酒挥袂，皆云江东比来未有此事，乃今日见之，二蹠聚金归田园，亦何得称高。先生乃曰：秦皇汉祖，楚羽吴策，并势横海外，雄架天维，寸气不续，则为一丘之壤，况乎二三子之徒也。高居云岭，访真幽府，正为此耳。日暮乃别，执御者亦歔歔。送者相谓曰：孤鸿已摩天去，吾侪恋稻粱，跳踉网罗中。明年，齐大乱，西昌侯萧鸾弑其君，于是乎知先生预见之明也。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

初，先生以大茅、中茅间有积金岭，其地可修上道。

《真诰》云：大茅、中茅相连，长阿中有连石，古时名为积金山，其处宜人住，可索有水处为居室静舍，乃住，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也。

乃于岭西立华阳上下馆。

《登真隐诀》云：上馆以研虚守真，下馆以炼丹治药。

袭紫皮巾帔，三易楮条褐。

《集卷》云：有人遗红丝帔，先生责而还之，乃云：近有人遗晋安三易楮，甚佳。褐者，著条为之，左九条，右十条，法二景也。神栖寂泊，精鹜玄极。虽萧萧独往，眇眇真贵，而亲旧书驿，远近参同，盖未能抑绝。常题桐叶作诗寄宜都王，其末云：愿为双白羽，长拂舆前尘。未几，夜梦宜都，云已亡，复二年当受生。先生曰：何往？王曰：未知也。因问鬼神中事云云。乃相执悲别，先生更留，云指痛不得久停。明日，俾出都参访，已遇害矣。

《本起录》云：永明十一年，宜都出为南豫州，镇姑熟。延兴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月十八日忽梦王云云。先生眠觉，悲怛惊怪，明日使人出都参访，云以此月十日致薨矣。

明帝即位，深相喜赏，诏敕日至，备安车厚礼，迎出居蒋山，先生拒之，乃已。

《本起录》云：齐明帝三年二月，敕迎先生出居蒋山，先生固辞，并因江祐陈启，乃停。从此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餉赐重叠，随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

乃于上馆更建层楼，永元初，乃登楼长静。

《本起录》云：四年，筑架层楼，规欲杜绝。永元元年移住，便与物顿隔，外间简牘亦削去。

于是便与物顿隔，晨昏供侍，一两人而已。潜光隐耀，盖无为而无不为也。所居堂静，榛芜不生，常患去水稍远，至是飞溜涌出，灵芝秀于下馆，甘露被于昭台。毛龟泳于前塘，白鼠见于药屋。皆致真之钜符，瑞圣之丕迹。是岁，命弟子戴坦秉策执简，授门人吴郡陆敬游建连石之邑并十赉。

世谓之锡，仙谓之赉。九者，阳极，君之位也。十者，阴终，以之制焉。孔子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故以十赉称焉。

为栖静处士。

其文曰云云，具集中。

时东昏不君，江表危动。

《齐书》云：废帝东昏侯讳宝卷，既即位，残忍酷暴，书契未闻。剝剔孕妇，格煞百姓，每一月凡三十余出，往无定处，东行驱北。明旦应出，郊即驱逐，吏司奔驰，叫呼盈路，鼓声所闻，便徒跣奔走，犯者皆手刃。工商废业，樵苏路断，或委病弃尸，不得殓葬，万姓嗷嗷，甚乎塗炭之上。

征东将军萧衍，军次石头，东昏宝台城，义师颇怀犹豫，先生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塗炭之苦，乃亟陈图讖，贻书赞赏。

《本起录》云：先生自永元以来，深托向晦，闻义师西下，日夕以觐及属于新林，便指毫赞赏，遣弟子戴猛之假道传送，行达皂荚桥，不能得造至登石头，复使李嗣公仰奏，即获闻答，时十一月

朔日也。时台堞犹自严固，时人惩崔氏复墮，多怀犹豫，先生不疑，庶事必决也。

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中水刃木处。

王子年《归来歌》亟论水刃木，皆是美词，兼引王君回文讖焉，荣牵三诗，并盛称梁字为应运之符。

及诸图讖，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洎将昭告，复令用四月丙寅。

《本起录》云：春末夏初，当就昭告，沈约宣旨，又请尅日。先生虽疏数日，而正拣四月八日丙寅也。

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惧之，诘朝升曜，既而复雨。

《本起录》云：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深虑致疑，诘朝迟明，登坛焚燎，受终礼毕，鸾驾还宫，百司陪庆，冥夕之间，雨复滂沛，朝廷扼腕，莫不谓天命矣。

梁武帝即位，弥加钦重，使朱嗣之及舍人黄陆賚敕至山，因召，先生画二牛，一在野，甚自得，一衣以文绣，有人扣刀执绳以随。帝曰：是将学曳尾龟，宁有可致之理，乃与先生书曰：今万乘为累，欲东向修弟子礼，其可得乎。因问享国之期，曰：吾历数奢促如何？先生启云：再环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则直上七七，然后乘彼白云。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预軫来兆，皆此类也。先生眇寻上道，究括纲领，若梯景譬云速，无如刀圭，潜心注想，惟朱黄为阙。

营九转丹，丹砂、雄黄最为主领，于时后魏及宇文泰强盛，武都路梗，雄黄不可致也。

天监三年，夜梦有人云，丹亦可得作。是夕，帝亦梦人云，有志无具，于何轻举，式歌汉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黄陆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阙。宜及真人，真心无难言也。先生初难之，吾宁学少君邪？帝复以梦旨告焉。乃命弟子陆逸冲、潘渊文开积金岭东以为转炼之所。凿石通涧，水东流矣。先生以谓丹品盖多。黄帝九品九丹。

《登真隐诀》云：此方《泰清中经》而治变驳，非后人能究也。
王君虹景。

王君即清虚小有真人也。

左慈九华。

《真诰》曰：左慈得炉火九华之益，即是也。方未显于世。
五灵七变、神精召魂之属。

此例凡三十许种，止还年及老远为地仙耳。
或方法舛略，难可凭用，或品例卑近，不得高通。

前所列诸丹皆泰清中小法，非上清太极冲虚控景之术也。
复有二金液，亦营合有碍。

《登真隐诀》云：一者，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此乃可就，而阙在消石，兼无真人手迹，弥所未安。二者，即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传，而用卤咸、房盐，此世难多，兼祭法用牢俎，以为惮碍之也。

高真上法有四，而四蕊未显。

世虽有其方，疑有假附。

琅玕渊重。

《登真隐诀》注具有其经，是上清法。

曲晨精妙。

《登真隐诀》具有经方，是太极法，二法非惟下识，未敢措心，亦并须房盐、消石为难致也矣。

惟九转所用药石，皆可寻求，制方之体，辞无浮长，历然可解，乃臧愿毕志。

《登真隐诀》云：九转神丹，升虚上经，是太极真人传长里先生，长里先生传西城总真王君，王君传太元真人也。

四年春，先生出居岭东，使王法明守上馆，陆逸冲居下馆，潘渊文、许灵真、杨超远从焉。是岁有事于炉燧，明年元日，开鼎无成。

《集卷》云：天监五年春正月旦，开鼎，惟近上二黄轻华已飞，

其余丹青，始缘边煖赤也。

重九复燧，亟多不偶。

《本起录》云：九月九日，复营，自起火，鼎多细圻，兼山中雷震，虑精华惊歇，更加补治，不敢烈火也。

限竟开鼎，复无成。

《本起录》云：年末限竟^① 开鼎，下鼎绕。

先生平居，凜然如斋戒，自摄心转炼，弥能谨笃。至于燃鼎用阳燧，日中取火，盖其精如此。性少睡，未尝昼寝，夜坐往往及晓。常于月明读书，及是为积烟所熏。

《登真隐诀》云：四年初营，自起火至限竟，用壘谷糠凡一千二百斛。药屋入夜复虑精物干触，必宜闭户，其烟气蓬勃可知矣。

火下欲不见字，帝知之，送波律烛。

《集卷》云：波律，外国香名，烧此可以明目也。

先生以为营非常事，宜声迹旷绝，而此山密迩朝市，岩林浅近，人人皆云有望，事丹家酷忌。

《登真隐诀》云：此事朝野声迹显著，人人皆有望，此最犯戒忌之大也。

姑改服易氏，遐遁东迈，当去建晋中。以其山海深旷，民不知道，见所营为无关视听。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为，是独济小道。

委形枕杖，此尸解下法，盖不得旋及故乡，无由更议营合。若脱尔便逝，不可以为教迹。乃以意启梁武，梁武难之。

《集卷》有帝答书：知欲徙卜，想谘请幽胜，谋及蓍龟。但迁徙之日，为当使人，为当使鬼，犹蹶躄因地，其不灭也。

先生撰意直往，不复疑异，惟是心计旁无知觉。称静斋五旬，一皆断绝，乃以夜半出山，天大晦冥，人莫能见。负笈以从者二人，改名氏曰王整官，称外兵。

^① 原文作“意”，据《内传》正文改。

真人所为非凡识所辨,此名氏官位,当有玄旨耳。

初欲入剡,或度天台至浙江,值潮波甚恶,乃上东阳,仍停长山,闻南路有海掠不可行,稍进赤岩,宿瞿溪石室,梦人告云:欲求还丹,三永之间。乃自思惟,知是永嘉、永宁、永康之际。

先生初造朱阳,创立基址,在永明、永泰、永元之中,今梦旨当指此耳。若是永嘉、永宁、永康,何管理之不证耶。因是出访村人,咸云过此室上百余里至永康,兰中山最为高绝。诘朝乃往。经纪山,良可居,惟田少,无议聚糠。

《集卷》云:此土居人合把稻,旦旦捣舂,以给日用,收糠不可得也。

后人楠溪青嶂山,爱其稻田,乃居。会荒伦,连岁不谐,兼寇掠充斥。

《集卷》云:先生因以此行皆不偶,自缘海数郡从来晏如,二三年来,无山不寇,先生亦僦田自作。复值岁饥。

乃曰:尝闻《五岳图》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

《名山记》云:霍山在罗江县,高三千四百丈,上方八百里,东卿司命茅君所居。

乃自海道往焉。过牛岑,出海口,东望扶桑,乃慨然叹曰:平生侠无学而不学,今日一皆休矣。霍山连略当六七百里,隐隐如阵云,岩崿惊拔,特异他处。先生足躋真境,心注玄关,大有灵应感对,事秘不书。亦人稀田寡,复以无糠为患。

《集卷》云:先生深历四面,无议投足。

复自海道还永嘉,至木^①溜,形势殊好。

《登真隐诀》云:壬辰年六月,便乘海还永嘉。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墟,孤立海中,都无人居,甚可营合。

会上使司徒慧明迎还旧岭。

《登真隐诀》云:八月,至木溜,见其可居,始上岸起屋。十

① 原文作“太”,据下文引《登真隐诀》改。

月，司徒慧明至。于时，愿得且停木溜，与慧明商榷，往复积日，永不敢许，于是相随而还也。

道中书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上使营朱阳馆，以居先生，三让之，诏不从。

《登真隐诀》云：甲午年，敕买故许长史宅宋长沙馆，仍使潘渊文与材官、师匠营起朱阳馆。

自于馆东建药屋静院，云蹊玄洲之迹。

《登真隐诀》云：昔李明于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发掘基址，屡得破瓦器，乃其旧用。

自南岳还，鼎事累营皆不谐，乃非都无仿佛，每开鼎皆获霜华。门人金谓此为成，先生验丹家说云：琅丹成，其飞华光彩三十七种；曲晨丹成，其飞华百杂乱色，光照流焕，玄气徘徊；太清金液丹成，其飞华状奔月坠星，云绣九色，其气似紫华之见太阳，其精似青大之映景云；九转丹成，则飞精九色，流光焕明。不尔未成也。累年所得，截轻华霏霏，或光明廉稜如霜雪，无杂色。十八年所获，严鏐光华，过于前者，皆似五六出华，剑锋雁齿，而下滓枯磕泖黑碎之如星，焚作朱黄，烟气当犹火势，或羸或猛，朱黄不得飞翥。时有邓郁之居南岳。

《登真隐诀》云：宜都夷陵人。天监四年湘州刺史杨公则携下都，启闻，进见。权住蒋山，后敕给九转药具，令还山营合。敕给九转丹具，令营合。限尽开鼎，上有钟乳霜雪，光明照耀，永无杂色。邓不以献奉，自饵之。

《丹经》说云：乙未正月开鼎，云上有钟乳霜雪，下滓作丸，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飞华都不与人，亦无献奉，独将往南岳间，一皆藏之也。

乃云病病，八日云^①。是夕衡岳本风雪，忽暂明朗。

① 原文作“云”，语义难通，疑是“去”字。

《登真隐诀》云：邓先生初云^①，颜色如故，后三日安舆中，停置积日，尸不毁坏。

《丹诀》云：丹成，无杂光彩，是毒丹，饵当暂死，须臾起去。

《丹经》云：丹数限未色疹不全^②，皆名毒丹，故太清云：顿服一两，亦即暂死。昔魏伯阳与弟子合丹成，共一人服，服亦死，余人行走，比还，已去也。

先生有乘云御龙心。自云，年十二时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欣然有志。及年二九，授上道，见上清太极法，遂鄙而不为，奚况饵毒丹求遁去乎。累年所得，一皆埋藏，而十八年飞华虽无杂色，光彩特异，欲试作黄白，以验成否。

《丹经》云：取铅十斤，著铁器中，猛火煎之，三沸，投九转之华一铢于铅中，搅之，须臾，立成黄金也。

是夕摄心乞感，忽见有人来，朦胧如烟云中，语云：不须试，试亦不得。今人多贪，忽闻金玉可作，便求，竟毁天禁。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复作叹声云：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渐服自可知。言讫，飒然东去。于是乃不试。先生常云：去世之日，如茅太元之发咸阳。

《太元真人传》云：真人发咸阳时，约亲友、乡人，其日皆至，有珍馐异乐自空虚而至，既而从千乘万骑而南，人皆瞻睹也。

赵广信之薨剡白。

葛稚川《神仙传》云：赵广信于剡北山白日升天。

欲以晓悟迷方，永题竹史，从来感遇，正恐挺运潜嘿，不得从志。至是乃叹曰：昔闻幽说，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登晨者，盖三朝有浮名乎。南真高尊，既非轻举。

南真紫虚元君魏夫人也，以夜半解化矣。

小掾萧邈，复是变解。

① 原文作“云”，疑是“去”字。

② 此句疑有脱讹。

小椽，许长史子玉斧也，因礼拜乃变迹。

玄师旧辙，诚宜仰遵也。普通五年复涂鼎起火。明年正旦甲子开鼎，光气照烛，动心焕目，形质似前者，而加以彩虹杂色。始天监四年初有志于此，及是凡七营乃成。先是，吏部尚书谢览梦人告曰：华阳先生得道未久，职位且掌禄籍。无几何，有女子侄钱，亦居华阳，师事先生，授经及符图，忽一日辞，先生问：何之？钱曰：上宾于金阙。先生曰：吾门人先吾去者数矣。钱曰：师当为蓬莱都水监。先生乃过岭送之，因赠诗云云。先生晚岁，眸子忽尔正方。

《紫阳周君传》云：君常于市中遇黄泰者，见其眸子正方，乃知是仙人，因求乞长生之术，乃自云是玄洲上卿苏君也。或云眸子方，寿万岁。

顾眄皆有奇异光象，文章气调弥更英逸，所居楼，虽入室弟子不许窥伺也。在世八十一年，以梁大同二年丙辰三月十二日癸丑解驾违世。其日诘朝作《告逝篇》示其门人。

其篇云云，具集中。

巳时，恬然乃去，支体柔弱，颜色不变，异香奇灵，缭绕山谷。将敛，乃见空衣。

变解之道，初宛然见尸存，存未几，但冠剑及空衣存耳。

十四日，窆虚柩于雷平山。梁武帝谥曰：贞白先生。先生以犹子松乔为嗣，仍居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

《学苑》一百卷

《孝经》、《论语》序注十二卷

《三礼序》一卷

注①《尚书》、《毛诗序》一卷

《老》②子内外集》四卷

① 原文讹作“汪”。

② 原文讹作“孝”。

- 《玉匱记》三卷
《三国志赞述》一卷
《抱朴子注》二十卷
《世语阙字》二卷
《古今州郡记》三卷
《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
撰《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
《员仪集要》三卷
《七曜新旧术数》二卷
《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
《卜筮略要》一卷
《灵奇秘奥》一卷
《举百事吉凶历》一卷
《算数艺术杂事》一卷
右一百六十六卷

先生在山所著书：

- 《登真隐诀》二十四卷
《真诰》十卷
《本草经注》七卷
《肘后百一方》三卷
《梦书》一卷
《效验施用药方》五卷
《集金丹药白方》一卷
《服云母诸石方》一卷
《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
《断谷秘方》一卷
《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
《服气导引》一卷
《人间却灾患法》一卷

右五十七卷

齐梁间侯王公卿从先生受业者数百人，一皆拒绝，惟徐勉、江祐、丘迟、范云、江淹、任、萧子云、沈约、谢朓、谢览、谢举等，在世日早申拥簪之礼，绝迹之后，提引不已。沈约尝因疾遂有挂冠志，疾愈，复流连簪绂，先生封前书以激其志。约启云：上不许陈乞。先生叹曰：此公乃尔蹇薄。

夫乐钟鼎者，以岩谷为接逐，恋山林者，视绂冕为桎梏。若论臻其微，钟鼎不及岩谷明矣。胁肩于荣辱之途，翘足于罗网之间，与夫啸傲林泽，咀嚼芝术可同日而言。即以沈休文之贵盛，先生叹为蹇薄，是知道德贵矣。

惟奇谢览，览年少，自疑寿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先生作浑天象，高三尺许，天转地静，列宿度数，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见伏早晚，以机转之，宛与天会。云修道所须，非史官家事。又因流水作自然漏刻，十二时循环自转，无劳守视。先生冲深粹和，性不严毅，小大见之，皆忻然乐悦，而真仪灵气，自命人畏服。门人承奉，祇肃有如宫廷。入山之后，巾褐未尝离体，每云：人之禀挺命禄，实自悬天。桐柏之弃舍王宫，文成之褫斥侯服，三茅之违亲绝胤，二许之遗室摈形，未必正由识见，兼是为运所引。我从来遇诸机际，并几成而失。永明中，五过启禄，得轍差舛，若不尔，岂得今日之事。身中既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弥笃。而思识精深，凡所弄阅，皆人不至。尤好五行阴阳，风角气候，太一遁甲、星历算数、山川地理、方国物产，及医方、香药分剂，虫鸟草木，考校名类，莫不毕该。常言：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下

宋宣和封诰

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龙汉之宝符，盖将敷畅灵音，恢隆道化，阐微言于至教，荐休命于列真。蓬莱都水监陶隐居，振迹荣罗，濯精华阙，神交无累。迹虽相于山中，诚感夙通，赋已仙于海上。顾德名之莫拟，岂妙荫之敢忘，尚都显号之荣，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

解真碑铭(邵陵王萧纶撰)

夫夜光结绿，非舫篋之恒真，逸羽翔鳞，岂园池之近玩。宁期心于远大，盖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颖阳高蹈，洗耳于唐朝，汉阴贞栖，灭迹于周代。盛德流风，有自来矣。应期而曜质者，其在兹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阳人，其先出自帝尧陶唐氏之后，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此。龙马见五色之符，钦明表八采之瑞，光被于天下，允厘于庶职。洪原夔远，系绪绵长。汉兴，舍为高祖右司马，子青，翟位至丞相，后汉末南渡，始居丹阳。七世祖潜，仕吴为镇南将军、荆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参军事，父贞宝，司徒建安王国侍郎，并立履清约，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气，蓄凌飏之雅姿，兼宣七善，总修九德，行仁蹈义，岳峙渊渟。墙仞无以睹，清浊不能测。道风与星汉同高，胜气与烟霞共远。六岁便解书，能属文，七岁读《孝经》、《毛诗》、《论语》数万言。曼倩幼习坟典，公干少读诗赋，方之于古，彼有多惭。是以岐嶷流声，中黄著颂。有乡人得葛洪《神仙传》，见淮南八公诸仙事，乃叹曰：读此书使人有凌云之气。于是寝兴讽诵，晨夜不辍。年二十七，为宜都王侍读，总知管记事，傍道求贤，禁林招士，朝难其选，咸曰得人。阮瑀之书记，不足扶衡，孙楚之辞才，何以捧毂。齐代好治宫室，方修苑囿，青溪旧馆，更就起筑，仍奏表上颂，辞事兼美，迈彼乐职之篇，逾乎景福之制，帝省览久之，益以为善。除奉朝请，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请，是谓棫朴者也。先生本不希荣，常欲辞退，乃与亲友书曰：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今已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东都之外，解组北山

之阿，同稷丘之栖隐，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东迈。朝廷锡问，时贤饯别，祖以二疏，括兹四隐，超然轻举，异代同符。尔乃杖策遐征，游践名岳。既而到于句容，登于茅岭，以此地神仙之官府，灵异之栖托，往不知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今我义达无复其方，请同求志之业。故自称隐居，亦犹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岩栖影，依林遁迹，交柯结宇，划径为门，悬崖对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岭，组织烟霞，枕石漱流，山禽无扰，采药偶逢，野兽不乱，逍遥闲旷，放浪丘陵，嗒然若丧，确乎难拔。属齐末道丧，天命既否，水阨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静思冥数，预识其兆，于是，近远书问，悉皆杜绝，昔乃闻之夏甫，今则见之先生。我大梁休运应期，受天明命，三辰开朗，四海宁谧，先生奉表称庆，于是信问复通。自天监已来，尝有敕旨，供给药饵，不乏岁时，渥泽深恩，莫之与比。先生七年暂从南岳兹山也，阊阖风之地轴，若崑陵之天镇。八柱旁临，九纯间设，树有琅玕，草生车骑，遗世独往，是用忘归。十一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征先生还茅山，别给廨宇。轩君之降情天老，汉帝之致礼河上，况于兹日，弗能尚也。养志山阿，多历年所，摄生既善，冥祥亦降，猛兽不据，魑魅莫逢。庭无荆棘，远同阙里，阶吐神泉，遥扶疏勒。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鸾凤游集，芝英丰润矣。以大同二年岁次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别迁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储皇轸悼。有诏称誉，追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礼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阳郡句容县之雷平山，若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仪精瞻，含章贞洁，不修廉隅，年将中寿，匪逾于矩。眉目疏朗，仪貌鲜洁，实忘劝沮，多行德惠。宝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厉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乙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安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诣。爰及羿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

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均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门人桓法阇等，慕遥风于缙氏，结遗想于乔阳，勒玄碑而相质，腾绛霄之流芳。乃作铭曰：

留舄表化，弃剑凝神。徘徊紫气，照耀丹林。厥迹犹在，余风可遵。谁其嗣此，渊哉淑人。高行迈种，盛德日新。朗犹悬镜，郁似贞筠。身以弘道，行不违仁。昔游纓纓，颀颀搢绅。猷乎匡救，劳彼问津。亦既解组，乃袭山巾。远寻丘壑，高蹈风尘。情无缁世，隐不隔真。结宇崇岩，贞栖茂草。冰玉留年，精华却老。乃有令闻，康庄寿考。白水过庭，危峰临洞。露缀兰阶，云生桂栋。日斜栏席，花落窗甕。尚平未返，王孙不旋。海桑交易，陵谷变迁。丰碑有竖，遗芳万年。

碑阴记(天台华峰白云道士河内司马道隐子微述)

大哉道元。万灵资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测，其生成也。氤氲可知。若夫禀习经法，精思通感，调转丹液，形神炼化，归同一致，举异三清，自古所得，罕能尽善。兼而聚之，鉴而辩之，静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实惟贞白先生欤。盖特禀灵气，胎息见龙升之梦，卓秀神仪，骨录表鹤仙之状。心若明镜，洞鉴无遗。器犹洪钟，虚受必应。是以天经真传，备集于昭台，奥义微言，咸决于灵府。纂类篇简，悉成部帙。广金书之凤篆，益琅函之龙章。阐幽前秘，击蒙后学。若诸真之下教，为百代之明师焉。睹先生写貌之象，则道存目击。览先生著述之义，则情见乎辞。纵逾千载，亦可得之一朝矣。至于思神密感之妙，炼形化度之术，非我不知，理难详据。敬以修身，德业受书道备。按夫科格，固超真阶，命分殊途，显然异轨，应从解景，不事登晨，冥升上清，弗可得而测已。然隐几云化，虚室仍存，代剑未飞，阴丘尚闭，道尊德贵，终古不渝，披文相质，乃今无睹，朝代累革，山世转睽，永怀仙烈，久增诚慨。子微将游衡岳，暂憩茅山，与诸法义，聚某刻石，邵陵撰制，美具当年，今以书勒言全往行，因运拙笔，聊述真猷，

纪于碑阴，式昭年世。时大唐开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书。

墓志铭(梁昭明太子撰)^①

维大同二年龙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时，华阳洞陶先生蝉蜕于茅山朱阳馆。先生讳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申如恒，颜色不变。有制赠以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遣舍人主书监护丧事，十四日巳时，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归空为美，道以无涯为真，不知悦生，大德所以为生，不知恶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隐显变化，物莫能测。既而岫开析石，天坠玉棺，银书息简，流珠罢灶。九节丽于天中，千和焚于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学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术，今簪元良，屡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怆，思化杖而酸辛。乃为铭曰：

无名之道，不死为仙。亦有元放，兼称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固然。猗欤夫子，受策归元。梨传宛吏，书因贾船。虎车照景，蜺拂凌烟。余花灼灿，春涧潺湲。郁郁茅岭，悠悠洞天。三仙白鹤，何时复旋。

沈约酬华阳先生

三清末可覩，一气且空存。所愿回光景，拯难拔危魂。若蒙九丹赠，岂惧六龙奔。

早欲寻名山，须待婚嫁毕。二事虽云已，此外复非一。忽闻龙图至，仍睹龙^②光溢。副朝首八元，开壤赋千室。冠缨曾弗露，风雨未尝栉。鸣玉响洞门，金蝉映朝日。惭无小人报，徒叨令尹秩。岂忘平生怀，靡盬不遑恤。

① 昭明太子先陶弘景卒，此铭实梁简文帝所撰，《内传》误题。

② 《沈隐侯集》作“荣”。

侧闻上士说，尺木乃腾霄。云骈不展地，仙居多丽谯。卧待三芝秀，坐对百神朝。衔书必青鸟，佳客信龙镳。非止灵桃实，方见大椿凋。

餐玉驻年龄，吞霞反容质。眇识青丘树，回见扶桑日。烂熳蜃云舒，嵌崟山海出。

后湖苏庠赞陶先生像

蕊珠妙言，字照编简。云霾三馆，其人则远。世衰道丧，完节者鲜。临终之叹，作世和扁。

(八)元张天雨《玄品录》卷三(《道藏》)

道品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十岁得葛洪《神仙传》读之，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侍读，除奉朝请。先生故事，多所取焉。^①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乃山中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江左诸名山，访求杨、许诸真迹。尝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此难立，正自恒欲就之。且永明间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安得为今日之事。先生为人，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弟子、宾客居其

^① “先生故事，多所取焉”句实删削《南史》而成，原句应为：“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

下,与物遂绝。特爱松风,欣然闻其响。有时独游泉领,望见者以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异,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圆产物,医术本草,帝代历年。尝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会。云修道所须也。深慕张良为人,云古贤无比。齐末为讖曰:水丑木为梁,及梁武兵至薪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先生援引图讖数家,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帝既早与之游,即位恩礼逾笃。先生已得神符秘诀,神丹屡成而辍,帝每给药物,又服所制飞丹有验,益敬重之。得所上书,烧香虔受。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惟画两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戮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以修上道。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仙书云:眼方者寿千岁,先生末年一眼有时而方。既妙解术数,逆知梁祚将覆,预制诗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应昭阳殿,化作单于宫。秘诗在篋,化去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比侯景篡,果在昭阳殿。逆期先知去日,为告逝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所著山世书数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余人。从子栩撰《华阳隐居陶先生本起录》,吴兴谢淪撰《陶先生小传》,李渤撰《梁茅山贞白先生传》,贾嵩撰《蓬萊都水监陶真人内传》。宣和《封宗元翊教真人诰》,诰词曰: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龙汉之宝符,盖将敷畅灵音,恢崇道化,阐微言于至教,荐休命于列真。蓬萊都水监陶隐居,振迹荣罗,濯精华阙,神交无累。迹虽相于山中,诚感凤通,赋已仙于海上。顾德名之莫拟,岂妙荫之敢忘,尚都显号之荣,永介涵生之祉。

(九)元刘大彬《茅山志》卷十《上清品》(《道藏》)

九代宗师金阙右卿司命蓬莱都水监梁国师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宗元翊教真人姓陶，讳弘景，字通明，吴荆牧濬七世孙，丹阳秣陵人也。生宋孝建三年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十岁见淮南八公事，便嗜养生之说，既冠而不肯婚，以资营未立，薄游下位，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从兴世馆孙先生咨禀经法，茅山获前真杨、许手书，于是启假东游，诣娄惠明于大洪山，遇杜京产于太平山，寻钟义山于峴山，谒朱僧标于天台，又获真人手迹十余卷。还都，以振武将军除奉朝请。永明十一年^①乃拜表辞职，时年三十七。遂来山，自称华阳隐居，岭西立华阳三馆，上馆建层楼，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梁武即位，弥加钦重，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出居岭东，有事于炉燧，七年，以为林岩浅近，复思远游，乃改名氏，曰王整，官，称外兵，夜半出山，至永嘉楠江青嶂山，梦佛授记，名胜力菩萨。住大若岩修所著《真诰》。复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武帝有敕迎还旧山，因诣鄮县礼阿育塔，自誓受五大摄戒。既归，入住东涧。明年冬，徙朱阳馆，又移郁冈斋室。先生山世所著书二百余卷，弟子受法者三千余人。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篇示桓法阇等，即日尸解，年八十一，屋中香气积日不散，敕遣舍人主书监护丧事，十四日窆虚柩于雷平山。先生神仪明秀，盼睐有光，形细长项，耳间矫矫，显然异众矣。尝言心中恒如明镜，触形遇物，不觉滞碍。紫阳王君曰：陶公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冲等也。赵丞曰：蓬莱都水监高光坐治水事被责，以陶代之。既且停召，当更选耳。按此乃乙未年中事，见《周氏玄通记》，后二十一年先生始去世，仙位当更升也。赞曰：

高卧白云，晨飧绛霞。弟子如林，著书满家。濯神九清，腾耀三景。与天为徒，如日之炯。

^① 按，当为永明十年。

(十)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文苑英华》卷八七三)^②

夫夜光结绿，非肱簋之恒真，逸羽翔鳞，岂园池之近玩。宁期心于远大，盖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颖阳高蹈，洗耳于唐朝，汉阴贞栖，灭迹于周代。盛德风流，有自来矣。应期而曜质者，其在兹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阳人，其先自帝尧陶唐氏之后胤，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止。龙马见五色之符，钦明表八彩之瑞，光宅于天下，允厘于庶职。洪原夙远，系绪绵长。汉兴，陶舍为高祖右司马，子青，翟位至丞相，后至汉末南渡，始居丹阳。七世祖濬，仕吴为镇南将军、荆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参军事，父贞宝，司徒建安王国侍郎，并立履清约，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气，蓄陵飏之雅姿，兼宣七善，总修九德，行仁蹈义，岳峙渊渟。墙仞无以睹，清浊不能测。道风与星汉同高，胜气与烟霞共远。六岁便解书，能属文，七岁读《孝经》、《毛诗》、《论语》数万言。曼倩幼习典坟，公干少诵诗赋，方之于古，彼有多惭。是以岐嶷流声，黄中著称。有乡人得葛洪《神仙传》，见淮南八公诸仙事，乃叹曰：读此书便使人有凌云之气。于是寝兴讽诵，晨夜不辍。年二十七，为宜都王侍读，总知管记事，傍道求贤，禁林招士，朝难其选，是曰得人。阮瑀之书记，不足扶衡，孙楚之才辞，何以捧毂。齐代好治宫室，方修苑囿，青溪旧观，更就起筑，仍奏表上颂，辞事兼美，迈彼乐职之篇，逾乎景福之制，帝省览久之，益以为善。除奉朝请，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请，是谓棫朴者也。先生本不希荣，常欲辞退，乃与亲友书曰：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藪。今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无为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东都之外，解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栖隐，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东迈。朝廷锡问，时贤饯别，祖以二疏，招兹四皓，超然轻举，异代

① 此碑亦见前贾嵩《内传》，然《内传》略有删削，此据《文苑英华》录出。

同符。尔乃杖策孤征，游践山岳。既而到于句容，登于茅岭，以此地神仙之宫府，灵异之栖托，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今我义通无复其一，请同求志之业。故自称隐居，亦犹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岩栖隐，依林遁迹，交柯结宇，划径为门，悬崖对溜，悲吟灌水，深壑绝峭，组织烟霞，枕石漱流，山禽无扰，采药耦耕，野兽不乱，逍遥闲旷，放浪陵山，嗒然若丧，确乎难拔。属齐末道消，天命既否，水斗谷洛，地震由辰，先生静思冥数，预识徵兆，于是，近远书问，悉皆杜绝，昔乃闻之夏甫，今则见之先生。我大梁休运应期，受天明命，三辰开朗，四海宁谧，先生奉表称庆，于是信问复通。天监以来，尝有敕旨，供给药饵，不乏岁时，渥泽湛恩，莫之与比。先生七年暂游南岳兹山也，譬闾风之地轴，若崑陵之天镇。八柱旁临，九纯间设，树有琅玕，草生车骑，遗世独往，是用忘归。十一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征还先生，茅山别给廨宇。轩后之降精天老，汉帝之致礼河宗，况于兹日，弗能尚也。养志山阿，多历年所，摄生既善，冥祥亦降，猛兽不据，魑魅莫逢。庭无荆棘，远同阙里。阶吐神泉，运动口口。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鸾凤游集，芝英丰润。大造佛像，爰及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梦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启闻，蒙敕许可。葛玄之梦见开士，朱鸾之远望尊仪，何以拟兹通感，正此徵应。^①以大同二^②年岁次景^③辰三月壬寅朔日癸丑，告别迁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储皇轸悼。有诏称誉，追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礼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阳郡句容县之雷平山，若轩辕之葬衣冠，如王乔之藏剑舄，化于兹日，可得偶焉。先生器宇凝深，思仪精瞻，含章贞洁，不修廉隅，年将中寿，匪逾于矩。眉目疏朗，仪貌鲜洁，实亡劝

① “大造佛像……正此徵应”句为《内传》所删。

② 原文误作“三”。

③ 原注：计其时当作丙，疑唐人避讳。

沮，多行德惠。恹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厉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乙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女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诣。爰及卜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钧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门人桓法阆等，慕遥风于侯氏，绘遗像于桥阳，勒玄碑而相质，腾绛霄之流芳。乃为铭曰：

留舄表化，弃剑凝神。徘徊紫气，照耀丹鳞。厥迹犹在，余风可遵。谁其嗣此，渊哉淑人。高行迈种，盛德日新。朗犹悬镜，郁似贞筠。身以弘道，行不违仁。昔游纓纓，颀颀缙绅。厌乎匡救，劳彼问津。亦既解组，乃袭山巾。远寻丘壑，高蹈风尘。情无缅世，隐不隔真。结宇依岩，贞栖茂草。水玉留年，华精却老。乃有令问，康庄寿考。泉过危庭，峰临窈洞。露凝兰阶，云生桂栋。日斜栏席，花落窗甃。尚平未返，王孙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贸迁。丰碑有树，遗烈无骞。

(十一)梁简文帝《华阳陶先生墓志》

(《艺文类聚》卷三十七)①

若夫，真以归空为美，送以无形为贵，不知悦生，大德所以为生，不知恶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隐显变化，则物莫之测。既而岫开析石，天坠玉棺，银书息简，流珠罢灶。九节丽于天中，千和焚于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学振临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汜上之术，今簪元良，屡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侧怆，思化杖而酸情。乃为铭曰：

无名之道，不死为仙。以有元则，兼称稚川。猗欤夫子，受策归玄。梨传宛吏，书因贾舡。郁郁方岩，悠悠洞天。三仙白鹤，何时复旋。

① 《艺文类聚》所载《华阳陶先生墓志》颇有删节，不及《内传》完整，录出备参。

附录二 陶弘景事迹类编

陶弘景事迹,前篇所录多种传记资料载之已详,复检子史杂书、笔记小说兼及佛道经典,又得隐居轶事多条,乃芟去与传记重复者,厘为五门,曰轶事、曰艺术、曰著作、曰遗址、曰师友门生。需说明者,本编所录隐居事迹,皆照录原文,不作考辨,如轶事门中佛书所记诸条,多不见正史及道经传记,按陶氏佞佛事颇为黄冠所讳言,而释子又不免夸大其词,故真赝难辨。又艺术、著作两门,辑录前贤有关隐居书画、著作记载,侧重评价之词及版本流传,若诸史艺文志仅记书目,碑帖目仅标名称者,一般不录。

(一) 轶 事

陶弘景字道(通)明,魏郡平阳人也,自号华阳隐居,常谓人曰:我心恒如悬镜,触物不遗。好行阴德,拯济困穷,合施诸药,远近赖之。平生未尝昼眠,看书必至夜半,好闻松风之声,少绝肥膴,晚惟进饀、紫菜、生姜,饮酒能至一斗,而断不醉也。(《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

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阳人也,自云华阳隐居,梁高祖太子从而受道,梁简文、邵陵诸王,谢览、沈约、阮忻、虞权并服膺师事之。(《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九引《三洞珠囊》)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慧),博通经史,覩葛洪《神仙传》,便有

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明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引《谈薮》）

元帝尝著《金楼子》，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南史·周弘正传》）

吾（萧绎）之亡也，可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礼，《曲礼》一卷、《孝经》一帙，《孝子传》并陶华阳剑一口以自随，此外珠玉不入，铜铁勿藏也。（《金楼子·终制》）

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篆，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隋书·经籍志》）

初（齐宜都王萧铿）出阁时，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日命过，身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著《梦记》云。（《南史·萧

铿传》)

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博学多识,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阳殿。(《梁书·侯景传》)

天监中,茅山隐士陶弘景为五言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忽作单于宫。及大同之季,公卿惟以谈玄为务。夷甫、平叔,朝贤也。侯景作乱,遂居昭阳殿。(《隋书·五行志》)

如茅山道士陶隐居,撰《众醮仪》,凡十卷。从天地山川星辰岳渎,及安宅谢墓,呼召魂神所营醮法,备列珍奇,广班绫彩,多用蒸鱼鹿脯,黄白蜜饭,清酒杂果,盐豉油米等。先奏章请唤将军吏兵,道士等皆执手版,向神称臣,叩头再拜,求恩乞福,与俗并同。既非出家,具造邪业。(《辩正论》卷二《三教治道篇第二》)

冲和子与陶隐居,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案琰玘抄文,冲和所制,以非当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隐居答大鸾法师书云:去朔耳闻音声,兹晨眼受文字,或由顶礼岁积,故致真应来仪,正尔整拂藤蒲,采汲华水,端襟俨思,伫聆警锡也。弟子华阳陶弘景和南。(《辩正论》卷六《内九箴篇第六》,又见《广弘明集》卷十三)

《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所以然者,道本无形但是元气。(《辩正论》卷八《历代相承篇第十一》)

其时丹阳陶弘景，性多博识，聪睿过人。身为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阳，静退无为，不交时事。时号贞白先生。又号陶隐居。多所著述，并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于所居地起塔，图佛容像，亲自供养，号曰胜力菩萨。其塔见在茅山朱阳观中，于今不为鸟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馆为观，行黄帝老子之教。恶灵宝法伪鄙而不行，手著论以非之。弘景深为梁武所器。尚频徵令仕，确乎不拔，并述诗以赠武帝，并入於集。事迹昭显，光乎梁史。（《甄正论》卷下）

（释昙鸾，雁门人，注《大集经》未半而感气疾，遂有感人命苦短，因闻江南陶隐居者，方术所归，广博弘贍，海内宗重，遂往从之。既达梁朝，时大通中也。……（先诣梁武帝，说佛法精义，为武帝称赏，帝）问所由来，昙鸾曰：欲学佛法，恨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帝曰：此傲世遁隐者，比屡征不就，任往造之。鸾寻致书通问，陶乃答云：去月耳闻音声，兹辰眼受文字，将由顶礼，岁积，故使真应来仪。正尔整拂藤蒲，具陈花水，端襟敛思，竚聆警锡也。及届山所，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远意。……（昙鸾还魏，欲依方修炼，逢中国三藏菩提留支）鸾往启曰：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不死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也。鸾寻顶受，所赍仙方并火烧之。（《续高僧传》卷六）

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尚书故实》）

贞白隐居贝都山中，尝畜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

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本传具载。（《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引《芝田录》）

（天监十五年）华阳真人陶弘景建菩提白塔于三茅山，尝梦佛授记名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大同二年）华阳真人陶弘景告化，香气积日不散。谥贞白先生。所撰书曰《真诰》。有云：清虚裴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余学仙道。紫阳周真人弟子十五人，四人解佛法。桐柏真人王子乔弟子二十五人，八人学佛法。对会稽东，去岸七万里，其西小方诸山，多有奉佛道，有浮图，高百丈，金玉镂之，虽奉佛道，不作比丘形。（《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陶隐居云：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续博物志》卷七）

丹阳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茅山。梁武帝早与之游，恩礼甚至，每得其书，焚香以受。数手敕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咨之，月中常有数信，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有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天下之士犹尚西晋之俗，竞谈玄理，故弘景云尔。盖散诞论空，则废礼法，礼法既废，则夷狄矣。古今之变，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邵氏闻见后录》卷九）

陶贞白七次丹成，皆中等，神人告以定分，止合得北中丹，于是服之，遁景而去。（《至正金陵新志》卷五《陶隐居井》）

梁武帝藏钟、张、二王书至多，尝使虞稣、陶隐居辈订证。

（《绛帖平》卷四）

宣和封杨、郭、许、陶五真人诰。敕。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龙汉之宝符，盖将敷畅灵音，恢隆道化。阐微言于至教，荐休明于列真。蓬莱都水监陶隐居，振迹荣罗，濯精华阙，神交无累。迹虽相于山中，诚感夙通，赋已仙于海上。顾德名之莫拟，岂妙荫之敢忘，尚都显号之荣，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茅山志》卷四）

梁陶隐居母梦有青龙入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执香炉诣之，已有娠，遂生。隐居与齐宜都王善，王被诛，梦来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遂著《梦记》。（《说郛》卷六十《五代新说》）

陶弘景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难立止，恒欲就之。（《南北朝新语》卷一）

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剑十三，以象闰月。《水经注》：梁国多池沼，时池中出神剑，至今其民像而作之，号大梁氏之剑。（《螭衣生剑记》）

昔北齐封阳休之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为王。使林远及陶隐居之徒，当必为休之耻矣。（《因话录》卷四）

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负戾飞天历，终是甲辰君之语，今陛下生年、纪号，实与之合，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元史·文宗本纪》）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世业盐荚，侨寓淮安。父修龄，以诗名家。若璩幼多病，读书闻记不出声，年十五，以商籍补山阳

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弘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其立志如此。(《清史稿·阎若璩传》)

(二)艺 术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法书要录》卷二《梁袁昂·古今书评》)

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法书要录》卷二《梁庾肩吾·书品》)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颜氏家训》卷七)

陶弘景父真宝,清辩有才学,工草隶,闲骑射、药术。而陶隐居亦善隶书,虽效王书而别为一法,文章尺牍为世所重。(《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真诰》)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隐居丹阳茅山,师祖钟王,采其气骨。然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其真书劲利,欧、虞往往不如。隶、行入能。(《书断》卷下)

通明高爽,紧密自然。摆阖宋文,峻削阮研。载窥逸轨,不让真仙。犹龙髯鹤颈,奋举云天。(《述书赋》卷上)

隐居颖脱,得书之精髓,如丽景霜空,鹰隼初击。(《墨池编》卷二《唐李嗣真后书品》)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幼有异操，年十岁，的葛洪《神仙传》，便有长生之志。喜琴棋，工草隶，征为诸王侍读，永明十年辞禄，遂止于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好著述，明众艺，善书画。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朝廷有事多询之，号山中宰相。（《历代名画记》卷七）

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瘞鹤铭，皆其遗迹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戏，妙识远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隐居、（张）道恩辈与之论书哉。（《东观余论》卷上）

陶隐居书故自入流，其在华阳，得杨、许三真君真迹最多而学之，故萧远淡雅，若其为人。今金陵有许长史旧馆坛碑，最先一行乃隐居书。又世有画版帖四十三字，与碑字笔势同，今观其为杨瓊瑶作奏章稿，与前二书虽真行不同，要非异手作也。袁昂论书，以隐居若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今审其疏，比之钟、王，为未成就，然神韵闲旷，那可以峭快目之。独寔易谓其高爽自然，逸轨奋举，颇近实云。（《东观余论》卷下）

跋瘞鹤铭后。此铭相传为王右军书，故苏舜钦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瘞鹤铭》。（欧阳）文忠以为不类王法，而类颜鲁公，由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瓚。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日真逸者，岂其别号欤。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住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

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此铭后又题丹阳仙尉山阴宰数字,及唐王瓚诗,字画以颇似《瘞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瓚书,误矣。((《东观余论》卷下)

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身長七尺四寸,神采耸秀,有仙风道骨。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而行书尤妙,大率以钟、王为法,骀力不至而逸气有余。然苦心笃志,未尝懈倦。无纸墨,则至于以荻画灰。苦恨无书以为楷式,则愿作主书吏。故其答武帝论书云:愚固博涉,患未能精。其刻意于学,有至于此。袁昂谓其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李嗣真亦云:如丽景霜空,鹰隼初击。俱以骏快称。今观其书,信乎其非虚言也。弘景少得养生之道,初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郎,上章辞禄,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辟穀道引,老而童颜,真神仙中人也。后赠中散大夫。今御府所藏行书六:《杨□瑶密辞》、《华阳洞天帖》、《屈画帖》、《茅山帖》、《带名帖》、《茅山仙迹》。((《宣和书谱》卷八)

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瘞鹤铭皆其遗迹。((《续博物志》卷八)

陶隐居年十二,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黄素写上清丹法,慨然有神仙之志,大都东晋士大夫既留意笔札,又不屑为俗间书,是以右军黄庭内外景、陶贞白神仙起居法,琅然照世,不独杨、许喜录上清真秘授也。((《六研斋笔记二笔》卷三)

陶隐居入山帖,仅见停云馆帖,而衡翁无跋,不知其祖本为石刻,为墨迹。据《弇山集》,入山帖在石刻部中,疑停云亦摹石本也。此书在茅山道观,道士所传,盖有墨迹,有石刻。据《贞白

先生集》后附宋成都李汝弼《桓先生实录》云：绍兴壬戌，游茅山玉晨观，见前都正傅公，具道观经兵火，而晋梁唐碑刻犹存，因得览隐居墨迹南平王萧伟所造清远之馆云云。与此帖正同，第无帖首元帝一行耳。据此知隐居墨迹，绍兴间犹在。又昭台弟子傅霄《桓记》后题云：按古刻，朱阳馆东有南平王所造清远之馆，乃桓所居。桓入山所作诗，并邵陵王访桓诗，皆隐居亲书，见刻于石。霄即李汝弼所称傅公。是绍兴间此帖尚有古石刻也。《舆地碑目》所谓陶隐居帖在玉晨观者，盖即此刻。帖固不必是隐居书，然传之有绪，题首华阳隐居真迹帖数字，当亦沿古刻旧题，非待诏臆定也。《东观余论》所记，隐居尚有画板帖、为杨琼瑶作奏稿二帖，今皆不传。（《海日楼札丛》卷八）

（三）著 作

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旧唐书·吕才传》）

初，志宁与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图，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铭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证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惟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七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佗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帝曰：善。（《新唐书·于志宁传》）

道士陶隐居作《发菩提心礼佛文》。(《破邪论》卷下)

陶隐居作《礼佛文》一卷。(《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桓闾为陶隐居执役十余年，一旦有青童白鹤自天而下，曰：太上召桓先生。隐居问：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矣。即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隐居之室，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害于物命，一纪之后但解形去世，为蓬莱都水监耳。隐居乃以草木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过。(《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药总诀》，梁陶隐居撰，论次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凡二卷。一本题云《药像教诀》，不著撰人名氏，文字并相类。(《证类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所引书传》)

《药性论》一本题曰陶隐居撰。然所记药性功效与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隐居所为。(《证类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所引书传》)

《古今刀剑录》一卷。右梁陶弘景撰，记古今刀剑。(《昭德先生读书志》卷三下)

《真诰》七卷。右梁陶弘景撰。皆真人口授之诰诀，故以为名。记许迈、许谧、杨羲诸仙受道之说。(《昭德先生读书志》卷三下)

《登真隐诀》二十五卷。右梁陶弘景撰。景以为学其诀者，

当由阶而登，真文多隐，非诀莫登，故以名书。凡七篇，十七条。隋志云。（《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卷二）

《道引养生图》一卷。右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势，如鸿鹤徘徊，鸳鸯戢羽之类，各绘像于其上。田伟家本少八势。（《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卷二）

《真诰》十卷。梁华阳隐句陶弘景撰。述杨羲、许迈、许玉斧遇仙真传授经文等事。（《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二）

《肘后百一方》三卷。晋葛洪撰，梁陶隐居增补。本名《肘后救卒方》，率多易得之药，凡八十六首。陶并七首，加二十二首，共为一百一首，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三）

跋《真诰》众灵教戒条后。此下方圆诸条，皆与佛《四十二章经》同，恐后人所附益，非杨、许书。（《东观余论》卷下）

跋《黄庭内景经》后。东晋兴宁二年，太岁甲子，上真司命紫虚元君南岳魏夫人降丹阳之句曲山，以上清诸真经授弟子琅琊王公府舍人杨君，使作隶书出，以传护军长史许君父子，魏传青策文，所谓起安启年经，乃始传得道之子当修玉文，《黄庭内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书，又名东华玉篇。自杨、许仙去，大传于世。而积载既久，转写多误，如以尊为前，以通为遍，以胥为骨，以飞为绯，此例甚众。惟华阳《登真隐诀》所载，乃杨、许旧本，可以依据。今参讎众本，而以《隐诀》是正，庶几不失真语云。（《东观余论》卷下）

道书中有《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

为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然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通志·校讎略》)

《陶隐居集》一卷,明时旧抄本。犹在张天如未辑《汉魏百三家(集)》以前。卷末,自文休承以下,传写叙次井井,可宝也。据跋,崇祯元年抄,校字避熹宗讳,可证也。(《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

《本草集注·序录》一卷。前佚数行,后均完好,后题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书题后又字二行,曰: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西陲石室旧藏,乙卯春予得影照本,不知原卷在何许也。本草之学,自《唐本草》行而《集注》微,《证类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时珍《纲目》行,《证类本草》亦仅存旧槧矣。《证类本草》序例二卷,其上卷载隐居序例之上半,起序文,论合药分剂料理法则,其标题曰:梁陶隐居序。下卷载诸病主药起,至引药对五条,亦隐居序例之下半,则不复注明陶氏说,使不得此卷校之,几令人疑为作《证类》时之序例矣。《证类》既截隐居序例为二,中间复夹入他家序例,凌杂无序。于诸病主药例中各病条下,于隐居所出诸药外复据他书续增,隐居所列诸病之旧次亦多错乱,如霍乱之后,次呕吐,次转筋,隐居原书霍乱标目乃大字直行,呕吐及转筋乃小字横行,盖霍乱是标目,呕吐、转筋乃霍乱条之子目,因霍乱而病呕吐、转筋也。《证类》则霍乱、呕吐、转筋三目并为大字,误析一病为三。又隐居原书中蛊之后,次以解毒,《证类》则于中蛊以后增出汗等九目,又将解毒一目析出,别为解百药及金石等毒,例殊失隐居之意。盖作《证类》者改窜隐居序例,攘为己有,故不著其所自出,又改所不当改,增所不当增,在作者固不虞七八百

年后，山岩绝塞，隐居之书一旦复出人间，致发其覆而暴其失也。又作《证类》诸人，似未见陶氏原书，隐居述诸病主药，曰：惟冷热须明，今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以省于烦注也。《证类》本引此书，乃作：惟冷热须明，今依《本经》、《别录》注于本条之下云云。而注中则曰：今详《唐本》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证类》竟以朱墨点记始于《唐本》，不知于隐居，是做到《证类》者未见原书之明证也。历代官修之书，无不卤莽灭裂，但以取盈卷帙为止，固不仅《证类本草》为然矣。此卷以一日之力写毕，故讹误不少，然有非写书者之过者。如序文中称《本草经》，谓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考《神农本草》，《七录》以下皆言三卷，未闻有四卷之本，四卷为三卷之讹无疑，而此卷与《证类》本均作四卷，可见承讹久矣。予十余年前得日本医家森约之校辑《本草集注》七卷手稿本，据《新修本草》等书校勘至密，塗乙狼籍，久欲为之写定付梓，今又得隐居原书，于此书殆有夙缘，爰先以此卷影印流传，森氏所辑，期异日成之。庶隐居之书不至遂绝于人间，亦艺林快事也。丙辰十月既望。（《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四）遺 址

卢子严说，早年随其懿亲郑常侍东之同游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垆迹犹在，后为佛舍。（《因话录》卷四）

陶隐居墓砖。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读其书，知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因书遗金陵天庆观黄冠，遂以入石。（《舆地碑记目》卷一）

华阳宫。《旧经》云：张真人炼丹之所也。梁朝陶隐居立为华阳上馆，唐天宝七年改今额。（《六朝事迹编类》卷十）

玉晨观。句容县东南四十五里，句曲洞北门之侧。《旧经》云：本晋许长史宅也。昔高辛时展上公，秦时巴陵侯，后汉时杜广平并于此学道得仙。梁武帝天监十三年，陶弘景奏请立为朱阳馆。唐贞观中，为紫微国师王先生改为华阳宫。天宝七年，为玄靖先生改紫阳观。前有郭真人养龙池，醮坛、丹井俱在。大中祥符中，奉敕改今额，曰玉晨观。（《六朝事迹编类》卷十）

太平观。《梁书》云：陶弘景读书万余卷，善琴棋，为诸王侍读。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曰：此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乃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唐贞观九年，为升真先生改为太平观。（《六朝事迹编类》卷十）

陶真人丹井，在华阳上馆前石桥之东，水甘冷，遇旱不竭。政和初，道士庄慎质修索得之，初去土三尺许得石井栏，已破段，合之尚全，环刻大字云：先生丹阳陶，仕齐奉朝请，壬申岁来山。栖身高静，自号隐居。同来弟子，吴郡陆敬游，其次，杨、王、吴、戴、陈、许，诸生供奉阶宇，湖孰潘逵及远近宗稟，不可具记，悠悠历代，讵勿识焉。梁天监三年八月十五日，钱唐陈懋宣书。及见砖甃，又穿数丈，获一员研，径九寸许，列十一趾，涤之，朱色粲然。又一鹊尾铜炉，仍见沙石间有丹一粒，大如芡实，光彩射人，亟欲取之，随坠井中。炉、研藏华阳，经寇攘亡之。又一井在灵宝院周真人池侧，亦隐居丹井也。（《茅山志》卷八）

昭真台。《真诰·翼真检》叙论真经，每云还封昭台，盖隐居宗修杨、许三真上法，此为藏真之室。山中久经盗斂，宝书真迹散逸无余，虽有志学之士，何由复见真人手泽，至此慨叹而已。玉晨观灵宝院即其地。（《茅山志》卷八）

青坛素塔。按《旧馆坛碑》，东位青坛，西表素塔。今塔已废，坛亦非旧。初皆隐居所建，表两教双修之义。当在玉晨观。（《茅山志》卷八）

隐居幽馆。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贵人罗淳一学道山中，尝忆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往观焉。惟铁绳悬一空棺，内有一剑并盂、镜各一而已。其圻瓮甃环绕，相次成文，隐起甃上，其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口口口之三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书迹神妙，当是隐居手书。墓既开，道士辈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淳一后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长乐林希子中所传如此。（《茅山志》卷八）

隐居炼丹炉。迹在华阳上馆，其地以水巽试之，逡巡，地干如月晕然。（《茅山志》卷八）

积金峰。在大茅峰、中茅峰之间，二峰相连，其长阿中有连石，古谓之积金山，陶隐居所住。东有一横垅，垅皆是石，形甚环奇，内有洞，即此峰也。（《至正金陵新志》卷五）

（五）师友门生

蒋负刍，义兴人也，与晋陵薛彪之为俗外之交，去来茅山，有志栖托，齐永明中，暂下都，陶隐居一遇便尽素契，陶后解绂，结宇中茅，仍请负刍度岭相就，经典、药术，常共论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

薛彪之，晋陵人也。烟炉神鼎之法无不辩其精粗，究其难易，门人有所请益，必诲示勤恳，随量而退。（《太平御览》卷六百

七十九引《三洞珠囊》)

薛彪之闻陶隐居委绂，架石室与蒋负刍邻居接宇。彪叹曰：彼二人者可为道友，何为久滞东川。于是命棹来归，便相就共住，日夕讲习。（《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道学传》）

潘洪字文盛，山阴人。幼辞家入山，修禀上法。陶贞白见而悦之，遂与投分共游诸处，寻求真书。（《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道学传》）

白龟潭。在衔珠山前。梁天监中隐居弟子周子良筑静室朱阳馆，因积茅覆屋，后有残茅，周欲敛积，见一白龟，长可六七寸许，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惟盾上有黑文，状如符书，不可识。捉取玩弄，复放之。潭去数百步外，来此积茅中，是表真瑞也。详见《周氏玄通记》。（《茅山志》卷八）

周真人池。隐居弟子周子良池，在灵宝院。（《茅山志》卷八）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隐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县人，寓居丹阳建康西乡清化里，祖文郎，宋江夏王国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继父耀旭，扬州议曹从事。母永嘉净光，怀娠五月，梦室中仙圣皆起行，四面来绕己身。以建武四年丁丑岁，正月二日人定时生。十岁随母还永嘉。天监七年隐居东游海岳，度峤至永嘉，憩于天师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内住，时年十二，因求入山，服节为弟子。始受《仙灵箓》、《老子五千文》、《西岳公禁虎豹符》，便专心于香灯之务。凡好书画，人间杂伎，经心则能。后随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从还茅岭，进受《五岳图》、《三皇内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亲族来投山居，

乃出就西阿别解住。子良密受灵旨，降真接仙，而隐居未尝有疑。盖自十四年乙未岁五月二十三夏至日，忽尔寝卧弥纶，良久乃起，是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①日昃后，平卧尸解，时年二十。隐居料理篋蕴，而永无遗记。十一月甲子旦，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书，遂登崎岳钩取，拜请将还，即是从来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纸杂糅，乃依日月次第，类为《周氏冥通记》四卷。隐居又撰周玄人传于记前，进之武皇帝。子良盖三生学道，初生周达家，次生刘伟家，其学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经三过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复落去，故经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虚灵，为保籍丞，后更奏东华，为保晨司，而刻名紫玉之简者矣。众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记中也。（《玄品录》卷四）

桓闾字音舒，东海丹徒人也。梁初昆仑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简，内有黄素写干君所出《太平经》三部。村人惊异，广于经所起静供养。先呈陶隐居。陶君云：此真干君古本。闾将经至都，便苦劳疟，诸治不愈。陶隐居闻云：此病非余，恐取经为咎。何不送经还本处。即依，二日送，寻愈。（《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

桓闾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华阳陶先生，为执役之士，辛勤十余年，性常谨默沈静，奉役之外，无所营为。一旦，有二青童白鹤，自空而下，集隐居庭中。隐居欣然临轩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隐居默然，心计门人无姓桓者，命求之，乃执役桓君耳。问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陶君欲师之，桓固执谦卑，不获请。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过，而淹延在世乎？愿为访之，他日相告。于是桓君服天衣，驾白鹤，升天而去。

① 按，据《周氏冥通记》周子良卒于通灵后的次年，即天监十五年，《玄品录》称当年卒，误。

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功虽及人，而害于物命。以此一纪之后，当解形去世，署蓬莱都水监耳。言讫乃去。陶君复以草木之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其过焉。后果解形得道。（《太平广记》卷十五引《神仙感遇传》）

桓闾为陶隐居执役十余年，一旦有青童白鹤自天而下，曰：太上召桓先生。隐居问：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矣。即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隐居之室，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害于物命，一纪之后但解形去世，为蓬莱都水监耳。隐居乃以草木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过。（《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旧唐书·王远知传》）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对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真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

（《太平广记》卷二十三引《谈宾录》）

许玉斧玄孙灵真，梁代在茅山，敕立嗣真馆，以褒远祖之德也。陶隐居所住朱阳馆，即是许长史旧宅也。（《上清道类事相》卷一引《道学传》）

宋初长沙景王就许长史宅地之东，起道士精舍。梁天监十三年敕贸此精舍为朱阳馆也。（《上清道类事相》卷一引《道学传》）

张绎字士和，吴郡人也。奖励学徒，整肃法事，屡讲众经，理致深密，词端华辩，当时所宗，梁武帝雅相钦赏。时陶隐居著《法检论》，明释、老二教，绎往复讨论，甚有条理，隐居嘉焉。专心道法，居贫守约，善八体书，别制云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老氏圣纪》）

王朗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师陶隐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隐居为制铭志，并设奠云：纸冕岂荣，随璜非宝，万里求真，絃兹内抱。（《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真诰》）

孙韬字文藏，会稽剡人也。入山师潘四明，参受真法，学摹写，遂大巧妙，后学王书，殊有深意，当时称之。南洞大碑及许长史坛碑并是韬迹也，陶隐居手为经题。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惟传孙韬与桓闾二人而已。（《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真诰》）

杨超字超远，东海人也，出入事陶隐居，往复与陶论难，得为人室。（《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

杨超字超远,东海人。梁时入吴包山为林屋馆主。门徒盈千人。又为华阳馆主,于华阳之东,别立召真馆焉。《(上清道类事相)卷一引《道学传》)

燕洞宫。《旧经》云:梁普通三年,晋陵县女子钱妙真幼年于此修行,诵《黄庭经》,积功三十年,道成,佩白练飞升,洞中有石室、醺坛存焉。天宝七年,奉敕于钱真人升仙之所建宫,度女道士。洞在宫东一百余步。《(六朝事迹编类)卷十)

晋陵人钱妙真于茅山燕口洞得道,门人立碑于茅山,邵陵王为观序,今具存焉。《(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

钱妙真,晋陵人也,幼而好道,便欲离俗,亲族逼以适人,泣涕固免,遂居大小二茅山,后往燕口洞,手裁书并诗七章与陶隐居。《(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老氏圣纪》)

钱妙真,晋陵女子也。辞家学道于隐居。普通年中,独处幽岩,诵《黄庭经》。时年十九,所居燕口洞,积三十年而仙,将去,手裁书并诗七首与隐居别。一日佩白练隐形入洞。敕其地为燕洞宫,至今女官奉祠。《(茅山志)卷十五)

江南间里间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也。《(颜氏家训)卷七)

司马天师明承祜,字紫微,形状类陶隐居。玄宗谓人曰:承祜,弘景后身也。《(尚书故实》)

本书征引(古典)文献一览

本书所徵引时贤著作、论文,其出处已详列该页脚注中,不烦两载。引用古代文献因正文仅有篇章名称,虑及版本差讹,谨列如次。

1.《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

1.1 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籤》(第22册)

1.1.1 李渤撰:真系(卷五)

1.1.2 周季通集:玄洲上卿苏君传(卷一百四)

1.1.3 李遵撰: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卷一百四)

1.1.4 邓云子撰:清灵真人裴君传(卷一百五)

1.1.5 魏华存撰:清虚真人王君内传(卷一百六)

1.1.6 紫阳真人周君内传(卷一百六)

1.1.7 谢朏撰:陶先生小传(卷一百七)

1.1.8 陶翊撰: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卷一百七)

1.1.9 李渤撰:梁茅山贞白先生传(卷一百七)

1.2 宋·贾嵩撰:《华阳陶隐居内传》(第5册)

1.3 宋·傅霄编:《华阳陶隐居集》(第23册)

1.4 梁·陶弘景撰:《真诰》(第20册)

1.5 梁·陶弘景撰:《登真隐诀》(第6册)

1.6 梁·陶弘景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第3册)

1.7 梁·陶弘景撰:《周氏冥通记》(第5册)

- 1.8 梁·陶弘景撰:《养性延命录》(第18册)
- 1.9 晋·葛洪撰,梁·陶弘景补阙:《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第33册)
- 1.10 元·刘大彬撰:《茅山志》(第5册)
- 1.11 《桓真人升仙记》(第5册)
- 1.12 《紫阳真人内传》(第5册)
- 1.13 《三洞珠囊》(第25册)
- 1.14 孟安排撰:《道教义枢》(第24册)
- 1.15 《太平经》(第24册)
- 1.16 《上清经秘诀》(第32册)
- 1.17 《上清三真旨要玉诀》(第6册)
- 1.18 《上清道类事相》(第24册)
- 1.19 《三天内解经》(第28册)
- 1.20 《鬼谷子》(第21册)
- 1.21 宋·李霖撰:《道德真经取善集》(第13册)
- 1.22 宋·陈景元:《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第2册)
- 1.23 元·张天雨集:《玄品录》(第18册)
- 2.《藏外道书》,巴蜀书社影印,1994年。
 - 2.1 《登真隐诀佚文》(第21册)
 - 2.2 《茅山全志》(第19册)
- 3.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年。
 - 3.1 《陶隐居集》(第4册)
 - 3.2 《沈隐侯集》(第4册)
 - 3.3 《梁武帝集》(第4册)
- 4.民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 4.1 梁·陶弘景撰:《真诰》(据学津讨源本排印)
 - 4.2 梁·陶弘景撰:《灵宝真灵位业图》(据秘册汇函影印)
 - 4.3 梁·陶弘景撰:《古今刀剑录》(据百川学海排印)

- 4.4 《佛说四十二章经》(据学津讨源本影印)
- 4.5 宋·王质撰:《绍陶录》(据十万卷楼丛书排印)
- 4.6 明·郭子章:《螭衣生剑记》(据宝颜堂秘笈排印)
- 4.7 清·汪士鋐撰:《瘞鹤铭考》(据粤雅堂丛书影印)
- 4.8 清·吴东发撰:《瘞鹤铭考》(据涉闻梓旧排印)
5.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光盘版。
 - 5.1 唐·张怀瓘:《书断》
 - 5.2 唐·窦易:《述书赋》
 - 5.3 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
 - 5.4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 5.5 唐·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
 - 5.6 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
 - 5.7 宋·朱长文:《墨池编》
 - 5.8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
 - 5.9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 5.10 宋·姜夔:《绉帖平》
 - 5.11 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二笔、三笔》
 - 5.12 《全唐诗》
6.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排印本,1982年,第2版。
7.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62年。
8.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4年。
9. 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4年。
10. 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2年。
11.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3年。
1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
13. 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3年。
14.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
15.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
1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1956年。

17.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排印本,1977年。
18. 唐·释法琳:《辩正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
19. 唐·释法琳:《破邪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
20. 唐·释玄嶷:《甄正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
21. 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2. 唐·释道宣编:《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3.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4.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2年,新1版。
25. 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排印本,1962年。
26. 宋·李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27. 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排印本,1961年。
28. 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
29.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30.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1.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91年。
32.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排印本,1960年。
33.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排印本,1985年。
34.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排印本,1997年。
35.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0年。
36. 唐·李绰:《尚书故实》,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排印本,2000年。
37. 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排印本,1984年。
38. 唐·赵璘:《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79年。
39. 宋·张敦颐著,张忱石点校:《六朝事迹编类》,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95年。
40.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排印本,1983年。

41. 宋·李石著,李之亮点校:《续博物志》,巴蜀书社,排印本,1991年。
42.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上海书店影印,《南京文献》,1991年。
43.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4. 明·林茂桂:《南北朝新语》,中国书店,1990年。
45. 清·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排印本,2001年。
46.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排印本,1984年。
47.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年。
48.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排印本,1998年。
49. 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8年。

后 记

书的末尾循例总要说一段话,其内容不外叙述写作缘起,感谢师友支持,本书亦难免俗。《陶弘景丛考》的出版经历虽较前一本书《神农本草经研究》曲折得多,现在却少了几分作后记的兴趣,勉力为之,总有生硬之感。

翻检日记,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开始于2000年5月,当年底写成“华阳陶隐居年谱长编”,次年初赴京学习,历时半年,2001年7月19日始作本书第一篇“陶弘景与梁武帝”,迄2002年4月写竟“《真诰》与《登真隐诀》”,约40万字的书稿,时间不足一年,若和费时12年的《神农本草经研究》相较,本书可谓是“急就章”了。尽管如此,自问对本书投入的心力实不在《本草经》研究之下,其间的苦甘,的确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多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甚广,除广义的历史学科外,还包括宗教学、目录学和书法艺术等,这些学问对于从事医学科学的我而言皆非专门,冒昧地把自己研读陶弘景的一点心得写出,其浅谬之处,尤请诸博雅君子赐教。

本书的顺利出版,承姜生、虞舜两博士费心多多,资料借阅,得淘书斋王海涛君鼎力相助,书笺出陈滞冬尊兄之手,精雅绝伦,编辑由金之平女士担任,恪尽其责,谨此敬申谢忱。

王家葵

壬午中伏写于巴州旅次